臺灣史研究

第十七卷　第一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編 輯 委 員 會

《臺灣史研究》第十七卷第一期

主　　編：許雪姬
執行編輯：鍾淑敏、劉士永
編輯委員：吳文星、吳聰敏、呂紹理、林玉茹、林會承
　　　　　林滿紅、施添福、詹素娟、鍾淑敏、劉士永
助理編輯：洪麗完、陳宗仁
編輯助理：劉鴻德、張雅惠
編輯顧問：陳奇祿、許倬雲、李亦園、曹永和、李國祁
　　　　　王世慶、賴澤涵、麥朝成、胡　佛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Editorial Board

Editor-in-chief	Hsueh-chi Hsu		
Executive Editors	Shu-min Chung	Shi-yung Liu	
Editors	Wen-hsing Wu	Tsong-min Wu	Shao-li Lu
	Yu-ju Lin	Hui-cheng Lin	Man-houng Lin
	Teng-fu Shih	Su-chuan Chan	Shu-min Chung
	Shi-yung Liu		
Assistant Editors	Li-wan Hung	Tsung-jen Chen	
Editorial Assistant	Feng-ted Liu	Ya-hui Chang	
Advisors	Chi-lu Chen	Cho-yun Hsu	Yih-yuan Li
	Yung-ho Tsao	Kuo-chi Lee	Shih-ching Wang
	Jeh-hang Lai	Chao-cheng Mai	Fu Hu

目　　錄

《臺灣史研究》第十七卷第一期

研究論著

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臺灣原住民部落整併／康培德 ……………………1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Problematic Military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Claims of Count Maurice Auguste comte de Benyowsky
in Formosa during 1771／Ian Inkster ……………………………………27

臺灣米價變動與「臺運」變遷之關聯（1783-1850）／吳玲青 …………71

全新的「舊慣」：
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改造（1898-1943）／曾文亮 ……125

研究討論

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一個歷史書寫的反省與展望／郭文華 ………175

書評

評鮑曉歐著《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陳宗仁 ……………………………211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臺灣史研究》
第十七卷第一期，頁 1-25
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臺灣原住民部落整併*

康培德**

摘　要

本文探討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時，對原住民部落的整併理念、實施過程與成效。文章在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地領地控制脈絡下，進一步以大武郡與打猫社為例，討論荷蘭人如何處理整併後的部落權力結構與村社規模。東印度公司之所以於平原地區實施部落整併，係遷就其宣教活動與行政統治；因此，村社作為殖民地的底層單位，其規模以及村社首長的派任，即成為荷蘭人整併前後的考量。荷蘭人在部落整併的做法上，雖然大多會循原有的部落社會網絡與族人的意願，但整併的成效不一。到了公司統治末期，整併形同蛇尾，甚至傳聞出加入叛離荷蘭人勢力的案例。

關鍵詞：荷蘭東印度公司、部落整併、臺灣原住民

---

* 本文改寫、延伸自原發表於2008年11月7-9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文化創造與社會實踐：南島民族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之論文。本文的完成，須感謝研討會與會學者的建議與批評，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作者在此一併銘謝之。文中的漏失、誤引等，則為作者的責任。

** 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來稿日期：2010 年 2 月 4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6 月 8 日。

一、前言
二、部落遷徙與領地控管
三、部落整併的理念
四、實施過程與成效
五、部落權力結構與村社規模：大武郡社與打猫社的案例
六、部落整併的尾聲
七、結論

一、前言

1622 年，金獅號（Gouden Leeuw）船員因海難飄流至小琉球（Lamey）而遭島民殺害，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報復，遂於 1633 年 11 月派遣 Claen Bruyn，由其率領一支由公司士兵及新港、蕭壠社戰士組成的部隊登陸小琉球，開啟了島民流離四散的歷史大幕。[1] 事後，荷蘭人除將殘餘的小琉球人分配給大員市鎮公司雇員為僕外，新港社人以「增加人口」為由，對公司提請安置小琉球人入社的要求，聽來或有不可思議之感，但臺灣議會仍同意所請，將部分小琉球人安置於不久前雙方還短兵相接的新港社人中。[2]

新港社人的動機其實不難理解，畢竟在當時，村社規模大小或人口多寡與部落勢力消長息息相關，何況小琉球的殘餘人口以婦孺為多。不過，荷蘭東印度公司雖然答應其請求，其實對原住民部落的整併或人口的遷移自有主張與想法。[3]

---

1 有關東印度公司對小琉球島民征討的始末，請參考曹永和、包樂史（Leonard Blussé）的研究。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0），頁 135-237；Leonard Blussé, “The Cave of the Black Spirits: Searching for a Vanished People,” in David Blundell, ed., *Austronesian Taiwan: Linguistics, History, Ethnology, and Prehistory*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pp. 143-147.

2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I: 1636-1645* (以下簡稱：*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Taipei: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0), pp. 116, 122.

3 本文對部落、（村）社等詞的使用原則，前者用於強調原住民本身自主性，或著重社會、文化面的

針對這一課題，學界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殖民地研究，多注重於「原居地」住民的治略，如地方會議、村社首長制、村社戶口調查、年貢制度及贌社等，[4] 而較少涉及聚落分合或人口遷徙的討論；尤其是公司對部落整併的作為，已涉及殖民者對聚落單位此一底層空間結構的控制問題。本文即鎖定此研究視角，以時序為主軸，討論荷蘭人的臺灣原住民部落整併理念、實施概況與成效，並透過今日彰化、雲林一帶的實證案例，進而探究荷蘭人如何處理整併後的殖民地底層部落權力結構。

二、部落遷徙與領地控管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原住民部落整併政策，當然不是以原住民部落的需求為首要考量——如新港社人吸納小琉球人的案例，公司自有基於其統治理念的想法。若仍以新港社為例，公司透過親荷新港社人口的增加，將會相對削弱不久前仍與荷蘭人為敵的麻豆、蕭壠等社勢力，此即有維持地域勢力平衡的考量。除此之外，由於新港社係基督化最深的原住民村社，將小琉球人安置其中，亦有助於對他們的「教化」。不僅如此，觀察荷蘭東印度公司相關的作為，可以得到更宏觀的圖象。

一般來說，部落整併的前提是人口遷移，其中若涉及離島、平原、山區等不同領地的統治，則東印度公司對不同空間屬性的做法，又可區分為「淨空離島人口」與「山區住民遷住平地」等兩大主軸。而這些遭致強制或鼓勵遷徙的部落，大多移至公司易於控制的平原地區，以與當地部落整併或安置在足以發揮影響力的範圍之內。不過，遷徙政策的實施並不順利，成效也未達到預期。[5]

情境，如原住民社會原有的「部落長老」、「部落權力」、「跨部落關係」、「為周遭部落所覬覦」等；後者則多用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立場，或偏向於實體的聚落，如公司派任的「村社首長」、「村社規模」、「村社戶口調查」、「棄社他遷」等。

4 翁佳音，〈地方會議、贌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史研究筆記（一）〉，《臺灣文獻》51: 3（2000 年 9 月），頁 263-281；康培德，《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荷西明鄭時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頁 113-218。其他泛論性著作，也請參考村上直次郎，〈荷蘭人的番社教化〉，收於村上直次郎等著、許賢瑤譯，《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頁 23-39；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頁 37-38、41-42、60-62。

5 本節敘述多取自康培德，〈離島淨空與平原移住：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原住民聚落遷移政策〉，《新史學》20: 3（2009 年 9 月），頁 101-128。

在淨空離島人口方面，公司僅完成小琉球的土著遷移，且這是在近乎滅族的報復征討行動後，針對殘存婦孺、老人的後續作業。其後，對蘭嶼（Bottol Tatachel）的淨空政策，隨著公司對臺灣東部探金活動熱潮的減緩，終於無疾而終；龜山島（Malabariga）方面，在探知其為無人島後，亦白忙一場。

至於山區住民的平地移住，重點在小規模及位於交通要道上的村社。小型部落方面，大多僅是部分家戶對荷蘭人政策的響應或配合，如山豬毛（Sotimor）、糞地（Polti）等社，原因可能與部落權力或資源分配紛爭有關；全社動員者僅少數，如勃朗社（Potlongh）。但不論部分或全社的平地移住，鮮少成功的案例。交通要道上的村社，如荷蘭人自 1645 年起試圖將林邊溪上游、大武溪河谷往來前後山的陸路交通——所謂「新卑南路徑」（den nieuwen Pimabasen wech）——納入掌控，途中的力里社（Tourikidick）一度成為公司移住政策的對象；其他如沿阿塱壹古道的內獅（Borboras）、內文（Taccabul）和阿塱壹（Calingit）三社，亦被公司要求遷到屏東平原的放索社附近就近管理，但幾乎都徒勞無功。

整體而言，離島原住民一經船隻載運遷移後，難有機會重返故居，故公司淨空離島人口的成敗，取決於政策執行、貫徹的程度。至於山區住民的平地移住，原住民能有較大的自主性，是否遷移，往往取決於部落本身的決定；而移動過程涉及的居住、營生環境轉變，以及與移入地部落的互動關係，也往往讓公司無法全然掌握成敗關鍵。儘管如此，由東印度公司屢屢嘗試離島淨空與平地移住政策，可以理解這些措施的要點係在於：將四散於離島或山區要道的人口移至平地易於控管處，而後續的安置作業及相關的平地原住部落，就會進一步產生「部落整併」作為，如此，即涉及荷蘭人的部落整併理念了。

三、部落整併的理念

從東印度公司的立場來看，土著部落整併與否，與領地控管理念為前提的遷移政策一樣，都是為了便於統治與管理，背後的考量則是宣教事業的推廣。

1636 年，荷蘭人正式將今臺南縣一帶原住民村社納入統治後，開始在各社設置學校、教堂，從事土著的基督教改宗工作。以鄰近大員商館的部落為例，1637 年，公司即將 Teopang、知母義（Tivalukang）、Tagupta 與 Ritbe 等社人口遷到鄰

近教堂所在地的大目降社。[6] 到了 1659 年，赤嵌（Provintia）地方官猫難實叮（Jacobus Valentijn）在率員訪視公司轄下村社的基督教推廣進度時，為了節省宣教成本，便將大目降社併入新港社。[7] 待鄭成功勢力接手臺灣，1664 年的《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顯示，大目降已是「民」社，不是原住民為主的「番」社。[8]

類似的情形，1638 年 2 月，臺灣長官范德勃格（Johannes van der Burch）與牧師利未士（Gerard Levius）至目加溜灣社視察基督教傳播成果時，[9] 可以發現前來聚會者，除目加溜灣社的 910 人外，鄰近的 Magkinam 與 Amamoliangh 兩小社亦分別有 68、30 人前來。[10] 文獻雖未出現三社是否合一的描述或討論，但由此後地方會議紀錄不見 Magkinam 與 Amamoliangh 的存在，推知可能被公司以目加溜灣社統稱一併視之。至於 1639 年底，Nicolaas Couckebacker 以專員身分前往東京灣與臺灣的視察報告中，則在提及大武壠（Tevorangh）、Teijnewangh、Sigit 等社（今玉井鄉一帶）時，將它們合而為一。[11] 前述案例或許不脫宣教事業的考量，[12] 然而，公司關於部落整併工作的思維，除宗教（kerkelijk）因素外，尚有更根本的統治考量。

---

6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ptions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1903), p. 159.

7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V, 1655-1662* (以下簡稱：*DZIV*) (Gravenhage: M. Nijhoff, 2000), p. 315; Shaogang Chen, *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 een Vergeten Geschiedeni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eit Leiden, 1995), p. 467；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0），頁 516-517。

8 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85。

9 荷蘭時代教會人士的譯名，請參考賴永祥，〈明末荷蘭駐臺傳教人員之陣容〉，《臺灣風物》16: 3（1966 年 9 月），頁 9-11。

10 Leonard Blussé, W. E. Van Opstall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 1629-1641* (以下簡稱：*DZI*) (Gravenhage: M. Nijhoff, 1986), p. 403；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第 1 冊，頁 378。

11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244-247;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182-183.

12 東印度公司對基督教傳播的考量，除落實在部落整併外，前述的部落遷徙亦有相同的想法。1644 年 3 月初，臺灣議會派資深商務員凱撒（Cornelis Sesaer）與商務員范德艾登（Johannes van der Eynde）前去南路麻里麻崙社執行原住民罪犯的死刑時，兩人亦奉命調查是否可以讓此區高山上的遠方村社搬遷下山，移到平原建立新的村社。原因是假如這些山地人讓牧師和教師伸手可及，將有益於基督教的進展。見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以下簡稱：*DZII*) (Gravenhage: M. Nijhoff, 1995), pp. 232-233;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 426；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第 2 冊，頁 241。

1644年，長官麥爾（Maximiliaen Lemaire）與臺灣議會正式推廣一年一度的人口戶數普查、貢稅徵收、地方會議等制度，以拓展對原住民的統治。這三項制度，皆以村社為單位：人口戶數普查，目的在調查每一社的人數與家戶數；貢稅，則以調查所得的村社家戶數作為徵收基數，但公司從長老中挑派的頭人，在職期間可以免除貢稅；地方會議召開時，則以村社為單位推派代表參加，公司依其人口規模挑出一定人數的長老，授以村社首長職位。這些制度的推行，奠定了公司以村社為基礎的原住民統治，而部落整併的政治統治（bestuurlijk／politiek）理念，亦需在其中探求。

以 1640 年代初期才納入荷蘭東印度公司勢力範圍的北臺灣淡水一帶為例，在 1646 年 9 月一份由一名士兵與 Lucas Kilas 起草的「淡水河與武勝灣河沿岸歸順村社戶口調查紀錄」中，明載北海岸有圭柔（Senaer）、Kipas 兩社，分別有 131、108 人，以及 37、32 戶；前者的頭人是乃胭（Tenayan），後者為嘎奇臘（Kakijlach）。[13] 隔年 4 月，臺灣議會議長 Overtwater 回覆駐淡水下席商務員 Jacob Nolpé 的信，則提及大員方面參考 Jacob Nolpé 的意見後，同意將圭柔與 Kabila（即 Kipas）兩社土著湊合在一起（versamelinge en bijeencomste），並對 Nolpé 的努力予以肯定感謝。[14] 因此，同年 5 月的全臺村社戶口調查紀錄，僅剩圭柔（Chenaer）社（人口 294、戶數 80），頭人為乃胭（Teman）與嘎奇臘（Kalilach）兩人。[15]

再以屏東平原為例，前述 Nicolaas Couckebacker 於 1639 年底的視察報告中，曾將該地分成五塊：一是打狗南方，含有阿猴、萬丹（Pandandel）、Galirolurongh、麻里麻崙、Narariangh 等社，估計有 1,450 名左右的壯漢；二是靠近山脈的地方，含有力力、Sengwen、Tarakeij、Jamick、Keersangan 等五社，統稱 Dolotocq，估計有 1,200 名壯漢；三是位於大員南方約 2 天路程、依山傍海的地區，有放索、Salomo、Tangenij、Tavoulangh 等四社，約可集結 750 名壯漢；四是大員東邊約 1 天路程的丘陵處，為大木連、塔樓、Sourioriol；五是大澤機一帶，更靠近山區，並由三、四社組成。[16] 1641 年 4 月，新任長官陶德（Paulus Traudenius）於赤嵌舉辦地方會議時，南路村社有 20 名頭人與會，分別代表位在屏東平原的 8 個村

---

[13]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123-124.
[14]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170-171.
[15]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 188.
[16]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244, 246-247.

社——即放索、阿猴、Sorriau（即 Sourioriol）、力力、麻里麻崙、萬丹、大木連和茄藤；其中，並註明放索係由六社所組成。[17]

到了 1644 年，臺灣長官卡隆（François Caron）將地方會議分為南北兩路分開舉辦。3 月底北路地方會議時，從南路前來觀禮的村社長老，除了放索、阿猴、力力、麻里麻崙、大木連、茄藤等社外，還有塔樓、大澤機、Sarakarrakey 與 Dollatock（即前述的 Dolotocq）派出代表。但 4 月以南路村社為主召開地方會議時，屏東平原與會的代表村社，則為放索、阿猴、力力、麻里麻崙、大木連、茄藤、塔樓、大澤機以及萬丹共九社。[18] 同年 10 月，卡隆給總督范迪門（Anthonio van Diemen）的書信，報告南北兩路地方會議的進度，即提到南路原有三十九社（含山區部落代表，如士文、七家陳、草山、佳平等），已組成十八個大社。[19] 到了年底，卡隆在給前往南路擔任政務員 Antony Boey 的命令中，提及分散四處的塔樓、Dolatock（即前述的 Dolotocq）和放索等社土著，曾於年前請求每一部落都能派駐一名教師，以教導社眾基督教基礎教義。但因部落數太多，公司無法派駐這麼多教師，在與部落首長商討後，決定將當地的二十八個小社（如 Sengwen、Tarakeij 或 Tarahey、Jamick、Keersangan 或 Cerangangh、Ariariangh、Sorriau、萬丹等小型部落）合併為放索、阿猴、力力、麻里麻崙、大木連、Dolatock、塔樓、大澤機等八社。Boey 即奉命去查證整併的進度，並負責完成整併的工作。[20]

隔年（1645 年）4 月，南路地方會議召開時，屏東平原的與會村社單位，與前一年度一樣，為「放索」、「阿猴」、「力力與 Tarahey」、「麻里麻崙與 Ariariangh」、「大木連」、「茄藤、Dolatocq 與 Cerangangh」、「塔樓」、「大澤機」以及「萬丹」等 9 個單位。[21] 之後，除了從山區移住的小型部落外，南路地方會議基本上一直

---

17 *DZII*, p. 2;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 265；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2-3。

18 *DZII*, pp. 241, 250；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251、261-262。

19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481-482, 486.

20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504, 509.

21 *DZII*, p. 373；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393-395。Ariariangh 在 1645 年的紀錄中為社名，與麻里麻崙（Verovorongh）社並列為一單位，獲頒公司籐杖的長老有 Wissur、Ouvey、Sakodis、Dakomey 等 4 人，全為續任。1644 年的地方會議紀錄裡，僅有麻里麻崙(Vorrevorongh)社，無 Ariariangh「社」的資料；但麻里麻崙社獲頒公司籐杖的長老有 Visschor（即 Wissur）、Opey（即 Ouvey）、Sakodijs（即 Sakodis）、Takoney（即 Dakomey）、Arrearejang（即 Ariariangh）等 5 人。1644 年的長老名在 1645 年成了社名。

維持這九個社，直到 1648 年萬丹於文獻中消逝不見，僅餘放索等八社。[22]

大員商館與南路部落首長商議後達成的部落整併結果，即為日後所稱的「鳳山八社」——放索、阿猴、力力、大木連（上淡水）、麻里麻崙（下淡水）、茄藤、塔樓、大澤機——前身。[23] 不過，屏東平原的部落整併，並非只為了因應部落長老關於基督教義教導的期待；對東印度公司而言，早在 1645 年 7 月總督范德萊恩（Cornelis van der Lijn）回覆長官卡隆的書信即已指出，部落整併後，配合人口、戶數普查的落實，除了讓公司易於收集貢稅外，更可藉此充分掌握壯漢人數與武力規模。[24]

四、實施過程與成效

不過，部落整併過程並不順利，成效也不一。以南路一帶為例，1642 年初，原與荷蘭人結盟的瑯嶠人，與荷方關係轉劣，東印度公司乃於年底派 Johannes Lamotius 領軍，以放索、下淡水兩社為盟軍出兵征討，馘首 40 顆，俘虜 7 名男女、小孩，瑯嶠王一子陣亡，轄下五社被焚。瑯嶠王本人，則傳說與其兄弟、隨從逃到知本社；公司繼而派兵懲罰知本社，並將該社遷往知本溪一帶的平地。[25] 戰後，公司計劃讓親荷的瑯嶠人移至南路平原定居，而戰役中與瑯嶠人交戰的放索社頭人，則邀請對方移住放索社；但瑯嶠人不肯接受，寧願留在先前已居住一段時間的居地，原因是他們和放索人拜的神祇不同。[26] 由此可見，瑯嶠人與放索社

---

22 *DZII*, pp.480, 553-554;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I, 1648-1655* (以下簡稱：*DZIII*) (Gravenhage: M. Nijhoff, 1996), pp. 15, 108-109；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510-511、610-611；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第 3 冊，頁 14、112-113。

23 有關清代文獻中的鳳山八社與荷蘭時代屏東平原的村社對應關係，請參考李國銘，〈屏東平原族群分類再議〉，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 368-371。

24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 552.

25 *DZII*, pp. 78, 82-85；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332-333, 335-337, 340, 342, 345-346, 357-358, 360-362；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74-75、78-81。

26 *DZII*, pp. 62-63;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59；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 353.

整併失利，除了原就處於敵對的狀態外，社會文化屬性的不同，[27] 也是重要因素。

其他透過公司代表與部落首長商討後的整併，一開始也不順。1645 年 6 月，東印度公司派駐在大木連的商務員 Anthony Boey 即說：他在數個場合力促（甚至稍微語帶威脅）放索附近小社併到（'t combineren）較大主社，卻毫無用處，對方並不配合要求。至於原本要從山上移住力力社定居、最終與放索社進一步合併的勃朗、陳阿修兩社，就更不用說了，整個計劃幾乎淪為紙上談兵。[28]

再以公司在臺行政重心附近的大目降社為例，陶德任職臺灣長官期間（ca. 1640–1643），新大目降一些家戶——總計 60 人，為了接受基督教教育，要求遷至新港社定居，並獲同意。不久之後，這些族人又請求遷回原居地，由於再三遭到拒絕，遂自行搬出新港社，回到先前住處，搭蓋新房舍，並就地栽種稻作。續任的臺灣長官卡隆，正處於合併諸小社的過程中，為防止類似的事再次發生，乃下令時任代理政務員（subsituyt politijck）的范勃亨（Joost van Bergen），在 200 名新港、大目降、目加溜灣社的戰士協助下，先是破壞這些擅自搬離新港社的大目降社人房舍與田地，再將族人遷回新港，嚴加告誡；最後，還將 7 名主事者移送大員接受處分，其中 2 名帶頭族人則予以拘禁。[29]

至於北臺灣淡水一帶的圭柔社（Chettaer），其在 1648 年的全臺村社戶口調查紀錄中，帳面上的人口 280、戶數 84，仍為整併後的狀態。不過，1650 年起的紀錄，所謂圭柔社即不再是一個村社單位，而成為圭柔（Chinar）、Kijpabe（即 Kipas）兩社，分別為 160、193 人，40、50 戶。1654 年的紀錄，竟進一步分成圭

---

27 費羅禮（Raleigh Ferrell）針對全臺南島語族的系統分類中，放索與瑯嶠的地理分布，文化屬性分屬濱海文化（littoral culture）與排灣文化，語言屬性分屬排灣第二群（Paiwanic II）與排灣第一群（Paiwanic I）。見 Raleigh Ferrell, *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69), pp. 24-29. 王益壽的平埔族群（lowland aborigines）分布圖，亦將放索（Pangsola-Dolatok）與瑯嶠（Lungkiau）分為不同的兩群人。I-shou Wang, “Cultural Contact and the Migration of Taiwan’s Aborigin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onald G. Knapp, ed., *China’s Island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0), p. 33.

28 *DZII*, p. 393-394;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538-539；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417。

29 *DRII*, pp. 247-248;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481-482, 486;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205-206；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258。

柔（Chinar）、Kibbabe（即 Kipas）、大屯（Ttona）三社，人口為 130、153、82，戶數 30、31、24。[30] 翌年 1655 年，調查紀錄仍維持前一年的三社，人口依序分別為 81、95、77，戶數 22、25、23；不過，Kipas 改以頭人姓名嘎奇臘為社名。[31]

圭柔社自 1650 年代逐步分為數小社，反映的應是 1630 年代淡水一帶小社林立的狀態。當時，西班牙 Jacinto Esquivel 神父提到：圭柔社人散居於 8、9 個小社，西班牙人為了佈道上的方便，乃仿效大雞籠、金包里等，將它們集中為一社。[32] 其後接管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雖曾一度嘗試整併，仍不敵原有的小社分立狀態。追究其因，可從「社名為頭人名」現象略窺端倪。

原住民「村社」係由數個共居的親屬群所組成，親屬群的地理空間分布若呈現集中趨勢，即成外人眼中的一社。反之，若呈散狀分布，就成了數個社。[33] 若親屬群以其要人為名號，則成了外人以為的社名。[34] 公司將散狀分布的親屬群集中安置，雖然形成帳面上的村社單位，充其量是不同親屬群的混合聚集（conglomeration），不必然能讓彼此整合（integration），此即圭柔社整併過程曇花一現的可能原因。

如果部落整併涉及公司行政統治與宣教推展等考量，站在公司的立場，整併後的部落權力結構、村社規模等因素，即為荷蘭人關心的議題。以部落權力結構為例，既然 1644 年起公司建立了以村社為基礎的原住民統治策略，並依人口規模挑出一定人數的長老授予村社首長職位，讓他們在殖民地底層行政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則部落整併必然會造成行政權力的再分配。而部落權力重分配的結果，亦可檢視部落整併的成效是表面上的混合聚集，還是真正朝整合的方向發展。

---

30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II: 1646-1654* (以下簡稱：*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Taipei: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6), pp. 235, 293, 501.

31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下卷：社會・文化，頁 22。

32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pp. 166, 181-182, 184.

33 Peter Kang, "A Brief Note on the Possibl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Large Village Size of the Siraya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in Leonard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2003), pp. 120-121.

34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74-77、86-87。

依邵式柏對臺南一帶土著社會的討論可知，原住民部落係由不同的親屬群組成，每一親屬群各有長老。[35] 東印度公司的村社首長職，基本上係從部落原有的長老中挑派配合度高者任命之，首長人數少於原代表親屬群的長老數。公司的理念，係希望擔任首長職的長老能打破原有的親屬群樊籬，成為整個部落的領導者。前述卡隆於 1644 年 10 月給總督迪門的信，提到公司底層的行政權力分配時，認為只要依各社規模，由公司選派 1 至 4 名最有能力者擔任領導人，遵循荷蘭人的命令行事即可；至於指派的首長，應負責整個村社，而不只是一個區塊（wijck）而已。[36] 卡隆所指的社中區塊，應該就是原部落長老所屬親屬群的居住空間。

五、部落權力結構與村社規模：大武郡社與打猫社的案例

我們可從文獻中找到大武郡社、打猫社兩個案例，略窺東印度公司在部落整併後的權力結構安排。前者位於濁水溪沖積扇北半部的二林地區，時間是 1640 年代下半；後者，則發生在 1650 年代上半的虎尾壠地區。

1645 年 1 月，東印度公司決定打通大員至淡水、雞籠間的陸路，派商務員凱薩（Cornelis Ceasar）、Hendrik Steen 與上尉彭恩（Pieter Boon）等，率領 210 名士兵，沿途征討與公司敵對的村社。

征伐隊於 1 月 22 日出發，2 月 16 日返抵大員；途中，除對敵社採焦土戰術外，並與臣服村社締結條約。[37] 當時，二林地區有一個稱為 Terriam 的部落，經戰火衝擊後僅餘 5 戶人家，臺灣議會乃決議將其遷至東螺社（Groot Davole，又

35　John R. Shepherd (邵式柏),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Arlington, V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pp. 24-26；康培德，〈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對西拉雅人村社概念變遷的影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2000 年平埔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00 年 10 月 23 至 25 日）。

36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482, 486.

37　*DZII*, p. 360;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517, 519-521；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380；郭輝翻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第一冊，頁 459、464；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二）》（東京：平凡社，1972），頁 342、349。

稱 Abasche，之後更正為 Dobale Bajen），但 Terriam 人要求遷往大突社（Turchara）。最後，公司於同年 10 月應北路牧師范布鍊（Simon van Breen）所請，准 Terriam 人與東螺社、Saribalo 等一併遷往虎尾壠，以方便范布鍊的宣教工作；不過，此一基於宣教便利性的整併考量，並不如臺南的案例順利。隔年地方會議時，臺灣長官宣布 Terriam 併入大武郡，東螺、Saribalo 兩社則不動；Terriam 長老 Tabaroua（又記為 Taboroal、Tavoro Al 等），則成為合併後的大武郡社頭人代表之一。[38] 到了 1648 年，東印度公司讓 Kakar Tacheybau 也併入大武郡社。[39] 表一即為大武郡、Terriam、Kakar Tacheybau 等三社歷任村社首長名單。

表一、大武郡、Terriam、Kakar Tacheybau 社歷任村社首長名單

大武郡		H B	B	B	B	B	B	B	B	B	B	B
Terriam		TA	TA	TA	TA	TA	TA	TA	TA	TA	TA	TA
Kakar Tacheybau		Tara	Tara	Tara	Tara	Tara						
年份	1644	1645	1646	1647	1648	1649	1650	1651	1653	1654	1655	1656
大事紀		**大武郡與** Terriam **合併**			**大武郡與** Kakar Tacheybau **合併**							

說明：1. 1652 年無資料，1649、1653 年資料係分別推自下一年度。
2. 人名代號部分，H 指 Hedey；B 指 Botley（又拼為 Tabotteley、Tabatteley、Tabottelij、Tabottaley、Tabotteyly）；TA 指 Taboro-Al（又拼為 Tabaroua、Taboroal）；Tara 指 Tarabeiaula（又拼為 Tarabei Aula、Tarabeyaula）。

資料來源：*DZII*, pp. 241, 471, 549; *DZIII*, pp.10, 103, 184, 311, 474; *DZIV*, p.13.

大武郡社與 Terriam 社的人口規模其實相當懸殊，約 10 比 1；但東印度公司的首長派任方式，對此採取彈性的權宜之計。大武郡社原有的派任首長，僅 Hedey、Botley（代號分別為 H、B）2 人。公司在 1646 年將 Terriam 社併入後，原大武郡社首長 Hedey 去世留下職缺，公司即任命 Terriam 社首長 Tabaroua（代號為 TA）填補，並與 Botley 共同擔任大武郡社首長；並以村社規模為由，不再

---

38 *DZII*, pp. 362, 378, 442-443, 471；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382、401、469、471、500。

39 *DZIII*, p. 10；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頁 10。

從原大武郡社挑派新首長。1648 年，又有 Kakar Tacheybau 社併入大武郡社，公司任命原 Kakar Tacheybau 社首長 Tarabeyaula（Tarabeiaula，代號為 Tara），與大武郡出身的 Botley（Tabotteley），以及 Terriam 出身的 Tabaroua（Taboroal）一同擔任新大武郡社首長。待 1650 年地方會議舉行時，公司以 Tarabeyaula 缺席為由，解除他的首長職，使大武郡社首長人數回歸 2 名。[40] 換句話說，公司對整併後的村社內部權力分配會權宜斟酌，讓首長人數保持彈性選擇空間，一方面讓新部落的原有「角頭」能維持一段時日，另一方面再藉機調整，以避免人數過於膨脹，在同規模村社中成為特例，破壞首長人數的原則。

至於虎尾壠地區的例證，早在 1636 年 4 月，在公司派遣的代表勸誘下，他里霧（Dalivo）、阿里山（Jarissang）、[41] 猴悶（Tossavang）、打猫（Dovoha）及猫勝刺（Valaula）等五社，已一併入新港社，獻箭締和。[42] 到了 1650 年，東印度公司讓僅有不足 80 人、約 30 戶不到的猫勝刺（Balabala），併入 300 多人、約 100 戶的打猫。[43] 4 年後，即 1654 年，先是應阿里山（Talac Bajar）社以教導基督教為由的要求，並參考議會代表的語言相近理由，將阿里山社納入諸羅山教區。[44] 翌年（1655），再基於地方官 Frederick Schedel 的建議，在北路地方會議中，要求阿里山（Talacbayen）社也併入打猫或猴悶（Chaumul）。[45] 翌年，即 1656 年，公司直接以打猫與阿里山兩社鄰近，居民也已混居為理由，將兩社合併為一。[46]

打猫與阿里山兩社在 1640 年代末期的人口數，其實不分軒輊；公司會整併兩社，有其背景。1654 年 9 月，駐地教師（多為士兵轉任）與雲嘉一帶原住民衝

---

[40] *DZII*, pp. 374, 471; *DZIII*, pp. 10, 103-104；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396、500；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頁 10、108。

[41] 「阿里山」社係擬其拼音的中譯，但此「阿里山」並非今日的阿里山山區，而是同清代的地名用法，指嘉義市東邊的淺山地帶。參考翁佳音，〈水沙連的早期史論：從荷蘭文獻中的水沙連談起〉，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主辦，「地方文史與區域研究：劉枝萬先生與水沙連研究」學術研討會（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2008 年 10 月 18 至 19 日），頁 118 的註 13。

[42]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 pp. 62-63;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 137. 「猫勝刺」為擬其拼音的中譯，中文文獻中並無此社名。

[43] *DZIII*, p. 103；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頁 107。

[44] *DZIII*, pp. 377-378；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頁 363；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p. 542-543.

[45] *DZIII*, pp. 464, 473-474；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頁 441-442、451。

[46] *DZIV*, p. 13.

突加劇。依政務員 David Hardhouwer 的信件報告，起因於駐地教師的暴躁性格與酗酒習性，動輒對居民動粗，導致阿里山社（Talacbajar）居民反抗駐地教師，進而引起公司方面的關切。翌年 3 月，地方官 Schedel 率員至當地視察，阿里山社已人去樓空，留下的老者宣稱社眾外出打獵，公司遂興起毀社他遷的念頭，並在北路地方會議中訓斥阿里山社代表，要求他們遷居。5 月，在諸羅山社政務員的信件（阿里山社自 1654 年 7 月劃歸諸羅山教區）中，已提到阿里山社族人同意棄舊社他遷打猫社。到了 8、9 月間，公司除了再次確定阿里山社族人入遷打猫社地的決定外，並擴大計劃，將 Emory、Pangalangh、Taringalangh 等社下遷至小 Takapoulangh 社。[47] 不過，後四社的下遷計劃並不順利，此由 1656 年 3 月的北路地方會議紀錄中其仍為獨立四社，分別派有各自的首長，可以看出。但打猫、阿里山已合稱為一個單位，即「打猫與阿里山」（Dovoha *en* Talacbayen），雙方原有的首長都續任。[48] 表二為 1650 年代整併的打猫等三社歷任村社首長名單。如同二林地區以大武郡為核心的案例，東印度公司在打猫、猫勝刺、阿里山等三社的整併工作中，對村社底層行政權力的分配相當謹慎。從表二列出的歷任村社首長派任名單，可看出公司讓雙方都有族人擔任整併後村社首長一段時日的做法，以謀求原籍的代表性。不過，這二個案例在整併原則上仍略有差異。

打猫、猫勝刺、阿里山的整併，除了有其地緣基礎外，還牽涉部落間原有社際網絡關係。表二裡，打猫社原有的公司派任首長 Tabay Maray（代號 B），在 1654 年遭公司免除職務，理由是私下移住阿里山社。[49] Tabay Maray 的個人行為，應該不是偶發現象。1640 年代，東印度公司紀錄中的打猫社，除了 Dovaha／Dovoha／Douvaha 一稱外，又稱 Talack（斗六？）；[50] 而阿里山社，除稱為 Arissangh 外，也稱作 Talack Bajen（另有 Talacbayen、Talacbajar 等拼法），意譯即「東 Talack」。[51] 打猫、阿里山兩社以 Talack 為集稱，關係應該非比尋常，甚至超越

---

47 *DZIII*, pp. 429-430, 464, 473-474, 507, 566；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頁 411、441-442、451、484、543。

48 *DZIV*, pp. 11-13.

49 *DZIII*, p. 310；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頁 300。文獻中 Tabay Maray 移住阿里山社的原因不詳。類似的例子有些則敘明遷居原因，如牛罵社頭人 Camachat Iboelich 於 1656 年地方會議時，送回象徵權力的籐杖，理由是他已隨沙轆籍妻子遷住沙轆社。*DZIV*, p. 14.

50 *DZII*, pp. 323, 469, 547；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340、498、605。

51 payan 或 bayan 意譯為「東」，係依 1936、1937 年採自埔里林仔城猫霧捒（Babuza）後裔與 Happart

一般同語族（虎尾壠語）社群。[52] 這或許解釋了 Tabay Maray 為何會移住阿里山社，以及阿里山社人在荷蘭人建議與打猫或猴悶併社之時，選擇前者之故。

表二、打猫、猫勝剌、阿里山社歷任村社首長名單

年份	1644	1645	1646	1647	1648	1649	1650	1651	1653	1654	1655	1656
打猫	V R	V R	V R	B	B	B	TB B Ta	TB B Ta	TB B Ta	TB Jacob Ta	TB Jacob Ta	TB Jacob Ta
猫勝剌	D	D	D	D	D	D	D	D				
阿里山	TT Tad	TT Tad	TT Tad	TT Tad	TT Tad	TT	TT	Tab	Tab Beydo	Tab P	TD P	TD P
大事紀							猫勝剌與打猫合併					阿里山與打猫合併

說明：1. 1652 年無資料，1649、1653 年資料係分別推自下一年度。

2. 人名代號部分，V 指 Valoavangh（又拼為 Tabellauboan）、R 指 Redongdongh（又拼為 Tarabeidondon）、TB 指 Ta Ballaboan（又拼為 Tabellaboan、Taballaboangh、Taballaboar）、B 指 Beiboie（又拼為 Bayrolle、Bairolle、Ta Beirolle、Tabay Maray）、Ta 指 Tabaibailiba（又拼為 Tabaibaillaba）、Jacob 指 Jacob Bellelouw（又拼為 Jacob Bellelau）、D 指 Daderouw（又拼為 Dhadorau、Hadorau、Dadorou、Ta Hadurro）、TT 指 Tacabba Tararababayres(又拼為 Rabeboas、Tacabba Tarabajus、Taccaba Tarababajus、Tarabeius）、Tab 指 Ta Balloboan（又拼為 Taballaboan）、TD 指 Tabarey Doradon（又拼為 Tarabey Doondoin）、Tad 指 Taddoa Dhadippan（又拼為 Dadipangh）、P 指 Poustey（又拼為 Poustay、Poutstay）。

3. 置於同一行，但人名代號不同者，指首長職的替代關係。如 Tab 替代 TT 成為 1651 年公司指派的阿里山社首長。

資料來源：*DZII*, pp. 241, 469, 547; *DZIII*, pp. 8, 103, 183, 310, 473; *DZIV*, p. 13.

於 1650 年編的虎尾壠語典。參考 Shigeru Tsuchida,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I: West Taiwan*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etters, University of Tokyo No. 7, 1982), p. 118.

52 類似的例子文獻中並不少，如苗栗縣一帶的加至閣群，即以 Kalika 為集稱，下有 Kalika Rusudt(Kalika Roudout、Kalika Rousout）、Calikautomael、Calicaroutschiou 等社；南投縣一帶的水沙連群，即以 Serrien 為集稱，下有 Serrien Souluan、Serrien Momoesa、Serrien Tackijkoas（Serrien Tallau）、Serrien Takamoessa 等社；臺中縣一帶，之後稱為巴宰（Pazeh）族、清代以岸裡聞名，當時則以 Aboan 為集稱，有 Aboan Tananoggan（Abouangh Oost，即岸裡）、Aboan Auran（Abouangh West，即烏牛欄）、Aboan Balis（阿里史）、Aboan Poali（樸仔籬）等；或所謂的大肚王（Quatoangh），其核心勢力係以 Darida 為集稱，下有 Darida Amicien（大肚北社）、Darida Babat（大肚中社）、Darida Mat（Dorrida Camachat，大肚南社）等。

表三、北路虎尾壠、二林一帶歷年村社人口、戶數值

	1647	1648	1650	1654	1655	1656
虎尾壠地區						
他里霧	288／059（4.9）	325／061（5.3）	317／071（4.5）	380／094（4.0）	371／090（4.1）	359／087（4.1）
猴悶	317／064（5.0）	312／059（5.3）	312／068（4.6）	231／056（4.1）	238／056（4.3）	235／057（4.1）
猫勝剌	082／027（3.0）	072／027（2.7）	379／122（3.1）	323／113（2.9）	369／120（3.1）	
打猫	317／093（3.4）	305／100（3.1）				512／161（3.2）
阿里山	316／108（2.9）	280／088（3.2）	249／072（3.5）	175／066（2.7）	142／040（3.6）	
猫兒干	422／079（5.3）	408／077（5.3）	422／081（5.2）	401／090（4.5）	396／087（4.6）	403／090（4.5）
虎尾壠	513／085（6.0）	543／097（5.6）	586／103（5.7）	597／106（5.6）	623／111（5.6）	649／114（5.7）
西螺	358／089（4.0）	366／088（4.2）	386／092（4.2）	299／092（3.3）	339／089（3.8）	351／091（3.9）
東螺	153／059（2.6）	203／060（3.4）	245／063（3.9）	231／072（3.2）	225／072（3.1）	250／072（3.5）
眉裡	135／035（3.9）	157／038（4.1）	203／057（3.6）	195／052（3.8）	196／059（3.3）	207／061（3.4）
二林地區						
二林	331／62（5.3）	438／088（5.0）	419／085（4.9）	308／077（4.0）	342／075（4.6）	347／075（4.6）
Saribalo	---／---（---）	106／022（4.8）	106／022（4.8）			
大突	---／---（---）	271／053（5.1）	267／060（4.5）	245／060（4.1）	235／055（4.3）	230／053（4.3）
大武郡	149／047（3.2）	246／070（3.5）	260／076（3.4）	240／083（2.9）	236／078（3.0）	247／073（3.4）
馬芝麟	208／066（3.2）	275／065（4.2）	289／055（5.3）	262／064（4.1）	264／062（4.3）	258／060（4.3）
阿束	237／051（4.6）	282／053（5.3）	263／055（4.8）	275／058（4.7）	283／059（4.8）	287／059（4.9）
半線	297／057（5.2）	288／059（4.9）	291／062（4.7）	267／059（4.5）	281／060（4.7）	296／062（4.8）
Tausabata	066／016（4.1）	063／012（5.3）	057／013（4.4）	037／012（3.1）	046／011（4.2）	070／019（3.7）
猫羅	112／033（3.4）	147／031（4.7）	148／039（3.8）	187／041（4.6）	186／043（4.3）	191／041（4.7）
Kakar Kachabouw	064／017（3.8）					
Taijlivangh						095／017（5.6）
Kakar Sackalij	159／025（6.4）	164／024（6.8）	160／033（4.8）	151／032（4.7）	147／032（4.6）	160／035（4.6）
南投	149／059（2.5）	265／075（3.5）	271／073（3.7）	275／076（3.6）	284／077（3.7）	253／061（4.1）
北投	189／063（3.0）	197／064（3.1）	194／061（3.2）	183／056（3.3）	187／055（3.4）	155／044（3.5）

說明：1. 虎尾壠、二林區（district）的劃分係依 1655 年 3 月北路地方會議的劃分。
　　　2. 各年度村社統計資料部分以 A／B（C）方式呈現，A 表示人口數，B 表示家戶數，C 表示平均戶口數。

資料來源：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社會·文化，頁 12-13。

相較之下，大武郡、Terriam、Kakar Tacheybau 等社的整併原則，略有不同。Kakar Tacheybau 本與 Kakar Sackalij、猫羅（Kakar Baroch 或 Kackarbabararongh）等社以 Kakar 為集稱，與「猫羅」關係較近；卻因人數偏少，而遭荷蘭人併入八卦臺地西南緣的大武郡社。至於 Terriam，在近乎滅社的情況下，先後應公司要

求併入東螺社、虎尾壠社，或自己要求的大突社，最後卻併入大武郡社。由此可見，公司的主導力量，強過住民本身的社際網絡關係或主體意願。

至於村社規模方面，整併後的大武郡，規模始達 200 餘人，與大突、馬芝麟、阿東、半線，甚至南投等社相近，亦與八卦臺地西側的村社平均規模較趨一致。另一方面，打猫社藉由帳面上的合併，跳脫他里霧、猴悶、西螺等社原有的 300 多人、100 戶水平，成為 500 多人、160 戶的規模，係虎尾壠地區中規模僅次於虎尾壠社的村社。表三為北路虎尾壠、二林一帶的人口、家戶數變化。

六、部落整併的尾聲

對遭到整併的部落而言，實質影響為何？限於文獻史料，我們難以替當事人發聲，惟有併入大武郡社的 Terriam 社，在文獻中呈現少許土地資源紛爭的訊息。

Terriam 社因人口銳減，原有獵場為周遭部落所覬覦。東印度公司乃在 1646 年的北路地方會議中，宣告 Terriam 的獵場歸其所有，外人不得干擾。[53] 不過，此時 Terriam 社已併入大武郡社，東印度公司雖判定 Terriam 社原有的獵場歸族人所用，但實際上大武郡社人也一併得能使用，而與已移入 Terriam 社舊地的大突社人起了土地糾紛。據載，因大突社人打算獨享土地，而於 1655 年鬧到正在當地訪視的地方官 Fredrick Schedel 與下席商務員 Pieter Elsevier 處。[54]

至於整併成功的案例，是否如東印度公司所願，達到傳教與統治的雙重目的？答案其實是見仁見智。對荷蘭人的行政治理而言，北路一帶打猫、大武郡社的整併，確實讓各部落達到一定程度的規模。不過，公司派駐北路的政務員、牧師，一向以諸羅山、虎尾壠、二林等社為主。1650 年，公司在確定大員至淡水之間的 10 天半陸路行程時，沿途落腳村社也僅見麻豆、諸羅山、他里霧、大突等社，不見打猫或大武郡扮演的角色。[55] 若拉長時間軸，在十七世紀末清帝國接掌臺灣後，依高拱乾《臺灣府志》的記載，打猫、猫勝刺、阿里山的整併案例僅部分成

---

[53] *DZII*, p. 473；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頁 502。
[54] *DZIII*, pp. 464, 467-468；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頁 442、445。
[55]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Formosan Encounter*, vol. III, p. 281.

功；《府志》中雖不見猫勝剌，但在規制與賦役的分類下，打猫與阿里山仍為各自獨立的單位，[56] 看來前述 1656 年東印度公司地方會議的記載——「打猫與阿里山」僅是帳面上的合稱。不過，官方郵傳據點，過了諸羅山舖後，往北 10 里即打猫舖，再往北行 90 里抵他里霧舖，之後每加 5 里、10 里、10 里、15 里、30 里、20 里、30 里，依序可抵猴悶、柴裏、草埔、西螺、埔薑林、小岡、大武郡等舖，然後再加 40 里、20 里，先後可抵大肚溪與半線等舖。[57] 此時，荷蘭時代的大突、二林不再雀屏中選。至於為採硫來臺的郁永河，自南臺灣沿陸路北上淡水時，過諸羅山社（4 月 8 日），經打猫社、他里霧社後，宿於柴里社（4 月 9 日），隔日過虎尾、西螺、東螺等溪，宿於大武郡社（4 月 10 日），翌日抵半線社。[58] 看來到了十七世紀末，在官方統治者眼中，大武郡社已不輸給大突、二林等社了。

東印度公司的部落整併政策，是否持續不變到統治末期？我們可從 1650 年代後半的例子略窺端倪。以北路為例，1648 年，Terragorrogo 社首次派員參加地方會議，獲公司首肯，之後即成為北路地方會議的成員。[59] 1655 年，Tarrogorrogo（即 Terragorrogo）社因苦於農地常遭水患，向地方官 Frederick Schedel 要求遷至猫霧捒。[60] 雖然如此，1656 年 3 月公司召開北路地方會議時，Tarrogorrogo 仍是獨立的村社單位，有指派的頭人。[61] 至於臺南一帶，位於目加溜灣與大武壠兩社之間的 Terrijverrrijvagangh，是個約 20 戶人家的小社。1656 年 3 月，藉由通譯 Tabare 的穿針引線，參加北路地方會議；東印度公司以其村社規模持續擴大為由，任命部落長老 Dorap Covol 為該社頭人，卻未聞公司要求該部落併入鄰近村

---

56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65 種，1960；1694 年原刊），頁 37、158。

57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50。此段郵傳路線，諸羅山、打猫、他里霧、猴悶、柴裏、西螺、大武郡、半線等是原住民村社。對照《臺灣府志》記載的坊里，諸羅山、打猫、他里霧、半線等在當時已有莊、社之分，代表漢人已成聚集成民莊，但沿線的猴悶、柴裏、西螺、大武郡等則有社無莊。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7-28。不過，郵傳路線大多依賴途中的原住民村社。編於十九世紀初的《彰化縣志》，即明載他里霧、猴悶、柴裏、西螺、大武郡、半線等舖都位於番社，僅打猫舖位打猫街，埔舖（即埔薑林舖）與小岡舖分別位東螺社南、北，大肚舖則在大肚溪墘。周璽，《彰化縣志》（文叢第 156 種，1962；1830 年原刊），頁 43-44。

58 郁永河，《裨海紀遊》（文叢第 44 種，1959；1697 年原刊），頁 18-19。

59 *DZIII*, pp. 10, 105, 185, 312, 475；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頁 10、110、189、302、453。

60 *DZIII*, p. 464；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頁 442。

61 *DZIV*, p. 15.

社，反而讓其與大武壠社一起成為收容南路塔樓社移出社民之處，人口因而得以繼續增長。翌年 6 月，公司僅讓 Terrijverrrijvagangh 與大武壠社一起出贌，卻未將兩社併為一社。[62] 到了 1661 年，有不少 Terrijverrrijvagangh 人和噍吧哖人（Tameniër）因地震避難，私下遷往 Tackepoulangh 社，傳聞加入叛離荷蘭人的勢力。[63]

七、結論

臺灣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轄下第一個大型殖民地，[64] 或後世荷蘭史家所說的海外地域型國家（territorial republic）之企圖，[65] 在缺乏「藍圖」可依循的前提下，荷蘭人的空間治理（spatial governance）不一定能全盤事前規劃，而多少有且戰且走、甚至誤打誤撞的性質在內。東印度公司對散住本島各地的原住民村社，係將其分為山區、平地兩大區塊，以放置在領地控管脈絡下統治；山區部分——特別是位於南路、影響前後山交通往來的村社，係採半強制、半鼓勵的策略將之下遷平地。平地方面，公司則維持較嚴厲的控管，所以從 1648 年南路地方會議開始，公司每年都在會議上向全體代表訓示：山區民眾可自由遷徙至平地居住，但平地居民未獲許可，不能任意搬遷。[66] 當部落搬遷係移入其他村社時，則牽涉到部落的整併。

站在公司的立場，部落整併不外乎宗教與行政統治兩個因素。宗教方面，主要顧及宣教工作的成本，讓公司有限的神職人員或學校教師能盡量照顧到眾人，其中隱藏有上帝旨意下的福音傳播需有經濟考量的思維。行政統治方面，是在 1644 年東印度公司奠定以村社為基礎的殖民地統治理念後，為顧及貢稅徵收、人

62　*DZIV*, pp. 11, 168, 170, 176.

63　*DZIV*, pp. 325-326, 329.

64　Jurrien van Goor, *De Nederlandse Koloniën: Geschiedenis van de Nederlandse Expansie 1600-1975*. 2. herziene druk edition. (Den Haag: Sdu Uitgevers, 1997), pp. 108-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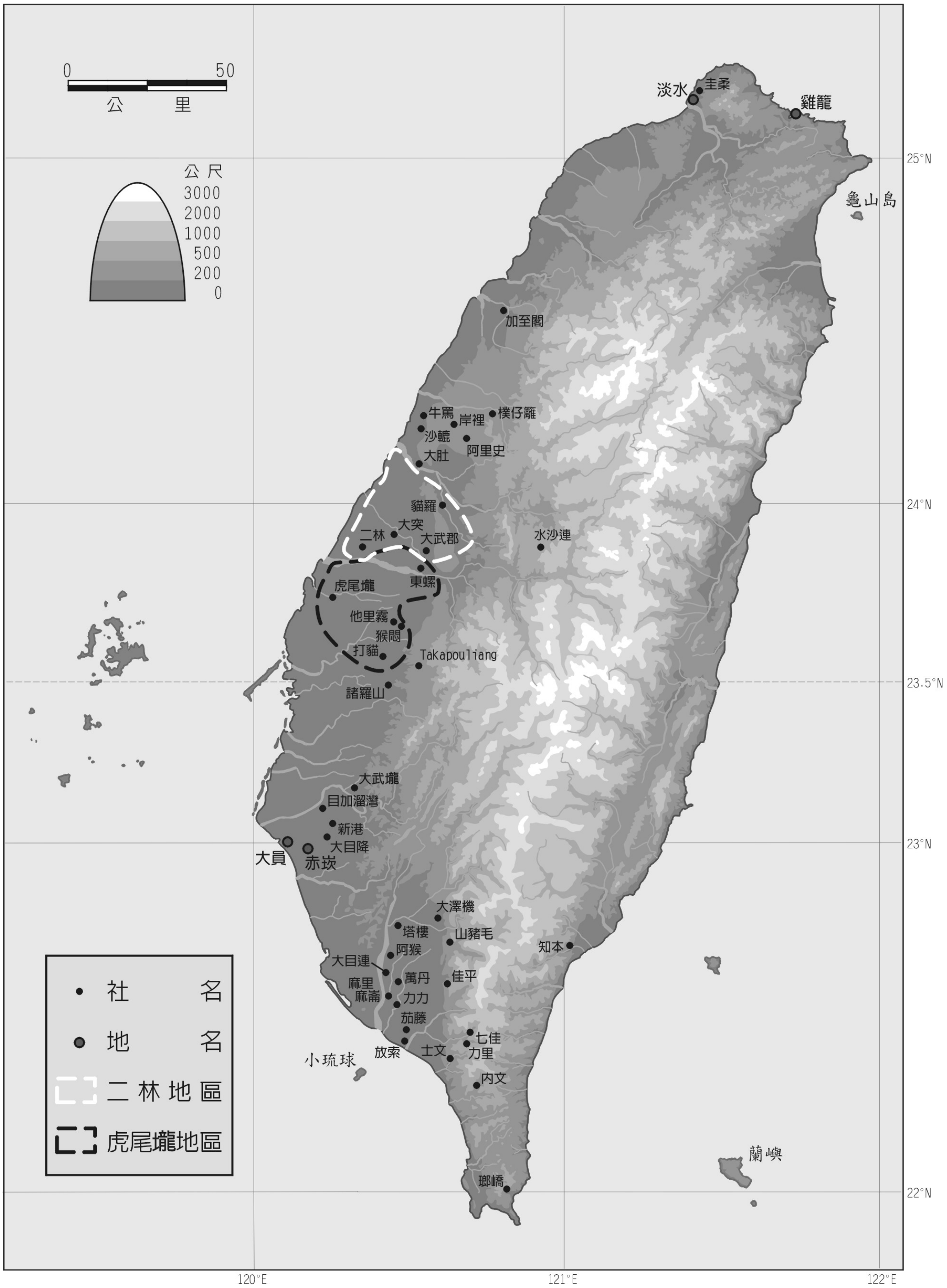
65　Ernst van Veen, "How the Dutch Ran a Seventeenth-Century Colony: The Occupation and Loss of Formosa 1624-1662," *Itinerario* 20: 1(1996), pp. 70-71, 77n57.

66　*DZIII*, pp. 20, 106, 115, 186, 313, 476; *DZIV*, pp. 15-16；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頁 20、110-111、119、190、303、454。

力掌握等因素，而調整村社規模，以利荷蘭人控管。整併多以併入親荷部落為前提，新港與放索即為例證；但整併的方向，多會參酌土著長老的意見或原有的跨部落關係，但仍可見少數例外，以大武郡社為核心的整併即為例證。

部落整併後的村社首長職，涉及原有部落的權力分配問題，亦即牽動了荷蘭人的殖民地底層結構。以北路大武郡社或打猫社為核心的部落整併為例，東印度公司傾向於讓整併雙方都有族人擔任新部落首長一段時日，以謀求原籍的代表性，維持以村社為基礎的原住民統治。荷蘭人的做法相當彈性，甚至可以讓人口懸殊的雙方，都各有一名代表，大武郡的整併即為一例。另一方面，部落整併也讓殖民地底層的村社達到一定規模；仍以大武郡為例，村社規模的擴大，雖無法立即改變其在周遭部落中的地位，長期來看卻發生了一定的影響。

整體而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部落整併，縱使在做法上依循原有社會網絡與族人的意願，也僅在南北路的平原地區有較顯著的進展。除了前述的大武郡等社外，最著名的案例應為屏東平原的「鳳山八社」，以及臺南一帶的大目降社併入新港社。不過，隨著荷蘭人的統治步入尾聲，1650 年代後半已形同蛇尾。此時，規模大小不一的部落仍能維持主體，甚至傳聞加入叛離荷蘭人的勢力，臺南一帶的 Terrijverrrijvagangh 社即為顯例。



附圖：相關地名分布圖

繪製：康培德、洪偉豪

引用書目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

2002 《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社會・文化。臺北：稻鄉出版社。

江樹生（譯註）

2000 《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2 《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3 《熱蘭遮城日誌》，第 3 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李國銘

1995 〈屏東平原族群分類再議〉，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 365-378。臺北：中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村上直次郎

2001 〈荷蘭人的番社教化〉，收於村上直次郎等著、許賢瑤譯，《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頁 23-39。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

1972 《バタヴィア城日誌（二）》。東京：平凡社。

周璽

1962[1830] 《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郁永河

1959[1697] 《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翁佳音

1998 《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2000 〈地方會議、贌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史研究筆記（一）〉，《臺灣文獻》51(3): 263-281。

2008 〈水沙連的早期史論：從荷蘭文獻中的水沙連談起〉，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主辦，「地方文史與區域研究：劉枝萬先生與水沙連研究」學術研討會。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10 月 18-19 日。

高拱乾

1960[1694] 《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許雪姬（總策畫）

2003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康培德

2000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對西拉雅人村社概念變遷的影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2000 年平埔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10 月 23-25 日。

2005 《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荷西明鄭時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9 〈離島淨空與平原移住：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原住民聚落遷移政策〉，《新史學》20(3): 99-126。

曹永和

1979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0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郭輝（翻譯）

1970　《巴達維亞城日記》，第 1 冊、第 2 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程紹剛（譯註）

2000　《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賴永祥

1966　〈明末荷蘭駐臺傳教人員之陣容〉，《臺灣風物》16(3): 3-22。

Blussé, Leonard

2001　"The Cave of the Black Spirits: Searching for a Vanished People." In David Blundell, ed., *Austronesian Taiwan: linguistics, history, ethnology, and prehistory*, pp. 131-150. Taipei: SMC Publishing.

Blussé, Leonard and Natalie Everts (eds.)

2000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I: 1636-1645*. Taipei: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6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II: 1646-1654*. Taipei: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Blussé, Leonard, W. E. van Opstall and Ts'ao Yung-ho (eds.)

198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 1629-1641*. Gravenhage: M. Nijhoff.

Blussé, Leonard,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1995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Gravenhage: M. Nijhoff.

199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I, 1648-1655*. Gravenhage: M. Nijhoff.

Blussé, Leonard,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2000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V, 1655-1662*. Gravenhage: M. Nijhoff.

Borao Mateo, José Eugenio, et al. (eds.)

2001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Taipei: SMC Publishing.

Campbell, Wm.

190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ptions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Chen, Shaogang

1995　*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 een Vergeten Geschiedeni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eit Leiden.

Ferrell, Raleigh

1969　*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Goor, Jurrien van

1997　*De Nederlandse Koloniën: Geschiedenis van de Nederlandse Expansie 1600-1975*. 2. herziene druk edition. Den Haag: Sdu Uitgevers.

Kang, Peter 康培德

2003 "A Brief Note on the Possibl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Large Village Size of the Siraya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In Leonard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pp. 111-127.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Shepherd, John R.

1995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Arlington, V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Tsuchida, Shigeru 土田滋

1982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I: West Taiwan*.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etters, University of Tokyo No. 7.

Van Veen, Ernst

1996 "How the Dutch Ran a Seventeenth-Century Colony: The Occupation and Loss of Formosa 1624-1662." *Itinerario* 20(1): 59-77.

Wang, I-shou

1980 "Cultural Contact and the Migration of Taiwan's Aborigin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onald G. Knapp, ed., *China's Island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pp. 31-54.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17, No. 1, pp. 1-25, March 2010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ribal Consolidation of Formosan Austronesians under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eter Kang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ssue of tribal consolidation of Formosan Austronesians under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or VOC, with emphasis on the idea behind the consolidation policy, its implementation and its effects. Taking Tavocol and Dovoha as two cases,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Dutch supervised the post-consolidation tribal power structure and size of settlement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control of the burgeoning colony. Evangelization and secular governance were the two mai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ribal consolidation in the lowland areas; hence, the Dutch we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manageable settlement size and the appointed headmen of consolidated villages. In praxis, the Dutch either followed the inter-village social networks or consulted the opinions of tribal principals on the consolidation project, but its outcomes greatly varied. Moreover, the policy could not be carried out consistently and some tribes even allegedly joined the camp against the VOC towards the end of Dutch colonization.

Keywords: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or VOC, Tribal Consolidation, Formosan Austronesians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17, No. 1, pp. 27-70, March 2010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Problematic Military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Claims of Count Maurice Auguste comte de Benyowsky in Formosa* during 1771**

Ian Inkster ***

ABSTRACT

Maurice Benyowsky's colourful version of his global adventures during the heady, expansive days of the late-Enlightenment remains still as an historical account, and is perhaps destined for reification at a time of romantic, post-modernist cultural affirmation. Ye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ithin it there lies a virile and possibly dangerous Orientalism, one at least partially based upon a lurid, opportunistic and self-seeking fabrication of his visit to Taiwan (Formosa) in the year 1771.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veracity, provenance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Benyowsky account of late-eighteenth century Formosa, both as an exercise in one facet of Taiwanese history and as some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and maintenance of European views of the "other" and of the "orient" as they were transforming during the late-Enlightenment period. Furthermore a principal task is to provide an historiographical analysis that illustrates both the initial reasons for the acceptance of Benyowsky's lurid account as well as the wider contexts of its long life as a seemingly reliable and authentic tale. Questions remain as to 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any general acceptance of otherwise doubtful stories, experiments, claims and "adventures". Here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original *Memoirs* were given greater credence by Benyowsky's talent in self-fashioning his character and status as those of a reliable gentleman.

Keywords: Benyowsky, Historiography, Aborigines, Enlightenment, Orientalism,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ravel literature, Voyages

---

* We use the term Formosa commonly here because this is the term for Taiwan most usually found in the foreign literature itself, and throughout by Benyowsky and the related material.

** This is the first result of a larger project on *Strangers, Observers and Oriental Accounting: An Analysis of Western Observations of Taiwan/ Formosa circa 1604-1920s* based in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Kaohsiung 80793, Taiwan.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Wenzao colleagues Profs. Jerry Liu and Yu-Hsuan Lee for comments on an earlier version, and Miss Meng Fang Tsai for research assistance.

*** Professor of Global History,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Kaohsiung, and Research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e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UK, and editor History of Technology (London, UK).

來稿日期：2010 年 3 月 23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5 月 10 日。

1. The Count Benyowsky
2. 18 Days in Formosa: The Narrative
3. 18 Days in Formosa: A Reality Check
4. Plans for Empire
5. Historiography I: Benyowsky as Enlightened Euro-Orientalist
6. Historiography II: The Elements of Acceptance
7. Windows of Deception: Orientalism as Fantasy
8. Conclusions: Enlightenment and the Warrants of Reliabilty

---

1. The Count Benyowsky

Dubbed the "Candide and the Monte Christo of real life" in one of the many popular accounts of his fascinating career,[1] the notoriety of Benyowsky[2] has earned him a place in the reference books of history. In Langer's 1940 *Encyclopaedia of World History*, he appears as a Polish adventurer with a commission to found a French settlement in Madagascar, who then set himself up as ruler of the whole north-eastern coast of that island, was repudiated upon his return to France in 1776, and was then supported and funded by the Americans to return to Madagascar, where he proclaimed himself ruler but was then killed during a campaign against a French expedition in 1786, all of which represents a fairly close, uncritical reading of Benyowsky's memoirs.[3] His

---

1 Herbert Greenhough Smith, *The Romance of History* (London: George Newness, 1895), pp. 52-86.

2 Following a full Hungarian orthography would yield Gróf Benyovszky Móricz, pronounced approximately with French accents. The spelling used here is Anglophone, is the most used in the literature and in the first editions, and in Taiwan this spelling is used by the best-known of foreign accounts of the Formosan "adventure", those of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Yokohama: Kelly & Walsh, 1903);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Paul, 1903) and Yosaburō Takekoshi,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London: Longman Green and Co.,1907). Each of these has been republished several times: see below extensively.

3 William L. Langer,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Houghton and Co., 1940), pp. 859-861.

seeming veracity on several counts, mainly those relating to Siberia and Madagascar had kept him alive in the accepted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he 20th century. Thus he is mentioned by Braudel in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4] regarding his 1770 observation concerning the tentative nature of Russia's hold over Siberia, which according to that great French historian he exaggerated. Similarly, an excellent recent biography of Catherine the Great, assesses Benyowsky as "one of the most romantically intrepid personaliti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judges him a real political danger in Siberia for the way in which he pulled together and led into escape such a disturbing group of dissidents, amongst whom could be counted Ioasaf Baturin (exiled for his plot to install the Grand Duke Peter in 1769), Peter Khrushchev (the guardsman conspirator banished in 1762), and Alexander Turchaninov (exiled from 1742 for conspiring against the Empress Elizabeth).[5] More recently — and perhaps something of a measure of a new post-Enlightenment romanticism — Benyowsky's life has been proclaimed anew by his countrymen.[6] At different times Austria, Hungary, Poland, and Russia have all proclaimed Benyowsky and the veracity of his memoirs and journals (see below), and recent political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have generated a renewed swelling of interest. Thus, in 2004 a beautifully and expensively bound version of his manuscript on Madagascar 1772-1776, which reproduced the original French manuscript folios, as well as French and Hungarian printed texts,[7] was published in Budapest.

---

4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London: Phoenix Press, 1984), p. 458.

5 John T. Alexa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Life and Lege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23-253. The Russian dissidents led by Benyowsky included also the officer of the Preobrazhenski Regiment, Ippolit Stepanov, who had been sent to Kamchatka in 1769 for advocating the overthrow of the Empress Catherine in favour of the Grand Duke Paul. According to Benyowsky, during the short period in Formosa, Stepanov emerged as his true enemy and rival, and was placed under forced confinement when the small fleet departed Formosa on 11 September 1771.

6 For instance the major exhibition, with lectures from various authorities including Benyowsky descendents, "Maurice Benyowsky: Citizen of the World,"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7; see also entry under Benyowsky of *Slovakopedia*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Slovakia and Slovaks), http://www.slovakopedia.com/.

7 Móric Benyovszky, *Protocolle du régiment des Volontaire de Benyowszky crée en 1772* (Budapest: Országos Széchényi Kónyvtár Magyar-Madagaszkári Baráti Társaság Kossuth Kiadá, 2004). For the superb original manuscript French version see "Voluntaires de Benyowsky 1772-1776. Memoire sur l'expedition de Lisle de Madagascar," British Library, Add. Mss., 18844. (Henceforth, Madagascar BL)

Much fabricated mystery surrounds Benyowsky. By his own self-fashioning account he was born in 1741 at Verbowa, in Nittria, Hungary, the son of a Count and general of cavalry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He was educated and train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ourt of Vienna in that manner afforded "to such of its vassals as are of illustrious families". By his own highly problematic and inconsistent recounting, he was in active service as a teenager, his first major battle being at Lobositz in 1756 against Prussia. Subsequently, various intricate misunderstandings lead to his disgrace, so he determined to travel—in particular to Danzig studying navigation. Much Euro-voyaging ensued, until his involvement in 1767 in Warsaw with the planned Polish Confederacy against Russia, from when he was caught up in a continued life of adventure.[8] One contemporary manuscript fragment claims that his early upbringing included a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Hungary in languages,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and much subsequent practical study of navigation in Dantzig, which would certainly have placed him firmly within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9] The most certain elements of his early career were that he does seem to have fought as a lieutenant in four pitched battles against Prussia before he was 17 years of age. On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his brothers seized his inheritance, and in his retaliation he was accused as a rebel, his property confiscated, whereupon he fled to Amsterdam and then possibly to Plymouth to study seamanship. Subsequently, he joined the Polish Confederation against Russia, fought as a colonel-general of cavalry, and secured a series of audacious successes. At one point he was captured and ransomed for £1,000, but repeatedly evaded permanent capture, until eventually seized by Cossacks and imprisoned. He escaped once more, to be captured and exiled to Kamchatka. The Siberian imprisonment and escape is the point at which the famous voyage begins, involving his claims concerning Formosa in September of 1771.

---

8 This is his story in all versions of the *Memoirs* from 1789 (see below extensively); see vol. 2 of Nicholson 1790 edition, pp. 1-35.

9 "18th Century fragments of the Career of Benyouski," in Hardwicke Papers, vol. 491, Historical Collections 1700-1817, Additional Manuscripts, BL 35839, f. 365-367, three double-sided folios, unclearly written and partially preserved. [Henceforth Hardwicke fragment BL]. This account takes the life of Benyowsky only up to the rebellion in Kamchattka. The published accounts of Benyowsky's early life, and the French manuscript volumes, do not mention such university studies, but have him enjoying a Viennese-style courtly education, joining the imperial army at 14 years of age, and fighting in his first battle at Lobositz in October 1756, the first action of the Seven Years' War.

2. 18 Days in Formosa: The Narrative

According to his memoirs and journal,[10] Benyowsky and his fleet of 3 ships and motley crew of 96 persons, arrived under the Polish flag somewhere on the eastern coast of Taiwan on 26th of August 1771. Giving his declared latitude as 23: 22N, this places him just south of the Tropic of Cancer, in a good harbour along the strip of coast to the north east of the Hsiu-ku-luan range of high cliffs. This was with certainty the territory of the Ami people, served well by west-east flowing rivers from the high-mountain ranges, far from the Han agricultural settlements and commerce along the western coast or the settlement sites of the earlier Dutch colonisation at that latitude to the west, well north of T'ai-tung, and with nothing much in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Ch'ing prefectural or county capitals and market towns of Taiwan at that date.

Upon anchoring a party set out in two boats towards a small group of islanders[11] around a camp fire, were subsequently led to their village, fed with roasted pork, boiled rice, limes and oranges, in turn presented the villagers with a first batch of the many European weapons—in this case knives—with which they were happy to supply indigenous groups, but were attacked with arrows upon their return.[12] The result of the first extended conflict on the first of 18 days, was over sixty indigenous Formosans killed at the cost of two Europeans slightly wounded. A larger landing party the next day were met by submissive, unarmed natives who again invited them into their village, plied them with alcohol and women and again attacked, driving them—some utterly naked—

[10] As will become very clear, there are many versions of the *Memoirs* in particular. Here we derive our account principally from the original French manuscript as well as its publishe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illiam Nicholson, London, G. G. J and J. Robinson, 1789. For the French original used here; Maurice Benyowsky "Memoirs with Charts and Maps," Additional Manuscripts, British Library, ff. 5359-5362 (in the original French). These are 4 beautifully leather-bound and written manuscript books, confusedly paginated; f. 5360 Tom. II is some 360 pp beginning with the Kamchattka revolt and escape, and contains meticulous marginalia and addenda by Nicholson. There are some missing pages. The account of Formosa makes up 73 pp of the total.[Henceforth Memoirs BL].

[11] The French ms Memoirs BL variously refers to the indigenous Formosans as insulaires, Formosiens, sauvages or les Indiens, seemingly depending on whether friends or foe.

[12] This is reported as a repeated pattern of relations in Memoirs BL, as in "d'insulaires, femmes et homes, presentement avec de la volailles, du viz des Cannes, de Sucre, des Cochons, des Oranges, de autres fruits."

from the settlement, Benyowsky's reply to which was to fire the village and kill some two hundred of its residents. This, only the second day.

Perhaps not surprisingly, the Benyowsky fleet then sailed northward on a particularly benign current for a short distance, when two native boats guided them into a perfect harbour of three fathoms, which our hero immediately named Port Maurice after himself! The location is again doubtful, and it remains possible that Benyowsky had sailed north along the eastern coast just far enough to reach the inlets and bays of the coastal area populated by indigenous peoples, whose focal points were more inland in the high mountains and forests. Once more conflict seems to have been momentarily forgotten and a number of boats came to supply the westerners with poultry, hogs, rice and fruits. Altogether more unexpectedly, one of these was headed by a Spanish adventurer from Manila, one Don Hieronimo Pacheco[13] who Benyowsky served with both presents and promises as an aid to obtaining his services as interpreter and ally. However, 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d day, a group of islanders hostile to Pacheco and his people, attacked them at a watering hole, and three Europeans were killed. Revenge was now the principal motive of both Benyowsky and Pacheco, the former slaughtering all native prisoners already held, attacking all approaching boats whatever their tribal allegiances, hanging all new captives. Some 250 of the mixed forces of Pacheco and Benyowsky drove the original tribe into high hills and used this exposure to bring the fleet's cannon to bear in broadside. A tally enumerated 1,156 dead indigenous people, amongst who were many armed women. In addition 640 captives were handed over into the charge of Pacheco.

Day the 4th began with Benyowsky moving his whole European crew and their womenfolk on-shore and the expected arrival there—from some 30 miles inland—of Huapo,[14] enemy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friend of Don Hieronimo and "chief" of the enemies of those natives already slaughtered by Benyowsky. This set the scene for a triangle of alliances on the eastern shore, potentially enormous as Huapo could supposedly muster under his own command some 20,000 to 25,000 armed men. A small advance group of indigenous warriors were hosted by Benyowsky and led by an officer wearing "a long close garment fitted to the body and reaching from head to foot, Chinese half-boots, a white

[13] In the best-known account in Taiwan, that of Campbell, this is unfortunately miss-spelled Pacheo (eg. p. 521); the ms Memoirs BL clearly gives Pacheco (eg. 2nd pagination p.91).

[14] In Memoirs BL (see first paginated pp. 10-14) this leader is consistently named Prince Huapo.

shirt, a black vest, and a red outer garment with buttons of coral set in gold. His bonnet of straw was exceedingly pointed and the upper extremity ornamented with horse-hair dyed red. His arms were a sabre, a lance, a bow and quiver, with twenty-five arrows. His troops were nak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piece of blue cloth around the middle; and their arms were bows and spears". By the time of the splendid arrival of the chief or Prince himself later in the day, the villagers were now sufficiently friends as to "leave their daughters in our camp". At the head of troops of infantry with pikes sat some fifty officers on "small but beautiful horses". The prince then thanked Benyowsky for the defeat of his enemies, identified him as a possible candidate for the mythical figure long predicted by his "diviners" as he who would break the hold of the Chinese over the island, and offered to join him in a wholesale liberation of Formosa.

At a later visit by the prince, Benyowsky was determined to ally with Huapo and to that purpose took him around the ships of his small fleet, put on an exhibition of fireworks, and presented him with two pieces of cannon, thirty muskets, six barrels of gunpowder, two hundred iron balls and fifty Japanese sabres. The chief — suddenly supplied with a western armoury that surely represented a veritable military revolution in Formosa — then prepared a series of proposals to Benyowsky, delivered by Don Hieronimo, including that he should leave some Europeans in Formosa after his planned departure, for reasons of both goodwill and instruction, that he should procure armed vessels and ships' officers for Formosa, that he should aid in the expelling of the Chinese in return for the proprietorship of the department of Hwangsin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at he should complete the defeat of a neighbouring chieftain in return for a direct payment, and that they should enter into a permanent treatment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Benyowsky agreed with all of this except the first, and examined and minutely priced the rest with seemingly serious intent. After a complex ceremony of celebration and obeisance, Benyowsky seems to have committed forty-eight of his men and sixty horses to assisting in a war between Huapo and a pro-Chinese chief Huaposingo, whose capital was a day and a half's march away with a muster of "only" 6,000 armed men and perhaps 1,000 Chinese and a few dozen muskets.

So, on September 3rd, only the 9th day since first arrival, this combined but very mixed armed group set out against their new enemy. A few hours from the enemy's capital, Benyowsky's advance camp was attacked by ten or twelve thousand men, at which he lost many of his native allies, but on Huapo's joining

them, the next morning saw the "great slaughter" continue but in reverse, and the retreat of the inland enemy was rewarded with presents from the prince of fine pearls, 800 pounds of silver, and over twenty-five pounds of gold. Benyowsky responded with gifts of arms, and despite the protests of his European followers, increasingly showered with wealth, made the coast and determined to embark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Europe. On the 12th of September they set sail around the northern headland of Formosa, steering for Macao.

3. 18 Days in Formosa: A Reality Check

In terms of qualities, Benyowsky's story is frequently questionable. Thus, despite his own accounts of the ferocious character of fighting on all sides, Benyowsky somehow concluded that "Les Formosiens sont d'un naturel efféminé, lache et sans auchune marque de courage".[15] But in terms of quantities, Benyowsky just gets far too much wrong. Any estimates of population for the eastern coast are guestimates at best, but under the Dutch it is unlikely that the whole indigenous village population of that coast had reached much above 6-10,000, living in maybe 40 or 50 settlements, representing some 10% at the very most of the total indigenous population of Formosa.[16] It follows that all of the figures for armies and followers given by Benyowsky are on the scale from highly improbable to frankly ludicrous. The notion that any authority, including the Chinese themselves, could control 25,000 armed indigenous men along the eastern coast and high mountains appears fabulous only, and the figure of up to 12,000 enemy in the attack on the Benyowsky camp in the inland mountain area seems completely outlandish. On even a modest (!) estimate the deaths inflicted on the natives by Benyowsky, amounted to over 2,000, with mentions of hundreds of prisoners. None of this agrees with the demography of Taiwan as known by historians or with other near-contemporary accounts. And horses abound in Benyowsky. At their first meeting on August 31st, Prince Huapo arrived with 6 horsemen carrying a standard, a troop of pike infantry, 40 mounted cavalry officers, infantry with bows, a troop with clubs and hatchets,

---

15 Memoirs BL 2nd pagination, p. 46.

16 John R.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Taipei: SMC, 1995); Ch'iu-k'un Ch'en, *Landlord and tenant: varieties of land tenure in frontier Taiwan 1680-1900*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7).

15 officers and the Prince on horses, then more troops. He was later attended by 50 mounted officers, and his army included another 250 horsemen. The prince lent Benyowsky 68 horses for his campaign. Yet all the evidence is that horses of any sort remained very rare indeed on the east coast and in the mountains and forest areas. It is true that combined with drums and muskets, horses had been deliberately used on the west coast by the Dutch many years earlier in order to terrorise aboriginal warriors and insurgents, and some time after Benyowski's visit (in 1788),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ere planning an increase in horses for their aboriginal military colonies in the west. But there is very little evidence that this use of horses during the Dutch years in the west of Formosa had ever translated into their wholesale use as vehicles of large-scale warfare in the east.[17]

Here we might note something of earlier authentic 18th century foreign accounts of Formosa in 1715, 1739, and 1782.[18] In these the western emphasis was on the very insecure partiality of Chinese control over Formosa, the lawlessnes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ithout religion, and acknowledging no God" and the cruelty and duplic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ir search for treasure. In other words, such accounts were, as might be expected, fully determined in their criticism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impacts, in their emphasis on the "otherness" of both Chinese and aboriginal peoples, and in the confirmation of European cultural and material superiority that such journeys and observations provided the writers as well as their readers. Thus in 1715, de Mailla in a mere 16 pages of description is clear on the limits of Chinese control and offers a very anti-Chinese account, emphasising duplicity and rapaciousness; they were gold-seekers at best; he makes precise points concerning oxen rather than horses, "herds" of apes and deer, and sees the capital of Tai-wan fu as equal to the best found in China. The only indigenous peoples in such western Formosan places "are those who serve them as domestics or rather slaves". Again, Mailla is able to tally the 45 small towns of natives "subject to the Chinese", of which 36 were

---

17 The Dutch Council of Taiwan at times wrote during the 1640s to their Governor-general requesting supplies of Persian or other horses, but only for small-scale visits between villages; see "The Council of Tayouan to the Governor-General Antonio van Diemen, Castle Zeelandia, 15 February, 1645," in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pp. 208-209; L.D. Kessler,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06; John R.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 53, 354, 366.

18 J. B. du Halde,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vol. 1, trans. Richard Brookes, French Translation (London: John Watts, 1739), pp. 171-190; Abbe Grosier,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vol. 1, French Translation (London: G. G. J. and J. Robinson, 1788), pp. 222-246,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Formosan flood of 1782.

in the north, 9 in the south, the northern populated and approaching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south more primitive, generally in smaller numbers and greater simplicity, living on rice, game, and small grain.[19] In distinct contrast to Benyowsky, even at a point in 1715 whe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island was in seeming full revolt against the western side, de Mailla mentions that indigenous people could at best put up ineffective fighting forces of perhaps "thirty or forty, armed with arrows and javelins". Again, in contrast to Benyowsky, other 18th century accounts relate details of climate, flora and fauna, cuisine and cooking methods, the fatal dangers of the water supply; they note that amongst the Chinese oxen acted as substitutes for scarce horses, a much more likely after-math of the Dutch occupation than the mustered and disciplined equestrianism claimed for the indigenous tribes by Benyowsky. In particular they highlight the vast contrasts between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of the west and the wildness of the "barbarian" east. But they also describe in far greater detail the social life and cultural forms of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providing evidence on such matters as hunting, clothing, tattooing, earrings and teeth-blackening, courtship, marriage and gender relations, governance by elders, commerce and tribute. Finally, in such earlier 18th century accounts, the search for "otherness" by no means precluded notions of nobility and superior morality amongst so-called savages, for they might well be "nearer to the true philosophy than a great number of the most celebrated Chinese sages". Western accounts testified to the remnants of Dutch-driven Christianity amongst the indigenous peoples—though not at all amongst the Chinese—and an absence of idolatry. The expansive aggression of such accounts lay not in cannon and guns but in the late-Enlightenment conviction that indigenous survival and growth would depend upon a cultural conversion, led as a matter of course by religious conversion through the examples of "prayers and holy deeds".

It is obvious that Benyowsky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all of this! Where Benyowsky does attempt something of a considered description of Formosa in his memoirs, the text quite abruptly ceases to be that of the adventurer, and reads more like a summary of the reports of others than his own observations. At such points he confuses Han Chinese, Hakka and indigenous regions and peoples, and is happy to assign to individual indigenous chiefs up to 2,000 slaves or 600 bodyguards each. There were simply not enough bodies on the whole island to

---

19 Father de Mailla, SJ, "The Early History of Formosa,"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French Translation (Shanghai: Loureiro and Co., 1715: reprinted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8 August 1874), quotes pp. 7-10.

provision such armies and services. One extensive quotation will need to serve the point, where he is supposedly *describing the Eastern territories that he has seen*, dominated by indigenous tribes and villages:

> In each province there are five or six towns, which have establishments in instructing youth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Their characters for writing and for the expression of numbers are as difficult as those of the Chinese. Their pronunciation is sometimes quick and elevated, at other times slow and grave. They obtain their books from China. There are reported sorcerers or diviners here, who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ver the people. Their religion consists in adoring one God, and in the performance of good offices to their neighbours. The provinces which are not conquered, are governed by Princes or Kings, who have an absolute power over their subjects. None of these subjects, without exception of even the great men, have any ownership in the land. They receive the advantages of their fields subject to the good pleasure of the prince, as well as the gains they derive from the multitude of their slaves. Some of the chief people have as many as one, or even two, thousand slaves. The princes always make up their councils of their principal military officers, and keep their troops on foot, divided into four, five, or six divisions, which remain constantly on the frontiers. The body guards of the sovereigns consist of no more than five or six hundred men, born of the principal families among their subjects. The ancient soldiers are employed in the command of towns or villages, for there is no village in Formosa which is not commanded by a soldier, and each commander is obliged to present annually to his superior a list of the people under his jurisdiction. Formosa being surrounded by sea, these Princes constantly maintain a certain number of vessels, each of which has two masts and twenty-four oars; they do not use cannon, but make use of artificial fireworks.

This mix of little-sense and non-sense comes at the end of a narrative of bloody, aggressive action and just prior to a plan for "the project of establishing a colony". Nevertheless, it is from such narrative patches that we may extract the very few points of salience or veracity. Thus Benyowsky mentions that Formosa is called by the Chinese "Touaiouai" and by the natives "Paccahimba"; the former is close to terms used by aboriginal people for any foreigners and possibly miss-apprehended by early Dutch settlers as the term for their own land (Taiwan), the latter is not too far from the *Pakan* or *Pak-ande* historically used by some natives. Again, in areas where it was relatively easy for Benyowsky to repeat contemporary Euro-accounts or the talk of seafarers, such as crops, foods or wildlife, he did get it—more or less—right. In matters of which he could know little, such as the actual density of population on his eastern coast and into the mountains, he made incorrect assumptions that led to nonsensical claims concern-

ing numbers of troops and followers, prisoners and slaves that could not have been true. In these areas the accumulations of claims is more damning than any one problematic claim, from huge villages and commanding armies to horse-hair (rather than dog-hair, which would be more tenable) clothing, and so on.

4. Plans for Empire

Quite well-known are Benyowsky's plans for an imperial conquest of Madagascar. Despite being warned by the French governor of the island, M. Poivre, the French authorities in 1772 appointed Benyowsky in command of an expedition to Madagascar. He arrived with limited instructions in 1774, and immediately convened the local chiefs, obtaining grants of land. Malaria and lack of resources limited this venture, and restrictive orders from France further encouraged Benyowsky to resign his command of the French establishment at Louisbourg, arrange a treaty with native chiefs, and return to France. Receiving decreasing support there, Benyowsky sought resources from America, and in October 1784 sailed from Baltimore on a return to Madagascar, pursuing what was in effect an independent colonising adventure. After capturing the French depot at Ngontsy and building a fort, this in turn met with French retaliation in the form of a gun-boat in 1786, and in the subsequent engagement Benyowsky received a fatal wound on 23rd May of that year.[20]

But his first serious proposal for any sort of colonisation had been conjured up in Formosa on 9th September 1771. In his plan to form a European colony in Formosa, Benyowsky laid out 23 points under the three headings of maxims, demands, and stipulations. Foremost amongst the first of these was included the necessity for early decisions concerning whether Formosa should be seen as primarily of commercial or military interest and "whether it be most proper to cultivate the commerce of exchange, of economy, or of industry".[21] Benyowsky

---

20 For detailed accounts see S. Pasfield Oliver, *Madagascar,* vol. 1 (London: Macmillan, 1886), pp. 18-21; Robert Drury, *Madagascar, or Robert Drury's Journal. And a further description by Abbe Alexis Rocho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aptain Pasfield Oliver, *Madagascar*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0). For Benyowsky and Madagascar see the *Memoirs* and Alexis M. Rochon, *A Voyage to Madagascar and the East Indies* (London: E. Jeffery, 1793); the French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Paris in 1791.

21 Because of its relatively common availability in Taiwan, I have taken all quotes in this section from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535-538.

argued that for Formosa, gaining a "superiority over their minds" would be of greater efficiency than military rule, but also that the colony should be "animated by glory, for in that case it may conquer, but will never be conquered". Benyowsky put forward exemplary Enlightenment views of governance and civil authority. So, although luxury should be generally avoided, "it will be proper to establish external marks of grandeur,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ranks of citizens who form the colony; as by this means emulation will be encouraged". Two further maxims declared Benyowsky as Enlightenment man. Although restraint of conscience should be abandoned, the resulting freedom would be Europeanised, for happy is he "who shall establish toleration and the belief of only one God". As commonly held during the late-Enlightenment, the colony might be run on slave labour. Thus, a code of laws "should be made in favour of slavery", but to encourage initiative and fit the moral codes for good governance "means should be appointed to enable this unfortunate order of men to arrive, by the force of labour and industry, to the rank of free citizens". Formosa was by force to be turned into a late-Enlightenment version of the classical Greek state. Of course, the availability of slaves was to be augmented by a population policy that would grant especial "privileges and gratifications to fathers and mothers who shall have presented to the State a number of children, the issues of their marriages".

Following this Enlightenment colonial agenda, Benyowsky issued demands pertaining to his own colonial authority and governance. Direct European power should work principally through his own authority and council, and should be boosted by the gift of three vessels with 18 months provisions and 1,200 men, with arms and tradable goods to the added value of one million two hundred livres. In order to set the conditions for efficiently sustained rule, Benyowsky demanded a three year period within which to be granted the right to "raise recruits to the number of four hundred men yearly, and the transport of two hundred foundling children of both sexes annually".

Clearly stip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defeat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Formosa, Benyowsky's 1771 plan represented — in brief — an Enlightenment proposal for colonial accultur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alongside a considerable repopulation of the island. In such a plan, casual, violent adventure had been replaced by an extens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 whereby Europe would emerge as the powerful cultural centre of a brave new world, in which peripheral areas would play their parts as suppliers of resources of all kinds. In such a

fashion, we might visualise this aspect of the larger Benyowsky project as fitting comfortably within late-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an ideas of the expanding world as an infinitely available resource. This was a style of thought that did indeed bring Benyowsky into the same world as that of Joseph Banks (below), whose famous *Endeavour* voyages brought Enlightenment enquiry and colonial adventure together in a mission to “maintain the power, dominion and sovereignty of Britain”.[22] From Australia to India, enlightened European ideology believed that indigenous people over the globe might be brought from what Governor Lachlan Macquarie of New South Wales thought of as “their rambling state” and transformed through colonial planning into commercial agents and farmers.[23] Even more generally, the Pacific was visualised as a vast natural laboratory within or upon which Europeans might experiment both politically and intellectually. Indeed, for these years Macleod and Rehbock once dubbed the Pacific “as a historical laboratory for scientific methods and mentalities, as well as an atelier for European art and anthropology”.[24] The essence of Europe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was an increasingly collective vision which located “The West” as a site of cultural change and creative diversity but located the entire rest of the world as a single site of stagnating otherness. The “enlightenment” component of this rested on notions that, with a more or less benign, controlled interaction, the “other” might—selectively—move across the civilization line towards the world of progress.[25]

5. Historiography I: Benyowsky as Enlightened Euro-Orientalist

Historiography of the *Memoirs* must begin prior to their actual publication. In 1772 the very influential English review,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published

---

22 Banks quoted in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3), p. 36.

23 Niall Ferguson, *Empire*, p. 109.

24 Roy Macleod and Philip Rehbock, eds., *Nature in its Greatest Exten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 1.

25 Ian Inkster, “Global Ambi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450-1800,” *Annals of Science* 54 (1997), pp. 611-622.

an "extraordinary Account" in brief of "de Benyofsky's" adventures in Siberia and Macau into late 1771 and early 1772, that did not explicitly mention Formosa at all.[26] Indeed, in a note written in French by Benyowsky and reproduced in this source, the Count himself writes that after taking in wines at Nagasaki he "sailed out again and passed by the Isles of Uljina, as far as Formosa and the Isle of Bassee; lastly took the straight course to Makaw, where I arrived in the month of September 1771… went out with 85 men, came back with 62". Thus, in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hat period, given in French directly by Benyowsky to Barlow at Macao in November 1771, no mention is made of any very recent murderous or colonial 18-day adventure in Formosa itself, this in a short passage that did manage to find space to refer to wines from Nagasaki. Again, in a letter written on 24th September 1771 at Macao, less than two weeks after Benyowsky supposedly left Formosa, Monseigneur, the Bishop Le Bon, referred at some length first hand to the arrival there and the claims of Benyowsky, and wrote that for "two months past they suffered hunger and thirst. He had been twice shipwrecked and twice they have repaired their vessel ... He came from the north and has coasted the island of Japan etc".[27] Again, here there is no mention of the Formosan adventure as reported in the later *Memoirs*. Even more damning, in material given Nicholson by the great *savant*, then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Sir Joseph Banks (1743-1820), an extended original account of his journey is given by Benyowsky himself, dated 21 March 1772, which seemingly came to Banks through the astronomer and priest the Abbé Alexis-Marie Rochon.[28] In what seems a reasonably precise narrative, Benyowsky here describes his Formosan period as follows:

---

26 Nathaniel Barlow, "Extraordinary Relation of a Voyage to Macao," *Gentleman's Magazine and Historical Chronicle* 13 (1772), pp. 272-274.

27 The Le Bon letter is reproduced by Pasfield Oliver in the extended preface to his edition of the *Memoir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3), pp. 17-18.

28 The original of this was communicated directly to the governor of Mauritius de Roche and his assistant M. Pierre Poivre. Rochon was at Port Louis when Benyowsky arrived there. Much of the original is reproduced in S. Pasfield Oliver, ed., *Memoirs* (1893), pp. 34-39. For further background see Medeleine Ly-Tio-Fane, *Mauritius and the Spice Trade. The Odyssey of Pierre Poivre 1719-1786* (Port Louis: MAPF, 1958); Yves Laissus, "Note sur les manuscripts de Pierre Poivre 1719-1786 a la bibliotheque centrale du Muse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ort Louis: Royal Society of Mauritius, 1973). It must be noted that Banks had accompanied Cook in his expedition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Endeavour* during 1768-1771 and knew much of far northern waters, having visited Iceland in 1772. He was thus in a good position to remain both enlightened and skeptical in all things pertaining to Benyowsky.

> Having entered a port in latitude 23:15 and longitude 223, I found myself attacked by the inhabitants, who killed three of my men. After avenging their death, the winds, always contrary, obliged me to make for the Continent of China, coasting along some small islands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Piscatoria: and want of water compelled me to enter by open force into Tanasoa, and to attack the Chinese, who endeavoured to prevent me from procuring a supply. I then sailed to Macao, a city belonging to her most faithful majesty, where I arrived on the 22nd of September 1771.[29]

In this account, then, there is no description of extended warfare of the sort produced later in the *Memoirs*, nor anything of large-scale activity of any kind. Finally, the pre-publication accounts of Benyowsky's supposed adventures include that of the astronomer Captain James King (1750-1784) in his work on Cook's last voyage, published in 1784. Here, King provided a first hand account of meeting one E.G. Ismyloff (almost certainly Ismailoff) in the Aleutian islands, who claimed to have travelled on Benyowsky's expedition from the 12th of May 1771 to the Kuriles, to Japan, to Canton, and then to France.[30] King also wrote of Benyowsky's journey without mention of Formosa, talked with three of Benyowsky's crew who seem also to have failed to give him any account of Formosa, and gave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s adventures up until 1774 when he was now "commander of a new settlement at Madagascar".[31]

Against this at best confused background, it is very clear from the outset that Hyacinth de Magellan (1723-1790), scientific investigator, copious correspondent of numerous European intellectuals, and descendent of the great navigator who had discovered the Magellan Straits in 1520, was essential to the original "Enlightenment" status of Benyowsky and his claims. Magellan was an Augustinian monk from Talavera, who then became involved in a

---

29 By this his entry point might be identified as Black Rock Bay, the islands are the Pescadores, whilst if Tanasoa is Tamsui, the Chinese city in Formosa, then this does not fit at all well with the *Memoirs* account as above.

30 If this is the Ismailoff referred to by Benyowsky in his *Memoirs* as active in Formosa (also spelt Ismailow eg. p.252 *Memoirs*, Oliver edition of 1897), it is again strange that he should not mention these spectacular episodes to King or others at that time. Indeed, this account accords much better with Benyowsky's own, original versions of 1771 and 1772.

31 James King and James Cook,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 for making Discoverie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3 vols. (London: G.J. Robinson, 1784); see also James King, *Troisième voyage de Cook, ou Voyage a l'ocean Pacifique, ordonné par le roi d'Angleterre* (Paris: Hôtel de Thou, 1785); King is a very reliable witness, providing a detailed account, he was FRS and author of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London: William Richardson, 1782).

serie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arriving in England in 1764. By 1774 he was a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in London, publishing work on optical equipment (1775), and was much engag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description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So, he was well placed to advertise Benyowsky's literary wares.[32]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agellan and Joseph Banks(1743-1820) between 1779 and 1783 shows Magellan as more than a mere acolyte and enthusiast, but rather as a member of a very extensive Enlightenment network that linked scientific experiment, navigation and exploration and global adventuring to a major Euro-project of placing European knowledge at the centre of world intellectual life and as a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beneficiary of an increasingly distant and exotic natural history.[33] Casual references in such correspondence, which stretched from Berlin to St. Petersburg, fitted nicely into Benyowsky's boasted university training in mathematics, philosophy and navigation.[34] Furthermore, during the 1780s Magellan was especially associated with a group of British *savants* who were members of the small but influential Birmingham Lunar Society, which amongst many such networks extended the notions of the late Enlightenment from metropolis to province, from theory to practice.[35] Associating and corresponding with such major British Enlightenment figures as botanist, medical therapist, and natural historian William Withering, (1741-1799), industrialist and engineer Matthew Boulton (1728-1809), and the geologist, instrument maker and engineer John Whitehurst (1713-1788), on such

---

32 The link between the two men was probably through navigation and instrumentation, though it must be emphasized that Benyowsky demonstrates very little mathematical or nautical knowledge anywhere in the memoirs or elsewhere, despite his claims of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See M. de Magellan, *Description des Octants et Sextants Anglais* (London: B. White, 1779); Joao Jacinto de Magalhaes, *Description et usages des instruments d'astronomie et de physique fait a Londres par ordres de la cour de Portugal en 1778 et 1779: J.H. de Magellan* (London: B. White, 1779).

33 For the relations of such elements at this time see especially essays by Adrian Johns, Rob Iliffe, Larry Stewart and Ian Inkster in Roy Porter, ed., *Eighteenth-Century Science*, vol. 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t is surely safe to hypothesise that the Banks-Magellan friendship may well have influenced Banks in remaining merely distant and non-committal in terms of Benyowsky's claims when it came to use of his critical ms material in the Nicholson edited first edition of the *Memoirs.*

34 Magellan to Joseph Banks, 1779-1783 in "Letters to Sir Joseph Banks 1774-1783," Additional Manuscripts 33,977, British Library, ff. 90, 112, 239.

35 Fo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see Ian Inkster and Jack Morrell, eds., *Metropolis and Province: Science in British Culture, 1780-1850* (London: Routledge, 2007); Robert E. Schofield, *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 A Social History of Provincial Science and Industr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matters as universal measures, mathematics, atmospheric chemistry, mineralogy , it is clear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handling of the Benyowsky manuscripts, Magellan was fully committed to generating financial benefit from locating these stories of oriental adventure within a broader enlightenment frame, just as he was hoping to generally benefit from the increasing twist of that frame towards matters commercial and technological.[36] In a sense, Magellan was constructing Benyowsky on a par with new works in mineralogy or chemistry.[37]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Benyowsky's initial British renown was the link with William Nicholson and the cosmopolitan, intellectually republican environs of London around 1789-1790. About 1783 or 1784 Magellan showed Nicholson a printed proposal to publish Benyowsky's memoirs in 3 volumes by subscription, a plan at that point given up. At that time the Count was back in Madagascar—having been funded by Magellan in hope of colonial returns. Again, this failed to reap any commercial benefits, so Magellan returned to publishing the memoirs, presumably in an attempt to recoup at least a proportion of his expenses. In order to do this he sold the rights over the French manuscript to Nicholson. When in 1788 Magellan became gravely ill, Nicholson decided to go ahead with publishing of the text despite the loss of the intended research by Magellan on the activities of Benyowsky that would have taken the story up to the point of Benyowsky's death.

William Nicholson (1753-1815) was a leading London figure of the late Enlightenment, the author of many works on chemistry, editor of the work of several *savants*, publisher and 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38] He himself had sailed und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years 1769-1776, but then settled in London as a very public scientist: he invented an ingenious aerometer for

---

36 Letters Magellan to Withering 2 December 1783, 11 August 1785 (Manuscript Papers of William Withering ,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London).

37 Axel Frederic Cronstedt, *An Essay towards a System of Mineralogy*, enlarged and improved by John Hyacinth de Magellan (London: Charles Dilly, 1788).

38 By "late enlightenment" we refer here mostly to France, England and Scotland, and the move from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renewal and critique towards new scientific certainties and a republican political environment amongst intellectuals and *savants*. For brilliant background see Roy Porter,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Palgrave, 2001), especially chapters 3, 7 and 9 and for an excellent summary see his comments in *The Guardian* newspaper (London) published on guardian.co.uk at 15.57 BST on Tuesday 12 June 2001; for an extensive treatment of London's scientific enlightenment in these years see Ian Inkste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Metropoli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the Askesian Society of London," *Annals of Science* 34 (1977), pp.1-32.

laboratory usage, was a patentee and patent agent, became engineer to the Portsmouth and Gosport Water Supply Company, brought out his *Dictionary* in 1808, and most famously edited *Nicholson's Journal of Natural Philosophy* during 1797-1815, and translated many works in chemistry and natural philosophy.[39] As with Magellan, he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Lunar Society, becoming European agent for the great industrialist Josiah Wedgewood (1730-1795) from 1776, using his journal to publish the new researches of Richard Lovell Edgeworth (1744-1817), Whitehurst, and 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 thereby linking provinces, metropolis and the continental Enlightenment.[40] Most significantly for the credence given to Benyowsky's leadership and navigational claims, Nicholson was publishing on practical navigation and instrumentation from the early 1780s, and in 1792 he produced his *Treatise on Practical Navigation*.[41] In the 1780s he had been active in the Chapter Coffee House Philosophical Society, and around the great metropolis was one of those most active of men, best likely to further Benyowsky's posthumous reputation.

The Benyowsky project was also favoured by its timeliness, arising at the peak of an interest in French intellectualism and ideology, at the height of Nicholson's reputation as an English *savant*. Just a few years later many of that generation of Enlightenment *savants* were under attack by a post-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that required more expertise and less risk in their ideologues.[42] Thus the stern critique by the Aikin brothers of the later editions of Nicholson's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Chemistry*, as old-fashioned and too slight and lacking in any emphasis on "actual practice".[43] But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editions of Benyowsky, William Nicholson neatly combined all attributes

---

39 Nicholson was experienced at 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thus his well-known editions of J. A. C. Chaptal's *Élémen de Chimie* (London: G. G. J. Robinson, 1791) or G. B. Venturi's *Experimental Enquiries* (London: G. G. J. Robinson, 1799).

40 S. Lilley, "Nicholson's Journal 1791-1813," *Annals of Science* 6 (1948), pp. 71-89; Robert E. Schofield, *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 pp. 131, 259-261, 302.

41 Nicholson's *The Navigator's Assistant* (1784) and *A Treatise on Practical Navigation* (1792) focused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ory and praxis, gave rules for plain, mid-latitude and Mercator's sailing, gave instructions for keeping a proper journal of voyages and seas, and advocated close scrutiny of standard sources such as John Robertson's (1712-1776) *Elements of Navigation* (1754).

42 Arnold Thackray, "Nicholson, William,"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10 (1974), pp. 107-109; T.H. Levere and G. L'E. Turner, *Discussing Chemistry and Steam: The Minutes of a Coffee House Philosophical Society 1780-1787*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3 *Annual Review* 7 (1809), pp. 683-686, 805-806.

of the late-Enlightenment, advocating a science that addressed all intellectual adventurers "whose prospects may direct them to the civil or military service of their country, or to the manufactures, trade or other important departments of active employ … A lecture upon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is delivered every Tuesday, and on Chemistry every Thursday, with experiments by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instruments and both sciences are illustrated by frequent exhibi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the tools, processes and operations of the useful arts and common operations of society".[44] Such a nice combination of attributes－navigational expertise, military adventuring, commerce, useful arts －would serve Benyowsky's memoirs well when they were published under Nicholson's careful editorship, first in 1789, the yea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all things French. These were, clearly, the definitiv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versions of Benyowsky's claims, and they deserve some fuller consideration.[45]

Nicholson immediately concludes from his work on the French manuscripts that "they contain nothing which is at all improbable or contradictory" and that "we must depend on his authority".[46] He emphasises that there is much collateral proof, especially of material upon (surprisingly) Japan and Formosa. Nicholson certainly takes on a liberal, Enlightenment stance when he argues that, although some aspects of the Benyowsky account are not directly provable, "the veracity of the count may be relied on" and any "disagreements of collateral evidence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arise from the imperfections of that evidence, than from his want of fidelity".[47] Nicholson then tells the story of how the Magellan ownership of the French material fell to himself around 1788 when Magellan became

---

44 *The Observer* 1 (July 1804), p. 1 advertisement.

45 The Nicholson translation and editions (that is the 1789 Robinson, London and the 1790, P. Wogan, Dublin) were used extensively throughout Europe in the 1790s, but see especially the editions edited by Johann Reinhold Forster (1729-1798) of Berlin, Christian F. Voss und Sohn, 1790, and 1793; M.A. Benyowsky, *Begebenheten und Reisen Grafen Moritz August von Benjowsky* [with extra material from von C.D. Ebeling und Dr J.P. Ebeling] (Hamburg: B.G. Hoffman, 1791); Nicholson kept corrections or selection to a complete minimum and seems to have only really added chapter distinctions and headings. We should also note that even the original French edition of 1791 was published by the same London firm and included a full French version of the Nicholson preface. This original translation of 1789 has been used as the basis for most if not all subsequent published versions, including those of 1893 (London: Fisher Unwin) and 1904 (London: Kegan Paul) the best of the more recent standard English accounts being edited by Captain Pasfield Oliver (London: Fisher Unwin, 1893).

46 Benyowsky, the 2 vols. of memoirs and travels, edited Dublin, P. Wogan, from the long preface by William Nicholson penned in London during December 1789, quote p.xiii.

47 Nicholson in Benyowsky, *Memoirs* (1789), pp. xvi-xvii, xxi.

mentally incapacitated—in fact Nicholson then proceeded with publication very quickly. A strategic intent of Nicholson was to emphasise the adventurous seafaring aspect, so some account of Magellan's researches into the later life of Benyowsky are included here, and repeated in most of the later editions that depend on the original work of Nicholson during 1788-1789. From the Madagascar and American adventuring of 1784-1786, Nicholson concluded that the Count possessed "an intimate and almost intuitive knowledge of the human mind … he was formed to persuade, to command, and to coerce".[48]

Nicholson seems at his most accepting when evaluating the veracity of Benyowsky in Japan and Formosa, arguing as follows:

> That he should stand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and direct his course for China, are obviously the result of the dictates of common sense; that extreme distress should follow the want of proper subordination among a set of exiles, or men of desperate fortune and adventure, is not at all wonderful; and that such men, without any settled destination, and acting throughout from the impulse of either necessity or their own inclinations, should range from one island to another, where their wants could be best supplied, is what the slightest ideas of cause and effect would have foretold. The discover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Count on this passage and elsewhere must speak for themselves .... [49]

It should not, then, be a surprise that the early reviews of Benyowsky were supportive. Thus the highly influential *Monthly Review* treatment of the 1790 Nicholson edition, made much of the gender/sexual aspects relating to Benyowsky's Russian mistress Aphanasia Nilow, and emphasised his frequent piracy on the coastal waters of Asia The reviewer basically followed the Benyowsky story, being critical only partially and when linked to Benyowsky's violent behaviour and attitudes, but even these were acknowledged as a function of the "motley complexion" and fractious nature of his crew. In such

---

48 Nicholson, ed., *Memoirs* (1789), pp. xxiii-xxviii. He and family voyaged to Maryland in April 1784, bound ultimately for the Madagascar trade! This was because Benyowsky could not get directly there and also thought that, with the revolution, American merchants were more likely to take on a new trade. From Baltimore he sailed in October 1784, bound for the east coast of Madagascar, St Augustin, to "form a settlement or emporium"—he already had there some "influence with the natives". He seems to have been a very dubious navigator. From Brazil he again headed out, and landed in Madagascar on 7 July 1785. He emerged from a confused armed encounter leading a force of armed natives against the French, and attacked the French factory at Foul Point and was killed on 23 May 1786.

49 Nicholson, ed., *Memoirs* (1789), vol. 1, pp. xxi-xxii.

circumstances "we must not be too strict in scrutinizing their behaviour in the remote Eastern seas".[50]

6. Historiography II: The Elements of Acceptance

As we have noted, Benyowsky's accounts, however fantastic, remained as historical resources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and into the present time. A complicating issue is that on certain fronts they had some veracity, could be cross-checked with other accounts, and so were held in some regard by contemporaries, later reference sources,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critical historians. For instance, distinguished and informed contemporaries seem to have relied on his accounts of his periods in Madagascar. Thus the French Minister Mons de Boynes, who invited Benyowsky to take charge of a limited adventure to Madagascar with the title of Governor-General and approved of his subsequent plans, claimed that the Count in the "course of his travels by sea, has learned the manner of treating of savage people; and to a great share of firmness, he has united that mildness of character which suits a design of this nature". We may be fairly sure that the French minister had no idea of what Benyowsky had reputedly been up to in Formosa.[51] When Samuel Copland wrote his history of Madagascar in 1822 he gave credence to the Benyowsky account of the 1770s and 1780s in a very substantial treatment.[52] Again, the Reverend William Ellis, Foreign Secretary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 long term resident of Madagascar and expert on its history, happily wrote of Benyowsky's "firm and enterprising character", his "accustomed decision and firmness", and his "great prudence and decision of character, aided by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mankind", as well as his attempt to "combine the opposite elements of military rule with philanthropic conciliation", and even managed to summon up such Christian forgiveness as to explain away Benyowsky's duplicity in pretending

---

50 John Noorthouck, "Memoirs and Travels of M. A. de Beniovsky," *Monthly Review or Literary Journal* 3 (September-December, 1790), pp. 169-175. Aphanasia was the daughter of the governor of Kamchatka, had been more or less promised to him by the governor－even though Benyowsky was already married; she escaped with other women dressed as men, after her father had in fact been deliberately killed during Benyowsky's escape.

51 William Ellis, *History of Madagascar* (London: Fisher, 1838), quote p. 68.

52 Samuel Copland, *A History of the Island of Madagascar* (London: Burton and Smith, 1822), pp. 176- 247.

to be himself the son of a local chief as well as his crazed cruelty during 1775 in ordering "firing without scruple upon all offenders" who opposed his, unwarranted, colonial ambitions.[53] Historians who have reported Benyowsly literally have often been simply following the credulities of his contemporaries, however often *en passant.* Thus the great historian of Japan, George Sansom, reported on Benyowsky's brief visits to Japan and Madagascar and repeated, with scepticism, Benyowsky's claims that "the Russian government had designs upon Japan".[54]

But from the later 19th century, Benyowsky was perhaps more a creature of Japanese colonial ideology, and fell subject to the need of the agents of Japanese expansionism to colour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the blackest of tars. The inexorable expansion of industrialising and — especially from the 1880s and 1890s — militarising Japan in the various coastline areas of Chinese culture coincided with a political project that was designed to denigrate and dismiss that culture, to spread 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ese arrogance, corruption, cruelty, backwardness and inefficiency. From an early point, a prime task of Japanese publicists and media was to reduce China to a place of corruption and ineptitude, just as Chinese commentators themselves were advocating such ideas as "A Scheme to Promote the Welfare of Asia" in early 1884 that assumed benign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55] Just months afterwards,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lite was considering "The Fate of the Orient" and were clearly, openly distrustful of any comments from the West that they could not select or control, and proclaimed that the world must look to Japanese leadership of Asia, for "i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for Japan to desert the fellowship of Eastern nations in order to enter the coterie of European powers", especially given western aggression over such vital issues as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unequal trade treaties within Japan itself.[56] Any true coali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thin the growing Chinese Empire could not now be on equal terms, for, as the *Hochi*

---

53 William Ellis, *History of Madagascar,* pp. 68, 71, 73-74;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his original order from De Boyes had been to establish a trading post, not a French colony. It might be also noted that when the Benyowsky manuscript account of Madagascar [above Madagascar BL] was sold in 1852 it was advertised widely as "indispensable" to any account of French colonialism [frontispage Madagascar BL].

54 George B. Sans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A Study in the Interaction of European and Asiatic Cultur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9), p. 213.

55 *Hu-Pao* (Shanghai, China), 20 February 1884.

56 "The Fate of the Orient," *Choya Shimbun* 3, May 1884.

Shimbun put it, how could equality be assumed between two such different peoples, where "inactivity and procrastina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57] This is an often neglected aspect of the history of "Orientalism"—east of India, much of the 20th century "European" conception of the "Orient" was in fact filtered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machination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the years 1895-1945.

Benyowsky's claims were captured by Japanese interests even prior to 1895.[58] In 1874 under a pretext of settling a conflict arising from the massacre in December of 1871 of some Ryukyu islands fishermen by a group of indigenous Taiwanese, an expedition was sent against the island led by Saigo Tsugumichi (1843-1902), of Satsuma, long a staunch loyalist of the Meiji government.[59] By the date of this Taiwanese venture, the Japanese had enlisted a number of Western observers as spies and advisers concerning the prospects of a successful invasion of the island, the likelihood of Chinese resistance,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In particular, General Charles Le Gendre, the US Consul at Amoy who had travelled fairly extensively in western Taiwan during 1872, was by 1874 in correspondence as an adviser to Okuma Shigenobu, (born 1838, a Councilor of State under the Meiji government), and writing to him concerning Japanese rights over indigenous Taiwan.[60] Although he had no direct knowledge of eastern Taiwan, Le Gendre drew upon a variety of second-hand sources in order to analyse Taiwan as an island of two distinct cultural halves, that of the Han Chinese in the west and tha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57 *Hochi Shimbun*, 26 July 1884.

58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foreigners in Taiwan were still taking Benyowsky quite seriously in their accounts though none could swallow all of his claims—see "Memoirs of Count Benyowsky," *Chinese Repository* 3 (March 1835), p. 496-504; Jos Bechtinger, *Het eiland in de Chineesche zee* (Batavia: Bruning et Wyt, 1871); and see for instance Joseph B. Steere (1842-1940), in his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1876, republished and edited by Paul Jen-kuei Li,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02), who lists cattle and horses, sheep, gold and silver as all "marvelous", and so in need of proper examination! (p. 184). see also Joseph B. Steere, "Formos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6 (1876), pp. 302-334.

59 The Ryukyu islands had long paid tribute to both Japan and China; ironically in 1609 the daimyo of Kagoshima had sent an expedition against Okinawa on the grounds of the ill-treatment of some Satsuma fisherman wrecked on that coast.

60 A manuscript now published in Robert Eskildsen, ed.,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Western Sources Related to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05).

east.[61] In hi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f 1874, now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Le Gendre enlisted Benyowsky's account as a serious tactic that might well be followed by the Japanese on the east coast to take over Taiwan, adapting it only in order to land at several points rather than just one. As Le Gendre puts it, "Benyowsky, with only a small vessel and a few adventurers, established a settlement which would have become considerable and prosperous had his party been composed of men possessing such guarantees of morality that he could have trusted his fortunes to their hands. With her resources, Japan could easily accomplish that which one man came so nearly doing with such limited means at his disposal. She could establish military stations at the mouths of the streams, at which vessels can anchor, and send there persons condemned to confinement for political offences, to open up relations of trade and amity with the natives, who being nearly of the same race as the Japanese, would rapidly become civilized under the tutelage of these teachers, many of whom are men of great talent…. As for the Chinese portion of the island, it ought to be strictly respected. All that Japan could require would be that, in carrying out these plans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Aboriginal Formosa, which could thus become an integral portion of the Empire, she would receive a full and cordial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doubtless the latter would observe its treaty stipulations and prevent the aborigines, who would be at war with Japan, from taking refuge on the Chinese side of the island".[62] The 1771 account had allowed a relative stranger to suggest aggressive colonizing tactics to senior Japanese statesmen at a time of extreme danger, tactics that followed directly from Benyowsky's earlier assertions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Taiwan's indigenous popul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authority.

Benyowsky was also enlisted in Japan's colonial project in one of the best known of Japanese early accounts of their Taiwanese colony. Although

---

[61]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Le Gendre as Consul had been important in securing a compact between American and Taiwanese indigenous interests, when American marines had invaded Taiwan in reaction to an 1867 attack by aboriginal Taiwanese on the American ship *Rover*. Over this issu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d taken no action after showing little interest, this indisputably colouring Le Gendre's whole attitude to the island. By 1874 Le Gendre had resigned his Amoy consulship and joined other Americans as an advisor to the Japanese Expeditionary Forces under Saigo. Upon being sent to Amoy as chief negotiato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Le Gendre was arrested by the American Consul on a charge of high treason, sent to Shanghai, but later released.

[62] Robert Eskildsen, ed.,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quote p. 65.

Yosaburo Takekoshi's investigative trip to Formos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as in fact very brief, the claim was immediately made that it accurately depicted Formosa under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contrast to the earlier, evil impacts of a neglectful Han rule. Takekoshi was a member of the Japanese Diet, and the status of his book as an official account was cemented in the preface of August 1905 written by the Chief of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Formosa, Baron Shimpei Goto, in which he emphasised how Takekoshi "had full opportunities of observing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 his statesmanlike ability has enabled him clearly to comprehend all sides of each question … it would be a hard task to improve on his account".[63] The book in its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 is addressed to all those in the West who "still doubt our colonizing ability". With this persuasion at centre-point, it was imperative to strik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benefits of Japanese rule and the long period of Chinese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64] Thus the historical sections emphasised the struggles between Chinese and aboriginals, arising principall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was even more careless and irresponsible than on the mainland". Unable to prevent Chinese emigrants, the local Chinese authorities were powerless in the face of "these newcomers who plundered the native tribes, stealing their lands, wasting their farms, and cheating them out of their crops. They even went so far as to set fire to their houses and shoot them on sight, until at last the latter were forced to fly for refuge further and further into the mountains, and were terrified at the sight of a foreigner". For hundreds of years "hardly a day passed" without "race fights" between Chinese and aboriginals. At such a narrative point the Benyowsky story becomes of great utility, illustrating the "cruelty and wickedness" of the Chinese and how "deep seated this enmity was". In the Takekoshi version, Benyowsky, having "killed 1,056 of the natives who opposed his landing, he advanced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island, where he met a Spaniard, named Don Hieronimo, who introduced him to Huapo, an independent Formosan chief … The chief's idea was to use Benyowsky to drive out the Chinese, and thus revenge himself for all the cruel wrongs he had suffered at their hands. Count

---

63 Takekoshi graduated from Keio and was appointed 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the Diet cabinet in 1898. He was memb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 14 years then of the House of Peers. Most notably in terms of our argument, he was also Chief Historian of the Imperial House.

64 Yosaburō Takekoshi,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quotes pp. 5-6. The book was written from Tokyo in early 1905.

Benyowsky's plan for colonizing the island, attracted attention all over Europe for a time, but was not well received in influential circles, with the result that, when a few years later he was killed in Madagascar, while fighting against the French, his schemes were soon forgotten".[65] In similar accounts stemming from Japan, Benyowsky's rebellion was considered literally authentic and one of a series, precursor to a "new revolt which lasted 30 years (1794-1833) and left the whole island a heap of ruins".[66] Takekoshi himself listed 22 "most important insurrections" in the 220 year period. Thereby, the personal aggrandisement of Benyowsky is elided into much more general claims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personality and rule. By so levering the Benyowsky account into a general story, the Japanese engineered the notion of themselves as Asian liberators, as colonialists on at least an equal moral footing with anything that the West could then boast. Indeed, ironically enough, they represented a new enlightenment.

So, it seems possible to identify fairly readily the elements that determined the acceptance of Benyowsky's accounts, both at their inception in London around the late 1780s and their reassertion by the Japanese after 1895. A serious question of historiography remains: How had the Benyowsky story survived the years between the European republicanism of the 1790s and its colonial resuscitation by the Japanes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 first point must centre on the sheer amount of attention given the *Memoirs* across Europe. 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accounts often included additional material and tended to elide the Benyowsky texts with general, authentic analyses of exploration and navigation.[67] At the same time, several respectable writers often moved from such accounts to quite adulatory biographical statements.[68] Of great importance was the exposure afforded the Benyowsky texts in the pan-European literary worl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greatest early example of this was the play by the famous Weimar dramatist Augustus von

---

[65] Yosaburō Takekoshi,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quotes pp. 69, 71. It should be noted here that Takekoshi was drawing from the Nicholson/ Oliver version of the Benyowsky translated memoirs as published in London in 1893, and clearly opted for Nicholson's naivety rather than Oliver's healthy skepticism!

[66] Edmond Papino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Japan* (Yokohama: Kelly and Walsh, 1910), pp. 626-627, 767-768.

[67] See the Russian version edited by Ivan Ryumin (Katerinburg, 1822), which contained critical materials.

[68] See Constant von Wurzback on Benyowsky in *Biographisches Lexikon des Kaiserthums Oesterreich* (Vienna: K. K. Hof, 1876).

Kotzebue (1761-1819). His comic dramatisation of Benyowsky's Siberian period was published as *Graf von Benjowsky* in 1791 to wide acclaim and many translations. Author of over 200 plays and commanding the entire European stage at that time, and at one time dramatist to the court theatre in Vienna, Kotzebue himself commented that the Benyowsky play was "received in a very flattering manner by the public, and, as was consequently to be expected, with scarcely less contumely by the critics".[69] Publicity was further raised when Kotzebue was arrested in 1800 when crossing into Russia on grounds that were dubious but which appeared to be relat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lay. He was himself then sent to Kamchatka, and subsequently concluded that the cause of his retention there was related to possible offence caused to the Emperor Paul by his ridiculing of Russian authority in the far north.[70] He was released through another whim of that Emperor some months later. This did no harm at all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iberian play, which went through many popular editions in most European languages.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period came a most significant edition, that of a giant of Hungarian literature, Maurus Jókai, (1825-1904). Jokai was the most acclaimed Hungarian literary figure of the time, whose first play *Zsidó fu* (the Jew Boy) was produced to much acclaim in the 1840s. He was editor of the leading journal *Életképek* and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848 emerged as an aggressive proponent of the national cause, and from that time led the life of a political suspect. An enthusiast for the Magyar language, composing a great number of romances, tales, essays and critiques, he re-emerged on the official political platform with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Hungarian constitution in 1867 as a 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ve and, from 1863, as editor of the government organ *Hon* during which time his literary output escalated into hundreds of volumes. As a renowned exponent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Jókai has been seen primarily as an arch-romantic with a strong and emotional "Oriental"

---

69 August von Kotzebue, *Count Benyowsky, or the Conspiracy of Kamtschatka, A tragic-comedy in Five Acts,* trans. Rev. Wilhelm Render, German Translation (Cork: printed by J. Connor and W. H. Creagh, 1799); the 1st edition of this was printed by the author, *ibid.* (Cambridge, 1798), another in London by W. J and J. Richardson in 1798. See also Benjamin Thompson, *The German Theatre*, vol. 2 (London: Vernon and Hood, 1801).

70 Augustus von Kotzebue, *The Most Remarkable Year in the Life of Augustus von Kotzebue*, trans. Rev. Benjamin Beresford, German Translation, vol. 1 (London: R. Phillips, 1802), pp. 164-165.

imagination.[71] But he was also a satirist and humorist of some subtlety, so it becomes problematic to signify the importance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Benyowsky historiography. Jokai's text — in five volumes — did not merely reproduce the standard memoir but appears to have involved some substantial research into Benyowsky's family and youthful years.

7. Windows of Deception: Orientalism as Fantasy

Precisely as Benyowsky was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himself at Madagascar, and only months before his violent death, appeared the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ausen*, published in London for the very modest sum of one-shilling. Republished hastily and copiously throughout enlightenment Europe, this was shown to be the fictitious work of Rudolph Erich Raspe (1737-1794).[72] Given its timing and its fantastic character, and that Raspe is known to have derived his stories from Hieronymus Karl Friedrich, Freiherr von Mūnchausen (1720-1797), a German who had been lo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Russian army, we can draw parallels within what might be over-generously termed a literary genre! This similar case having given rise to an entire psychological disorder — "Munchausen's syndrome"[73] — might we not merely dismiss Benyowsky's story as a good example of fantastic aggrandisement associated with this late enlightenment period, which mixed outrageous claims with the very real materi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s in Europe at that time, and spawned at the same time such fictitious accounts as those of James Bruce (1730-1794) in his 1790 *Travels to Discover the Nile*?

---

71 H. W. Temperley, "Maurus Jokai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Contemporary Review* 86 (July/ December 1904), pp. 107-114.

72 Rodolph Eric Raspe, *Baron Munchausen's Narrative of his Marvelous Travels and Campaigns in Russia* (Oxford: Smith, 1786). The original 49-page pamphlet expanded as it was randomly embellished by publishers and booksellers in subsequent years. Five English editions rapidly followed, and a free German translation was made by the poet Gottfried A. Burger and printed in Gottingen in 1786.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ext is the 7th English edition of 1793, continuously pirated in later editions. Note then the similarities with the Benyowsky publications in terms of background, association with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ism,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copying within this genre.

73 First named in a paper by Richard Asher in 1951, this ail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simulated illness, pathological lying, and constant movement from place to place: Richard Asher, "Munchausen's Syndrome," *Lancet* 6650:1 (February 1951), pp. 339-341.

Do we dismiss Benyowsky－then－as *only* an opportunist? We argue here that this would be careless, not only because such fictitious adventuring was clearly part and parcel of a more general expansionist mentality of superiority and inevitability conjured up within Europe at this time, but because in the very specific case of Formosa, it had an important precedent that belonged more to the scientific world of Isaac Newton than the years of the later, republican enlightenment. In 1704, George Psalmanazar (1679-1763) published his *Description of Formosa* as a romantic but real account of his travels and experiences on the island, in which he utilised just that mixture of known fact and fantasy that we associate with Benyowsky.[74] Described by a modern writer as a "well-written melange", replete with accounts of Formosan polygamy, cannibalism, idolatry and human sacrifices, with a god who demanded the hearts of 18,000 boys each year, much of the account was a partially-disguised attack on both pagan doctrine and Jesuit activity in the east and in Europe, and perhaps because of such controversial elements became an instant bestseller.[75] Although Psalmanazar identified himself variously as a Formosan or a Japanese, he was in all probability of Flemish or French background.[76] In a work of 1707, Psalmanazar posed as a Formosan, and in dialogic format argued that the Japanese were far more rational than supposed in Europe, that they were more "like a man of a free born understanding" This supposed focus in fact disguises an attack on the new rational religion of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where the "Formosan" actually wins the argument.[77]

Urged on by booksellers he utilised existing accounts of Formosa by the Reverend George Candidius to construct his fictions.[78] Although the Royal

---

74 For a 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Psalmanazar see Phyllis Greenacre, "The Impostor,"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27 (1950), pp. 370-379. For a good general account, F. J. Foley, *The Great Formosan Imposter* (Rome: Jesuit Historical Institute; St. Louis, Mo.: St. Louis University, 1968).

75 F. J. Foley, *The Great Formosan Imposter*, p. 37.

76 John Shufelt, "The trickster as an instrument of enlightenment: George Psalmanazar and the writings of Jonathon Swift,"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1: 2 (2005), pp. 147-171.

77 George Psalmanazar, *A Dialogue between a Japanese and a Formosan, about some Points of the Religion of the Time* (London: Bernard Lintott/ Nando's Coffee House, 1707), quote p. 9.

78 George Candidius, "Short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inted in James Awnsham and John Churchill, eds.,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vol. 1 (London: Churchill, 1704), pp. 526-533; see also *Churchill's Collection*, vol. 1 (London: Churchill, 1744), pp. 404-411. For an excellent recent account that places Candidius in a wider Formosan context see 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 and in particular the commercial setting of "cangan-christians", pp. 37-39, 66, 209.

Society of London, perhaps the foremost intellectual forum for Europe at that time, demanded his examination by the Jesuit mathematician and Chinese missionary, Jean de Fontenay (1643-1710), the fiction was truly foiled by the famous astronomer Edmund Halley (1656-1742) with basic astronom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duration of daylight in Formosa.[79] From 1705 the Royal Society publicly repudiated the Psalmanazar account. But—the account being periodically embellished and republished — credulity reigned amidst rationalism in 18th century Europe, and for many the Formosan fictions remained extant as Formosan truths throughout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Indeed, the influential *Monthly Review*—later to give credit to the *Memoirs* of Benyowsky—argued that Royal Society opposition aided the popularity of the Psalmanazar claim.[80] We might argue, then, that the Benyowsky memoirs were a timely reinforcement of an evolving "orientalism" associated with expanding European culture and power. In this milieu scientific truth was acknowledged as master, but in practice the most extravagant accounts could survive if they spoke to the European mind in other ways. In an interesting recent analysis of the Psalmanazar case as exemplary of fiction versus truth, Tzvetan Todorov argues that Halley and Fontenay demonstrated clear truth, just as Psalmanazar "spoke falsely".[81] This is so but can not explain the continued popularity of such claims, even when they were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o be deliberate falsehoods rather than fictions.

Perhaps Benyowsky may be best located within the conjuncture of the late Enlightenment and the renewed transmogrification of the "orientalist" discourse. In such a perspective, Benyowsly is exemplary of a complex, European search for identity, strengthened in the travellers' accounts of "the other", and especially in a reconstructed and invigorated western "orientalism". It was not, perhaps, impolitic for Magellan or Nicholson to seek early publication in London rather than France, despite the French-language provenance of Benyowsky's original script. From the popular writings of Richard Hakluyt (1552-1616) of Oxford in the late 16th century, the English had developed a fondness for maritime

---

79 Halley had been fundamental to the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Newton's *Principia* which he introduced to the Royal Society and published at his own expense; editor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he became Savilian professor of geometry at Oxford in 1703.

80 R. Griffiths, "Memoirs of George Psalmanazar," *Monthly Review* 31 (1764), pp. 364-385, 441-454; see also *Gentleman's Magazine*, 1st ser., 33 (1763), pp. 257, 447.

81 Tzvetan Todorov, *The Morals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p. 87-119.

accounts that combined something of the exotic with even more of the commercial and the mercantile.[82] Ackroyd has argued that England as a seafaring island had long taken in the most extravagant of accounts of travel, especially those that depicted vividly "all that England is not", proposing that travel tales defined English "nationhood by describing other nations; it is an instinctive form of reassurance".[83] But Britain was also the most aggressive and successful of all the enlightenment nations in its global reach and this brought with it a transforming orientalism.

For its great and critical proponent,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was primarily a creation of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of the 18th century, applied in particular to Islam and what the west regarded as the Near East, and replenished, refined and culturally nuanced by a great industry of intellect and ideology throughout the 19th century.[84] More importantly for our argument, Said saw the early "orientalist" propositions as stemming overwhelmingly from England and France, effectively the twin origins of Benyowsky's account. So his published version of 1789 came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midst of a radical republicanism that also mooted a new, firm, and more aggressive perspective on the "Orient". Edward Said argues that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there arose "a number of new, interlocking elements that hinted at the coming evangelical phase" of culturally aggressive orientalism. Increased exploration, profusion of travel literature, voyages and scientific reporting, as well as developments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historicism and in the classificatory sciences of Linnaeus and Buffon all combined to generate a tendency to classify and compartmentalise as a method or procedure of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clarification.[85] It is clear that Benyowsky's accounts touched directly on several of such elements. In particular, this form of a developing discourse allowed the

---

82 Richard Hakluyt, *Principall Navigations, 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London: Halpers, 1589).

83 Peter Ackroyd, *Albi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2), quote p. 270.

84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dge and Kegan Paul,1978), see especially chapter 2, pp. 113-197. Said admits to the notion of Orientalism as being also based much further east, but restricts himself for reasons of coherence and greater focus. For considerations of a broader, inclusive notion of orientalism see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a review symposium which see Richard H. Minear, "Review: Orientalism and the Study of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9: 3 (May 1980), pp. 507-517; Simon Leys, "Orientalism and Sinology," in Simon Leys, *The Burning Forest: Essay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6).

85 See Said, *Orientalism,* especially pp. 113-123.

bringing together of such otherwise disparate elements as the adventures and travels of a Benyowsky in Russia or China with the science of a Royal Society, Joseph Banks or William Nicholson in London. In such a particular setting the *Memoirs* could be seen as an addition to useful and reliable knowledge within a Euro-wide program of cultural change and colonialism.

It might well be that Benyowsky's claims concerning Formosa are of very little detailed empirical value to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The value that we might now place on this account, as well as several others like it, is that they serve to remind all historians, including those of Taiwan, that globalisation and Euro-modernity was never simply a story of large civilizations colliding. Thus much historiography tells the tale of "China and the West" as a great confrontation peopled by imperial courts, Jesuits, major battles and the victory of Euro-based useful and reliable knowledge over Confucian certainties.[86] Benyowsky's tales might force us to reflect rather on the interpretive salience of the many frictions between systems and fragments of systems that occurred over a period of very many years. Except in the most nominal sense of a highly stretched political suzerainty,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aiwan were not mere appendage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system. Even if all of Benyowsky's claims concerning Formosa were true, they would not represent an episode in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ut rather the perverse flack emitted by an uncontrollably expanding material world, the frontiers and confrontations of which were rarely within the governance of any central authorities whatsoever.

8. Conclusions: Enlightenment and the Warrants of Reliability

We have little reason to adhere to Nicholson's advice of 1789 that the Benyowsky accounts of Japan, Liqueio, but particularly, Formosa, "must be

---

[86] For arguments concerning the power of useful and reliable knowledge see Ian Inkster, "Potentially Global: A Story of Useful and Reliable Knowledge and Material Progress in Europe, circa 1474-1914,"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8: 2 (2006), pp. 237-286; Ian Inkster,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Cultures of Constraint and Innovation, Emul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s," *Compara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ociety* 5: 2 (2007), pp. 108-127; Ian Inkster, "The National Imperative: The St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olicy Evolution, 1400-2000," in Rigas Arvanitis, 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2 vols. (Oxford: UNESCO, 2008), pp. 165-183.

admitted on the credit of the discoverer, until subsequent researches shall either confirm or disprove them". The fact that other aspects of his *Memoirs* (for instance on Siberia) could be demonstrated at the time and by subsequent research does not prove the veracity of statements concerning Formosa. The earliest accounts of the journey, prior to publication of the *Memoirs* in 1789, do not mention Formosa except as a coastal passing or brief stoppage en route to Macau, and these include authentic notes written by Benyowsky himself. Much of what he wrote about Formosa does not accord with our present historical knowledge from other sources.[87] Much of what he did depict with some accuracy could be got from existing sources, for as Oliver concluded after extensive reflection, "it is evident that Benyowsky not only had all the material in the form of charts, logs, and journals of previous voyages, but he actually had as his companions the master of the vessel and various other mariners in the ship whose acquaintance with the localities north of Japan was, so to say, intimate". Oliver also noted the stark contradictions of the Japanese and Formosan accounts, the mixture of reliance on published accounts and alterations of claims, especially the switch from his 1772 assertion about attacking the Chinese at Tanasoa, to his *Memoir* account that "he had carried on important operations against a city of the aborigines, a false story which cannot stand investigation. In this interpolation he has hopelessly confused his dates".[88] Yet his account of Formosa has stood as a text of Formosan history, republished and reworked in standard sources, Western and Japanese.[89]

---

87 See however János Jánko, *Grof Benyovsky Moricz mint fôldrajzi kutató. Kritikai megjegyzések kamcsatkától Makóig tett útjára* (Budapest: Orientalia, 1890), and P. M. Kiss, *Janos Jánko, 1833-1896* (Gyula: Ferenc Mûzeum Kiadványai, 1961). In his ethnography covering sources in several languages, Janko investigated in great detail the journey from Kamchatka to Macau, deducing localities and bearings, but without any substantive additional material on the Formosa claims.

88 S. Pasfield Oliver, ed., *Memoir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3), pp. 50-51; see also footnote 64 above.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S. Pasfield Oliver (1838-1907) was former Captain in the Royal Navy and a Fellow of the Royal geological Society, so knew his navuigation and seamanship, the problems of difficult passages and terrains, as well as something of natural ecology and indigenous life. This explains his informed skepticism. Between Benyowsky's return to France in 1777 and his departure again from Europe in 1784, accounts that he may well have copied from include *Chart of Synd's Voyage towards Tschukotskoi Noss* (London: T. Cadell, 1780); J.N. Bellin, *Cartes de l'Empire du Japon. Par le Sr. Bellin, 1735* (Paris: P.F. Giffart, 1736); Stepan P. Krasheninnikov, *The History of Kamtschatka* (London: T. Jefferys, 1764).

89 We should also note that initially even in England doubts were cast from the first. Thus the generally supportive *Gentelman's Magazine* did suggest that by his own testimony, Benyowsky was "little influenced by a regard to truth, or indeed any principle of morality whatever" (lx, pt. ii, August 1790, quote p. 725).

W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broadening acceptance of Benyowsky's fabulous tale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was very much a fortuitous outcome of several elements operating at a pan-European level. Despite his eastern European origins, his memoirs sprang out of an Anglo-French late-enlightenment period of republicanism and political experiment.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were bolstered by major enlightenment figures such as Magellan, Nicholson, and Banks whose *savant* enquiries coincided nicely with commercial interests following claims concerning the wealth of furs and other high-value trades obtainable in the extreme north, the richness of the China trade, at a time when reliable accounts of these areas and seas were sparse or non-existent.[90] It was only from the 1780s that more popular, yet acceptable accounts of discoveries and commercial possibilities in such regions as Kamchatka and the Bearing Straits appeared in Western Europe, this giving something of a boost to the earlier reception offered Benyowsky.[91] Without doubt, Benyowsky's *Memoirs* were multiply timely. But we have shown that this early support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uch more popular, nationalist form in the subsequent years as Benyowsky was taken up by an enormous variety of agencies, who basically repeated the claims and arguments of the original editions. Ultimately,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use of the Formosan passages in particular for the purposes of a global defence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East Asia, carried a more overt "Orientalist" message that continues into the present time.

Finally, we must surely admit that the manner in which Benyowsky's account of Formosa has survived so long also depends upon a process of self-fashioning and image-making. Steven Shapin brilliantly recounts how early-modern truth-tellers, scientists or savants, travellers or claimants on knowledge of all sorts, searched for and established their "warrants of reliability"[92] Thus the natural philosopher Robert Boyle (1627-1691), a founder of the Royal Society, could accept the veracity of the Bristol navigator, Captain Thomas James's

---

90 The force of this latter element was reduced somewhat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James Cook's (1728-1779) *Voyages* and William Coxe's (1747-1828) *Account* in 1780. See also below.

91 See especially William Coxe, *An Account of the Russian Discoveries between Asia and America* (London: Nichols, 2d ed., 1780; 3d ed., 1787); J. F. Le Horpe, *Abrégé de l'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Paris: Chez Laporte, 1786). It should be realized that until then Dutch traders had retained their secrets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trade, and that an intense rivalry existed between the various European-based companies operating east of the Cape.

92 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593-1635) account of the northwest passage in 1633 because of James's record for reliability and skill that was certified by the evidence of reliable persons.[93] Support for such an extremely costly voyage came from merchants and even royalty, so that his accounts "may well be represented to us, as likely to deserve our consideration and credit". This seems very similar to the position of the early reviewers, his editor Nicholson and others concerning Benyowsky and his infamous *Memoirs*. Again, Shapin refers to "evident signs of knowledgeability", that is in James' case a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which led Boyle to believe his account of the cold extremities that he discovered. Also James was located within a network that included friends of Boyle. But James also showed great precision and the use of reliable instruments and accounts of latitude, nothing at all of which was shown by Benyowsky. But we can surely accept that the experimentalist Boyle would require stronger "warrants of reliability" than the general reading public of the late Enlightenment and industrialisation, where a romantic revival perhaps conjured increased degrees of scepticism concerning the ultimate outcomes of modernity, its industry and urbanism.

We must also acknowledge that claims by merchants and adventurers who could clearly gain tangible profit from travels and reports of voyages were held with greater scepticism than those of genteel status and style. From the 17th century many gentlemen intellectuals would presume that merchants were mundanely untruthful, one of Francis Bacon's categories of a lie was that told by the merchant "for advantage".[94] So, was Benyowsky principally seen in the guise of a savant, a traveller, a merchant or a gentleman? Perhaps a main function of the historiography post-1800 lay in constructing Benyowsky as a euro-wide gentleman-traveller, whose memoir was a report rather than a commercial adventure, dwelling little on the veracity of the Formosan passages, more on the greater certainties of the Russian and Madagascar passages and interludes. This was really quite a task, for Benyowsky was obviously "foreign" to most of his readers, indeed to all of his readers in such centres of euro-enlightenment as England and France. It would have helped that his original memoirs were written in French,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a public euro-savant and former

---

93 It is of note here that Boyle was son of the first Earl of Cork, educated at Eton, a director of the East India Co, and possibly the greatest experimentalist of his age. Thomas James' narrative of his journey was pub in 1633 and has been problematically identified as the original of Coleridge's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94 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p. 93 forward.

public servant, and that the original account and its "enlightened" commentaries were utilised for most if not quite all later editions well into the 19th century. Even Pasfield Oliver in his critical remarks remains dependent on both the Nicholson edition and the Nicholson commentary.

Of course, it was quite possible to be seen as an unreliable gentleman.[95] In the years of Benyowsky's initial popularity, good birth certainly did not prevent deceit, and in all probability aided it. James Bruce (above) was educated at Harrow, a seat of the English gentry, was sequentially a wine trader, a consul at Algiers, and an archaeologist on the Barbary coast, all this prior to the publication of his fabulous accounts of the Nile, the Red Sea and Nubia. The more celebrated imposter, Alessandro Cagliostro (1743-1795), was exactly contemporary with Benyowsky, and he undoubtedly began his career in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of Sicily, but convincingly refashioned himself as "Count" in Malta, married the genteel Italian Loreanza Feliciani, and peddled both freemasonry and alchemical nostrums throughout Europe in the 1770s and 1780s. In the yea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of Benyowsky's *Memoirs*, and after two brief imprisonments in Paris and London, he was finally arrested in Rome, and died six years later in the fortress prison of San Leo.[96] So, in establishing his pan-European status of gentility, Benyowsky was also fashioning what—following Shapin—we might identify as his initial "warrant of reliability". And this did not prohibit a renewed fashioning in frontier locales—thus Benyowski's readiness to identify with mythical, godly prophets and leaders within the indigenous legends of both Formosa and Madagascar, as a revolutionary in the deposition of the Governor of Madagascar, but donning the mask of the distinguished Euro-gentleman in his negotiations with French or American politicians and statesmen.

---

95 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pp. 95-101.

96 For varying treatments see Charles Sotheran, "Alessandro di Cagliostro, 1743-1795: Imposter or Martyr?" read before the New York Liberal Club, reprinted in *The Truth Seeker* (New York: Truth Seeker Company, 1875); W. R. H. Trowbridge, *Cagliostro*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6); Henry Ridgely Evans, *Cagliostro, a Sorcerer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asonic bibliophiles, 1931); Jean Villiers, *Cagliostro: le prophèt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Cruy Trédaniel, 1988).

References

"Maurice Benyowsky: Citizen of the World,"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7.

Choya Shimbun《朝野新聞》3, May 1884.

Hochi Shimbun《和氣新聞》, 26 July 1884.

Hu-Pao《滬報》(Shanghai, China), 20 February, 1884.

Slovakopedia "Benyowsky."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Slovakia and Slovaks, http://www.slovakopedia.com/.

Ackroyd, Peter

2002 *Albi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Alexander, John T.

1999 *Catherine the Great: Life and Lege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sher, Richard

1951 "Munchausen's Syndrome." *Lancet* 6650 (1): 339-343.

Barlow, Nathaniel

1772 "Extraordinary Relation of a Voyage to Macao." *Gentleman's Magazine and Historical Chronicle* 13: 272-274.

Bechtinger, Jos

1871 *Het eiland in de Chineesche zee.* Batavia: Bruning et Wyt.

Bellin, J.N.

1736 *Cartes de l'Empire du Japon. Par le Sr. Bellin, 1735*. Paris: P.F. Giffart.

Benyovszky, Móric

2004 *Protocolle du régiment des Volontaire de Benyowszky crée en 1772.* Budapest: Országos Széchényi Kónyvtár Magyar-Madagaszkári Baráti Társaság Kossuth Kiadá.

Benyowsky, M. A.

1791 *Begebenheten und Reisen Grafen Moritz August von Benjowsky*. Hamburg: B.G. Hoffman.

Benyowsky, M. A.

1893 *Memoirs.* London: T. Fisher Unwin

Benyowsky, M. A (Author), William Nicholson (Trans.)

1789 *Memoirs*. London: Robinson; and 1790, Dublin: P. Wogan.

Benyowsky, M. A (Author), Johann Reinhold Forster (Trans.)

1790 *Memoirs*. Berlin: Christian F. Voss und Sohn.

Braudel, Fernand

1984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London: Phoenix Press.

Campbell, Wm.

190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Paul.

Candidius, George

1704 "Short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In James Awnsham, and John Churchill eds.,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Vol. 1, pp. 526-533. London: Churchill.

Ch'en Ch'iu-k'un 陳秋坤

1987 *Landlord and Tenant: Varieties of Land Tenure in Frontier Taiwan 1680-1900.*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Cadell, T.

1780 *Chart of Synd's Voyage towards Tschukotskoi Noss*. London: T. Cadell.

Chiu Hsin-hui 邱馨慧

2008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Copland, Samuel

1822 *A History of the Island of Madagascar*. London: Burton and Smith.

Coxe, William

1780 *An Account of the Russian Discoveries between Asia and America*. London: Nichols.

Cronstedt, Axel Frederic

1788 *An Essay towards a System of Mineralogy*. London: Charles Dilly.

Davidson, James W.

1903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Yokohama: Kelly & Walsh.

de Magalhaes, Joao Jacinto

1779 *Description et usages des instruments d'astronomie et de physique fait a Londres par ordres de la cour de Portugal en 1778 et 1779: J.H. de Magellan*. London: B. White.

Drury, Robert

1890 *Madagascar, or Robert Drury's Journal. And a Further Description by Abbe Alexis Rochon*. London: T. Fisher Unwin.

du Halde, J. B. (Author), Richard Brookes (Trans.)

1739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French Translation. Vol.1. London: John Watts.

Ellis, William

1838 *History of Madagascar*. London: Fisher.

Eskildsen, Robert (ed.)

2005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Western Sources Related to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vans, Henry Ridgely

1931 *Cagliostro, A Sorcerer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asonic bibliophiles.

Father de Mailla, father de SJ

1715 *The Early History of Formosa, from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 French Translation. Shanghai: Loureiro and Co.

Ferguson, Niall

2003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Foley, F.J.

1968 *The Great Formosan Imposter*. Rome: Jesuit Historical Institute; St. Louis, Mo.: St. Louis University.

Greenacre, Phyllis

1950 "The Impostor."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27: 370-379.

Griffiths, R.

1764 "Memoirs of George Psalmanazar." *Monthly Review* 31: 364-367.

Grosier, Abbe

1788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French Translation. Vol. 1. London: Williamson.

Hakluyt, Richard

1589 *Principall Navigations, 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London: Halpers.

Inkster, Ian

1977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Metropoli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the Askesian Society of London." *Annals of Science* 34: 1-32.

Inkster, Ian

1997 "Global Ambi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450-1800." *Annals of Science* 54: 611-622.

Inkster, Ian

2006 "Potentially Global. A Story of Useful and Reliable Knowledge and Material Progress in Europe circa 1474-1914."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8 (2): 237-286.

Inkster, Ian

2007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Cultures of Constraint and Innovation, Emul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s." *Compara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ociety* 5(2): 108-127.

Inkster, Ian

2008 "The National Imperative: The St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olicy Evolution 1400-2000." In Rigas Arvanitis, 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Vol. 1, pp. 165-183. Oxford: UNESCO.

Inkster, Ian and Jack Morrell (eds.)

2007 *Metropolis and Province: Science in British Culture, 1780-1850*. London: Routledge.

Jánko, János

1890 *Grof Benyovsky Moricz mint fôldrajzi kutató. Kritikai megjegyzések kamcsatkától Makóig tett útjára*. Budapest: Orientalia.

Kessler, L.D.

1976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King, James

1782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London: William Richardson.

1785 *Troisième voyage de Cook, ou Voyage a l'ocean Pacifique, ordonné par le roi d'Angleterre*. Paris: Hôtel de Thou.

King, James and James Cook

1784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 for Making Discoverie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London: G.J. Robinson.

Kiss, P. M.

1961 *Janos Jánko, 1833-1896*. Gyula: Ferenc Mûzeum Kiadvanyai.

Kotzebue, August von (Author), Rev. Wilhelm Render (Trans.)

1799 *Count Benyowsky, or the Conspiracy of Kamtschatka, in Five Acts*, German Translation. Cork: Connor and Creagh.

Kotzebue, Augustus von (Author), Rev. Benjamin Beresford (Trans.)

1802 *The Most Remarkable Year in the Life of Augustus von Kotzebue*, German Translation. London: R. Phillips.

Krasheninnikov, Stepan P.

1764 *The History of Kamtschatka*. London: T. Jefferys.

Laissus, Yves

1973 "Note sur les manuscripts de Pierre Poivre 1719-1786 a la bibliotheque centrale du Muse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Port Louis: Royal Society of Mauritiu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anger, William L.

1940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Houghton and Co..

Le Horpe, J.F.

1786 *Abrégé de l'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Paris: Chez Laporte.

Levere, T.H. and G. L'E. Turner

2002 *Discussing Chemistry and Steam: The Minutes of a Coffee House Philosophical Society 1780-1787*.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ys, Simon

1986 "Orientalism and Sinology." In Simon Leys, *The Burning Forest, Essay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Lilley, S.

1948 "Nicholson's Journal 1791-1813." *Annals of Science* 6: 71-89.

Ly-Tio-Fane, Madeleine

1958 *Mauritius and the Spice Trade. The Odyssey of Pierre Poivre 1719-1786.* Port Louis: MAPF.

Macleod, Roy and Philip Rehbock (eds.)

1988 *Nature in its Greatest Exten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agellan, M. de

1779 *Description des Octants et Sextants Anglais*. London: B. White.

Minear, Richard H.

1980 "Review: Orientalism and the Study of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9 (3): 507-517.

Noorthouck, John

1790 "Memoirs and Travels of M. A. de Beniovsky." *Monthly Review or Literary Journal* 3: 169-175.

Oliver, S. Pasfield

1886 *Madagascar*. London: Macmillan.

Papinot, E.

1910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Japan*. Yokohama: Kelly and Walsh.

Porter, Roy

2001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Palgrave.

Porter, Roy (ed.)

2003 *Eighteenth-Century Science*. Vol. 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salmanazar, George

1707 *A Dialogue between a Japanese and a Formosan, about some Points of the Religion of the Time*. London: Bernard Lintott/ Nando's Coffee House.

Raspe, Rodolph Eric

1786 *Munchausen's Narrative of his Marvelous Travels and Campaigns in Russia*. Oxford: Smith.

Rochon, Alexis M.

1793 *A Voyage to Madagascar and the East Indies*. London: E. Jeffery.

Said, Edward W.

1978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dge and Kegan Paul.

Sansom, George B.

1949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A Study in the Interaction of European and Asiatic Cultur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Schofield, Robert E.

1963 *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 A Social History of Provincial Science and Industr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hapin, Steven

1994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epherd, John R.

1995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Taipei: SMC.

Shufelt, John

2005 "The Trickster as an Instrument of Enlightenment: George Psalmanazar and the Writings of Jonathon Swift."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1(2): 147-171.

Smith, Herbert Greenhough

1895 *The Romance of History*. London: George Newness.

Sotheran, Charles

1875 "Alessandro di Cagliostro 1743-1795. Imposter or Martyr? " Reprinted in *The Truth Seeker*. New York: Truth Seeker Company.

Steere, Joseph B.

1876 "Formos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6: 302-334.

Steere, Joseph B. (Author), Li, Paul Jen-kuei 李壬癸 (ed.)

2002[1876]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kekoshi, Yosaburō

1907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London: Longman Green and Co..

Tanaka, Stefan

1993 *Japan's 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emperley, H. W.

1904 "Maurus Jokai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Contemporary Review* 86: 107-114.

Thackray, Arnold

1974 "Nicholson, William."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10: 107-109.

Thompson, Benjamin

1801 *The German Theatre*. Vol. 2. London: Vernon and Hood.

Todorov, Tzvetan

1995 *The Morals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rowbridge, W. R. H.

1926 *Cagliostro*. London: Allen and Unwin.

Villiers, Jean

1988 *Cagliostro: le prophèt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Cruy Trédaniel.

Wurzback, Constant von

1876 "Benyowsky." In Constant von Wurzbach, ed., *Biographisches Lexikon des Kaiserthums Oesterreich*. Vienna: K. K. Hof.

《臺灣史研究》
第十七卷第一期，頁 27-70
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東方式的啟蒙：1771 年貝尼奧斯基在福爾摩沙島的軍事經驗與文化主張之省思

音雅恩（伊恩．英克斯特）

摘 要

貝尼奧斯基的傳記真可以說是惡名遠播，然而包括他 1771 年到臺灣遊歷的敘述在內，至今許多歷史學家仍然持續地沿用。本文蒐集自 1771 年至今，關於貝尼奧斯基的各種相關出版，以嚴格而批判的角度檢視他對臺灣的種種主張與說法，並試圖發展出一個較完整的論述。藉由各種文獻的比對，本文得以評量貝尼奧斯基論著的可靠性，並且說明何以他的著作在各地得以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本文同時檢視貝尼奧斯基的說法如何被西方和日本學者所使用，試圖建構一個關於中國的「東方主義」（薩伊德）論述，而把中國文化形塑為一個較日本文化低劣的「他者」。本文主張，貝尼奧斯基的作品其實是歐洲啟蒙運動晚期，特別是在法國和英國的一個代表性著作。其之所以廣受歡迎的原因，在於它描繪了一個優越而強大的西方文明，透過歐洲人在十八世紀藉由航海、貿易與殖民，在亞洲和其他地方行使強大的文化權威的歷程。

關鍵詞：貝尼奧斯基、原住民、啟蒙運動、東方主義、文明衝突、旅遊文學

《臺灣史研究》
第十七卷第一期，頁 71-124
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米價變動與「臺運」變遷之關聯（1783-1850）*

吳玲青**

摘　要

本文試圖找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前半之間，導致「臺運」逐漸衰退的結構性因素，透過臺灣與漳泉米價差距的檢討，以及臺灣島內米價所存在的地區性差異，發現十八世紀中葉臺灣米穀移出的價格低廉這一背景，在 1830 年代中期出現了供需地與價格賤貴背離的現象。米價因素與「臺運」運作的商船、正口航路等種種條件相互作用，導致了「臺運」逐漸發生變化。

十八世紀臺灣的米穀價格低廉，民間商人利用臺灣與漳泉之間存在的米價差距，在官方政策允許下從事米穀交易；同時官方也依賴民間商船配載「臺運」官穀，達到遂行公務的目的。「臺運」的流通結構，一方面依附於民間交易的成立，同時也受限於官方所制訂的對渡正口、航路與船舶等種種政策。

林爽文事件結束之後的乾隆 53、54 年（1788、1789）之間，臺灣南部出現了高於漳泉的米價，意味著前往南部鹿耳門一口從事米穀交易難以獲利；但在此同時，北部由於米價較南部低，造成商人利用漁船、小船前往南部以外的中、北部地區經商。雖然嘉慶年間的臺灣南北米價普遍下跌，但是以非商船的名義前往臺灣中、北部從事米穀交易，可以省卻回程的「臺運」配穀，逐漸造成人為的規避「臺運」。道光年間，尤其在 1830 年代中期，臺灣的南北米價同時高昂，與漳泉的同類米價並沒有太大的價格差異，在獲利減少的情況下，出入私口又可規避「臺運」的負擔，因此前往正口的民間商船減少，導致了依賴民間商船由正口配運的「臺運」這一流通結構逐漸鬆動崩解。這一過程，顯示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所同樣出現的「臺運」衰退問題，可說是在不同時期的背景下相異因素作用的結果。

關鍵詞：正供、「臺運」、米穀價格差、臺灣米穀移出、流通結構

---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主辦之「臺灣研究在法國與臺灣史新研究研討會暨2009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2009年12月3日)。感謝評論人林文凱先生的意見與提示，以及三位匿名論文審查人就論文主題、內容與文辭表達等所給予的建議。又，筆者最初構想本文與寫作期間，曾獲得「林宗毅博士文教基金會」(2007年度)獎學金贊助，謹此致謝。
** 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0 年 2 月 1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4 月 27 日。

一、前言
二、「臺運」的流通結構
三、清代中葉臺灣米價變動及其現象
四、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的「臺運」變遷
五、結論

一、前言

米穀生產在清代臺灣的土地開發過程中具有主導性的重要地位，嘉慶、道光年間，歷任臺灣知縣、噶瑪蘭通判與臺灣道員等職的姚瑩，在檢討十九世紀前半的臺灣正供官穀移出問題時，指出十七世紀末期至十八世紀之初的臺灣處於一種米多銀少的狀態，對清廷統治之初的臺灣有以下的說明：「臺地產穀之區，頗艱銀貨，故昔人因地定賦，有供粟而無地丁，雖有匀丁雜稅，為數無幾；而漳、泉、福州兵民繁庶，產穀不足；故以有易無，運臺穀以濟各郡之兵糈，發帑銀以給全臺之兵餉，各得其所，民間便之久矣。」[1] 清廷權衡當時臺灣缺乏通貨、卻富於米穀生產的現狀，在臺灣收取正供實物租穀運往內地漳、泉與福州，再自福建搬運餉銀入臺流通，以有易無。從這個角度而言，包括官方將正供米穀移出至漳泉等處與民間米穀交易的臺灣米穀流通，[2] 對於理解清代臺灣的整體發展相當重要。正是如此，與米穀相關的流通、交易、價格等等問題，自來一直是學者們關注與研究的重要論題。

---

1 姚瑩，〈籌議商運臺穀〉，收於姚瑩，《東槎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7 種，1957；1832 年原刊），頁 27。

2 清代臺灣的民間米穀移出市場不限於福建，還包括江浙一帶。參考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 350-351。除了福建與江浙之外，民間亦移出米穀至廣東地區。參考陳春聲，《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 世紀廣東米價分析》（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頁 33-38。本文著重於正供官穀的移出變遷，因此將討論地區限定在福建。

1950 年代末期，王世慶開始進行清代臺灣米穀的移出與價格兩方面的相關研究。他根據《臺灣文獻叢刊》的地方志、政書等史料，指出十八世紀初期以來的臺灣，向閩南的漳泉、閩北的福州、浙江、廣東，以及十九世紀之後遠及天津等地移出米穀，最盛時期達到年約 50 餘萬石。除了上述的民間米穀交易之外，雍正 3 年（1725）起，官方以平糶米、眷米以及其後兵米的名義，開始實施所謂的臺運。[3] 但是臺運在十八世紀末期開始停滯，咸豐初期突然衰微，到光緒年間更出現了南部移出米穀，而北部反而需要米穀移入的現象。[4] 王世慶詳細敘述了清代臺運由盛而衰的變遷，突顯了米穀移出這一論題在清代臺灣經濟研究上的重要性，在此同時，臺運自十八世紀末期以來逐漸衰退的這種認識，幾乎成為既定印象。然而，王世慶根據史料所描述的主要是正供官穀移出的變遷，並非當時民間米穀的移出情形，卻往往被混同視為是臺灣米穀移出的整體趨勢。

米穀移出的相關研究這一範疇，近年來再度受到重視。高銘鈴更進一步檢討臺運的具體內容，釐清上述王世慶所提出的臺運逐漸衰退的論述，明確指出十九世紀之後的臺灣南部官方運穀雖然衰退，但是中北部的民間米穀移出仍然活絡，顯示出米穀移出情況的地區性差異。高銘鈴分析雍正與乾隆年間臺運的營運，指出臺運集中在臺灣南部與中部，[5] 其後經過乾隆末期至嘉慶中期的商船渡海限制、陋規以及海盜騷擾等因素的影響，臺運出現了停滯的現象。[6] 高銘鈴觀察道光年間臺灣各個正口的商船交易量，發現經由南部鹿耳門的米穀交易量減少，使

---

[3] 關於「臺運」一詞，在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產與外銷〉一文中並非專有名詞，不加以括弧。民間的米穀移出，或者以「臺米之糶運」表示。而高銘鈴以不加括弧的臺運二字指稱官穀的移出，另一方面將民間米穀做為廣義的「臺運」，加上括弧表示。本文根據《廈門志》臺運略中所述：「臺灣，內地一大倉儲也。……賦其穀曰正供，備內地兵糈。然大海非船不載，商船赴臺貿易者，照樑頭分船之大、小，配運內地各廳縣兵穀、兵米，曰臺運」，將臺運視為專有名詞，加以括弧，以「臺運」二字指稱官方移出正供米穀以作為福建內地各營之兵米與眷米（每年定額的平糶米移出於乾隆 11 年後取消），而不包括民間米穀移出的這一部分。本文在前言中提及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時，依照其原文引用。此外，全文根據周凱《廈門志》之定義使用「臺運」一詞。參考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產與外銷〉，收於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4），頁 93-129；高銘鈴，〈雍正・乾隆期における福建・台湾間の米穀流通〉，《(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7（1999 年 4 月），頁 28；周凱，《廈門志》（文叢第 95 種，1961；1839 年原刊），卷六臺運略，頁 185。

[4] 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產與外銷〉，頁 93-129。

[5] 高銘鈴，〈雍正・乾隆期における福建・台湾間の米穀流通〉，頁 40-41。

[6] 高銘鈴，〈清代中期における台運体制の実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9（2001 年 4 月），頁 113。

得臺運出現衰退的現象，但是從北部正口的米穀移出反而是增加的。因此高銘鈴修正以往認為臺運逐漸衰退的定論，強調伴隨著倉儲體制的空洞化，南部的臺運移出雖然逐漸減少，但是中、北部的民間米穀移出卻逐漸增加，並且成為臺灣米穀移出的中心。[7] 這一結論提示了臺運變遷所具有的地區性差異，就打破以往臺運整體由盛而衰的這一印象而言，相當重要。但是，高銘鈴所舉出的商船渡海限制、陋規與海盜騷擾等等導致臺運衰退的因素，卻無法解釋這些因素如何造成南部的官穀與中北部的民間米穀在移出上的不同表現。也就是說，高銘鈴並未分析同樣的因素如何在不同的地區發揮不同的作用與影響。因此，十八世紀末期之後臺運出現變化的原因與背景這一問題，仍然有待釐清。

本文根據上述的研究成果，嘗試解釋十八世紀末期之後的「臺運」為何呈現衰退趨勢，以及在此趨勢之中又如何形成了地區性差異的問題。基於這個問題意識，筆者首先從「臺運」的流通結構如何成立這一問題著手，接著檢討「臺運」運作背景上的種種變化。在討論「臺運」的變化之前，本文並檢討十八世紀以來臺灣米穀移出得以成立的條件之一——臺灣與漳泉之間的米穀價格差，透過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前半的米價比較，分析「臺運」得以流通變化的背景因素。

關於清代臺灣米價的論著為數眾多，依照其所使用的史料，可以約略劃分為利用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的地方志、文集、政書等零星記述的米價資料，以及從奏摺檔案中整理出具有長期連續性的米價資料。前者最早是 1950 年代末期王世慶的研究，從《臺灣文獻叢刊》中收集零星散布的米價，歸納出臺灣在清代各朝的米價，指出米價的變動受到收穫豐凶、社會動亂與甘蔗競作，以及私鑄制錢等因素左右，同時說明長期的大量移出主要是乾隆年間米價逐漸上揚，以及道光初、中期米價騰貴的原因。[8] 王世慶明確指出了臺灣的米價與移出息息相關，這一點也成為日後研究臺灣米價變動時所必須討論的基本問題。至於後者，利用檔案與奏摺史料的米價相關研究，近年則有謝美娥將米價變化分為 1738 年至 1838 年的上昇期，與 1839 年至 1850 年的下降期，並對這段期間影響米價變動的

---

7 高銘鈴，〈19 世紀前・中期における台湾米穀の流通に関する一考察〉，《東洋学報》85: 2（2003 年 9 月），頁 112。

8 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價〉，收於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 73-91。

耕地、人口、糧食流通、貨幣等因素加以詳細分析與討論。指出在米價上昇期中，人口以及米穀移出是導致米價上漲的主要因素，而貨幣因素在 1830 年代之前，因為交易和兵餉進入臺灣而使得貨幣流通量增加，也帶動了米價上昇；但是在 1830 年代之後，由於米穀移出數量整體減少，加上白銀外流所導致的「銀貴」，使得 1839 年之後米價開始下跌。[9] 謝美娥的研究提供了臺灣開港之前相當完整的米價資料，以及詳細的價格變動分析，對於理解清代臺灣的米價變動有著相當重要的貢獻。

不過，與本文所嘗試討論的「臺運」流通結構這一問題更直接相關的是王業鍵對於福建米價的研究。王業鍵透過米穀價格趨勢的觀察，將福建省內的糧食供需市場劃分為：「（1）南區：以泉州和漳州為核心，台灣為其主要的米糧供應者，還包括西部的兩個州（永春和龍巖）。（2）閩江流域區：以福州為核心，閩江上游的三個府為其主要的米糧供應者，還包括沿海兩個自給的府（興化和福寧）。（3）西區：僅包括汀州一府，它基本上完全仰賴江西的供應……」。在南區的米穀供需市場與價格關係中，以乾隆 10 年至 23 年（1745-1758）之間為例，作為米穀供給地的臺灣府米穀價格一直維持著比需求地泉州府米穀價格較低的水準，並隨之上下連動。[10] 根據上述王業鍵所提示的糧食供需與米價賤貴相關的論點，十八世紀中葉的臺灣米穀價格往往低於漳泉米穀價格的同時，臺灣米穀也長期移出至漳泉地區。王業鍵關注的焦點是十八世紀福建米價賤貴與糧食供需的相互對應關係，然而他所提示的這一論點在十九世紀之後的表現，至今仍然未見檢討。以下，本文首先分析「臺運」的成立與運作方式，再整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臺灣米價變動的現象，以觀察王業鍵所提示的這一原則在這段期間的表現，掌握「臺運」得以運作的背景條件所出現的變化，再討論米價因素對於「臺運」流通結構所造成的影響，以明瞭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之間「臺運」變遷的經過。

---

9 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449-460。

10 王業鍵，〈18 世紀福建的糧食供需與糧價分析〉，收於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 119-150。

二、「臺運」的流通結構

十八世紀初期開始實施的「臺運」，有其得以運作的背景與賴以流通的結構。「臺運」以康熙年間臺灣的豐富倉儲為基礎，於雍正年間做為消化倉儲貯穀的對策而展開，在這個背景之下，自雍正 3 年（1725）起，規定每年將「平糶米」5 萬石以及做為「內地班兵眷口月米」的「眷米」穀 2 萬 1 千石運至福建。雍正 5 年（1727）再加入「金廈提鎮兩標兵丁月米」的「兵米」穀 2 萬 2 千 4 百餘石，其後又在雍正 10 年（1732）追加「督標四營兵丁月糧」的「兵米」穀 1 萬 5 千餘石。[11] 這些陸續規定的正供官穀移出——包括平糶、眷米、兵米，即是所謂的「臺運」。總而言之，臺灣府地方官員面對著康熙年間以來臺灣正供穀逐漸增多的囤積問題，[12] 為了替長年累積的正供穀尋求解決之道，官方因此決定採取「臺運」這一對策。

再者，「臺運」的流通結構一方面仰賴民間的米穀交易流通，一方面又受制於官方的政策規定。以下就民間與官方兩方面的相關條件做一說明：

（一）「臺運」依賴民間商船運載

十八世紀初期「臺運」展開的同時，民間的米穀交易同樣蓬勃發展；漳泉地方商人在康熙年間已經開始將臺灣米穀移出至福建。雍正 4 年（1726）閩浙總督高其倬上奏〈請開臺灣遏米之禁疏〉，奏請朝廷停止臺灣米禁，准許民間運搬米穀接濟漳泉，[13] 民間移出米穀至福建從此常態化，並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而官方同時乘民間米穀交易往來頻繁之便，利用來回兩岸的民間商船從

---

1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臺北：編者，1953），第 2 本，頁 102b。

12 十八世紀初期的臺灣，藉由正供徵收所累積的倉儲穀數，在康熙 43 年福建省清查所屬倉儲米穀的存留與售出數額時，得知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共貯蓄有穀 70 餘萬石，朝廷因而下令保留穀 20 萬石作為三年的預備軍糧，其餘的 50 萬石換為銀兩，收貯於臺灣府庫，以作為兵餉發放。由於缺乏史料，目前無法得知穀 50 萬石如何替換為臺灣府兵餉的細節。此外，康熙 45 年左右，臺灣府每年的正供穀收入約為 13 萬石。請參考〈倉儲〉，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第 84 種，1960；1829 年原刊），頁 173。

13 高其倬，〈請開臺灣遏米之禁疏〉，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奏疏選彙》（文叢第 256 種，1968），頁 36。

事「臺運」。

閩臺兩地的地方官員並未安排官方專屬的船隻搬運「臺運」官穀，而是由前往臺灣從事民間交易的商船，在回航時攤派官穀的運搬。根據《廈門志》「臺運略」一節，道光年間歷任興泉永道、臺灣道員的作者周凱認為，商船搬運臺穀的規定起於乾隆 11 年（1746）福建巡撫周學健奏請分配商船運赴各倉。[14] 但是從周學健在該年 3 月奏報「臺運」運出停滯的解決方法時，提及「查撥運穀係臺、廈往來商船按樑頭搭運，赴內地交收，每船自一百石至三百而止，從未整船裝運，是以壓欠穀三十四萬九千餘石。」[15] 說明了「臺運」的積壓是因為往來臺廈之間的商船未能按照規定數量裝載。可見在此之前，「臺運」的移出已經由商船負責。清廷認為，「且船隻往來，有此官運兵粟亦易於稽查。」[16] 藉著掌握官穀流向的名義，同時有利於官府稽查民間商船。

「臺運」依賴往來臺廈之間的民間商船代為搬運，這種作法持續到十九世紀之後。由於「臺灣一府孤懸海外，民間日用貨物大半取資內地，而內地兵糈亦賴赴臺商船配運。」[17] 臺灣所需的日用百貨，或是內地所需兵糧，都有賴於商船海上往返運載。道光年間，商船被分派的公務更加繁多，「配運兵穀、臺廠木料、臺營馬匹、班兵臺餉、往來官員人犯、海外用兵，所需尤甚，然皆踴躍從事。」[18] 包括兩岸往來的公文書信也利用商船傳送。[19] 以「臺運」為首的官方公務和民間交易，兩者都依賴民間商船的往來而進行。

「臺運」的官穀由橫洋船、糖船之類的民間商船在由臺灣返回福建的回程時，負責載運規定的米穀數量交給福建各倉。基本上，商船以外的船隻，例如漁船，並不負責「臺運」的配穀。道光年間，鹿港同知兼噶瑪蘭通判陳盛韶說明商船與漁船的差別時，說明了官府為何限定商船載運「臺運」的原因。陳盛韶指出：「商

---

14 周凱，《廈門志》，卷六臺運略，頁 185。

1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高宗實錄選輯（一）》（文叢第 186 種，1964），頁 48。此外，乾隆 29 年 9 月，巡臺御史李宜青在上奏米穀的運搬費用時也曾提及乾隆 11 年的「臺運」，「據原任福建巡撫周學健奏請通籌臺郡供粟撥運事宜案內聲明，撥運內地穀石，歷年係臺廈往來商舡按照樑頭搭運赴內地交收，每舡自一百石至三百而止，等因在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2 本，頁 117a）。文中「歷年」二字在文句中，應該是指在乾隆 11 年之前已由商船負責搬運。

1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2 本，頁 130a。

1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2 本，頁 168b。

18 周凱，《廈門志》，卷五船政略，頁 171。

1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丙集》（文叢第 176 種，1963），頁 177。

船通商，漁船網漁，實則配運與不配運而已。……惟准沿海一帶，載貨生理，網漁納課。其遠渡重洋至臺灣者，皆云遭風寄碇，行保不出保結，不配官粟。」[20] 漁船不配運官穀的主要原因，在於漁船沒有船行出具擔保。渡海往來於閩臺之間的商船，通常由內地行商或者臺灣的郊行出具船戶的擔保，萬一因為事故而導致官穀損失時，由行商或郊行負責賠償。而由於行商和郊行並不出具漁船的擔保，因此官府不會將官穀交給沒有擔保的漁船載運。[21] 也就是為了確保官穀渡海的安全，渡海來臺的船隻是否為具有擔保的商船，成為官府攤派「臺運」配穀的主要考量。

（二）正口與航路的規定

清廷領臺之後，開放府城附近的鹿耳門一港作為正口，與廈門對渡。直到十八世紀下半葉，這條路線是清廷認可的唯一正式對渡航路。[22] 乾隆 49 年（1784），清廷才又開放第二條正式航路，以中部的鹿港為正口，與蚶江口對渡。但是林爽文事件之後的乾隆 53 年（1788）6 月，隨即由大學士福康安奏請開放淡水廳的八里坌與福州五虎門對渡往來。[23] 也就是在十八世紀末期，閩臺之間的對渡航路包括了廈門海防廳（廈防廳）與臺防廳所轄的廈門、鹿耳門，蚶江廳與鹿港廳所轄

---

20 陳盛韶，《問俗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1834 原刊），頁 129-130。

21 高銘鈴，〈雍正・乾隆期における福建・台湾間の米穀流通〉，頁 36-37。

22 清廷雖然規定由正口對渡，但是對於民間不按照正口航路的私渡顯然並非全面禁止。例如乾隆 17 年福建巡撫李有用上奏當時前往臺灣北路的內地商船被劫時提及：「查得臺灣北路洋面原屬禁地，內地商漁槳不許赴北路港澳收泊貿易採捕，止准臺地小船徃來鹿耳門載運貨物，并北路額設社船十隻，每年自十月為始，徃來廈門貿易數次，歲底即行停止。其臺廈徃來客商貨船，亦從不令赴北路貿易。……自本年春夏之間，忽有內地商漁在北路洋面游移無定。四月初間，臺邑船戶洪協華即在鹿仔港外被劫，五月望後又有臺邑船戶徐得利在大甲溪口外被劫……」（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編者，1987〕，第 4 輯，頁 442-443）。從這個例子可知，民間商船不按照正口航路渡海的情況並非少見，官方也無法全面禁止。本文認為民間商船的私渡必定存在，但是官穀移送必須按照官方規定的正口與航路進行，所以在討論「臺運」時，限定在正口及其規定的航路上。

23 福康安奏請開放八里坌的理由是：「查淡水八里坌地方港口，距五虎門水程約六、七百里。逆匪滋事時，經臣徐嗣曾奏明派兵自五虎門放洋，直趨淡水，嗣後運往淡水之糧餉鉛藥，亦多由八里坌收口，一載以來，甚為利涉。該處港道寬闊，可容大船出入，從前即有商船收泊該處，載運米石，管口員弁藉端需索，得受陋規，徒有封禁之名，毫無實際。且淡水為產米之區，八里坌一港又非偏僻港口，僅容小船者可比。……小民等趨利如騖，勢難禁遏，與其陽奉陰違，轉滋訛索，不若明設口岸，以便商民。……應請將八里坌對渡五虎門海口，一體准令開設」（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文叢第 102 種，1961；1788 年原刊〕，頁 1011-1012）。可見在林爽文事件之前，八里坌已經是船隻出入、利用往來的港口，福康安的奏請只是將既存事實合法化的請求。

的蚶江口與鹿（仔）港，以及福防廳、淡防廳的五虎門、八里坌等六個正口所連結的三條航路。[24] 在航路固定的情形下，由廈門出港的商船在回程時，按規定只能從鹿耳門啟程返航。同樣地，由蚶江口出港渡臺的商船也只能由鹿港回航。

正口與渡航路線的規定左右了「臺運」的基本形態。由於廈門與鹿耳門對渡的航路長期維持，在乾隆 49 年（1784）第二條航路被准許之前，商船理應都由鹿耳門載運「臺運」官穀返回廈門。乾隆 20 年（1755），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在爭取米穀的運搬費用時指出：「以致南北路各廳縣所產米穀，必從城鄉車運至沿海港口，再用膨仔杉板等小船，由沿邊海面運送至郡治鹿耳門內，方能配裝橫洋大船，轉運至廈。此即臺地所需之小船車工運腳，不特官運米穀為然，即民間貨物米穀，亦復如此轉運……。」[25] 說明了在鹿港設為正口之前，臺灣各地的米穀與貨物原則上都要經由鹿耳門移出至廈門。如此一來，利用民間商船返航之際分攤運載的「臺運」，自然集中在南部的鹿耳門。

中部的鹿港在設為正口之後，也必須負擔「臺運」的配穀。乾隆 48 年（1783）閩浙總督富勒渾奏請設立新的正口，提及鹿港即將要分攤鹿耳門的「臺運」移出時說明：「查臺灣府屬撥運內地兵粟，歲共八萬餘石，均從鹿耳門配船載運。今蚶江既准經渡，則商販之多，亦應酌分輓運，以均勞逸。……所有臺屬北路諸羅、彰化二縣應運內地粟石，即責令鹿仔港同知專司配運。……查諸羅、彰化二縣每年領運兵粟三萬四千餘石，其船隻多寡、可運若干，此時尚難預定，應俟查明酌核確數。倘船隻稀少，不能全運……仍由鹿耳門配運。」[26] 也就是 8 萬餘石的「臺運」官穀原本集中在鹿耳門出口，而新的正口鹿港一旦設置，就必須分攤鹿耳門的「臺運」。這反映出十八世紀末之前，「臺運」的多數運穀集中在鹿耳門，其次在鹿港的情形。[27] 而數年後設置的北部八里坌由於成立較遲，在正口設立之初並未被分派「臺運」的配穀，直到嘉慶 15 年（1810）清廷允許臺閩各處正口自由對渡，八里坌才開始負擔配穀。[28]

---

2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74 輯，頁 308。

2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2 本，頁 102b。

2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2 本，頁 130a-130b。

27 高銘鈴，〈19 世紀前・中期における台灣米穀の流通に関する一考察〉，頁 92-93。

28 〈八里坌對渡五虎門開設口岸未盡事宜〉，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文叢第 199 種，1964；1873 年原刊），海防例，頁 711。同時請參考〈嘉慶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內閣奉上諭〉，收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四）》（臺北：編者，1997），頁 3040-3041。

三、清代中葉臺灣米價[29] 變動及其現象

如同本文前言所提到的，王業鍵提示了米穀供需與價格賤貴的原則，而且十八世紀中葉的臺灣與漳泉的米價表現也正反映了這種供需與賤貴的關係。本小節檢討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臺灣與漳泉的米價關係，並觀察臺灣島內米價的地區性差異，以作為分析「臺運」變遷背景的基礎。

（一）「糧價清單」的內容與處理

筆者收集了乾隆 48 年至道光 30 年（1783-1850）之間，福建省內地九府二州以及臺灣府的米價，這些米價資料收集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軍機處檔月摺包〉的「糧價清單」，以及《宮中檔嘉慶朝奏摺》。再者，嘉慶與道光年間的大部分米價資料是從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縮微膠捲〈糧價單・福建〉第 6 卷的「糧價清單」中收集得來，兩者與謝美娥所使用的米價數字來源相同。由於謝美娥已經花費相當的篇幅，詳密檢證了檔案資料中「糧價清單」所載米價數字的可信程度，[30] 本文在此不再重覆。

在臺灣府的米價數字部分，其中嘉慶年間（1796-1820）的米價欠缺了嘉慶 11、12 年全年，以及其他年份的部分月數數字，共收集有 226 個月，可以確認有米價的月份占了 73%（嘉慶朝含閏月共 309 個月中，226 個月份所占比例）。道光朝（1821-1850）的 30 年間，共收集了 276 個月的米價數字，其中道光元、2、3、5 年的全年米價數字欠缺，加上其他年份若干欠缺的月份，道光年間可以得知

---

29 為行文方便，本文提及米穀價格時以米價一詞概稱，但實際上有米價（脫殼碾米）與穀價（史料中或稱為粟，指未脫殼之稻穀）之分。本文提起稻穀價格時，以穀價一詞記之，其餘以米價一詞記之。又清代通常以「一米二穀」計算，《清耆獻類徵選編》卷八中曾有：「每年臺灣應碾赴泉、漳平糶兵米及廈門、金門兩標兵米共八萬三千餘石；若停臺灣碾米，照『一米二穀』以穀十六萬六千餘石運至廈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耆獻類徵選編》〔文叢第 230 種，1967〕，頁 729），明白指出「一米二穀」的作法。再如下述引文：「臣等查臺鳳漳諸四縣，每年額征粟共十三萬九千四百餘石，除臺澎各營歲支兵米三萬六千石，該粟七萬二千石，每年尚餘粟六萬七千餘石（按：漳為彰字之誤，標點為筆者所加）」（和碩怡親王允祥等題本，〈臺灣澎湖支放兵餉改由供粟折銀〉，收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第 9 冊，頁 286），由其計算，可知其將米的二倍數量視為是粟的數量。

30 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41-100。

米價的月份為 74%（道光朝共 371 個月中，276 個月份所占比例）。[31]

在解釋筆者的米價分析結果之前，必須先介紹「糧價清單」的內容。以嘉慶 21 年 2 月的「糧價清單」為例，其內容如下：

> 謹將福建省內地九府二州屬嘉慶二十一年二月分，并臺灣府屬二十年十二月分米糧價值，敬繕清單，恭呈御覽……。（按：引文中標點為筆者所加，福州府以下內地各府州略）
>
> 臺灣府屬嘉慶二十年十二月分。上米每倉石價銀二兩五錢至三兩一錢，較十一月分貴三錢。中米每倉石價銀二兩四錢至三兩，較十一月分貴三錢。下米每倉石價銀二兩三錢至二兩九錢，較十一月分貴三錢。……（略）。[32]

如同上述文字，米價數字通常以「每倉石[33] 價銀 X 兩 X 錢至 X 兩 X 錢」來表現。根據王業鍵的研究，以府為單位向朝廷上報的米價，記載的是該府所轄州縣中，在某月報出的最低價格與最高價格，[34] 也就是這兩個數字是，某月該府中米價最低的某州縣與米價最高的某州縣所分別報出的數字。本文依照這個解釋，將「至」字之前的前一個數字做為最低價格，「至」字之後的後一個數字視為最高價格。以上述嘉慶 20 年（1815）12 月的臺灣府米價為例，該月臺灣府各廳縣所報出的上米價格中，每倉石銀 2 兩 5 錢是最低的數字的話，上米的最低價格便記為銀 2 兩 5 錢。同時，各廳縣所報出的上米價格中，每倉石銀 3 兩 1 錢是最高

31 筆者於本文中所使用的糧價數字，收集於 2005 年至 2006 年之間（附錄一、二、三），米價資料有所缺漏。而新近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價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中所收的道光朝米價資料更為完整，道光朝 30 年間，福州、泉州、漳州三府只欠缺道光 5 年 2 月、7 年 10 月、18 年 5 月的三個月份米價，臺灣府僅缺道光 4 年 12 月、5 年 2 月、7 年 10 月的三個月份米價，另行整理於文末附錄六與附錄七。筆者所收「糧價清單」與《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價表》所記的米穀價格數字雖有不同（兩者月份數不同之故），但附錄六、七所顯示的價格趨勢與附錄二、三的表現（即臺灣米價升降，漳、泉、福州三府與臺灣比較）是相同的。又，本文保留「糧價清單」中所記農曆年份及月份，未加以轉換為西曆，亦即附錄各表中的年份請以農曆年份視之。

32 《軍機處錄副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047321。

33 倉石為米穀計量時所用的單位。米穀的計量方式之一，以貯放於戶部、稱為戶部量之鐵鑄方形量器，亦即倉斛為標準。再按戶部庫貯之銅斛，製成木斛，發於各倉使用。以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五斗為一斛、二斛為一石。參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報告：清國行政法》（臺北：編者，1910），第 3 卷，頁 112。

34 王業鍵，〈清代的糧價陳報制度及其評價〉，收於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二）》，頁 34。

的數字的話，便將上米的最高價格記為銀 3 兩 1 錢。本文將清單中的最低與最高價格，各自以上、中、下米，[35] 按每年有米價數據的月分數，求出該類米在該年的最低價格平均值與最高價格平均值。

王業鍵以一府的中米最低與最高價格的平均值來觀察米價的變動，[36] 筆者則就各類米的最高價格平均值與最低價格平均值，分別觀察。這樣的作法在討論清代臺灣的米價時之所以可行，原因在於臺灣在清代開發的先後順序有跡可尋，可以觀察到開發先後的地區米價出現高低差異的現象，比較容易確定最低與最高價格出現在某縣廳或地區（分析請詳見本節之（三））。如同前述，由於筆者嘗試檢討十八世紀末之後的臺灣與漳泉二府的米價與米穀流通之間的關係，[37] 希望更具體地以臺灣府之中的各地米價來探討其與米穀移出的關係，所以分別就最低價格平均值與最高價格平均值加以觀察。

---

35 米價數字中的上米、中米、下米，指的是米穀的品種。臺灣府的米穀品種之中，何者被列為上米或中米、下米，在檔案中並未明載。乾隆 29 年出版的鳳山地方志中，記載有包括占稻（俗稱「尖仔」）、早尖、埔尖、烏尖、三杯、三杯擇、呂宋尖、圓粒早、安南早、白肚早、紅腳早、一支早、花螺等米穀品種（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 146 種，1962；1764 年原刊〕，頁 281）。在這些眾多品種之中，烏尖以及紅腳在同治 11 年的淡水廳被列為上米與中米（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淡新檔案（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1〕，第一編行政編第四類建設第一款民業，頁 246）。此外，在光緒 2 年的淡水廳，花螺也被列為上米（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淡新檔案（七）》，第一編行政編第四類建設第一款民業，頁 271-273）。至於移出用的米穀品種，就筆者管見，根據《臺灣私法》所載光緒年間商船「金德寶」之一例，「金德寶」所載運的米穀清單中，「以栖新花螺兌二·四五元，好低腳二·四八元，芒朮二·八元，安早二·三二元、二·三三元」，依照價格來看，可以得知芒朮、低（紅）腳、花螺、安（南）早的由高至低的順序（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商事編》〔文叢第 91 種，1961；1909-1911 年原刊〕，第六章海商，頁 294-295）。其中的花螺在淡水廳被列為上米，可以推測當時臺灣移出的米穀品種也包括上米。另，引文中的「栖」字疑為「粞」字之誤，意思似指脫殼的花螺新米。

36 觀察米價數字資料時，王業鍵認為：「糧價單上的糧價上限和下限，並不代表一個固定地點的價格。在我們利用這些資料作學術研究時，除非能夠肯定上限下限是幾乎一致地屬於某縣或某一地區的價格，就上下限取其平均值來觀察，應該是較有代表性和一致性的」，主張取最低與最高價格之平均值。王業鍵，〈清代的糧價陳報制度及其評價〉，頁 34。

37 謝美娥在討論臺灣米價變動時，當然也觀察到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的臺灣米價有時要高於漳泉的這種現象，並將各個時期的這種現象歸因於地方動亂與自然災害作用的結果，請見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135-159。但是如果同樣觀察福建省閩江流域的米價與供需地關係（以福州府為米穀需求地區、閩江上游的延平府、建寧府以及邵武府為米穀供給地區），這個區域直到十八世紀末期，都是需求米穀的福州府米價高於供給米穀的其他三府。但是在進入嘉慶與道光年間之後，建寧府的米價躍昇為四府之冠，福州府的最高價格只有在嘉慶 14、15 年、嘉慶 20 至 24 年、道光 27 至 29 年的數年高於其他三府，最低價格則是在道光 24 至 26 年之間高於其他三府，除此之外的其他大多數年份中，福州府的米價大多低於延平與建寧府，甚至為四府中米價最低者。從上述的這種現象看來，十九世紀之後，閩江流域和閩南地區同樣出現了米穀需求地區的米價高於供給地區的反常現象。礙於本文主旨，筆者僅能指出十九世紀之後閩江流域與閩南地區的米價出現相同趨勢，在此無法詳究其因。

（二）清代中葉臺灣米價變動與漳泉米價關係

筆者將乾隆 48 年至道光 30 年的臺灣米價數字，分別就上、中、下米的最高價格平均值與最低價格平均值，整理如文末附錄一。可以看出林爽文事件（1786-1788）結束之初的兩、三年間，臺灣上、中米的最高價格平均值曾經一度高漲至每石銀 3 兩之上，之後價格雖然回穩，但是到了嘉慶中期出現逐漸升高的傾向，雖然嘉慶末期又再度下跌，但是道光 12 年（1832）之後，臺灣米價的上漲趨勢非常明確，道光 13 年（1833）至 17 年（1837）之間各類米的最高價格每石超過銀 3 兩，達到臺灣米價的最高點。不過，道光 18 年（1838）起，各類米的最高價格又再度下跌為每石 2 兩前後。道光 24、25 年（1844、1845）雖然稍微上昇，但是在道光 29、30 年（1849、1850）又回復到每石 2 兩以下的水準。

這段期間中，值得注意的當然是臺灣米價平均值超過同時期的漳泉米價平均值的現象。附錄二與附錄三顯示臺灣、福州、泉州、漳州等四府的米價平均值，附錄二記錄的是四府的最高價格平均值。在這個時期之中，臺灣府的上米最高價格平均值有 16 個年份、中米最高價格平均值有 15 個年份、下米最高價格平均值有 10 個年份，分別超過漳泉或者福州各府，特別是在嘉慶 20、21 年以及道光 13、15、16、23、24、25 年的這 8 年，臺灣府上、中、下米的最高價格平均值成為四府中價格最高者。再者，附錄三的最低價格平均值，也顯示臺灣的上米最低價格平均值有 6 個年份（另有道光 27 年與泉州府同為最高）、中米最低價格平均值有 7 個年份、下米最低價格平均值有 10 個年份，分別超過福建三府。在道光 6、7、14、15、17 年的 5 個年份中，臺灣府的上、中、下米最低價格平均值也成為四府同類價格平均值中最高者。雖然除了上述年份之外，臺灣米價的最高價格平均值與最低價格平均值大部分都低於漳泉米價，但是上述四府的最高價格平均值與最低價格平均值的關係，顯示了道光 15 年（1835）前後的 1830 年代中期，臺灣米價陸續出現了高於漳泉米價的現象。這一價格趨勢顯然背離了十八世紀中葉臺灣及漳泉之間供需關係與米穀賤貴的原則，並不符合米穀供給地的米穀價格低於需求地價格的常態。[38]

---

[38] 臺灣與漳泉米價的關係，如同乾隆 19 年福建巡撫陳弘謀所指出的：「臺灣米價因漳泉昂貴，是以不能獨賤，然究竟比漳泉平減」（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7 輯，頁 825）。也就

（三）臺灣米價的地區性差異

「糧價清單」中所記錄的最高與最低價格，代表著某府中該等級米穀的價格最高以及最低的縣廳所上報的米價。本文試圖藉由敘述性史料掌握清代臺灣各地所存在的米價差異，找出最高價格與最低價格所可能代表的區域。

十八世紀中葉的臺灣各地米價差距，從《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的記述中可以歸納如文末附錄四。從附錄四中可以看出，(1) 在沒有自然災害的情況下，臺灣道員駐在的「府城」、「府治」、「郡城」往往是米價最高的地區。(2) 北部的淡水地方大致上是米價最低的地區。(3) 自然災害發生的地區雖然會出現米價一時高漲的情形，但是隨後仍然會回歸常態。如同附錄四，乾隆 19 年（1754）9 月的彰化與諸羅兩縣米價由於暴風雨被災而高漲，到乾隆 20 年（1755）年間，價格仍然高於南部的府城。由於欠缺其後的相關史料，無法得知這種現象持續至何時，但是在乾隆 32 年（1767）時，府城米價仍然又高居各地之首。(4) 十八世紀中葉的臺灣各地米價透露出府城、鳳山、諸羅、彰化、淡水的由高而低的順序差異。

十八世紀中葉的臺灣各地米價出現南高於北的現象，[39] 至少應該持續到十九

是臺灣米穀向來接濟漳泉，在漳泉米價騰貴之際，臺灣米價會因為移出而上漲，然而終究會保持在低於漳泉價格的範圍之內。關於十八世紀中葉的臺灣與福建內地的米價，筆者所收集的數例如下表：

時間	報告者	內容	資料來源
乾隆 16 年 12 月	閩浙總督喀爾吉善	省會漳泉每石價皆二兩有奇，即建卲等屬亦在二兩以內。惟臺郡現在有價平至一兩三四錢者。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2 輯，頁 124。
乾隆 17 年 3 月	福州將軍暫署福建巡撫新柱	臣查泉汀二府與漳州鄰近、……現在飭查市賣米價在二兩以上者居多。……又據臺灣府陳玉友稟報、正月下旬臺屬米價自一兩四錢二分至一兩九錢不等……。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2 輯，頁 405-406。
乾隆 17 年 3 月	閩浙總督喀爾吉善	至各屬米價自正月以後皆漸增長，省會暨下游各府，每石現賣二兩六七錢不等。上游延建卲等府，市價亦有在二兩以上者。……至臺郡米價，正、二月間較內地平減，聞近日亦因青黃不接，長至二兩以上……。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2 輯，頁 461。
乾隆 21 年 9 月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事新柱	上游每米一石需銀一兩五錢至一兩七錢，下游每米一石需銀一兩四錢至一兩六錢。臺灣每米一石需銀一兩二錢，較前平減，地方安靜。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15 輯，頁 371。
乾隆 30 年 5 月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事明福	上下游各府州屬……各處糧價每石自一兩五六錢至二兩三四錢零不等。省中糧價每石自二兩一錢至二兩三錢五分不等，緣青黃不接之時，較前稍增。臺灣府屬，……糧價每石自一兩三錢五分至一兩九錢五分不等，……。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24 輯、頁 736。

39 許世融也曾經指出十八世紀臺灣各地的米價差異，依照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彰化縣、淡防廳的順序逐漸遞減。許世融，〈清雍正乾隆時期臺灣米價分析〉，《史耘》3/4（1998 年 9 月），頁 130。

世紀中葉。嘉慶與道光年間的「糧價清單」中，只記載臺灣府項下的最高與最低價格，因此不像《宮中檔》直接記載了十八世紀中葉的臺灣各地米價差異。不過，其他的史料敘述也間接記載了臺灣各地的米價差異。例如姚瑩在記述噶瑪蘭的開發經過時提及，嘉慶 17 年（1812）噶瑪蘭新設為廳時，同知呂志恒請求將當地的正供定為銀納。當時臺灣各地的正供大多以實物交納，但是呂志恒認為噶瑪蘭對外交通不便，將正供實物再運出到淡水廳實為多此一舉，不如在噶瑪蘭廳徵收折色，由人員攜銀在淡水廳買穀交納。但是福建省議定穀每石以庫紋銀 6 錢換算，呂志恒指出這個價格在淡水購買穀石實有困難時提及：「惟彰穀貴於淡防，而蘭穀則較淡防為賤。」[40] 顯示開發之初的噶瑪蘭地區米價低於淡水，而淡水地區的米價又低於中部彰化。這個敘述雖然沒有提到當時的南部米價，但是米價在彰化、淡水、噶瑪蘭由高而低的表現，與開發先後及人口飽和的順序是一致的。

再以道光初年為例，道光 4 年（1824）清朝招攬福建商人運送臺灣米穀前往天津之際，命令福建巡撫調查運搬所需的船舶數量與運費。福建巡撫孫爾準依旨調查上奏：「在臺召募商民運米十四萬石，用糖、商各船七十四隻陸續開放；其鹿耳門、鹿子港兩處米價每石二兩六、七、八錢不等，淡水一處米價每石二兩四、五錢不等，腳價每石俱六、七錢不等，按船給予免稅印照，聽各自投行」，[41] 明確記載了當時北部港口淡水的米價較中部鹿港、南部鹿耳門低廉的情形。由上述嘉慶與道光年間的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十九世紀前半的臺灣各地米價差距和十八世紀中葉的情形基本上相同，大致符合開發的先後順序。同時，道光 4 年（1824）的這個例子，顯示了各處正口隨著周圍地區也存在米價差異的情形，因此本文提及米價的最高價格平均值與最低價格平均值時，將最高價格平均值設定為南部以鹿耳門正口為中心的地區價格，並將最低價格平均值視為北部與東北部以八里坌正口為中心的地區價格，[42] 進行價格趨勢與米穀流通關係的檢討。

---

40 姚瑩，〈籌議噶瑪蘭定制〉，收於姚瑩，《東槎紀略》，頁 46。

41 〈戶部、倉庾、採買米石〉，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會典臺灣事例》（文叢第 226 種，1966），頁 49。

42 如同呂志恒所指出的，嘉慶年間噶瑪蘭廳的米價低於淡水廳，因此噶瑪蘭廳設置之後，「糧價清單」的最低價格應該視為由噶瑪蘭廳上報，但是噶瑪蘭廳的烏石港在道光 6 年方才設為正口，在此之前，臺灣北部與東北部的正口唯有八里坌一港。由於淡水廳、噶瑪蘭廳米價兩者都低於南部府城米價，本文想強調的是南部與北部、東北部的米價的相對性差異，因此將包含噶瑪蘭廳的東北部米價，與北部淡水廳一概視為最低價格。

四、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的「臺運」變遷

透過觀察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之間臺灣與漳泉的米價差，以及島內存在的米價地區性差異，本小節將分析上述這兩項米價因素如何與「臺運」運作的民間商船、正口對渡航路等種種條件相互作用，逐漸造成「臺運」變遷的經過。

（一）林爽文事件結束後的臺灣米價

乾隆 51 年（1786）11 月，發生於彰化縣大里杙的林爽文事件迅速擴大，同年 12 月，彰化縣城與淡水廳的竹塹城都為林爽文軍所攻陷。隨後，林爽文軍南下，進入諸羅，包圍府城。在林爽文軍攻陷府城之前，淡水廳幕僚壽同春奪回了竹塹城。但是，相較於清廷很快控制了北部，乾隆 52 年（1787）之後，林爽文軍和官軍互相爭奪鳳山、諸羅和府城附近的村莊，南部地區因而長期遭受兩軍攻佔、奪回的反覆蹂躪。清廷陸續調派至臺灣的援軍，也因此多由北部八里坌與中部鹿港登陸。乾隆 52 年（1787）11 月，清廷派來臺灣平亂、官職位階最高的大學士福康安自鹿港上陸後，隨即南下解諸羅之圍，乘勢跨越中部沿山隘界、進入番社追捕敗退亂軍，最後於乾隆 53 年（1788）1 月擒獲亂軍首領林爽文，同年 2 月又獲另一亂軍首領莊大田，為期約 1 年 3 個月的林爽文事件方才結束。[43]

林爽文事件期間及其結束之後，臺灣地區的農業生產究竟受到什麼樣的破壞，從史料中並不容易掌握。負責海關稅收管理的福州將軍魁倫，在乾隆 54 年（1789）10 月報告該年閩海關稅收不如以往時，提及「臺灣經平定以後，蔗糖油料產殖雖漸次復初，尚未能如從前之豐旺。」[44] 間接說明了米穀以外的臺灣產業以及秩序仍在恢復之中。至於米穀生產，在事件尚未結束的乾隆 52 年（1787）末，清廷曾經要求閩浙總督李侍堯對當時臺灣稻米的耕作現況，以及臺灣米穀的移出情形作一報告，李侍堯所回覆的上奏如下：

---

[43] 周璽，《彰化縣志》（文叢第 156 種，1962；1836 年原刊），卷 11 雜識志「兵燹」，頁 363-376。

[4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73 輯，頁 691。

> 臺灣自賊擾以來，專販米穀之商船日漸減少。惟運送兵丁糧餉到臺之船回棹時，有附載米穀內渡者。六、七月間，每旬或數百石至一、二千石。八、九月以來，海多風暴，回船本少，近日始有陸續回來，每船不過帶米數十石，均係船戶自買食米。其自北淡水回者，尚間有數十石、百餘石不等。至臺灣南北何處尚照常耕種，福康安到彼，自必確查具奏。臣等現據各官稟報，亦有可得其大概者。查北淡水久無賊擾，居民已安農業，現據巡檢王增錞報稱，秋收約有五分，米價每石二千五、六百文。又鳳山縣南之山豬毛粵民各莊，賊既不敢侵犯，自必耕種如常。前據吳元琪稟稱，東港一通，府城米價頓減。近又據楊廷理稟稱，粵莊米穀有到府者，是南北兩路賊所不到之處，俱照常耕種。其餘附近賊巢各莊，前據徐夢麟等稟稱，所有田稻，賊皆加二抽分，以資糧食。至諸羅各鄉，當魏大斌等進兵時，賊皆放水灌滿，稻田是亦未嘗無耕種。但不從賊者多被搶擄，從賊者米穀又不出售，是以糧食不得流通，將來賊匪潰散後，民間仍不虞缺食也。[45]

李侍堯的奏報有兩個要點，一是記載了事件期間臺灣各地米穀耕種的大概情形。北部淡水因為秩序恢復較早，[46] 和南部鳳山的六堆客家是能夠如同往常耕種的地區；除了這兩處之外，諸羅地區無法正常耕種以及糧食流通受阻的情形相對明顯。第二，戰亂使得前往臺灣從事米穀交易的商船減少，但是北部淡水仍然有商船出入，裝載米穀移出。從上述兩點看來，可以說在林爽文事件期間，北部淡水是相對受創較少的地區。

李侍堯的報告中也記載了乾隆 52 年（1787）末的淡水米價為每石 2 千 5、6 百文，而當時府城的米價在東港米穀運到之後，才下降至每石 3 千 1、2 百文。[47] 至於中部鹿港的米價，從該年 11 月每石 5 千 2 百文的高價，到了同年 12 月才急

---

4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66 輯，頁 163-164。

46 淡水在林爽文事件期間較早恢復安定，除了上述李侍堯的上奏之外，許文雄關於械鬥的研究也有同樣的觀察。根據許文雄的研究，林爽文事件期間，臺灣各地發生多起械鬥，北部的械鬥在乾隆 52 年 6 月下旬左右結束，但是中部與南部的械鬥大致發生在同年 4 月至 11 月之間。許文雄，〈林爽文起事和臺灣歷史發展〉，《故宮學術季刊》19: 1（2001 年秋季號），頁 95-150。

4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66 輯，頁 255。

速下降到每石 3 千 5 百文。[48] 從各地米價的差距，可以看出淡水地區比起其他地區較早恢復生產與安定，相對於南部，擁有供應米穀移出的較佳條件。

（二）乾隆 53 至 55 年間臺灣各地與漳泉米價平均值的差距

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淡水地區的米價一向低於中、南部米價，在林爽文事件期間以及事件結束之後，淡水的米價持續低於中、南部。如果從附錄三將林爽文事件結束後三年間，淡水（包括東北噶瑪蘭）的米價平均值作為臺灣府米穀最低價格平均值，與當時漳泉米穀的最低價格平均值作一比較，可以得到下表一：

表一、乾隆 53 至 55 年臺灣與漳泉米穀的最低價格平均值

單位：兩／石

種類	上米			中米			下米		
年＼府	臺灣	泉州	漳州	臺灣	泉州	漳州	臺灣	泉州	漳州
乾隆 53 年	2.38	2.46	2.64	2.06	2.62	2.54	1.74	2.51	2.09
乾隆 54 年	1.95	2.39	2.40	1.67	2.26	2.30	1.37	2.16	1.51
乾隆 55 年	1.75	2.18	2.11	1.51	2.08	2.01	1.23	1.98	1.42

表一顯示臺灣府米穀的最低價格平均值在林爽文事件結束之後的三年之間，仍然低於漳泉二府的最低價格平均值，計算其價格差如下表二：

表二、乾隆 53 至 55 年以臺灣最低價格平均值為基準的漳泉與臺灣最低價格平均值之差額

單位：兩／石

種類	上米		中米		下米	
年＼府	泉州	漳州	泉州	漳州	泉州	漳州
乾隆 53 年	+0.08	+0.26	+0.56	+0.48	+0.77	+0.35
乾隆 54 年	+0.44	+0.45	+0.59	+0.63	+0.79	+0.14
乾隆 55 年	+0.43	+0.36	+0.57	+0.60	+0.75	+0.19

相對於上述最低價格平均值的表現，同樣從附錄二將林爽文事件結束之後三年、代表南部的最高價格平均值與漳泉最高價格平均值作一比較，卻出現稍有不同的現象，如下表三：

---

[4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66 輯，頁 543。

表三、乾隆 53 至 55 年臺灣與漳泉米穀的最高價格平均值

單位：兩／石

種類	上米			中米			下米		
府／年	臺灣	泉州	漳州	臺灣	泉州	漳州	臺灣	泉州	漳州
乾隆 53 年	3.48	2.90	2.98	3.09	2.78	2.95	2.26	2.65	2.71
乾隆 54 年	3.15	2.83	2.85	2.62	2.67	2.75	2.15	2.47	2.50
乾隆 55 年	2.39	2.44	2.52	2.21	2.29	2.42	1.86	2.21	2.32

在表三之中，出現了部分臺灣米價高於漳泉米價的地方，將表三的數字整理如下表四：

表四、乾隆 53 至 55 年以臺灣最高價格平均值為基準的漳泉與臺灣最高價格平均值之差額

單位：兩／石

種類	上米		中米		下米	
府／年	泉州	漳州	泉州	漳州	泉州	漳州
乾隆 53 年	-0.55	-0.50	-0.31	-0.14	+0.39	+0.46
乾隆 54 年	-0.32	-0.30	+0.05	+0.13	+0.32	+0.35
乾隆 55 年	+0.05	+0.13	+0.08	+0.21	+0.35	+0.46

從表四可以得知臺灣府上米的最高價格平均值在林爽文事件結束之後的第一、二年，以及中米最高價格平均值在第一年時，都要高於漳泉同類米穀價格的平均值。也就是說，臺灣南部的上米以及中米價格平均值在這一、兩年之中是高於漳泉的。[49] 而即使臺灣的最高價格平均值仍然低於漳泉，上、中米的平均值差額也只保持在 5 分至 2 錢 1 分之間。從表二以及表四看來，可以推論林爽文事件結束之後的臺灣南部米價平均值比較接近漳泉同類米穀的價格平均值，甚至在最初一、兩年還曾經超過漳泉的最高價格平均值，而北部米價則一直低於漳泉最低價格平均值，同時其低於漳泉最低價格平均值的差額也比較大。

如果再比較表一的臺灣與表三的漳泉這兩個數據的話，兩者之間的價格差距就更加拉大。以下的表五與表六為兩者的比較：

[49] 至於表三下米最高價格平均值的趨勢與上、中米的表現為何不同，原因不明，暫不加以討論。不過，如同前註 35，上米與中米作為臺灣移出用米穀的可能性極高。

表五、乾隆 53 至 55 年臺灣的最低價格平均值與漳泉米穀的最高價格平均值

單位：兩／石

種類	上米			中米			下米		
府／年	臺灣	泉州	漳州	臺灣	泉州	漳州	臺灣	泉州	漳州
	最低價格平均值	最高價格平均值	最高價格平均值	最低價格平均值	最高價格平均值	最高價格平均值	最低價格平均值	最高價格平均值	最高價格平均值
乾隆 53 年	2.38	2.90	2.98	2.06	2.78	2.95	1.74	2.65	2.71
乾隆 54 年	1.95	2.83	2.85	1.67	2.67	2.75	1.37	2.47	2.50
乾隆 55 年	1.75	2.44	2.52	1.51	2.29	2.42	1.23	2.21	2.32

表六、乾隆 53 至 55 年以臺灣最低價格平均值為基準的漳泉最高價格平均值與臺灣最低價格平均值之差額

單位：兩／石

種類	上米		中米		下米	
府／年	泉州	漳州	泉州	漳州	泉州	漳州
乾隆 53 年	+0.52	+0.60	+0.72	+0.89	+0.91	+0.97
乾隆 54 年	+0.88	+0.90	+1.00	+1.08	+1.10	+1.13
乾隆 55 年	+0.69	+0.77	+0.78	+0.91	+0.98	+1.09

從表六之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表六所表示的臺灣北部與漳泉最高價格的平均值差距，要遠大於表四所顯示的南部與漳泉最高價格平均值的差距。換句話說，在林爽文事件結束之後的一、兩年之間，由漳泉到臺灣北部從事米穀買賣，可以因為較大的米價差額而獲利較多。相對而言，臺灣南部在事件結束之初的第一、二年之中，不但有部分的米價高於漳泉，即使之後米價下跌，與漳泉米價的差距仍然較小，加上其他運輸成本的計算，[50] 對於漳泉而言，林爽文事件結束之

[50] 臺灣米穀移出至漳泉，除了米穀價格之外，在史料中稱為「水腳價銀」或者「腳價」的運費也必須考慮。史料中關於運費的記載，可以大致整理如下：

年	民間米穀運費	官方所定腳價	史料出處
雍正 5 年	—	每米 1 石自臺至廈 1 錢 8 釐	《臺案彙錄丙集》，頁 173
雍正 7 年	—	每穀 1 石自臺至廈 8 分	《臺案彙錄丙集》，頁 173
乾隆 18 年	—	每石准加給運費 3 分	《臺案彙錄丙集》，頁 175
道光年間	銀 3 錢至 6 錢不等	銀每石 6 分 6 厘（船樑頭 1 尺 6 丈以上）	《東槎紀略》，頁 23
道光 4 年	腳價每石俱 6、7 錢不等	—	《清會典臺灣事例》，頁 49

高銘鈐整理了自雍正年間之後，官方支付載運官穀（即「臺運」）的腳價費用，不同正口的不同對渡航路所需的腳費各有不同，例如乾隆 49 年以後，自鹿耳門運出官穀時，官方所支付的腳價為每石 6 分 6 釐 4 毫（0.0664 兩）。參考高銘鈐，〈雍正・乾隆期における福建・台湾間の米穀流通〉，頁 38-39。

此外，民間運穀所需的腳價費用似乎要高於官方所付的官穀補貼腳價，不過關於民間腳價的記

初的第一、二年，臺灣南部的米價甚至於高過漳泉米價，顯然背離了米穀供給地價格低於需求地價格的常態。

十八世紀中葉，原本存在於臺灣南北的米價地區性差異，加上林爽文事件期間的北部與南部秩序恢復快慢不一，因此出現了事件結束之後的乾隆 53 年（1788）、54 年（1789）之間，臺灣南部米價高於漳泉的米穀交易不利因素，而北部的較低米價相對提供了更有利的交易條件，因而造成了民間米穀交易地區的變化，這個變化從下面所舉一例可以見其端倪。

（三）對渡航路下「臺運」流通結構的改變

林爽文事件結束後的第一、二年，臺灣南部米價由於高出漳泉，比起臺灣北部米價仍然低於漳泉米價而言，當時的南部並不適合從事米穀交易。但是礙於正口對渡航路的規定，從廈門啟航的商船只能前往鹿耳門一口。換句話說，對於由廈門出口的商船而言，在事件結束之後前往鹿耳門從事米穀交易幾乎不可能獲得利潤。雖然筆者目前並未發現與這個看法直接相關的史料，但是乾隆 55 年（1790）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奏請准許廈門白底艍船[51] 前往鹿港交易一事，間接印證了當

述並不多見，除了上述道光年間的記載外，《淡新檔案》中記載了光緒 4 年北部的運腳價格。根據淡水同知陳星聚的報告，「臺北米價，每石四元，上等陳米有貴至四元一、二角不等。以卑（敝）屬通用七二番計之，照米市旬報每石二兩八錢，尚屬不敷，……若由臺運省，再加船腳袋皮，每石需米四元五、六角之左，臺價貴於省糧，商人惟利是圖，誰肯作虧本之行運，招之不來，於省無補，乃礱戶乘此囤積，價益居奇。」（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淡新檔案（七）》，第一編行政編第四類建設第一款民業，頁 281）可以得知腳價與裝袋費用大致在 72 番銀 4 角左右，換算為銀約為 2 錢 8 分 8 釐左右。

除了腳價之外，民間商船至臺灣運穀時，還必須負擔近似「陋規」的靠港費用。根據《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三十一年所定文員衙門每船准收番銀三圓，武職衙門准收制錢自一百文至二十文不等。近年食物昂貴，實不敷用，應請文員衙門每船准收番銀五圓，武職衙門准收番銀三圓，以資貼補其掛驗米石等項，陋例一概嚴行禁革。」（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67 輯，頁 867）商船進入正口之際，還必須分別向文武衙門繳納規費，這一部分的費用也應該在商人考慮載運成本的計算之中。

51 白底艍船應該為大型漁船之一。周凱在《廈門志》中曾經加以說明：「漁船有大、小二種，單桅、雙桅之別。初，漁船止准單桅，樑頭七尺，歸縣徵收漁稅，不許越省採捕。後閩省漁船許用雙桅，樑頭至一丈而止。七尺以上，歸關徵稅。大者曰白底艍，春、冬漁汛准赴浙江定海、鎮海、象山三縣洋面捕�федер、釣鰳。與商船一體取具里鄰族澳甲保結……」（周凱，《廈門志》，卷五船政略，頁 172）。從上述的說明可知，白底艍船為大型漁船，但是可以越省航行，而且與商船同樣具有保結，因此應該可以載運官穀，根據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的報告：「至白底艍船比蚶江之單桅、雙桅船身較大，如遇配運官穀，應以每船裝米六十石，穀則倍之。」（〈戶部「為內閣抄出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奏」移會〉，《臺案彙錄丙集》，頁 258）。

時船隻不願意前往臺灣南部交易米穀的情況。伍拉納指出：

> 自鹿仔港未經設口以前，廈門向有白底艍船，往來鹿仔港販買米穀，運回銷售，於商民頗多利益。嗣因私販多由蚶江偷渡，乾隆四十九年，經前任福州將軍臣永奏請，臺灣北路於鹿仔港設口，內地泉州於蚶江設口。議定廈門船隻由廈門舊口掛驗赴鹿耳門，其蚶江船隻則由蚶江新口掛驗赴鹿仔港。如廈門白底艍船有赴鹿仔港貿易者，亦必由蚶江掛驗，始准出口。立法固屬周詳，惟是廈門船隻渡赴鹿仔港，風順之時不過一、二日可到，如轉至蚶江掛驗後再赴鹿仔港，海道既屬紆迴，而風汛靡常，守候動需時日。邇年以來，廈門白底艍船因格於成例，往回稽阻，漸次歇業，以致泉州之廈門及漳州一帶販運稀少，糧價增昂，民食不無拮据，實於商民不便。且白底艍船赴鹿仔港者既少，則嘉義、彰化二縣應運內地兵穀，耑藉蚶江一處單桅、雙桅小船配運，亦難免積壓之虞。[52]

根據上述伍拉納的陳述，原本由廈門私渡至鹿港從事米穀交易的白底艍船，在鹿仔港與蚶江設為對渡正口之後，由於必須先由廈門北上到蚶江口掛驗出海，耗費時日，因而逐漸歇業，不僅販運至漳泉的米糧減少，鹿仔港一口的「臺運」也因此積壓未運，因此伍拉納希望朝廷准許廈門白底艍船能夠不受渡航路線的限制，直接由廈門對渡鹿港。伍拉納的這個奏請究竟意味著什麼？頗值得深思。鹿港設為正口之後，如果廈門白底艍船北上至蚶江耗費時日，那麼為什麼不按照原本廈門與鹿耳門的對渡航路往來，而是由伍拉納奏請讓白底艍船自廈門前往鹿港？這間接反映出鹿耳門並不在當時船隻渡臺從事米穀交易的考慮之列，也符合乾隆 53 年（1788）前後臺灣南部米價高昂、並不適於米穀交易的推測。

伍拉納的奏請後來得到朝廷的許可，但是除了廈門白底艍船可以直接前往鹿港之外，伍拉納強調：「其餘廈門一切糖船、橫洋等船，自應循照舊例，止准對渡鹿耳門出入，毋許偷越鹿仔港。」[53] 也就是廈門商船的渡臺，仍然要按照正口航路的規定，前往鹿耳門一口。道光年間的周凱則認為伍拉納的作法開啟了漁船渡臺貿易之始，他指出：

---

[52] 〈廈門白底艍船准其徑渡鹿港貿易章程〉，《福建省例》，船政例，頁 662- 663。

[53] 〈廈門白底艍船准其徑渡鹿港貿易章程〉，《福建省例》，船政例，頁 666。

> 乾隆五十五年，總督伍拉納奏：廈門白底艍欲赴鹿仔港貿易者，令由廈門同知編號挂驗放行，仍於船旁大書『廈門赴鹿仔港』字樣，並令與泉永道於牌照內加用關防驗放（省例。按白底艍，漁船也；定例不准經商。此乃啟漁船經商之漸，後仍禁止）。[54]

周凱特別強調漁船經商的原因是，原本擔任米穀交易的商船受限於對渡航路，只能前往當時米價相對高昂的南部，而大型漁船的白底艍船卻可以變更航路，前往米價相對較低的中部港口。這個措施意味著只要變更船舶的種類，便可以改變渡航路線，同時可以避開米穀交易較為不利的南部鹿耳門一口，前往獲利較豐的其他地區。以此為始，乾隆末期之後的漁船或小船渡臺的情形似乎漸趨頻繁，「臺運」因而逐漸出現變化。

（四）嘉慶年間的「臺運」對策

進入嘉慶年間，臺灣的米穀價格雖然下降，但是利用渡航路線以及小型船隻規避「臺運」配穀的作法卻持續存在。嘉慶中期海盜騷擾臺灣這一事件使得「臺運」積壓的問題暴露無遺，成為福建與臺灣地方官員必須解決的難題。海盜蔡牽在嘉慶 10 年（1805）11 月以及 11 年（1806）5 月，兩次試圖從鹿耳門登陸臺灣。蔡牽攻擊鹿耳門之際，「臺運」當然無法照常進行，結果從嘉慶 10 年（1805）到福建海域治安恢復的嘉慶 14 年（1809）之間，未能搬運的官穀合計累積為 15 萬 7 千餘石。[55]

為了要解決因為海盜騷擾而雪上加霜的「臺運」積壓，臺灣府知府徐汝瀾在嘉慶 14 年（1809）曾經奏請小型商船同樣按照樑頭大小，分攤「臺運」配穀。徐汝瀾的提案跟他觀察到來臺商船的減少這一認識有關（詳見後述澎湖小船渡航增加），為了要解決小船規避載運配穀的問題，徐汝瀾提議所有的渡臺商船，不

---

54 周凱，《廈門志》，卷五船政略，頁 173。

55 根據嘉慶 15 年閩浙總督方維甸的報告：「此項臺灣每年應運內地米穀，自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十四年十月因海洋未靖，商船被劫有一百四十六案，計米三千餘石、穀一萬七千餘石。」由上述史料可知，被海盜所劫的米穀數量，遠不及於「臺運」停擺、無法運出的數量。參考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五）：自嘉慶 12 年 11 月上至嘉慶 15 年 8 月》（臺北：華文書局，1969），卷 226，頁 3325。

論樑頭大小，回程必須載運規定數量的「臺運」配穀。這個提議似乎得到了朝廷的許可，因為周凱在分析「臺運」停滯原因時曾經指出：

> 嘉慶十四年，署臺灣府徐汝瀾請按照樑頭配穀之議起，於是船戶取巧規避，捏報樑頭以大作小，蚶江之船至有樑頭四尺數寸者造船換照，出口、入口胥吏之挾制需索更甚，臺運之積壓益多。[56]

就日後的周凱看來，徐汝瀾將所有大小商船一律配穀的作法，反而促使商船虛報樑頭大小。大型商船為了減少配穀數額，謊報為小型商船，結果商船出入正口時，由於船照與船舶大小不一，加上搬運的配穀數量不符，遭到管口胥吏要脅勒索，以致於商船出入不由正口，規避「臺運」配穀的情形愈趨嚴重，積壓日愈增多。

徐汝瀾建議商船不分樑頭大小、一律配載「臺運」的奏請，顯然與下面的記述有關。嘉慶 15 年（1810）3 月，福建布政使景敏在其所上奏的〈澎湖添復尖艚船額往臺販運糧食議定稽查章程〉中，提到了當時渡臺船舶的變化：

> 據署澎湖通判黎溶詳稱：澎湖漁船向無出洋，惟有廳民潛往臺地，創置沙艚、杉板頭等船，其船式與尖艚船樣無異，越赴臺、鳳、嘉各邑混請漁船牌照，私自來往臺澎。……並核署臺灣府徐汝瀾詳稱，近來橫洋糖船，潛往澎湖寄椗，另覓小船來臺裝運糖米，駁載回棹，規避配運官穀。尖艚船隻，若全多載米石，恐受大船覓載轉運，並恐其私透接濟等語。[57]

將徐汝瀾和黎溶的稟報互相參照，可以看出嘉慶 15 年（1810）之前的臺灣渡航似乎已經出現某些變化。原本渡臺運載米糖的橫洋船、糖船等大型商船並不直接前往臺灣，而是中途停泊澎湖，再利用澎湖當地的沙艚、杉板頭等小船前往臺灣購買米糖，返回澎湖轉交大型商船載出。商船利用這種作法規避「臺運」，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也使清廷同意了徐汝瀾提議渡臺大小商船一律配穀的奏請。

同時，閩浙總督方維甸隨即在同年 5 月提出新的對策，奏請朝廷允許商船不拘對渡航路，只要出入經由正口即可。朝廷批准方維甸的奏請，做了以下的指示：

56　周凱，《廈門志》，卷六臺運略，頁 191。

57　〈澎湖添復尖艚船額往臺販運糧食議定稽查章程〉，《福建省例》，船政例，頁 688-689。

> 據稱臺灣商船向來鹿耳門港口對渡廈門，鹿仔港對渡泉州蚶江，八里坌港口對渡福州五虎門，各有指定口岸。然風汛靡常，商民並不遵例對渡，往往因牌照不符，勾串丁役，捏報遭風。既可私販貨物，又可免配官穀，弊竇甚多，應行酌改章程等語。……現在臺灣未運官穀積壓至十五萬餘石之多，皆由商船規避不運所致，不可不速籌良策。著照方維甸所請，嗣後准令廈門、蚶江、五虎門船隻通行臺灣三口，將官穀按船配運。[58]

從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朝廷以及地方官員認為當時的「臺運」積壓是由於商船不按照既定航路前往對渡口岸，以遭風漂失為藉口，故意從別的正口登岸，以便回航時躲避配穀所造成的。針對商船的這種作法，方維甸因此提案放寬對渡航路，由正口出入即可，同時不管自哪個正口回航，都必須運載「臺運」配穀。此後，閩臺之間的往來只要出入經由正口即可，不必拘泥於廈門與鹿耳門、蚶江口與鹿港以及五虎門與八里坌對渡的三條航路。方維甸似乎希望藉由對渡航路的自由化，能夠彌補渡臺商船避開對渡航路所規定的正口而規避回程載穀所造成的「臺運」積壓。

方維甸緊接著下令自同年 7 月起，將海盜蔡牽騷擾時所積壓的 15 餘萬石官穀分 5 年帶運移出。根據後來的報告，這一批積壓的「臺運」實際上運出了 13 萬多石，但是後來仍然積壓了 2 萬 5 千 6 百餘石，其中包括嘉義縣穀 1 萬 8 千 5 百餘石，彰化縣穀 7 千餘石未能運出。[59]

但是當時的閩臺地方官員所面臨的「臺運」問題，除了上述歷年累積的未運配穀之外，還必須處理每年例行運出的 8 萬多石「臺運」的配穀。[60] 換句話說，自嘉慶 15 年（1810）起的 5 年之間，由臺灣運往福建的「臺運」配穀約為 11 萬

58　〈嘉慶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內閣奉上諭〉，收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四）》，頁 3040-3041。

59　〈閩浙總督汪志伊、福建巡撫王紹蘭臺灣應運節年內地穀石□□由〉，《軍機處錄副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檔案號碼 051433。

60　根據下列史料，可以略知嘉慶年間的應運「臺運」官穀數字：「今嘉慶元年應徵供粟欽奉恩旨蠲免，所有內地及臺灣兵糧應即籌撥支放。……仍應徵六分有零，粟一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八石九斗零，除本年留給臺灣、澎湖二處兵米，粟九萬六千四百二十二石四斗外，計餘存勻徵供粟三萬八百六十六石五斗零，以之運給內地本年兵眷、兵米，粟八萬四千六百八十九石四斗零，為數實屬不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9 本，頁 871a），可知嘉慶元年的「臺運」數額為運給內地兵眷與兵米的穀約 84,689 石。

餘石，這對當時已經苦於商船利用名目規避「臺運」的臺灣地方官而言，更增一層困難。因此，嘉慶 16 年（1811），閩浙總督汪志伊提出了「專運」，希望由專員集中搬運官穀，儘速解決「臺運」的積壓問題。關於「專運」實施的經過，周凱作了如下的說明：

> 嘉慶十六年，總督汪志伊以臺灣應運內地兵米、眷穀積壓過多，奏明委員專運。廈防廳封雇大號商船十隻，每船約裝穀二千石；蚶江廳封雇大船十隻，每船約裝穀一千石，派委丞、倅、遊、守各一員。腳價由例價之外，每石加給銀二分。分作三次，運回穀十數萬石。[61]

以「專運」一次運回穀 10 餘萬石，似乎順利解決了該年度應運配穀的搬運問題，但事實上，「專運」卻造成行商賠累的弊端，並使得臺灣的米糧價格受到人為因素操作而上漲，周凱指出：

> ……不得已，為官雇商船委員專運之舉。載民貨一石，水腳銀三錢至六錢不等，官穀例價，每石六分六釐，大運由司捐廉、酌加二分，合計每石止八分有奇。每船以二千石為率，船戶僅得運腳銀一百餘兩，不敷舵水飯食、工資、修理、篷索之需，加以兵役供應犒賞，行商之賠累甚鉅。而臺洋內地奸商、屯戶一聞大運，居奇昂價，民食堪虞。[62]

周凱認為「專運」不但使得受僱行商賠累，還造成米價因囤積而騰漲。[63] 這種「專運」帶動臺灣本地糧食價格上揚的想法，是否代表了嘉慶中期閩臺地方官員的普遍看法，由於史料闕如，無法確認。但是，「專運」於嘉慶 23 年（1818）再度實施，接著在嘉慶 25 年（1820）進行了第三次的「專運」，不過，即使嘉慶末年數次實施「專運」，「臺運」的積壓似乎仍然不見好轉。

61　周凱，《廈門志》，卷六臺運略，頁 190。

62　周凱，《廈門志》，卷六臺運略，頁 191。

63　雖然周凱認為「專運」造成臺灣民間囤積米穀，可能使得米價上漲，但是如果對照附錄一的臺灣米價趨勢，實施「專運」的嘉慶 16、23、25 年顯然並非這數年之間米價最高的年份。不過，其中還必須考慮臺灣民間聽聞「專運」消息的時間，以及人為操作何時、如何反映在米價上的過程，因此對於「專運」與米價的關聯，在此請容暫時存疑。

閩臺官員所試圖解決的「臺運」積壓，除了閩臺之間對渡船隻與正口航路的問題之外，嘉慶中期之後，由臺灣啟程回航的船舶不一定直接返回福建各港，以及整體商業交易環境的轉變，應該也是必須考慮的因素。[64] 嘉慶 22 年（1817），閩浙總督汪志伊要求與「臺運」業務相關的廈防廳、蚶江廳、興泉永道、泉州府等各官員報告改善「臺運」積壓的對策時，渡臺商船不遵守回航至福建正口的情況便被揭露：

> 又上年廈防廳摺報，金大興等五、六十船，均係上年三、四、五、六等月配運出口，在洋遭風，漂收上海、天津等處。遲至半年及七、八月，始行到廈。應如何究罰，並如何查係實在遭風，抑係偷漏捏報一節，本道（按：興泉永道）當即督同廈防廳張署丞嚴查歷年廈船由臺配穀漂收寧波、上海、天津、錦、蓋等處，多係糖船，加倍配穀，其中實在遭風者固屬不少，而乘風經商遠去者難保必無。上年金大興等五、六十船，類多如此。若逐船查究，其中經商遠去，捏報遭風者固不足恤，而實在遭風者情屬可憫。且事在未經議定以前，似可分別查明各該船如於進口業將官穀轉運明白，並無貽誤者，姑寬既往，免予深究。[65]

上述的例子中，金大興船團自臺返航時，以載送砂糖而前往福建以北的上海等港，並不直接回航福建，違反了清廷的規定：「前據蚶江廳條議，配載官穀船隻，由臺掛號出口，俱以臺灣移知之日為始，總限以一月，如有遲逾，照私渡關津律杖八十、枷號一個月等因，奉飭查議，區別罰懲，以嚴稽查。」[66] 清廷明確地規定了自臺灣返回福建的船隻航行期間以及懲處的作法。但是，相對於上述蚶江廳的規定，金大興船團未被處罰的實際經過並不清楚。

---

64 山本進認為在清朝的米禁政策之下，臺灣被納入福建地區經濟圈之內，以廈門為聯結點，由臺灣移出米穀，換取來自江浙的纖維產品，形成 L 型的分業關係。但是由於十九世紀的米禁體制弛緩，L 型的交易關係崩解，臺灣米穀直接進入福建的情形減少，而是直接前往浙江以及天津。參考山本進，〈清代福建商品生產臺灣米流通〉，收於山本進，《清代の市場構造と経済政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頁 134-156。山本進試圖以米禁與分業關係解釋閩臺之間的米穀流通構造，但是他將道光 4 年臺灣運米天津 14 萬石的例子視為是米禁弛緩、分業下的 L 型交易關係崩解的這個看法，忽略了這是一次為了援助天津地方饑荒的特例，並非道光年間的常態。

65 〈配運臺穀條款章程〉，《福建省例》，頁 75-76。

66 〈配運臺穀條款章程〉，《福建省例》，頁 70。

嘉慶年間的閩臺地方官員雖然長期摸索對策，但是「臺運」的情形仍然不見好轉。廈防廳官員曾經針對當時往來閩臺之間商船私渡小口，規避「臺運」的這種現象，作了如下的說明：

> 卑職遵查往臺商船，如係規避配穀，則不無捏報遭風，越收臺屬小口之弊。若既嚴小口越收之禁，又飭內地各正口認真查驗遭風實據，方准收泊，則各船自必由臺地正口配穀，已屬無所規避。……但商船往來貿易，貨本萬金，而所配官穀，少只數十石，多至數百石為止，如果臺屬各口廳員秉公撥配，內地各處照數盤收，嚴杜丁胥勒索擾累之弊，則商船何致多方規避，甘於冒險而罹刑章？是配運臺穀之事，全在各口廳員認真查辦，不可任聽丁胥行保串通賄免，亦不可任聽胥役勒索陋規，則商船無所顧慮，自必源源領運，可無積壓之虞。[67]

將商船規避「臺運」的問題，歸因於胥吏的勒索擾累，一方面可能是官員的推託之詞，但是另一方面，人為刻意躲避載運配穀的種種作法造成胥吏的乘機勒索，這種情形也並非全然不可能。總而言之，嘉慶年間的閩臺官員檢討乾隆末年以來的「臺運」停滯，認為不論是渡臺船舶由商船轉變為漁船、小船，或是商船利用對渡航路規避載運配穀，原因都在於願意配運的民間商船減少而引起。這種現象暴露了「臺運」依賴民間商船、官府缺乏搬運船隻的窘境，因此嘉慶 25 年（1820），臺灣道葉世倬欲罷商人運穀，請製官船，代替商船搬運官穀，但是卻遭到時任臺灣縣知縣的姚瑩所反對。[68] 姚瑩認為：「臺穀歲十萬石，舟以二千為率，法當用五十艘。一艘工料五千為率，當費金二十五萬。既有糧艘，必用弁兵、管駕、並舵工、水手每舟不下數十人，歲費金又數萬。海舟駕駛，三年當一修，費又數萬。重洋風濤不測，一有沉失，則舟穀兩亡。是漕艘之外，又增國家一病也。」[69] 姚瑩認為建造官船顯然一定要先有所支出，造成之後還必須保養船隻、添置人員等等，尤其是官方運穀的渡海風險也將無人可以承擔，因此堅決反對建

---

67 〈配運臺穀條款章程〉，《福建省例》，頁 70-71。

68 施立業，《姚瑩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4），頁 85。

69 姚瑩，〈籌議商運臺穀〉，收於姚瑩，《東槎紀略》，頁 24。

造官船以取代民船。上述嘉慶年間種種解決「臺運」積壓的相關對策，顯然都未能發揮作用。

（五）道光年間的「臺運」積壓

歸納上述的分析，乾隆末期以來逐漸惡化的「臺運」積壓，起因於林爽文事件結束後不久的臺灣南部米價高騰，超過漳泉米價，促使渡臺商船改以漁船、小船，前往南部正口以外的地區從事米穀交易，也因而得以免除回航載運「臺運」配穀的義務，逐漸造成「臺運」的停滯。而嘉慶年間的「臺運」問題，則是漁船渡臺持續增加，以及船隻利用航路、正口以及船舶大小等各種規定躲避出入正口與載運配穀，可以說是人為刻意逃避「臺運」的結果。

進入道光年間，自嘉慶年間以來頻繁發生的漁船或小船渡臺的情形，似乎仍然持續存在。周凱曾經敘述這種情形為：「晉、惠、澄、詔各漁船捏報樑頭四、五尺，其大至與商船販艚等，偷渡臺灣貿易，捏報遭風，避配官穀載貨。由臺南北貿易往來便捷，奪商船之利，致商船盡改為漁，亦船政之大弊也。」[70] 漁船偷渡臺灣，可以躲避正口的「臺運」配穀，成為渡臺船隻的慣用手法。同時「內地晉江之祥芝、永寧、圍頭、古浮、深澳各澳、惠安之獺窟、崇武、臭塗各澳，矇領漁船小照置船船隻，潛赴臺地各私口裝載貨，俱不由正口掛驗，無從稽查，無從配穀，俗謂之偏港船。同一往來貿販營生，乃彼得巧避官穀，獲利倍於他船，無怪正口各船心懷不服。」[71] 不論是漁船或小船，只要避開正口，各由兩岸的小口出入，便可以渡海交易，又同時可以規避「臺運」的配穀。小口交易的模式甚至促使噶瑪蘭廳的烏石港在道光 6 年（1826）由私口轉為正口，根據閩浙總督孫爾準的說明：

> 又查噶瑪（蘭）處全臺之背，但產米穀，一切器用皆取資于外販。……惟西勢之烏石港、東勢之加禮遠港，每于春末夏初、南風司令之時，可通四、五百石小船。內地福州、泉州等處商民，裝載日用貨物前往易來（米）而歸，福泉民食借資接濟，兩有裨益，若加裁禁，則商販不通，

70 周凱，《廈門志》，卷五船政略，頁 174-175。
71 周凱，《廈門志》，卷六臺運略，頁 192。

> 于民間殊多未便，亦應如其所請，開設正口，以利民生。……該處雖無大號商船出入，不能配運兵穀，凡小船往來，俱由該縣丞查驗蓋印放行，仍于船照內登明所載貨物、米糧數目及運回何處售賣，按月造冊通報，俾有查考。……如此變通辦理，既可疏通積穀，又可便民貿易，而層層稽查，仍于嚴禁偷渡之意相符。[72]

烏石港於設為正口之前，原本是小船出入的私口，因此未分配有兵穀的載運。地方官員奏請改設為正口，最主要是希望對往來的小船進行稽查控制，並且藉由多設一處正口，增加船隻載運米穀出口。但是如同前述，「臺運」的配額集中在臺灣南部與中部正口，嘉慶 15 年（1810）之後再分散至北部正口，因此新設的東北部正口對於解決「臺運」的積滯，助益不大。在這之前的道光 5 年（1825），以及之後的道光 10 年（1830），閩臺地方官員再度藉助「專運」，方能運出積壓的配穀。

不過，道光 5 年（1825）實施「專運」時，「專運」的缺陷充分顯露。該年度實施「專運」乃是因為道光 4 年（1824），閩臺商船響應清廷的呼籲，以 70 餘艘船、載米 13 萬餘石前往天津交官並糶賣，「……上年募商運米天津七十餘船，又皆免其配運臺穀，以示體恤……。」[73] 由於清廷免除赴津商船配運官穀，造成了道光 5 年（1825）積壓未運的官穀達到約 14 萬餘石之多，因而官府不得不實施「專運」，清理積穀。閩浙總督趙慎畛對於當時的臺灣米價、「臺運」的滯運狀況以及「專運」的作法，有如下比較詳細的說明：

> 臺灣雖係產米之滙（區），究屬一郡之地，頻年販濟外省，而本省漳泉等府又向需臺米接濟。查上年十一月臺灣上米每倉石價銀二兩四錢至二兩八錢不等，較之常時已屬稍昂，其十二月後市價尚未據報到。此時若將積積（疑誤）欠穀十四萬八千餘石責令一起全運，再加以本年應運額穀八萬六千餘石，為數較多，不特大號商船一時不敷雇備，兼恐于臺郡民食有碍，自應酌量籌辦，以期于民舍（食）兵糧兩有裨益。應請飭令

---

7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2 本，頁 169b。
7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10 本，頁 938b。

廈防、蚶江二廳雇備堅固大號商船四十隻，約計每船可裝穀二千餘石者前赴臺灣，將已報運澳穀八萬七千七百一十二石零先行按數運回內地，分雇小船轉運沿海各廳縣倉交收。其尚未運澳穀六萬四千四百四十三石零，俟來年察看情形，再行籌辦。[74]

顯然趙慎畛對於「專運」的實施相當謹慎，他認為臺灣米價由於米穀長年外移至福建與他省，已經出現騰漲之勢，[75] 再加上「專運」大量搬出米穀，對於臺灣的糧食供應恐怕造成影響。同時，搬運穀 14 萬石所需的船舶為數不少，並不容易，因此決定只將已經運抵港口的「臺運」配穀運出，剩餘的數額則留待日後觀察情形，再做決定。之後，或許可以推測上述的剩餘未運配穀並沒有被運出，積壓的官穀數額仍然龐大，因為僅僅兩年之後的道光 7 年（1827），閩浙總督孫爾準在提及「臺運」仍有積壓時，指出尚未運出的數額甚至要多過於兩年之前：

今截至道光六年止，共積壓未運穀十六萬五千四百六十石零，又未運兵米一萬二百九十一石。本應將徵運稽遲及配船延誤之廳縣，分別嚴參，第念道光三、四兩年採買臺米協濟浙江、天津案內，凡赴臺買米商船概免配穀，上年夏秋以來，臺北匪徒械鬪，所有載兵載餉船隻亦俱免配臺穀，以致欠運漸多，是其遲延尚屬有因。……應請將道光七年預運兵穀兵米，勒令于本年內全數運竣，不得顆粒短少。並將道光六年以前積壓陳穀，分作三年帶運清楚，以後務須年清年欵[款]，不許拖欠。[76]

除了該年尚未運完的兵米之外，孫爾準報告的「臺運」積壓穀數比起之前趙慎畛所上奏的數字又有增加。雖然沒有進一步的資料可以得知孫爾準所提及的 16 萬餘石數字是如何形成，但是這個數字扣去前述道光 5 年（1825）趙慎畛所提到的「尚未運澳穀六萬四千四百四十三石零」，以及道光初年每年「臺運」的

---

7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10 本，頁 938b-939a。

75 除了上述引文中，趙慎畛所言的「較之常時已屬稍昂」之外，道光初期歷任臺灣府知府、道員的方傳穟也指出：「況臺地近年米貴，一聞雇運，民間米價必一時騰踴，匪類藉以滋事。」（姚瑩，〈籌議商運臺穀〉，收於姚瑩，《東槎紀略》，頁 25），說明移出與米價的關係。

76 《軍機處錄副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編號：054871。

移出規定數額 8 萬 5 千石，[77] 仍然有餘。換句話說，道光 7 年（1827）的積壓穀數（165,460 石），包括了道光 5 年（1825）「專運」實施之後的剩餘未運數額（64,443 石），也還高於道光 6 年（1826）的該年「臺運」數額，這等於又有一年份的「臺運」幾乎全數未運，清楚地反映出了「專運」的侷限。

道光初年的「專運」既然無法順利解決「臺運」的積壓，閩臺地方官員不得不摸索其他的解決之道。福建布政使吳榮光於道光 7 年（1827）時，奏請廢止嘉慶 14 年（1809）徐汝瀾所議請大小商船不論樑頭、一律配穀的前例，回復為乾隆年間按商船樑頭大小配穀的作法，減少「臺運」的數額，同時對「臺運」的配穀港口作了一番調整如下：

> 前督撫臣又以額運谷數本多，近來赴臺商船較少，奏蒙諭旨自道光八年起，將每年額運眷谷二萬五千八百餘石改放折色，原期減少額數，以補運積谷。惟額派眷谷一項，彰化獨多，該縣應運之谷，向歸鹿港、八里坌兩口分運，八里坌船少路遠，配谷無多，鹿港船隻較多，自眷谷折價後，每年僅應配谷一萬二千餘石，未免船少谷多。鹿耳門一口坐配臺灣、鳳山、嘉義三縣，谷數本多，所裁眷谷無幾，計每年仍配谷五萬三千餘石，勢有偏重，難以疏通積欠。前據臺灣府廳節次議詳，請將鹿耳門應運嘉義縣谷，自道光十年起，按年撥出一萬石，改歸鹿港口配運，另撥八千石歸新開之五條港配運。[78]

在歷年「臺運」積壓的情況下，地方官員奏請將「臺運」項目之一的眷穀自道光 8 年（1828）起改為折色交收，並且將原本鹿耳門的配穀分散至鹿港與新開的五條港，以疏通鹿耳門的積穀。但是上述的兩個對策似乎也未能發揮作用，道光 16 年（1836）閩浙總督程祖洛報告「臺運」積壓的前例，提及兩年前的鹿港應運兵穀僅僅搬出十分之二，時任鹿港同知兼噶瑪蘭通判的陳盛韶眼見道光 14 年（1834）的配穀旋將接踵而至，只好捐資雇船，派遣家丁押運內渡交倉，方才運出鹿港口積壓存澳的道光 13、14 年份兵穀 1 萬 2 千 6 百餘石，解除了鹿港兵穀配運的積壓。程祖洛認為這是因為陳盛韶專遣家丁運糧，「以杜承收衙門向船戶刁難

[7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10 本，頁 949b。
[7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2 本，頁 189b。

勒索之弊。各船戶既得雇值，又可無虞賠累，因之踴躍爭先，轆轤轉運。」[79] 但是同時期前後的鳳山知縣徐必觀、嘉義知縣熊飛以及彰化知縣李廷璧，卻因為無法全數運出道光 13、14 年的「臺運」配額，而遭到開除頂戴的處分。[80]

（六）米價高騰背景下的「臺運」流通

在歷經嘉慶年間大小商船一律配運、正口自由對渡，以及持續至道光初期的數次「專運」，這一連串「臺運」積壓的對策施行無效之後，福建地方官員進而探究造成「臺運」變化的因素。其中，閩浙總督程祖洛曾經在道光 13 年（1833）較為詳細地分析當時每年的「臺運」無法順利搬出的原因如下：

> 而欠運之故則有二，一因商船日少，二因穀數不足。查商船之所以日少者，其故亦有二。臺灣所產，只有糖米二種。近來粵省產糖充旺，紛紛外販。至臺地北販之糖，獲利較薄。米谷一項，又以生齒日煩，其存積不能如昔日之多。上年內地及浙江省歉收，米貴不得不暫弛海禁。臺米既多外販，致本地價亦增昂。彰（漳）、泉一帶船戶赴臺販米者，常虞虧本而裹足不前。……商船既壞於風波，商力有疲於折乏，赴臺之船自少。何以穀數又有不足？查積年欠運兵穀，除現已撥放撫卹並抵放征兵口糧外，計其欠數，尚不下十萬石。臣詳加訪察，現在征存未運之穀業已無多，而積年民欠未征者甚屬不少。即如彰化縣年額應徵谷三萬三千餘石，自嘉慶二十三年起，逐年民欠者皆有三、四千石不等，以十年計之，即有三、四萬石。一縣如此，他縣可知……。[81]

如同上述，程祖洛在道光 13 年（1833）指出商船日少與穀數不足是「臺運」停滯的兩個因素，他並分析商船減少的原因在於臺灣北販之糖獲利較薄，在此同時，米穀因為多數外販、價格增昂，以致於赴臺商船顧慮虧本、不願前來。至於穀數不足的因素，除了由於臺灣人口增多、無法如以往存積米穀之外，各縣拖欠未納的徵穀逐漸累積，導致「臺運」無法順利運出。值得注意的是，道光 16 年

---

79 《軍機處錄副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編號：069859。

80 《軍機處錄副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編號：069854。

8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2 本，頁 189b-190a。

（1836），程祖洛雖然也同樣以渡臺商船的減少來解釋「臺運」的積壓，但是從下列的敘述中，可以發現他認為不論是商船日少或者穀數不足，還包括了地方吏員的推託之詞，他指出：

> 再，臺灣各縣應運內地兵米、兵谷，在乾隆年間已不意積壓，迨嘉慶初年以後，經征之縣府既藉口民欠，經配之廳員又諉諸渡臺船少，而內地口員則以商船不願渡臺，未便強之使往，彼此互相推委，因之章程屢更，遂至法愈密而弊愈滋，短欠歲以萬計。節經各前任督臣奏明專雇商船前往載運，非特苦累船戶，而運舊欠新，積壓如故，以年額計之，新舊牽算，所欠總在兩年以上……。[82]

程祖洛很明確地認識到「專運」運舊欠新，總是無法全數運清並且解決「臺運」的積壓。他認為這是嘉慶年間以來，負責徵收正供的臺灣府各縣以民欠為藉口、拖延交穀，以及負責運出作業的臺灣與福建地方官員以渡臺商船減少、商船不願渡臺的藉口所造成的。在種種對策苦無成效的情形之下，省級地方官員將問題歸因於下級地方吏員的推託，這樣的作法當然不無可能。但是，程祖洛在這之前所舉出的商船與穀數這兩個因素，是否也有其客觀存在的可能？從道光年間其他臺灣地方官員的言論中，可以發現自道光初年以來，許多官員們也都曾注意到當時渡臺商船數目減少的這一變化。道光 8 年（1828），閩浙總督孫爾準曾經分析「臺運」配穀與商船日漸減少之間的關係，他指出：

> 從前臺地米穀糖貨價值較賤，商民貿易舡隻來去絡繹，是以配運不致遲悞。近年以來，生齒日繁，食物漸貴，商販獲利無多，舡隻較前漸少，兵穀不能如數配運，以致頻年積壓。[83]

孫爾準將配運的長年積壓歸因於來臺船隻較前減少，而船隻減少的最主要原因是，伴隨著臺灣人口增加所出現的米穀價格逐漸上漲，來臺商船無法獲利因而逐漸減少。孫爾準指出了臺灣米穀價格上漲、商船獲利不多而減少來臺，以及「臺

---

82 《軍機處錄副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編號：069859。

8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10 本，頁 949b。

運」配穀因而積壓的這一連串反應，提示了「臺運」流通結構崩解的過程。這樣的看法，與上述道光 13 年（1833）程祖洛的想法也是一致的。而同樣認為商船減少的地方官員，還有道光 13 年（1833），曾經自行出資雇用船隻、運載官穀至閩的鹿港同知陳盛韶，他也曾質疑當時渡臺商船減少的原因如下：

> 然則鹿港商船數百，今止五十餘號奈何？曰：富商日少，船壞難復，去其一。販運失利，配運避累，去其一耳。[84]

陳盛韶認為前來鹿港的商船減少，一是因為富商財力減退，二則因為販運獲利不多，因此商船為了減少賠累而躲避配運，渡臺前來者更少。陳盛韶接著解釋商船販運獲利不多的原因在於「鹿港稻米所出，道光五年前，鹿港米貴不過二千餘錢，六年後，年穀不登，蓋藏空虛，動貴至三、四、五千一石。」[85] 米糧價格的騰漲使得鹿港的米穀交易利潤降低，這也是陳盛韶認為前來鹿港商船減少的最主要原因。

從上述三位地方官員的認識與言說看來，臺灣物價與米穀價格的上漲，導致商船獲利不豐、減少來臺，連帶使得「臺運」官穀移出停滯，這一過程可以說代表了道光中期閩臺地方官員檢討當時「臺運」停滯原因的普遍認識。具體而言，嘉慶、道光年間的民間商船前往正口以外的地方從事米穀交易，長期的搬出導致臺灣米價上漲，使得商船以改換漁船、小船等方式渡臺，並且規避前往正口，「臺運」的運作因而逐漸失調。這樣的民間移出私口米穀、米價上漲與正口的「臺運」移出減少之間的循環關係，可以視為是十九世紀前半葉臺灣米穀移出的大致圖象。

將道光中期閩臺地方官員的普遍認識與本文前述「糧價清單」中的米價變動相互對照看來，兩者大致是符合的。道光初期的米價平均值大約在 2 兩上下移動，[86] 但是由附錄一可知，自道光 12 年（1832）起，代表最低價格平均值的北部米價在每石銀 2 兩以上。道光 13 年（1833）之後，代表最高價格平均值的南部米價更攀升至每石銀 3 兩以上。接下來的這幾年，南北兩地米價的上昇趨勢非

---

84 陳盛韶，《問俗錄》，卷六鹿港廳，頁 62。

85 陳盛韶，《問俗錄》，卷六鹿港廳，頁 62。

86 〈戍兵眷米請改給折色等由〉中記有：「遡自道光元年以來，臺屬米價有二兩以上者，亦有二兩以下者。」《軍機處錄副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編號：060033。

常明顯，直到道光 17 年（1837），米價都還保持在較高的水準。再就其他文字敘述的米價資料來看，「道光五年以前，米價每石不過二千餘，六年以後，臺灣欠收，各省水旱頻仍，海船販運日多，動輒貴至三四千、五六千。」[87] 說明了道光初期的民間米穀交易搬出甚多，導致臺灣的米價上漲。

民間搬出為數眾多的米穀，使得道光初期以來的臺灣米價高騰，牴觸了本文前述的臺閩米穀供需與米價賤貴的原則。比起林爽文事件結束之後大約兩年之間，臺灣南部米價高於漳泉米價的短暫表現，道光中期的臺灣米價高於漳泉的這種現象持續得更久。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不論最高或者最低價格的平均值，兩者都同時出現了高於漳泉同類米價平均值的情形。從本文附錄二、附錄三的數字看來，代表南部的最高價格平均值在自道光 15 年（1835）至 25 年（1845）間，其中上米價格平均值，除了道光 21 年（1841）之外，在其餘的 9 年之中，都要高於漳泉兩府的上米價格平均值。同時，南部的中米價格平均值，除了道光 21 年（1841）、22 年（1942）之外，同樣也為福建中米價格平均值的最高者。就代表北部的最低價格平均值來說，上米與中米價格平均值在道光 6 年（1826）、7 年（1827）、14 年（1834）、15 年（1835）、17 年（1837）都分別高過於漳泉的同類米價平均值，而北部的下米價格平均值則是自道光 10 年（1830）到 17 年（1837）之間，連續 7 年都高於漳泉的下米最低價格平均值。甚至連臺灣米價的最低價格平均值也曾在道光 14 年（1834）、15 年（1835）超過了漳州府的最高價格平均值，拉近了與泉州府最高價格平均值之間的差價。

如果採取王業鍵平均中米的最低與最高價格的計算方式，如同文末附錄五所顯示，道光初期的漳州府中米價格雖然一直為四府之冠，但是臺灣中米價格的平均值在道光 4 年（1824）至 7 年（1827）、11 年（1831）與 12 年（1832）都超過泉州的中米價格，進一步於道光 13 年（1833）至 18 年（1838）的 5 年間，以及 23 年（1843）至 25 年（1845）的 3 年間，都持續成為四府的中米價格最高者。臺灣米價趨勢的這類表現，顯然異於前述王業鍵所指出的十八世紀中葉臺灣與漳

---

87 引文見陳盛韶，《問俗錄》，卷六鹿港廳，頁 70。道光初年的高昂米價，在道光 17 年 4 月似乎仍然居高不下，該年由於前一年秋收欠豐，中米價格仍然在每石制錢 4 千 2 百文的高價。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10 本，頁 979b。根據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價〉中的米價表，當時的制錢 4 千 2 百文可換算為銀 3 兩 2、3 錢。參考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價〉，頁 89。

泉米價的關係，也意味著 1830 年代中期，就米穀移出的價格利潤而言，臺灣米穀交易的獲利空間都已經不如十八世紀。

與十八世紀末臺灣南部米價較高、北部仍低的情況相比，道光中期的臺灣南北米價出現了同時騰貴的情形。歸納上述地方官員的認識以及文字敘述看來，引起臺灣南北米價皆高的原因之一，在於道光初期臺灣民間私口交易的米穀搬出甚多，導致南北米價同時上漲，同時商船也持續著嘉慶年間以來躲避配運官穀的作法，避免由正口出入，地方官員所觀察到的進入正口的商船數量減少，顯示依賴商船、自正口載運的「臺運」流通結構正逐漸崩解。

道光 20 年（1840）起的鴉片戰爭，對於「臺運」顯然又是一次打擊。翌年（1841）8 月，英國船艦數次接近臺灣北部與中部的港口，試圖登陸未果，但是卻影響了「臺運」的施行。道光 24 年（1844），閩浙總督劉鴻翱在奏請延續鴉片戰爭以來的兵穀半數折色時，說明了鴉片戰爭開始之後，「臺運」削減配額而實施的情形如下：

> 竊照臺灣府屬遞年應運澎湖及內地各府廳縣倉兵米兵穀，向藉商船赴臺貿易，搭配運至內地。前因夷氛未靖，來往商船稀少，撥配不敷。經臣劉鴻翱會同前督臣怡良恭摺，奏請將臺運米穀，除澎湖、南澳二廳仍舊全運本色外，其餘內地各倉，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一律改為一半折色，仿照眷米折色成案，每穀一石折銀一兩，每米一石折銀二兩，由司籌欵[款]給發，在于次年應發臺餉銀內劃扣歸欵[款]，責令臺灣各縣于額征借粟內劃出，變價歸補臺餉。一俟夷匪平定，照舊章全運本色支給。……現今洋面肅清，本應復照舊章全運本色，無如邇來商船仍屬無多，兼之本年三月間海面颶風大作，泉廈商船在臺港擊碎三十餘隻，商情益形困累。……至各營兵糧自二十一年改議半本半折以來，均以按期領價，隨時買食，各營稱便。且各兵于內地各府地方零星買食，于民食亦毫無妨礙，應請將臺運內地各府地方廳縣兵米兵穀，仍照二十一年奏案，改為折色一半，給兵買食，劃抵臺餉歸欵[款]。俟三四年後察看情形，能否照舊全運，再行奏請辦理。[88]

[8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 10 本，頁 990b-991a。

劉鴻翱的這個奏請提及了鴉片戰爭期間，由於往來臺灣海峽的商船減少，因此只好將「臺運」項目中兵穀的一半折色交運。這一部分的兵穀原本預訂在鴉片戰爭結束後恢復全運本色，但是卻因為商船仍然稀少，直至道光 24 年（1844），兵穀的一半仍然以折色移出。這可以推測是因為鴉片戰爭結束之後的道光 23 年（1843）至 25 年（1845）之間，「臺運」配穀較多的南部地區各類米價都要高於漳泉米價（參考附錄二），前往南部正口的民間商船仍然不多，兵穀自然無法恢復全運本色。加上鴉片戰爭之後開放洋米進口，臺米市場為低廉的洋米所奪，即使臺灣米價下滑，來臺商船仍然不多。[89] 到了同治 6 年（1867），「更有應解內地各營一半米折，一半本色，歷年俱未解齊。嗣自同治六年起，由糧道會司議改全折。」[90] 臺灣應運福建各營的兵穀俱改為折色，可以說是「臺運」的告終。

五、結論

本文試圖找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前半之間，導致「臺運」逐漸衰退的結構性因素，透過臺灣與漳泉米價差距的檢討，以及臺灣島內米價所存在的地區性差異，發現十八世紀中葉臺灣米穀移出的價格低廉這一背景，在 1830 年代中期出現了供需地與價格賤貴背離的現象。米價因素與「臺運」運作的商船、正口航路等種種條件相互作用，導致了「臺運」逐漸發生變化。

十八世紀臺灣的米穀價格低廉，福建民間商船利用臺灣與漳泉米穀之間的價格差，在臺灣購買米穀運至漳泉，賺取其中的差價利潤；另一方面，官方利用商

89 關於洋米進入福建對於臺灣的影響，道光 28 年至咸豐 4 年間擔任臺灣道的徐宗幹曾經敘述如下:「履其地而後，知十年前不如二十年前也，五年前之不如十年前也，……其故安在？兩言以蔽之曰:銀日少、穀日多。……穀何以日多？洋米愈賤也。……臺地無源可開，但通其流而源自裕。米穀不流通，日積日多。望豐年乎？賤更甚矣；抑待歉年乎？賤如故也；蓋由內地食洋米而不食臺米也。不食臺米，則臺米無去處，而無內渡之米船；無內渡之米船，即無外來之貨船。往年春夏外來洋元數十萬，今則來者寥寥，已數月無廈口商船矣」（徐宗幹，〈請籌議備貯書〉，收於丁曰健，《治臺必告錄》〔文叢第 17 種，1959；1867 年原刊〕，頁 282-283）。上述徐宗幹的記述，透露了洋米價錢更低於臺米，因而奪佔了臺米在福建的市場，以致於由廈門前來臺灣的商船寥寥無幾。另一方面，當時的臺灣雖然因為米穀外移減少而米價下跌，但洋米以低廉價格大量輸入福建的結果，可能因為洋米輸入眾多，使得以廈門為門戶的泉州府米價仍然有低於臺灣的可能。

90 〈整頓臺灣餉項〉，《福建省例》，兵餉例，頁 557。

船的回程，分派「臺運」的配穀移出。換句話說，民間商人利用臺灣與漳泉之間存在的米價差距，在官方政策允許下從事米穀交易，同時官方也依賴民間商船配載官穀，達到遂行公務的目的。「臺運」的流通結構，一方面有賴於民間交易的成立，同時也受限於官方所制訂的種種渡航政策。

十八世紀末，林爽文事件動搖了「臺運」流通的基本結構。事件結束之後的乾隆 53、54 年（1788、1789）之間，臺灣南部出現了高於漳泉的米價，阻礙了它與漳泉的米穀交易流通；另一方面，當時北部由於米價較南部低，逐漸成為米穀交易的重心地區。受限於對渡港口與航路的商船，自廈門出口前往鹿耳門一口幾乎不可能獲利，因此在這短短兩年之間，商人利用漁船（包括私自領取漁船船照的商船）、小船前往南部以外的地區，使得米穀交易的重心轉移至臺灣中、北部。雖然乾隆 55 年（1790）之後、以及嘉慶年間的臺灣南部米價下跌，但是利用非商船的名義前往臺灣中、北部從事米穀交易，可以省卻回程的「臺運」配穀，使得以漁船、小船前往南部正口以外的渡航方式逐漸增多。民間商船規避配穀所造成的「臺運」停滯，在嘉慶中期明顯暴露，福建與臺灣的地方官員以對渡港口與航路的自由化、調整船隻配穀數量以及「專運」等等措施，試圖扭轉情勢，但是似乎不見成效。在民間頻繁自私口移出米穀的情況下，尤其在 1830 年代中期，臺灣的南北米價同時高昂，與漳泉的同類米價並沒有太大的價格差異，意味著臺灣的米穀交易逐漸失去價格差的利潤優勢。在獲利減少的情況下，同時為了躲避「臺運」的負擔，前往正口的民間商船減少，導致了依賴民間商船由正口配運的「臺運」這一流通結構逐漸鬆動崩解。

林爽文事件結束之後，臺灣南部米穀的高價位所引起的商船規避渡航規定，可以說是偶然造成的，但是此後直至嘉慶年間的商船規避「臺運」，卻是人為的選擇結果。而道光年間的「臺運」移出停滯，則又是因為臺灣與漳泉米價相近所造成的結果。因此，在不同時期同樣出現的「臺運」積壓問題，可說是在不同的背景與因素下作用的結果。

附錄一、乾隆 48 年至道光 30 年臺灣府米價平均值

年代	最低價格平均值			最高價格平均值		
	低價上米	低價中米	低價下米	高價上米	高價中米	高價下米
乾隆 48 年	1.61	1.51	1.41	2.10	2.02	1.92
乾隆 49 年	1.62	1.52	1.42	1.99	1.93	1.84
乾隆 50 年	1.52	1.42	1.32	1.80	1.75	1.70
乾隆 51 年	1.48	1.38	1.28	1.77	1.72	1.67
乾隆 53 年	2.38	2.06	1.74	3.48	3.09	2.26
乾隆 54 年	1.95	1.67	1.37	3.15	2.62	2.15
乾隆 55 年	1.76	1.52	1.23	2.39	2.21	1.86
乾隆 56 年	1.75	1.51	1.23	1.79	1.70	1.60
乾隆 57 年	1.67	1.44	1.19	1.78	1.69	1.59
乾隆 58 年	1.67	1.44	1.19	1.86	1.77	1.67
乾隆 59 年	1.69	1.57	1.41	1.86	1.77	1.67
乾隆 60 年	1.68	1.58	1.43	2.04	1.96	1.86
嘉慶元年	1.83	1.78	1.67	2.02	1.91	1.83
嘉慶 2 年	1.77	1.71	1.63	2.06	1.92	1.84
嘉慶 3 年	1.81	1.72	1.64	2.20	2.05	1.95
嘉慶 4 年	1.84	1.77	1.70	2.09	1.97	1.90
嘉慶 5 年	1.84	1.76	1.68	2.09	1.96	1.89
嘉慶 6 年	1.72	1.64	1.58	1.97	1.84	1.78
嘉慶 7 年	1.63	1.55	1.49	1.88	1.75	1.69
嘉慶 8 年	1.65	1.57	1.51	1.90	1.77	1.72
嘉慶 9 年	1.74	1.66	1.60	1.99	1.86	1.80
嘉慶 10 年	1.77	1.69	1.63	2.02	1.89	1.83
嘉慶 13 年	2.37	2.27	2.21	2.66	2.56	2.46
嘉慶 14 年	2.05	1.95	1.85	2.99	2.89	2.79
嘉慶 15 年	2.22	2.12	2.02	2.79	2.69	2.59
嘉慶 16 年	2.35	2.25	2.15	2.95	2.85	2.73
嘉慶 17 年	2.04	1.94	1.84	2.71	2.61	2.51
嘉慶 18 年	1.72	1.62	1.52	2.35	2.25	2.15
嘉慶 19 年	2.01	1.91	1.81	2.47	2.37	2.27
嘉慶 20 年	2.40	2.30	2.20	2.95	2.85	2.75
嘉慶 21 年	2.53	2.43	2.28	3.30	3.20	2.83
嘉慶 22 年	2.03	1.90	1.79	2.71	2.61	2.36
嘉慶 23 年	1.71	1.61	1.51	2.16	2.06	1.86
嘉慶 24 年	1.37	1.27	1.17	1.98	1.82	1.64

嘉慶 25 年	1.49	1.39	1.29	2.23	2.03	1.84
道光 6 年	2.45	2.35	2.25	3.15	2.94	2.74
道光 7 年	2.40	2.30	2.21	2.81	2.60	2.44
道光 8 年	1.66	1.56	1.47	2.29	2.11	1.92
道光 9 年	1.82	1.72	1.62	2.19	2.02	1.85
道光 10 年	2.08	1.98	1.87	2.45	2.28	2.11
道光 11 年	2.13	2.03	1.93	2.45	2.34	2.23
道光 12 年	2.30	2.19	2.07	2.69	2.57	2.46
道光 13 年	2.70	2.60	2.50	3.26	3.16	3.06
道光 14 年	2.92	2.82	2.75	3.46	3.36	3.26
道光 15 年	2.79	2.69	2.59	3.25	3.15	3.05
道光 16 年	2.73	2.58	2.48	3.51	3.42	3.24
道光 17 年	2.63	2.50	2.39	3.41	3.31	2.52
道光 18 年	1.92	1.81	1.70	2.70	2.60	1.97
道光 19 年	1.68	1.59	1.54	2.53	2.34	2.18
道光 20 年	1.75	1.67	1.66	2.58	2.38	2.18
道光 21 年	1.68	1.58	1.57	2.32	2.13	1.94
道光 22 年	1.73	1.63	1.62	2.26	2.11	1.96
道光 23 年	1.94	1.83	1.68	2.36	2.21	2.08
道光 24 年	2.20	2.08	1.96	2.90	2.76	2.63
道光 25 年	2.08	1.89	1.69	2.90	2.76	2.63
道光 26 年	1.73	1.53	1.33	2.18	2.05	1.94
道光 27 年	1.83	1.69	1.55	2.50	2.37	2.21
道光 28 年	1.57	1.42	1.27	2.28	2.11	2.00
道光 29 年	1.56	1.43	1.24	1.91	1.68	1.52
道光 30 年	1.55	1.45	1.30	1.87	1.76	1.55

說明：(1) 各年的米價數字月份（包括閏月）未超過 6 個月份的，有乾隆 49、56 年，以及嘉慶 10、20 年。
(2) 該年份的各個月份（包括閏月）米價數字完整無缺的，有嘉慶 4-9、14-18、24-25 年，以及道光 9-27、30 年。

資料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月摺包〉所收之「糧價清單」；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糧價單・福建〉，第 6 卷，縮微膠捲。

附錄二、福建四府米價之最高價格平均值（乾隆 48 年至道光 30 年）

年代	福州府			泉州府			漳州府			臺灣府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乾隆 48 年	2.16	2.00	1.87	2.16	2.06	1.96	2.18	2.05	1.98	2.10	2.02	1.92
乾隆 49 年	2.34	2.18	1.99	2.35	2.25	2.16	2.18	2.06	1.98	1.99	1.93	1.84
乾隆 50 年	2.37	2.18	1.98	2.26	2.17	2.04	2.05	1.95	1.85	1.80	1.75	1.70
乾隆 51 年	2.15	1.99	1.82	2.11	2.01	1.91	2.00	1.90	1.80	1.77	1.72	1.67
乾隆 52 年	2.15	1.99	1.87	2.60	2.50	2.39	3.05	2.95	2.85	/	/	/
乾隆 53 年	2.32	2.22	2.11	2.90	2.78	2.65	2.98	2.95	2.71	3.48	3.09	2.26
乾隆 54 年	2.32	2.22	2.10	2.83	2.67	2.47	2.85	2.75	2.50	3.15	2.62	2.15
乾隆 55 年	2.18	2.07	1.96	2.44	2.29	2.21	2.52	2.42	2.32	2.39	2.21	1.86
乾隆 56 年	1.87	1.75	1.67	2.28	2.08	2.05	2.37	2.27	2.12	1.79	1.70	1.60
乾隆 57 年	2.01	1.94	1.84	2.21	2.02	1.99	2.31	2.21	2.02	1.78	1.69	1.59
乾隆 58 年	2.09	2.00	1.91	2.14	2.07	1.96	2.26	2.16	1.97	1.86	1.77	1.67
乾隆 59 年	1.99	1.90	1.80	2.28	2.20	2.07	2.50	2.39	2.26	1.86	1.77	1.67
乾隆 60 年	2.39	2.18	1.97	2.92	2.81	2.66	3.18	3.06	2.91	2.04	1.96	1.86
嘉慶元年	2.39	2.17	1.95	2.97	2.90	2.82	3.06	2.95	2.84	2.02	1.91	1.83
嘉慶 2 年	2.32	2.12	1.93	2.64	2.62	2.60	2.65	2.59	2.56	2.06	1.92	1.84
嘉慶 3 年	2.27	2.22	1.92	2.55	2.53	2.52	2.53	2.52	2.50	2.20	2.05	1.95
嘉慶 4 年	2.22	2.06	1.90	2.42	2.41	2.40	2.41	2.40	2.39	2.09	1.97	1.90
嘉慶 5 年	2.17	2.01	1.85	2.42	2.41	2.40	2.37	2.36	2.35	2.09	1.96	1.89
嘉慶 6 年	2.16	2.00	1.84	2.46	2.45	2.44	2.34	2.33	2.32	1.97	1.84	1.78
嘉慶 7 年	2.06	1.90	1.74	2.33	2.32	2.31	2.25	2.24	2.23	1.88	1.75	1.69
嘉慶 8 年	2.06	1.90	1.74	2.31	2.30	2.29	2.22	2.20	2.20	1.90	1.77	1.72
嘉慶 9 年	2.10	1.94	1.78	2.39	2.38	2.37	2.28	2.27	2.26	1.99	1.86	1.80
嘉慶 10 年	2.14	1.98	1.82	2.40	2.39	2.38	2.35	2.34	2.33	2.02	1.89	1.83
嘉慶 13 年	2.80	2.64	2.50	3.45	3.28	3.17	3.57	3.52	3.47	2.66	2.56	2.46
嘉慶 14 年	3.04	2.88	2.54	3.35	3.19	3.08	3.63	3.60	3.56	2.99	2.89	2.79
嘉慶 15 年	3.25	3.08	2.96	3.25	3.12	3.00	3.64	3.58	3.53	2.79	2.69	2.59
嘉慶 16 年	3.16	2.98	2.82	3.19	3.08	2.90	3.65	3.59	3.54	2.95	2.85	2.73
嘉慶 17 年	3.24	3.05	2.91	3.12	3.01	2.75	3.44	3.40	3.36	2.71	2.61	2.51
嘉慶 18 年	3.00	2.83	2.65	2.95	2.83	2.61	3.35	3.29	3.23	2.35	2.25	2.15
嘉慶 19 年	2.90	2.72	2.55	3.03	2.88	2.65	3.30	3.20	3.10	2.47	2.37	2.27
嘉慶 20 年	2.72	2.54	2.39	2.76	2.62	2.38	2.92	2.82	2.72	2.95	2.85	2.75
嘉慶 21 年	2.75	2.59	2.43	3.11	2.91	2.63	2.91	2.80	2.70	3.30	3.20	2.83
嘉慶 22 年	2.57	2.44	2.32	2.81	2.60	2.30	2.68	2.58	2.48	2.71	2.61	2.36
嘉慶 23 年	2.40	2.30	2.20	2.20	2.04	1.74	2.58	2.48	2.38	2.16	2.06	1.86
嘉慶 24 年	2.40	2.30	2.20	2.11	1.99	1.81	2.54	2.44	2.34	1.98	1.82	1.64

嘉慶 25 年	2.74	2.60	2.45	2.74	2.49	2.32	2.62	2.52	2.42	2.23	2.03	1.84
道光 6 年	2.94	2.78	2.62	2.50	2.30	2.10	3.20	3.10	3.00	3.15	2.94	2.74
道光 7 年	2.64	2.50	2.38	2.33	2.13	1.93	3.11	3.01	2.91	2.81	2.60	2.44
道光 8 年	2.43	2.28	2.14	2.17	2.00	1.84	2.96	2.86	2.76	2.29	2.11	1.92
道光 9 年	2.61	2.46	2.33	2.53	2.28	2.07	2.81	2.71	2.61	2.19	2.02	1.85
道光 10 年	2.64	2.53	2.42	2.48	2.22	2.03	2.76	2.66	2.56	2.45	2.28	2.11
道光 11 年	2.78	2.65	2.54	2.39	2.15	1.98	2.78	2.68	2.58	2.45	2.34	2.23
道光 12 年	3.22	3.08	2.92	2.69	2.50	2.28	3.36	3.26	3.16	2.69	2.57	2.46
道光 13 年	3.26	3.14	3.05	3.10	2.75	2.62	2.96	2.84	2.72	3.26	3.16	3.06
道光 14 年	3.56	3.46	3.22	3.28	2.95	2.74	2.62	2.49	2.40	3.46	3.36	3.26
道光 15 年	3.16	3.02	2.89	3.03	2.77	2.58	2.77	2.69	2.58	3.25	3.15	3.05
道光 16 年	3.15	3.03	2.93	3.11	2.83	2.70	2.76	2.66	2.56	3.51	3.42	3.24
道光 17 年	2.92	2.81	2.71	2.89	2.71	2.63	2.60	2.52	2.41	3.41	3.31	2.52
道光 18 年	2.64	2.53	2.43	2.56	2.46	2.42	2.13	2.06	1.96	2.70	2.60	1.97
道光 19 年	2.40	2.29	2.19	2.47	2.34	2.31	2.27	2.14	2.02	2.53	2.34	2.18
道光 20 年	2.34	2.23	2.13	2.43	2.22	2.09	2.43	2.36	2.28	2.58	2.38	2.18
道光 21 年	2.21	2.11	2.00	2.25	2.08	2.03	2.34	2.28	2.22	2.32	2.13	1.94
道光 22 年	2.17	2.07	1.97	2.13	1.98	1.91	2.22	2.17	2.08	2.26	2.11	1.96
道光 23 年	2.15	2.05	1.95	2.23	2.10	1.99	2.21	2.15	2.05	2.36	2.21	2.08
道光 24 年	2.42	2.32	2.22	2.48	2.34	2.28	2.52	2.44	2.34	2.90	2.76	2.63
道光 25 年	2.40	2.31	2.21	2.45	2.31	2.20	2.49	2.41	2.31	2.90	2.76	2.63
道光 26 年	2.42	2.32	2.22	2.39	2.24	2.09	2.45	2.37	2.27	2.18	2.05	1.94
道光 27 年	2.45	2.35	2.25	2.45	2.26	2.13	2.33	2.26	2.18	2.50	2.37	2.21
道光 28 年	2.34	2.24	2.14	2.17	2.06	1.99	2.08	2.04	1.97	2.28	2.11	2.00
道光 29 年	2.20	2.10	2.00	2.08	2.00	1.96	1.98	1.89	1.80	1.91	1.68	1.52
道光 30 年	2.14	2.03	1.93	2.20	2.12	2.07	1.96	1.86	1.76	1.87	1.76	1.55

說明：(1) 各年的米價數字月份（包括閏月）未超過 6 個月份的，有乾隆 49、56 年，以及嘉慶 10、20 年。
(2) 該年份的各個月份（包括閏月）米價數字完整無缺的，有嘉慶 4-9、14-18、24-25 年，以及道光 9-27、30 年。

資料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月摺包〉所收之「糧價清單」；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糧價單・福建〉，第 6 卷，縮微膠捲。

附錄三、福建四府米價之最低價格平均值（乾隆 48 年至道光 30 年）

年代	福州府			泉州府			漳州府			臺灣府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乾隆 48 年	1.77	1.67	1.58	2.08	2.01	1.91	1.86	1.79	1.71	1.61	1.51	1.41
乾隆 49 年	1.79	1.69	1.59	2.27	2.17	2.05	1.86	1.81	1.74	1.62	1.52	1.42
乾隆 50 年	1.73	1.64	1.54	2.12	2.02	1.91	1.80	1.72	1.64	1.52	1.42	1.32
乾隆 51 年	1.55	1.45	1.35	2.05	1.95	1.85	1.72	1.62	1.53	1.48	1.38	1.28
乾隆 52 年	1.49	1.39	1.29	2.53	2.43	2.33	2.83	2.73	2.64	/	/	/
乾隆 53 年	1.51	1.43	1.35	2.74	2.62	2.51	2.64	2.54	2.09	2.38	2.06	1.74
乾隆 54 年	1.43	1.38	1.26	2.39	2.26	2.16	2.40	2.30	1.51	1.95	1.67	1.37
乾隆 55 年	1.29	1.27	1.10	2.18	2.08	1.98	2.11	2.01	1.42	1.75	1.51	1.23
乾隆 56 年	1.50	1.39	1.29	2.10	1.99	1.90	1.82	1.72	1.50	1.67	1.44	1.19
乾隆 57 年	1.77	1.68	1.60	2.04	1.93	1.84	1.81	1.70	1.58	1.67	1.44	1.19
乾隆 58 年	1.82	1.76	1.67	1.99	1.88	1.77	1.90	1.78	1.69	1.69	1.57	1.41
乾隆 59 年	1.75	1.70	1.60	2.06	1.96	1.87	2.19	2.13	2.06	1.68	1.58	1.43
乾隆 60 年	1.75	1.55	1.41	2.50	2.31	2.09	2.74	2.54	2.35	1.83	1.78	1.67
嘉慶元年	1.59	1.37	1.25	2.47	2.30	2.12	2.56	2.35	2.14	1.77	1.71	1.63
嘉慶 2 年	1.52	1.32	1.23	2.14	2.02	1.90	2.15	1.99	1.86	1.81	1.72	1.64
嘉慶 3 年	1.47	1.29	1.22	2.05	1.95	1.83	2.03	1.92	1.80	1.95	1.85	1.75
嘉慶 4 年	1.42	1.26	1.20	1.92	1.82	1.71	1.91	1.80	1.69	1.84	1.77	1.70
嘉慶 5 年	1.37	1.21	1.15	1.92	1.82	1.71	1.87	1.76	1.65	1.84	1.76	1.68
嘉慶 6 年	1.36	1.20	1.14	1.96	1.86	1.75	1.84	1.73	1.62	1.72	1.64	1.58
嘉慶 7 年	1.26	1.10	1.04	1.83	1.73	1.62	1.75	1.64	1.53	1.63	1.55	1.49
嘉慶 8 年	1.26	1.10	1.04	1.81	1.71	1.60	1.72	1.61	1.50	1.65	1.57	1.51
嘉慶 9 年	1.30	1.14	1.08	1.89	1.79	1.68	1.78	1.67	1.56	1.74	1.66	1.60
嘉慶 10 年	1.34	1.18	1.12	1.90	1.80	1.69	1.85	1.74	1.63	1.77	1.69	1.63
嘉慶 13 年	1.63	1.53	1.43	3.18	3.06	2.83	2.10	2.06	2.03	2.37	2.27	2.21
嘉慶 14 年	1.61	1.50	1.40	3.15	3.05	2.87	2.15	2.11	2.08	2.05	1.95	1.85
嘉慶 15 年	1.69	1.59	1.49	3.12	3.02	2.83	2.22	2.16	2.13	2.22	2.12	2.02
嘉慶 16 年	1.60	1.50	1.37	3.04	2.93	2.72	2.30	2.23	2.19	2.35	2.25	2.15
嘉慶 17 年	1.68	1.58	1.48	2.89	2.77	2.59	2.33	2.27	2.24	2.04	1.94	1.84
嘉慶 18 年	1.60	1.50	1.40	2.68	2.56	2.38	2.30	2.24	2.21	1.72	1.62	1.52
嘉慶 19 年	1.59	1.49	1.39	2.60	2.46	2.34	2.34	2.27	2.22	2.01	1.91	1.81
嘉慶 20 年	1.58	1.48	1.38	2.63	2.51	2.30	2.59	2.46	2.36	2.40	2.30	2.20
嘉慶 21 年	1.75	1.65	1.55	2.58	2.46	2.30	2.55	2.45	2.34	2.53	2.43	2.28
嘉慶 22 年	1.58	1.48	1.38	2.35	2.20	2.05	2.30	2.20	2.10	2.03	1.90	1.79
嘉慶 23 年	1.43	1.33	1.23	1.86	1.75	1.47	2.11	2.00	1.90	1.71	1.61	1.51

嘉慶 24 年	1.38	1.28	1.18	1.90	1.79	1.61	2.01	1.90	1.80	1.37	1.27	1.17
嘉慶 25 年	1.41	1.31	1.21	2.47	2.32	2.20	2.16	2.07	1.97	1.49	1.39	1.29
道光 6 年	1.91	1.81	1.73	2.23	2.03	1.84	2.36	2.26	2.10	2.45	2.35	2.25
道光 7 年	1.91	1.81	1.72	2.10	1.92	1.72	2.27	2.14	1.98	2.40	2.30	2.21
道光 8 年	1.88	1.78	1.66	2.00	1.83	1.64	2.17	2.00	1.84	1.66	1.56	1.47
道光 9 年	1.83	1.75	1.66	2.34	2.15	1.92	1.96	1.86	1.76	1.82	1.72	1.62
道光 10 年	1.86	1.79	1.73	2.24	2.09	1.87	2.04	1.94	1.82	2.08	1.98	1.87
道光 11 年	1.94	1.84	1.76	2.13	2.00	1.81	2.14	1.91	1.73	2.13	2.03	1.93
道光 12 年	1.91	1.81	1.73	2.48	2.23	1.94	2.28	2.06	1.88	2.30	2.19	2.07
道光 13 年	1.98	1.88	1.80	2.75	2.41	2.07	2.31	2.15	1.98	2.70	2.60	2.50
道光 14 年	2.16	2.07	2.00	2.76	2.54	2.32	2.08	2.06	1.84	2.92	2.82	2.75
道光 15 年	2.13	2.03	1.94	2.75	2.58	2.39	2.07	2.05	1.83	2.79	2.69	2.59
道光 16 年	2.05	1.95	1.85	2.85	2.64	2.42	2.26	2.25	2.03	2.73	2.58	2.48
道光 17 年	1.90	1.80	1.70	2.61	2.43	2.23	2.09	2.06	1.85	2.63	2.50	2.39
道光 18 年	1.62	1.52	1.42	2.12	2.08	1.99	1.83	1.73	1.59	1.92	1.81	1.70
道光 19 年	1.40	1.30	1.20	1.97	1.88	1.80	1.88	1.82	1.63	1.68	1.59	1.54
道光 20 年	1.53	1.43	1.33	2.05	1.98	1.90	1.99	1.88	1.69	1.75	1.67	1.66
道光 21 年	1.50	1.40	1.30	2.03	1.95	1.84	1.75	1.61	1.42	1.68	1.58	1.57
道光 22 年	1.60	1.50	1.40	1.98	1.88	1.77	1.67	1.56	1.42	1.73	1.63	1.62
道光 23 年	1.66	1.57	1.50	1.98	1.91	1.82	1.80	1.65	1.46	1.94	1.83	1.68
道光 24 年	1.78	1.69	1.62	2.21	2.16	2.02	2.00	1.83	1.64	2.20	2.08	1.96
道光 25 年	1.74	1.65	1.57	2.07	1.99	1.91	1.88	1.71	1.52	2.08	1.89	1.69
道光 26 年	1.58	1.49	1.41	1.78	1.65	1.64	1.86	1.69	1.50	1.73	1.53	1.33
道光 27 年	1.44	1.35	1.28	1.83	1.70	1.69	1.78	1.61	1.42	1.83	1.69	1.55
道光 28 年	1.41	1.32	1.25	1.76	1.64	1.64	1.66	1.52	1.37	1.57	1.42	1.27
道光 29 年	1.40	1.31	1.24	1.76	1.64	1.60	1.71	1.56	1.37	1.56	1.43	1.24
道光 30 年	1.40	1.31	1.24	1.91	1.78	1.67	1.70	1.56	1.37	1.55	1.45	1.30

說明：(1) 各年的米價數字月份（包括閏月）未超過 6 個月份的，有乾隆 49、56 年，以及嘉慶 10、20 年。
(2) 該年份的各個月份（包括閏月）米價數字完整無缺的，有嘉慶 4-9、14-18、24-25 年，以及道光 9-27、30 年。

資料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月摺包〉所收之「糧價清單」；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糧價單・福建〉，第 6 卷，縮微膠捲。

附錄四、十八世紀中葉臺灣各地米價差

時間	上奏者	內容	資料來源
乾隆 16 年 7 月	巡臺御史書昌	至現在米價，臺灣縣屬每石約值銀一兩五錢零，鳳山縣屬每石約值銀一兩六錢零，諸羅縣屬每石約值銀一兩四錢，彰化縣屬每石約值一兩三錢零，淡水廳屬每石約值銀一兩一錢零，較之夏令，亦無大增減。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一輯，頁 43。
乾隆 17 年 9 月	福建臺灣鎮總兵官陳林每	目下府治民間日用食米倉斗每石賣銀貳兩壹錢肆、伍分，其鳳諸彰三邑米價每石倉斗自壹兩肆、五錢至壹兩柒、捌錢不等。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四輯，頁 849。
乾隆 19 年 6 月	福建臺灣鎮總兵官馬大用	目下米價府治每石賣銀貳兩有零，南北二路每石賣銀自壹兩參、肆錢至壹兩柒、捌錢不等。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八輯，頁 847。
乾隆 20 年 3 月	福建巡撫鐘音	至臺郡地方北路之淡水米價二兩以內，南路之鳳山米價二兩一錢，皆不為貴。惟郡城及諸羅、彰化二邑雖稍平減，中等之米仍須二兩三、四錢不等，是以平糶尚未停止。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十輯，頁 897。
乾隆 20 年 7 月	福建臺灣鎮總兵官馬大用	郡城與鳳山、諸羅等處每石賣錢壹兩柒錢及壹兩捌錢不等，彰化縣每石賣銀二兩。惟上淡水今歲豐登，收穫更廣，米價又覺平賤，每石止賣銀壹兩貳、參錢。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十二輯，頁 162。
乾隆 20 年 10 月	閩浙總督革職留任喀爾吉善	臺灣地方秋雨充足，田園禾稼處處秀實，米價每石一兩八、九錢、二兩不等，淡水一帶減至一兩三錢。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十二輯，頁 718。
乾隆 32 年 9 月	巡視臺灣給事中覺羅明善、朱丕烈	現在七、八月糧價，府城稻米上者每倉石價銀一兩七錢，中次者遞減一錢，穀每石八錢。……南路鳳山縣各項糧價，每石較府城減少一錢及五分不等，北路諸羅、彰化二縣較府城糧價，每石減二錢及一錢五分不等。淡水地方最為平減，稻米上者每石價錢一兩四錢，中次者一兩二、三錢，穀每石六錢二分……。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二十八輯，頁 103-104。

附錄五、福建四府中米之最低與最高價格平均值（乾隆48年至道光30年）

年代	福州府	泉州府	漳州府	臺灣府
乾隆 48 年	1.84	2.04	1.92	1.77
乾隆 49 年	1.94	2.21	1.94	1.73
乾隆 50 年	1.91	2.10	1.84	1.59
乾隆 51 年	1.72	1.98	1.76	1.55
乾隆 52 年	1.69	2.46	2.84	/
乾隆 53 年	1.82	2.70	2.74	2.58
乾隆 54 年	1.80	2.47	2.52	2.15
乾隆 55 年	1.67	2.18	2.21	1.86
乾隆 56 年	1.57	2.04	1.99	1.57
乾隆 57 年	1.81	1.98	1.95	1.57
乾隆 58 年	1.88	1.98	1.97	1.67
乾隆 59 年	1.80	2.08	2.26	1.67
乾隆 60 年	1.86	2.56	2.80	1.87
嘉慶元年	1.77	2.60	2.65	1.81
嘉慶 2 年	1.72	2.32	2.29	1.82
嘉慶 3 年	1.76	2.24	2.22	1.95
嘉慶 4 年	1.66	2.11	2.10	1.87
嘉慶 5 年	1.61	2.11	2.06	1.86
嘉慶 6 年	1.60	2.16	2.03	1.74
嘉慶 7 年	1.50	2.03	1.94	1.65
嘉慶 8 年	1.50	2.00	1.91	1.67
嘉慶 9 年	1.54	2.08	1.97	1.76
嘉慶 10 年	1.58	2.10	2.04	1.79
嘉慶 13 年	2.09	3.17	2.79	2.42
嘉慶 14 年	2.19	3.12	2.85	2.42
嘉慶 15 年	2.34	3.07	2.87	2.41
嘉慶 16 年	2.24	3.00	2.91	2.55
嘉慶 17 年	2.31	2.89	2.83	2.28
嘉慶 18 年	2.16	2.69	2.76	1.93
嘉慶 19 年	2.11	2.67	2.74	2.14
嘉慶 20 年	2.01	2.56	2.64	2.58
嘉慶 21 年	2.12	2.69	2.63	2.82
嘉慶 22 年	1.96	2.40	2.39	2.26
嘉慶 23 年	1.81	1.89	2.24	1.84
嘉慶 24 年	1.79	1.89	2.17	1.55

嘉慶 25 年	1.95	2.41	2.30	1.71
道光元年	2.43	2.36	2.31	2.11
道光 2 年	2.18	2.18	2.22	1.99
道光 3 年	2.05	2.09	2.23	1.96
道光 4 年	2.04	2.16	2.49	2.38
道光 5 年	2.16	2.25	2.75	2.35
道光 6 年	2.32	2.26	2.87	2.62
道光 7 年	2.15	2.01	2.59	2.48
道光 8 年	2.03	1.91	2.45	1.83
道光 9 年	2.10	2.22	2.29	1.86
道光 10 年	2.16	2.16	2.30	2.14
道光 11 年	2.25	2.07	2.29	2.19
道光 12 年	2.45	2.36	2.66	2.41
道光 13 年	2.51	2.56	2.49	2.89
道光 14 年	2.72	2.75	2.27	3.09
道光 15 年	2.53	2.67	2.38	2.92
道光 16 年	2.49	2.73	2.45	3.00
道光 17 年	2.30	2.57	2.29	2.90
道光 18 年	2.02	2.27	1.90	2.30
道光 19 年	1.80	2.11	1.98	1.97
道光 20 年	1.83	2.10	2.12	2.02
道光 21 年	1.75	2.01	1.94	1.86
道光 22 年	1.79	1.93	1.86	1.89
道光 23 年	1.81	2.01	1.90	2.02
道光 24 年	2.01	2.25	2.13	2.42
道光 25 年	1.97	2.13	2.06	2.33
道光 26 年	1.90	1.94	2.03	1.79
道光 27 年	1.84	1.98	1.93	2.04
道光 28 年	1.77	1.84	1.78	1.60
道光 29 年	1.72	1.82	1.72	1.52
道光 30 年	1.67	1.95	1.71	1.61

說明：本附錄數字的計算，取最高價格與最低價格的平均值。（亦即由平均附錄二、三各府的中米一欄數字而算出，平均附錄六、七各府中米一欄數字的計算方式相同）

資料來源：乾隆、嘉慶年間數據取自於附錄二、三之各府中米一欄數字。道光年間數據取自於附錄六、七之各府中米一欄數字。

附錄六、道光朝福建四府最高價格平均值

年代	福州府			泉州府			漳州府			臺灣府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道光元年	3.22	3.09	2.94	2.67	2.49	2.33	2.70	2.60	2.50	2.47	2.30	2.13
道光 2 年	2.76	2.65	2.41	2.49	2.29	2.11	2.56	2.46	2.36	2.33	2.23	2.13
道光 3 年	2.57	2.44	2.22	2.45	2.26	2.09	2.58	2.48	2.38	2.35	2.20	2.08
道光 4 年	2.60	2.44	2.28	2.52	2.32	2.04	3.07	2.97	2.87	2.73	2.55	2.37
道光 5 年	2.92	2.76	2.61	2.60	2.38	2.15	3.33	3.23	3.13	2.82	2.61	2.40
道光 6 年	3.08	2.91	2.75	2.61	2.41	2.22	3.48	3.38	3.28	3.15	2.92	2.72
道光 7 年	2.64	2.50	2.37	2.30	2.10	1.93	3.13	3.03	2.93	2.85	2.64	2.48
道光 8 年	2.42	2.27	2.14	2.18	2.01	1.85	2.98	2.88	2.78	2.30	2.11	1.92
道光 9 年	2.61	2.46	2.33	2.53	2.28	2.07	2.81	2.71	2.61	2.15	2.00	1.83
道光 10 年	2.65	2.54	2.42	2.49	2.23	2.04	2.76	2.66	2.56	2.46	2.29	2.12
道光 11 年	2.78	2.65	2.54	2.39	2.15	1.98	2.78	2.68	2.58	2.45	2.34	2.23
道光 12 年	3.22	3.08	2.92	2.69	2.50	2.28	3.36	3.26	3.16	2.75	2.62	2.50
道光 13 年	3.27	3.15	3.05	3.06	2.73	2.61	2.94	2.83	2.72	3.29	3.18	3.08
道光 14 年	3.51	3.41	3.19	3.27	2.95	2.74	2.63	2.50	2.41	3.46	3.36	3.26
道光 15 年	3.17	3.03	2.90	3.03	2.77	2.58	2.81	2.72	2.61	3.25	3.15	3.05
道光 16 年	3.15	3.03	2.93	3.11	2.83	2.70	2.76	2.66	2.56	3.51	3.42	3.24
道光 17 年	2.92	2.81	2.71	2.89	2.71	2.63	2.60	2.52	2.41	3.41	3.31	2.52
道光 18 年	2.64	2.53	2.43	2.55	2.45	2.41	2.12	2.06	1.96	2.92	2.81	2.13
道光 19 年	2.40	2.29	2.19	2.46	2.34	2.31	2.27	2.14	2.02	2.53	2.34	2.18
道光 20 年	2.34	2.23	2.13	2.43	2.22	2.09	2.43	2.36	2.28	2.58	2.38	2.18
道光 21 年	2.21	2.10	2.00	2.25	2.08	2.03	2.34	2.28	2.22	2.32	2.13	1.94
道光 22 年	2.18	2.08	1.98	2.13	1.98	1.91	2.22	2.17	2.08	2.26	2.11	1.96
道光 23 年	2.15	2.05	1.95	2.23	2.10	1.99	2.21	2.15	2.05	2.36	2.21	2.08
道光 24 年	2.42	2.32	2.22	2.48	2.34	2.28	2.52	2.44	2.34	2.90	2.76	2.63
道光 25 年	2.40	2.31	2.21	2.45	2.31	2.19	2.49	2.41	2.31	2.91	2.77	2.64
道光 26 年	2.41	2.31	2.21	2.39	2.24	2.09	2.45	2.37	2.27	2.19	2.06	1.95
道光 27 年	2.44	2.34	2.24	2.46	2.26	2.13	2.33	2.26	2.17	2.50	2.38	2.22
道光 28 年	2.32	2.22	2.12	2.16	2.05	1.98	2.07	2.03	1.96	2.12	1.87	1.76
道光 29 年	2.22	2.12	2.02	2.06	1.99	1.95	1.98	1.89	1.80	1.94	1.66	1.52
道光 30 年	2.14	2.03	1.93	2.20	2.12	2.07	1.96	1.86	1.76	1.87	1.76	1.55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價表》，頁 7-16（福州府）、頁 47-56（泉州府）、頁 259-268（漳州府）、頁 397-406（臺灣府）。

附錄七、道光朝福建四府最低價格平均值

年代	福州府			泉州府			漳州府			臺灣府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上米	中米	下米
道光元年	1.88	1.78	1.68	2.36	2.23	2.09	2.11	2.02	1.92	2.03	1.93	1.82
道光 2 年	1.80	1.70	1.61	2.22	2.06	1.91	2.07	1.97	1.86	1.85	1.75	1.65
道光 3 年	1.76	1.66	1.58	2.12	1.92	1.76	2.08	1.99	1.85	1.83	1.73	1.63
道光 4 年	1.74	1.64	1.56	2.25	1.99	1.77	2.14	2.01	1.87	2.30	2.20	2.10
道光 5 年	1.66	1.56	1.50	2.41	2.12	1.85	2.38	2.27	2.17	2.18	2.08	1.97
道光 6 年	1.82	1.72	1.65	2.32	2.10	1.91	2.46	2.35	2.22	2.44	2.33	2.23
道光 7 年	1.91	1.81	1.72	2.09	1.91	1.73	2.28	2.16	2.00	2.43	2.33	2.24
道光 8 年	1.89	1.79	1.68	1.97	1.81	1.62	2.17	2.01	1.84	1.65	1.55	1.45
道光 9 年	1.83	1.75	1.66	2.34	2.15	1.91	1.96	1.86	1.76	1.82	1.72	1.62
道光 10 年	1.86	1.79	1.73	2.24	2.09	1.87	2.04	1.94	1.83	2.08	1.98	1.88
道光 11 年	1.94	1.84	1.76	2.13	2.00	1.81	2.14	1.91	1.74	2.13	2.03	1.93
道光 12 年	1.91	1.81	1.73	2.48	2.23	1.94	2.28	2.06	1.88	2.32	2.21	2.09
道光 13 年	1.96	1.86	1.78	2.72	2.39	2.06	2.30	2.14	1.97	2.70	2.60	2.50
道光 14 年	2.13	2.04	1.97	2.77	2.54	2.33	2.08	2.05	1.84	2.92	2.82	2.75
道光 15 年	2.13	2.03	1.94	2.75	2.58	2.39	2.07	2.05	1.83	2.79	2.69	2.59
道光 16 年	2.05	1.95	1.85	2.85	2.64	2.42	2.27	2.25	2.03	2.73	2.58	2.48
道光 17 年	1.90	1.80	1.70	2.61	2.43	2.23	2.09	2.06	1.85	2.63	2.50	2.39
道光 18 年	1.61	1.51	1.40	2.13	2.09	2.00	1.83	1.73	1.59	1.92	1.79	1.69
道光 19 年	1.40	1.30	1.20	1.97	1.88	1.80	1.88	1.82	1.63	1.68	1.59	1.53
道光 20 年	1.53	1.43	1.33	2.05	1.99	1.91	1.99	1.88	1.69	1.75	1.67	1.66
道光 21 年	1.50	1.40	1.30	2.03	1.95	1.84	1.74	1.60	1.41	1.68	1.58	1.57
道光 22 年	1.60	1.50	1.40	1.97	1.88	1.77	1.67	1.56	1.42	1.77	1.67	1.66
道光 23 年	1.66	1.57	1.50	1.98	1.91	1.82	1.81	1.66	1.47	1.94	1.83	1.68
道光 24 年	1.78	1.69	1.62	2.21	2.16	2.02	2.00	1.83	1.64	2.20	2.08	1.96
道光 25 年	1.73	1.63	1.56	2.04	1.96	1.89	1.87	1.70	1.51	2.08	1.90	1.70
道光 26 年	1.58	1.49	1.41	1.78	1.65	1.64	1.86	1.69	1.50	1.74	1.52	1.32
道光 27 年	1.43	1.34	1.27	1.83	1.69	1.68	1.77	1.60	1.41	1.83	1.71	1.58
道光 28 年	1.41	1.32	1.25	1.76	1.64	1.63	1.66	1.52	1.37	1.47	1.33	1.18
道光 29 年	1.41	1.32	1.24	1.76	1.64	1.60	1.71	1.56	1.37	1.54	1.38	1.18
道光 30 年	1.40	1.31	1.24	1.91	1.78	1.67	1.70	1.56	1.37	1.55	1.45	1.30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價表》，頁 7-16（福州府）、頁 47-56（泉州府）、頁 259-268（漳州府）、頁 397-406（臺灣府）。

引用書目

《軍機處錄副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編號：047321、051433、054871、060033、069854、069859。

丁曰健

1959（1867）　《治臺必告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1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山本進

2002　《清代の市場構造と経済政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53　《明清史料・戊編》。臺北：編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

2009　《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價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

2009　《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

王世慶

1994　《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王業鍵

2003　《清代經濟史論文集（二）》。臺北：稻鄉出版社。

王瑛曾

1962（1764）　《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凱

1961（1839）　《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璽

1962（1836）　《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施立業

2004　《姚瑩年譜》。合肥：黃山書社。

姚瑩

1957（1832）　《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高銘鈴

1999　〈雍正・乾隆期における福建・台湾間の米穀流通〉，《（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7: 27-47。

2001　〈清代中期における台運体制の実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9: 88-115。

2003　〈19 世紀前・中期における台湾米穀の流通に関する一考察〉，《東洋学報》85(2): 87-117。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

2001　《淡新檔案（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許文雄

2001　〈林爽文起事和臺灣歷史發展〉，《故宮學術季刊》19(1): 95-150。

許世融

1998 〈清雍正乾隆時期臺灣米價分析〉，《史耘》3/4: 107-141。

陳春聲

2005 《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 世紀廣東米價分析》。臺北：稻鄉出版社。

陳盛韶

1997[1834] 《問俗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987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故宮博物院。

1997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四）》。臺北：故宮博物院。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0[1829] 《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1[1788]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1[1909-1911] 《臺灣私法商事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9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3 《臺案彙錄丙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17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4 《清高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 18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4[1873] 《福建省例》，臺灣文獻叢刊第 19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6 《清會典臺灣事例》，臺灣文獻叢刊第 22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7 《清耆獻類徵選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23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8 《清奏疏選彙》，臺灣文獻叢刊第 2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謝美娥

2008 《清代臺灣米價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191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報告：清國行政法》，第 3 卷。臺北：編者。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

1969 《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五）：自嘉慶 12 年 11 月上至嘉慶 15 年 8 月》。臺北：華文書局。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17, No. 1, pp. 71-124, March 2010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Rice Price and "Tai-yun" in Mid-Qing Taiwan (1783-1850)

Ling-ching W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decline of "Tai-yun" circulation structure. "Tai-yun" refers to the transport of rice, collected as land tax in Taiwan, to Qing troops and their families stationed in Fukien.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in rice price between Taiwan and Quan-zhou Prefecture, as well as that in various parts of Taiw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played by rice price in "Tai-yun" and its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rice in Taiwan was inexpensive. Merchants from China took advantage of the price difference and engaged in exports of rice from Taiwan. Such trade exchange was allow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because the merchants' vessels helped undertake the official duty of "Tai-yun". The circulation structure of "Tai-yun" was dependent on commercial vesselss for rice transport while subjected to restrictions under government policies concerning official ports, navigation routes and vessels allowed.

After the end of Lin Shuangwen Rebellion, the rice price of southern Taiwan rose (1788-1789 A.D.), and exceeded that of Quan-zhou Prefecture, meaning diminished profits for rice exports from southern Taiwan. The relatively lower rice price of northern Taiwan drove merchants to export rice from illegal ports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to shun their commitment in "Tai-yun", rice merchants began to transport rice in fishing vessels and small boats, which were not allowed to cross the Taiwan Strait. Such intentional evasion of "Tai-yun" persisted throughout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qing (1796-1819 A.D.), during which the price of rice all over Taiwan dropped. Profits from rice trade continued to decline in the mid 1830s when the difference in rice price between Taiwan and Quan-zhou Prefecture further narrowed. Hence, reduction in profits led to fewer merchant vessels visiting official ports for rice trade, thus affecting "Tai-yun" declined by the decrease of commercial fleets. Consequently, the circulation structure of "Taiyun" disintegrated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

Keywords: Land Tax, “Tai-Yun”, Difference in Rice Price, Rice Export, Circulation Structure

《臺灣史研究》
第十七卷第一期，頁 125-174
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全新的「舊慣」：
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改造
（1898-1943）*

曾文亮**

摘　要

不同於其他民商事項在 1923 年後改依日本民法，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事項始終「依用舊慣」或「依習慣」，因此有關臺灣人家族法的日本化問題，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有學者認為日治後期有明顯日本化傾向，亦有學者認為日本當局並未致力於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日本化。

本文以總督府法院的覆審、高等法院判例集相關案例為主要資料，重新檢討此一問題。本文認為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法確實有日本化的傾向。總督府法院在 1910 年代即透過戶口規則及舊慣立法草案精神，間接引進日本家族法元素；而在進入 1930 年之後，日本家族法的影響更為顯著。此一日本化趨勢背後的原因，與總督府法院的實務考量有關。除此之外，包括總督府法院在 1920 年代末期修法運動累積的知識基礎，以及 1930 年代臺灣戶籍法制的實施及皇民化運動等大環境，也有助於此一趨勢的發展。但此一日本化的趨勢，最後因為日本的戰敗而變成未竟的內地延長。

關鍵字：臺灣、總督府法院、舊慣、臺灣人家族舊慣、家族法

---

* 本文原為筆者博士論文之一章，經修改後宣讀於 2009 年 12 月 26 日「臺灣法律史學會秋季研討會」，會後再經修改而成。感謝研討會中兩位與談人黃詩淳教授與陳世榮博士候選人提供之問題與寶貴意見；也感謝現場許多來賓之提問。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來稿日期：2010 年 2 月 5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4 月 26 日。

一、前言
二、臺灣人家族習慣之發現與舊慣
三、朝向日本化的臺灣人家族舊慣
四、家族舊慣的進一步改造與未竟的內地延長
五、結論

一、前言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家族習慣問題，乃舊慣調查事業中的一大課題。[1] 關於此點，早在岡松參太郎來臺灣進行土地舊慣調查時即已察覺，而後在舊慣調查事業的主要成果《臺灣私法》中，也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說明臺灣人的家族習慣。[2] 有關舊慣調查事業及其累積的成果，早為學界所注意。[3] 舊慣調查會之外，另外一個與臺灣人家族舊慣關係密切的是總督府法院。由於日治時期臺灣的國家法對於涉及家族紛爭的事件，始終以民間習慣作為主要的法源依據，因此總督府法院也有必要瞭解臺灣人的家族習慣內涵。經由法院判決承認其法律上效力的家族習慣，則構成當時臺灣人家族法的內涵，為了與前述的「習慣」相區別，筆者稱之

---

1 本文中所使用的「臺灣人」一詞，其意義相當於當時法律上用語的「本島人」，泛指 1895 年之前即自中國大陸移住臺灣，並於嗣後取得日本國籍的漢人及其子孫，以及被漢人生活方式同化的平埔族（當時稱為「熟蕃人」）。參見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頁 16-17。

2 舊慣調查會關於臺灣人家族舊慣的介紹，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以下簡稱《臺灣私法》）（臺北：該會，1911），第 2 卷下冊。

3 例如春山明哲，〈台湾旧慣調査と立法構想：岡松参太郎による調査と立案を中心に〉，《台湾近現代史研究》6（1988），頁 81-114；邱純惠，〈日治時期臺灣民商法施行問題初探〉，《臺灣風物》48: 1（1998 年 3 月），頁 21-40；吳豪人，〈岡松參太郎論：殖民地法學者的近代性認識〉，收於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頁 511-586；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王泰升，〈學說與政策交織下的日治臺灣民事法制變遷：以岡松文書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37: 3（2008 年 9 月），頁 47-95。

為「舊慣」。[4]

戰後初期臺灣的法學界很快就出現對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法制的回顧研究。戴炎輝在一篇回顧日治時期法制的文章中指出，臺灣人家族法在 1923 年以後有逐漸轉向日本法制之傾向，而其原因，則在於總督府法院法官越來越不懂臺灣習慣或有意識地改造為日本法制；且此一日本化，讓臺灣吸收了日本的封建法制，是開倒車。[5] 蔡章麟在《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以下簡稱《通志稿》）中，亦提及日治時期因為總督府法院採取漸廢臺灣固有習慣之方針而適用日本法，使得前清遺制及自中國傳來的習慣或習慣法受了相當之變革。[6] 惟兩者均未提供足夠的實證分析。有關此一議題的進一步檢討，一直要等到 1990 年代王泰升的《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一書的相關討論。[7] 王泰升對於臺灣民事法西方化的過程，特別強調臺灣民間習慣與日本國家實定法下的「舊慣」兩個概念的區分，並從家制、婚姻收養、繼承等幾項議題切入，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法之西方化程度。[8] 王泰升認為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法因為採取「類似判例法」的政策，使得總督府法院法官可能透過法律解釋，將日本法的元素或近代西方法律

---

4 按「舊慣」一詞含意甚廣；即使只針對民事法律關係，根據舊慣調查會的看法，其內涵亦包括舊慣官府法與民間具有法效力的習慣。關於舊慣調查事業中的「舊慣」概念之分析，可參見西英昭，《「臺灣私法」の成立過程：テキストの層位学的分析を中心に》（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2009），頁 243-248。而總督府法院在使用此一概念時，除了與舊慣調查會一樣將存在於過去臺灣的某種舊有秩序轉化為國家法律規範之目的外，同時還有在新的國家體制下，繼續引導社會秩序改造之作用。總督府在 1922 年公布、1923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的勅令第 407 號中，改用「習慣」一詞取代「舊慣」作為法律上的用語，即是基於這樣的考量。惟儘管如此，總督府法院判決中對於習慣、舊慣仍然混雜使用。職是之故，本文以「習慣」指稱一般生活中的行為，而將「舊慣」用於指稱經由法院判斷認為具有法律效力的習慣。

5 參見戴炎輝，〈五十年來的臺灣法制〉，《臺灣文化》5: 1（1949），頁 10-11。

6 參見戴炎輝、蔡章麟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5）第 1 冊，頁 262。

7 在此之前，黃靜嘉於 1960 年出版了《日據時期之臺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一書。此書後來經過作者增補修訂後，於 2002 年重新以《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之名出版。該書認為日治時期法院對於臺灣人親屬繼承習慣之態度，有加以肯定者，亦有加以變更者。而在肯定者中，有某些違反現代平等原則者，有放任愚民之嫌。參見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頁 145-177。惟黃著此結論同樣欠缺實證分析過程，因此亦招致後來學者之批評。參見吳煜宗，〈臺灣民事舊慣的法化過程：婚姻法制近代化筆記〉，收於戴東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現代身分法之基礎理論：戴東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7），頁 93。

8 參見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303-369。

元素帶進臺灣人的身分法中。[9] 但是在日本化的部分，王泰升不同意戴炎輝的「開倒車」說法，而認為日本法院常用日本法上的名稱來重新解釋臺灣有關身分事項之舊慣，但並未因此將臺灣習慣中原已具有的封建性家族法制導向更封建的方向。[10] 由於當時日本家族法與臺灣舊有習慣規範同樣具有保守封建性格，日本人並未努力大幅改變臺灣人關於親屬繼承之舊慣。因此從結論言，臺灣人的家族法事項在日治時期僅受到近代西方法有限的影響。[11]

王泰升以西方法為參照點，討論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法的改革，並由此導出受近代西方法有限影響的結論，固非無據；但其以明治家族法與臺灣人家族習慣同樣具有「保守封建性格」而認為日本人未努力大幅改造臺灣人家族習慣，[12] 則與戴炎輝、蔡章麟的相當變革說有所出入，而且在論理上亦欠缺足夠論據。有鑑於此，本文擬在王泰升所提的依用舊慣框架下，重新檢討總督府法院如何認識、發現並從法律觀點判斷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法律效力，以及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法制的西方化與日本化問題。

在使用的材料上，雖然是以覆審法院（1898-1919）及高等法院（1919-1945）的資料為主要素材，[13] 但本文於分析時並不使用「覆審法院」或「高等法院」的稱呼，而是統稱為「總督府法院」，係基於如下理由：從制度上言，覆審／高等法院乃當時總督府司法體系中之最終審法院，地方法院的見解有可能因為案件的上訴而在覆審／高等法院中被修正；而下級法院如果要避免其判決遭上級法院推翻，謹慎參考覆審／高等法院判決例自然大有助益。因此覆審／高等法院對於習

---

9 參見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349-350。

10 參見王泰升，〈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的法制改革〉，收於王泰升，《臺灣法律史的建立》(臺北：著者發行，1997)，頁 177-178。

11 參見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368-369。

12 例如將「分家」與「繼承」分開這件事情，即為大幅度改造臺灣人習慣之結果。詳細論證參見後述。

13 由於總督府法院要到 1919 年恢復高等法院之後才開始出版判例集，因此對於日治前期的部分，本文以覆審法院判例要旨以及《臺灣慣習記事》、《臺法月報》等雜誌上所刊登的覆審法院判決為材料。上述材料均已有復刻版。參見臺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編纂、小森惠編，《臺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判例：自明治 29 年至昭和 18 年》(東京：文生書院，1995)；臺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編纂、小森惠編，《臺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判例補遺：明治 31 年至明治 40 年》(東京：文生書院，1997)。由於本文資料大量引用自該套判例集，以下簡稱「《覆審高等判例》」。不過在《覆審高等判例》中，仍然漏掉了總督府高等法院昭和 13 年至 15 年的判例集。另外基於討論上之需要，本文亦參酌使用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下載日期：2010 年 3 月 10 日，網址：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

慣的法律判斷，應該足以代表整個總督府法院的立場。[14] 又，本文中所稱的家族紛爭，僅指涉及家族法規範對象（即「親屬」、「繼承」事項）有關之紛爭，因而不包括家族內部成員間的財產借貸關係或刑事紛爭問題。[15]

二、臺灣人家族習慣之發現與舊慣

（一）「依用舊慣」與臺灣人家族習慣調查

總督府法院根據習慣或法理審理臺灣人的民事事件，自軍政時期即已開始，即 1895 年日令第 21 號「臺灣住民民事訴訟令」所規定的「審判官準任地方之慣例及法理審斷訴訟。」[16] 但是在進入民政時期後，總督府法院在欠缺法源依據下，仍然延續軍政時期之依從習慣及法理之作法，有關民事審判的法源依據一直要到 1898 年後才確定，此即 1898 年律令第 8 號第 1 條規定：

> 關於民事商事及刑事事項，……。但左揭事項，除另有規定外，依現行之例：一、不涉及本島人及清國人以外之人的民事及商事事項。……[17]
> （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個規定被規定於但書之中，是一種例外規定。如係日本人間或臺灣人與日本人間發生的民商事件，則應適用原則規定之日本民法。只是從當時臺灣的人口結構來看，絕大部分的案件都會發生在臺灣人之間，因此適用此原則性規定的機會反而很少。對於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臺灣人，其民事事件的法源依據卻屬於例外規定，其實涉及其他政治考量，亦即日本國內的條約改正與殖民地統治政策的修正問題。首先，配合條約改正的需要，有關臺灣的基本法制必須在 1898 年 7 月 16 日之前提出，並以實施日本民法為原則。其次，對於當時殖民地統治的問題，

---

14 雖然筆者同意總督府法院內部對於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法律判斷可能會有不同意見，但此一問題只有待將來進一步利用「日治法院檔案」進行研究後才能得到解答。關於日治法院檔案之介紹，可參見王泰升，〈日治法院檔案的整編與研究〉，收於王泰升主編，《跨界的日治法院檔案研究》（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9），頁 1-37。

15 關於此點，感謝匿名審查人之提醒。

16 參見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89。

17 全文請參見外務省条約局編，《外地法制誌》（東京：文生書院，1990），第 4 卷：律令總覽，頁 146。

日本中央接受了後藤新平的舊慣政策作為新的殖民地統治政策。[18] 兒玉／後藤體制成立後，總督府首先改造了法院體制，將原來的三審制改為二級二審制。[19] 經改造後的二級二審制總督府法院，開始依照律令第 8 號的根據，審理臺灣人的民商事案件，當然也包括臺灣人間的家族法事件。

負責運用此一規定審理案件的總督府法院，不僅在制度上模仿近代西方司法制度，法院判官也都與日本內地判事一樣受過近代法學教育。但是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基於民事紛爭的不告不理原則，總督府法院只有在臺灣人家族紛爭進入法院後，才能根據個案探求相關的習慣內容或法理，作為判決的依據。總督府法院判官因為受過近代法學教育，對於何謂法理都有一定的認知。但是對於臺灣人的習慣則甚為陌生，因此亟需瞭解臺灣人習慣的整體面貌。1901 年成立的舊慣調查會即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設立。[20] 除了舊慣調查會之外，總督府法院在第三任覆審法院長鈴木宗言上任後，也展開了自己的舊慣調查。按鈴木宗言在 1900 年接任覆審法院院長的位置，與後藤的臺灣統治政策密切相關。[21] 鈴木宗言出任覆審法院院長後，在後藤新平推動的臺灣法律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22] 而對於總督府的土地調查事業也採取全面配合的態度，不僅有多名法院判官出任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委員，[23] 對於土地調查的結果也完全給予尊重。[24]

---

18 有關條約改正與臺灣殖民地法制之間的關係，可參見淺野豊美著，何義麟、劉夏如、洪郁如、楊桂香譯，〈近代日本的「條約改正」與臺灣殖民地法制的初步建構〉，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頁 307-346。

19 參見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34-135。

20 後藤新平在 1901 年初與《東京日日新聞》記者的談話中，曾特別提到必須透過舊慣制度的調查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法典編纂，才能確保對臺灣的永久統治。參見後藤新平，〈臺灣經營上舊慣制度の調查を必要とする意見〉，《臺灣慣習記事》1: 5（1901），頁 28-29。

21 後藤上臺之前的殖民地統治危機，部分原因正是當時的總督府法院與行政機關之間的衝突。關於此點，可參見小林道彥著、鄭天凱譯，〈1897 年臺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明治國家與殖民地領有〉，《臺灣風物》47: 2（1997 年 6 月），頁 129-157。為此，兒玉／後藤體制確立後，除了修改總督府法院條例，加強對總督府法院的掌控外，也希望透過尋找支持總督府政策的判官出任覆審法院長，以改善總督府內部官僚之間的關係。而鈴木宗言的親弟弟中村是公乃後藤新平系重要官僚，因此鈴木宗言可謂當時適合的覆審法院長人選。

22 在鈴木出任覆審法院長第二年，即奉命前往各殖民地考察殖民地法制，並於回來後推動臺灣的法制改革。例如 1904 年的笞刑制度，即是在鈴木宗言的論述基礎上，不顧當時內地法曹界的強烈反對而斷然實施者。參見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正伝・後藤新平》（東京：藤原書店，2004），第 3 卷：臺灣時代（1898-1906 年），頁 200。

23 有關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參見魏家弘，〈臺灣土地所有權概念的形成經過：從業到所有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126-127。

在舊慣調查方面，鈴木宗言接任覆審法院長後，隨即參與有志慣習研究會的設立，除了實際負責會務工作外，並自翌年1月起發行機關誌——《臺灣慣習記事》。[25] 除了慣習研究會外，總督府法院基於實務上的需要，另外在各個地方法院成立「有志慣習諮問會」，成員以各法院的判官及檢察官為主，透過問答的方式對臺灣地方士紳進行口述訪談，以瞭解臺灣社會的舊慣，並將訪談紀錄刊登於《臺灣慣習記事》。根據筆者的統計，總督府法院在三個地方法院所進行的慣習問答，其最早刊載的一次法院舊慣諮問紀錄為1901年4月，而最後一次的舊慣諮問紀錄則刊登於1905年7月號；其中臺北至少32回，臺中24回，臺南14回，合計至少70回。

在舊慣問答的提問背後，反映的是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家族習慣範圍的想像，而此一想像基本上限制了受訪者回答的範圍。但是對於臺灣人的回答內容，總督府法院並沒有進一步的研究分析；遇有不同意見，也是同時並陳而已，總督府法院也無法馬上判斷其真偽。[26] 由此以觀，此一舊慣問答成果，可以說是由總督府法院與臺灣人受訪者所共同形成，而與舊慣調查會的調查報告相當不同。[27]

（二）家族習慣與家族舊慣

總督府法院的舊慣問答或舊慣調查會的調查報告，都是關於臺灣人家族習慣的記載，而這些記載也都是總督府法院審理家族紛爭時的重要參考材料。但只有法院在具體案件中採用某項臺灣人習慣作為判決依據，該習慣才會成為具有法律

---

24 例如1903年控民第13號判決：「經裁決或查定所確定之業主權人，無論何人不得以查定或裁決前之緣由，對之主張業主權。」同年控民第27號判決：「雖基於虛構申告而被查定之事實，於查定確定後，無論何人不得與之對抗。」1904年控民第218號判決：「對查定以前之事實而言，為土地業主權之絕對證據。」1905年控民第379號判決：「於已確定業主名義之上，不得主張與其相反之事實，或主張不相容之權利。」分別見《覆審高等判例》，第1冊，頁106、107、109、110。

25 參見後藤新平，〈敢て會員諸君の意見を問ふ〉，《臺灣慣習記事》4: 7（1904），頁76-78。

26 例如當時在日本人所辦的《臺灣民報》中，即曾出現「慣例調查難」的報導，指出臺灣人會在總督府法院所舉辦的慣習諮問會前先行會商，再提出不會造成對自己不利的回答。參見《臺灣民報》，1903年5月17日。轉引自西英昭，《「臺灣私法」の成立過程》，頁115-116。

27 與此形成明顯對比的是由舊慣調查會所進行的舊慣調查事業。接受總督府法院問答的同一批人，幾乎同時也是舊慣調查會所聘僱的人員，但是不同於總督府法院的問答錄，在舊慣調查事業中，這些臺灣人的角色，就像人類學研究中的報導人而已，只是眾多蒐集材料的來源之一。至於舊慣調查事業最終所呈現的關於臺灣人習慣的報告書（即《臺灣私法》），雖然也會出現對臺灣人習慣的看法，但是不論在體系安排與內容敘述方面，都與總督府法院的舊慣問答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效力的舊慣。考察總督府法院在前述發現臺灣人家族習慣期間的判決，主要即是在判斷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法律效力。但除此之外，至少還有兩項特色：一為異法域下家族法制差異性之強調，二為個人主義原則的引進。

1. 從家族習慣到家族舊慣的轉換

如前所述，臺灣人家族習慣經由總督府法院認可後，即變成具有法律規範意義的家族舊慣。從初期的判決內容來看，總督府法院對於臺灣人家族習慣，基本上採取尊重的態度。例如在婚姻方面，總督府法院認為婚姻或離婚並不只是當事人之意思即成立，而須遵從尊親屬的意思。[28] 至於婚姻形式要件，總督府法院主要根據民間習慣，認為正式婚姻必須書立婚字。[29] 而婚姻的成立，也以完成一定儀式，具備事實上之婚姻結果為已足，不需完成戶口申報。[30] 此外，總督府法院也承認「妾」制度乃臺灣所公認之身分關係，因而不得謂其違反公序良俗。[31] 此外，有關招夫婚的習慣也為法院判決所承認，並因而衍生出相關的問題。[32]

婚姻之外，總督府法院對於臺灣人的收養習慣，包括過房子、螟蛉子，乃至因為重視宗祧關係而衍生出來的立繼（死後收養）制度，也都予以承認。例如在1901 年的判決中即認為，螟蛉子的目的不限於繼嗣，還可能考慮到家門隆盛而收養，因此應視為與親生子同，分予足以成立一家之產業。[33] 且螟蛉子與親生子間之財產分配，應各自平等。[34] 既然收養可能是以家門隆盛為目的，因此並非沒有二人以上之過房子或螟蛉子之例。[35] 至於立繼方面，在 1907 年的一則判例中清楚表明，子先於父而亡仍不構成絕房，乃因為根據臺灣習慣，有可能於後日透過過房子或螟蛉子承繼。[36]

---

28 1907 年控 288 號，1908 年 4 月 29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71。

29 1906 年控 230 號，1906 年 7 月 4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71。

30 明治 40 年控民 366 號，1907 年 10 月 16 日判決；1917 年控 317 號，1917 年 9 月 18 日判決。

31 明治 39 年控民第 294 號，1906 年 8 月 31 日判決。《臺灣慣習記事》6: 12（1907），頁 45-46。

32 例如 1901 年的一項判決中，處理的問題是寡婦在招夫後，對於前夫遺留財產的處分，應該如何看待的問題。而 1905 年的另一項判決，處理的則是招夫對入家的財產不享有任何權利。分別參見《臺灣慣習記事》1: 7（1901），頁 46-47；《臺灣舊慣記事》5: 3（1905），頁 48-50。

33 1901 年控 18 號，1901 年 3 月 15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84。

34 1901 年控 297 號，1902 年 1 月 17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85。

35 1906 年控 408 號，1906 年 12 月 25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85。

36 1907 年控 24 號，1907 年 5 月 24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85。

尤有甚者，對於臺灣人社會中某些與近代法律理念不符的習慣，總督府法院也可能基於臺灣人舊慣而承認其法律效力。例如在臺灣社會中的女子收養，存在以金錢買賣女子作為媳婦仔或查某嫺的舊慣。其中查某嫺的部分，從清治時期社會觀點即為婢女，屬於賤民階級。此不論從近代歐陸法中的人格平等或日本帝國憲法所強調之四民平等精神來看，均有所違背。但是總督府法院在日治初期仍然曾一度認為查某嫺是一種善良風俗而承認其效力。[37]

2. 異法域下家族法制差異的強調

總督府法院對臺灣與日本家族法制差異的強調，與當時兩地為相異法域有關。在 1903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認為家長的任務包括祭祀祖先、管理家產及處理其他重要家事。[38] 而在家長的資格方面，以男子為原則，只有家中無男子時，女性才能擔任家長。[39] 對於家長地位的承認，等於承認臺灣人存在家制度。由於明治民法中同樣承認家制度，因此對於總督府法院而言，承認臺灣人家制度並不會感到任何困難。但是臺灣人習慣中的家制度畢竟不同於明治家族法上的「家」制度，因此總督府法院特別留意兩者之間的差別。例如，從《臺灣慣習記事》所刊載的有關臺灣人家制度的判決，可以看出總督府法院至少強調兩個問題：首先是家產繼承問題。從 1902-1903 年，至少有 6 則有關臺灣人家產繼承原則的判決。這些判決均承認臺灣家族制度中的家產繼承係由諸子均分，而且不分親生子或螟蛉子。[40] 總督府法院將臺灣人的分家習慣理解為家產繼承，基本上與舊慣調查會的觀點一致。[41] 臺灣人的此一家產繼承習慣，與明治民法上的家督繼承明顯不同。根據明治民法規定，繼承可以分為家督繼承與家屬遺產繼承。前者原則上由長子一人繼承戶主之地位及戶主之全部財產。而後者，則由被繼承人之

---

[37] 1906 年民 612 號，1907 年 2 月 6 日判決。

[38] 1903 年控 172 號，1904 年 5 月 24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92。

[39] 1903 年控 172 號、1904 年控 139 號、控 490 號。以上均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92。

[40] 參見〈遺產分配請求の件〉，《臺灣慣習記事》2: 7（1902），頁 32-34；〈財產分配請求事件〉，《臺灣慣習記事》2: 8（1902），頁 42-43；〈遺產分配請求の件〉，《臺灣慣習記事》3: 1（1903），頁 47-48；〈收益權確認請求の件〉，《臺灣慣習記事》3: 2（1903），頁 52-53；〈收益權確認請求の件〉，《臺灣慣習記事》3: 4（1903），頁 50-52；〈財產分配請求事件〉，《臺灣慣習記事》3: 10（1903），頁 46-48。

[41] 舊慣調查會關於家產繼承的看法，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私法》，第 2 卷下冊，頁 561-91。

直系卑親屬為第一順位繼承人，平均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42]

另一個對於異法域制度的強調，涉及戶籍（戶口）登記與家族法之間的關係。總督府自 1899 年起即在臺灣實施戶口登記制度，1903 年臺灣的地方行政機關甚至嘗試採取本籍地主義的戶籍登記制度，而後到 1905 年總督府又在戶口普查的基礎上實施臺灣戶口規則。根據明治家族法，有關婚姻、收養等行為，都是以戶籍登記為生效要件；因此在判斷是否具有這類親屬關係時，戶籍登記內容具有絕對的效力。但是因為明治家族法不適用於臺灣人間，而戶口登記制度亦非臺灣的習慣，因此有關臺灣人家族關係如婚姻、收養等是否存在，雖可以戶口登記簿作為證據，但是當現實情況與戶口登記簿內容不一致時，仍應根據實際狀況認定其效力。由於臺灣的情況與日本內地存在如此重大的差異，總督府法院亦曾在《臺灣慣習記事》上數度刊載有關臺灣人家族舊慣與戶口登記內容無涉的判決。[43]

3. 個人主義原則的引進與舊慣

除了強調與明治家族法的差異外，總督府法院在創造舊慣的過程中，也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個人主義原則。按個人主義原則雖然是西方近代法律思想的產物，但日本在繼受近代歐陸法後，也成為明治民法中的基本原則。明治家族法中除了承認家制度外，同時也承認近代歐陸法中的個人主義原則，因而形成所謂「二重構造」的家制度。[44] 總督府法院雖然明確區分明治家族法中的家制度與臺灣人的家制度，但是並未同時排斥個人主義原則；例如對於成年制度的承認即屬之。雖然在臺灣人習慣中有所謂的成丁，但成丁與否並不影響其卑幼地位；因此卑幼與婦女置於家族的尊長權與夫權之下，其個人的主體性並不明顯。但是根據近代個人主義的法律精神，只要達到一定年齡後，原則上即具有完全的法律行為能力。因此，總督府法院在 1901 年的一項判決中，即

---

42 明治民法第 986 條、1009 條。參見我妻榮，《親族法・相續法講義案》，頁 31-47，相續法部分。

43 例如〈辨務署戶籍簿の效力に關する件〉，《臺灣慣習記事》4: 6（1904），頁 38-39；〈廳長の作りたる身分證明書の效力〉，《臺灣慣習記事》4: 10（1904），頁 41-42；〈實子確認請求事件〉，《臺灣慣習記事》5: 8（1905），頁 34-35。

44 參見近藤佳代子，〈近代の家：「家」の論理と商品交換法の論理との交錯〉，收於利谷信義、吉井蒼生夫、水林彪編，《法における近代と現代》（東京：日本評論社，1993），頁 239-265。

依清朝統治時期的成丁觀念，作為個人是否能夠單獨提起訴訟的判斷標準。[45] 而在隔年的另一項判決中，進一步承認臺灣一般以 16 歲為成年，[46] 達 16 歲者，得獨立自為法律行為。[47]

總督府法院對於個人主義原則的承認，不僅反映在成年制度中，也反映在對家產的看法。在臺灣人習慣中，家產雖歸於家長管理，但並不意味著家長對於家產享有如近代所有權般的絕對、排他之權利。根據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所作的舊慣問答，家父長的死亡只是改由其他人出任家長，但並不影響一家之同居共財，[48] 而在分家時，也只有具有承繼宗祧資格者才能參與分配。[49] 換言之，臺灣人習慣中的家產，並不專屬於家長所有，而且與宗祧延續具有密切關係。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中所引進的個人主義所有權制度，不僅反映在舊慣調查事業的報告中，[50] 也影響到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家產習慣之認定。根據總督府法院的判決，一方面否定宗祧的法律上意義，[51] 另一方面，對於家父長死亡後的財產關係，則是在肯定其為繼承之前提下，認定男性子孫為繼承人；[52] 並將臺灣人習慣中的家產分析解釋為遺產分割，從而認為在遺產分割前，家父長之遺產為諸子所共有。[53]

不過，總督府法院雖然否定宗祧的法律意義，但是宗祧因素在早期總督府法院的判決中，仍具有實質的影響力。例如前述的遺產為諸子共有即為一例。除此之外，總督府法院認為繼承人確定的時點為遺產分割之時，而非被繼承人死亡時，也是在承認臺灣人立繼習慣的前提下所作成的解釋。而在 1905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認為臺灣人於繼承人曠缺時，並不當然由旁系親屬繼承，而是由

---

45 參見 1898 年故民第 60 號，〈米代金支拂請求之件〉，《臺灣慣習記事》1: 1（1901），頁 39-41。

46 1902 年控民第 37 號，1902 年 6 月 27 日判決。《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57。同樣見解，另可參見 1906 年控民第 589 號，1906 年 12 月 21 日判決，《臺灣慣習記事》7: 7（1907），頁 37-38。

47 1903 年控民第 196 號，1905 年 12 月 6 日判決。《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57。

48 參見〈舊慣問答錄：遺產承繼ニ關スル件〉，《臺灣慣習記事》1: 10（1901），頁 39-40。

49 關於此一家產與宗祧的關係，參見陳其南，《家族與社會：臺灣和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另外，在法院的舊慣問答錄中亦有記載。參見〈舊慣問答錄：遺產承繼ニ關スル件〉，《臺灣慣習記事》1: 10（1901），頁 38。

50 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私法》，第 2 卷下冊，頁 549-560。

51 1905 年控 270 號，1905 年 11 月 2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304。該判決認為臺灣並沒有一定的宗祧繼承習慣，而是一憑父母之任意決定。

52 1899 年故[原文]第 22 號，〈貸金請求事件〉，《臺灣慣習記事》3: 4（1903），頁 50-52。

53 1898 年控 176 號，1898 年 8 月 29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302。

他房暫時管理財產，日後再由親族以過房或其他方法決定繼承人繼承該財產。[54] 這樣的看法更是出於對臺灣人立繼習慣的正面肯定而否定近代繼承法中的一般繼承順位原則。

臺灣社會對於個人主義原則的陌生感，可以從「私產」問題上看出。雖然在臨時舊慣調查會的報告中承認臺灣已有家產與私產的區別，但是在總督府法院判決中，有關私產的判決甚為罕見。[55] 雖然個人主義乃源自近代西方法的原則，但是從前述家產的例子來看，引進近代西方法的概念，並不必然影響到臺灣人的家族習慣。但是正如本文接下來所討論的，個人主義原則確實成為臺灣人家族舊慣改造的起點。

三、朝向日本化的臺灣人家族舊慣

總督府法院對於臺灣人家族舊慣的改造，比舊慣調查會的舊慣立法事業更早，大約從 1906 年前後即已開始，此後到 1923 年內地延長主義法制實施為止，可以視為一個階段。此一時期的總督府法院，一方面從個人主義原則解釋臺灣人舊慣，另一方面從戶口規則與舊慣立法草案中擷取明治家族法元素，改造臺灣人家制度，使臺灣人家族舊慣逐漸脫離臺灣人家族習慣，而朝向明治家族法改變。

（一）個人主義原則的滲透

1. 個人行為能力的問題

總督府法院承認成年制度與婦女行為能力，此舉具有強化個人主體性的作用，因此必然會影響到尊長權的權威性。例如，一直到 1905 年為止，總督府法院還可能以尊長權為由限縮個人對財產的處分權。[56] 但是到了 1906 年，總督府

---

[54] 1904 年控民第 330 號，《臺灣慣習記事》5: 11（1905），頁 32-33。

[55] 1906 年控民第 585 號，1906 年 12 月 14 日判決中，總督府法院承認婦女得擁有私號從事交易。此或可作為總督府法院承認私產的證據。惟此類判決在此時期並不多見。參見《臺灣慣習記事》7: 1（1907），頁 36-37。

[56] 例如在該年的一項判決中，覆審法院認為，父親過世之際，其子當然繼承其家之祭祀。至於財產，若母親尚在，由母親掌管，不得自由使用，亦不得向母親提出分產之請求。1904 年控民第 274 號，1905 年 4 月 1 日判決。參見《臺灣慣習記事》5: 6（1905），頁 46-48。

判決已經認為成年房主向母親請求取回契字掌管，其母不得拒絕；而出賣田業時，須得母之承諾、由母在場出名之慣例，也只是德義上之行為，與法律關係無涉。[57] 婦女的行為能力方面，主要出現在已婚女性是否就財產處分有行為能力。[58] 對此總督府法院判決中曾經出現過不同的看法，[59] 但是到了 1906 年，總督府法院承認臺灣習慣中，婦人有特別財產的情況下，常有經營私號從事各種交易。[60] 換言之，總督府法院承認女子亦得有行為能力。

對於尊長權與婦女行為能力的改造，明顯與其對個人主體的肯定有關。關於此點，不論從前述對於成年習慣的肯定，或對於土地調查事業從一開始即確定以個人為財產權主體的支持，均可看出。而且根據 1898 年律令第 8 號規定，總督府法院亦得根據法理進行裁判，因此以個人主體原則來解釋舊慣，完全於法有據。雖然說舊慣改造本為舊慣立法之任務，但是在舊慣立法之前出現相關的紛爭時，法院本無暇等待舊慣立法之後再決定究竟要貫徹個人主義原則或因襲臺灣人尊長權習慣。更何況在此一判決出現之前，臨時舊慣調查會已經完成北部與南部的舊慣調查，[61] 而總督府法院的舊慣諮問會，更已經完成全部的舊慣問答。因而在作成此一判決時，可以認為總督府法院對於臺灣人的家族習慣已經有了相當的掌握。

2. 個人主義原則對家族內部關係的改造

個人主義原則對於家族內部秩序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婚姻關係方面。在臺灣人習慣中，婚姻的主要目的在於延續家族宗祧，因此婚姻應由家長或尊長決定，卑幼的意思不具決定性。臺灣人的這種習慣，雖然與近代歐陸法上的個人主義原則相違背，但是至少到 1908 年為止仍為總督府法院所肯定，認為結婚或離婚均

[57] 1906 年控民第 610 號，1907 年 2 月 22 日判決。參見《臺灣慣習記事》7: 4（1907），頁 81-82。

[58] 明治民法就此採取否定之看法。參見明治民法總則第 14-18 條。我妻榮，《親族法・相續法講義案》，頁 67。

[59] 1899 年控民第 301 號判決不認為有夫之婦為無能力者，但是 1902 年控民第 101 號判決，卻認為在臺灣不存在丈夫生存時，妻子能擁有獨立私號買賣不動產的習慣。有關兩則判決之內容，分別參見《臺灣慣習記事》3: 5（1903），頁 45-46；《臺灣慣習記事》3: 9（1903），頁 50-51。

[60] 1906 年控民第 585 號，1906 年 12 月 14 日判決。參見《臺灣慣習記事》7: 1（1907），頁 36-37。

[6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第二回報告書》（臺北：該會，1906）。

應依從尊親屬之意思。[62] 但是到了 1919 年，總督府法院已經改認為婚約與一般契約一樣都是以當事人意思合致為基礎，[63] 且主婚人並非婚姻關係之當事人。[64]

除了婚姻當事人之意思自主外，總督府法院也強調婚姻當事人的對等性。對於違反夫妻關係對等性的習慣，透過公序良俗進行篩選，並逐步淘汰。例如過去民間習慣中盛行的贈妻、賣妻習俗，法院認為此係違反公共秩序之行為，因此無效。[65] 又如根據親屬協議將寡婦革逐，也被法院認為係過去不承認婦女人格之遺風，不應繼續遵守。[66] 離婚時的聘金返還，雖係民間習慣，但法院認為此習慣不過是下層社會中視婚姻為買賣、聘金為身價銀之觀念，不得以此為基礎而於離婚時請求返還聘金。[67] 總督府法院在 1910 年代對於夫妻關係平等的強調，與日本內地法院透過判例改善妻子地位的模式類似，均反映了近代市民家族法原理在二十世紀的修正。[68]

總督府法院對於夫妻關係中男女地位的對等性，也反映在對「妾」的離婚請求權之承認上。一直到 1917 年為止，總督府法院仍然認為在夫妾關係中，夫可以任意要妾離戶，而妾對於夫則只限於有重大情事始得請求離婚。[69] 但是到了 1919 年，總督府法院改認為臺灣舊慣中，妾對夫完全沒有離婚請求權，不僅無視妾之人格，且限制天賦之自由，有違公序良俗，因此不具法律上的效力。並認為根據法理，只要當事人一方無繼續維持雙方關係之意思時，原則上均得解消之。[70] 總督府法院肯定妾的離婚權利理由中，一再強調個人人格以及天賦人權價值，此點亦深刻反映在對查某嫺制度的立場轉變上。原本為總督府法院所承認的查某嫺制

---

[62] 1907 年控民第 288 號，1908 年 4 月 29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74。

[63] 1919 年控民第 332 號，1919 年 8 月 9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73。惟法院並不是以該行為違反公序良俗為理由。

[64] 1919 年控民第 790 號，1919 年 12 月 16 日判決。《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483。

[65] 1909 年控民第 567 號，1909 年 12 月 10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71。

[66] 1913 年控民第 587 號，1913 年 10 月 8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75。

[67] 1917 控民第 90 號，1917 年 4 月 14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77。

[68] 關於日本內地家族法原理變遷的基本介紹，可參見日本近代法制史研究会編，《日本近代法 120 講》（京都：法律文化社，1992），頁 198-199。另外，雖然總督府法院不斷強調夫妻之間的對等性，但是透過司法手段是否真能達到此一理想，仍有疑問。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參見陳昭如，〈離婚的權利史：臺灣女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69] 臺南地方法院 1917 年民第 680 號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9 冊，頁 327-328。

[70] 1919 年控民第 853 號判決。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臺北：臺法月報發行所，1931），頁 171。

度，在 1917 年開始以違反公序良俗的理由宣告無效。[71]

相較於婚姻關係方面的改造幅度，總督府法院在有關收養的舊慣方面，除了承認養子或養媳可以請求終止外，[72] 基本上仍以承認臺灣人習慣為主。例如家長過世而只留有女兒時，收養過房子；此時該過房子不是該女子的過房子，而是死者的直接繼承人。[73] 亦即在被繼承人死亡後，仍得追立繼承人。[74] 另外，由於民間習慣多以買斷方式收養螟蛉子，因此法院認為在收養契約成立之同時，螟蛉子即與本生家斷絕身分關係。[75] 並認為不存在親生子或為他家養子後，尚得與本生家兄弟共同分配親父遺產之習慣。[76] 過房子則不同，由於過房子宗祧色彩濃厚，在清代宗祧為家產分析前提的情況下，過房子往往因為兼承二房而有兩分家產。對此總督府法院亦認為，不得以過房子得繼承本生家，即認為當然喪失養家之繼承權。[77]

從總督府法院此一時期對臺灣人婚姻及收養習慣的立場可以看出，在只涉及個人與尊長權之關係或人身自由等問題上，總督府法院比較傾向於改造舊慣，以貫徹個人主義原則。但是在涉及宗祧立繼與家產繼承等臺灣人家族習慣中的核心問題時，總督府法院的態度即趨於謹慎。[78]

---

71 1917 年控民第 557 號，1917 年 11 月 7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105-106。1921 年另一件判決中，總督府為貫徹此一原則，進一步承認已經成為查某嫺者，只要本人有正當事由，無論何時均得脫離此身分關係，戶主不得拒絕。1921 年控民第 414 號，1921 年 7 月 18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181。又，總督府法院對於查某嫺舊慣的改造，也可能與當時國際婦女賣春禁止運動有關。參見洪郁如，〈植民地の法と慣習：台湾社会の女児取引をめぐる諸問題〉，收於浅野豊美、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構造》（東京：信山社，2004），頁 259。

72 1906 年控民第 129 號，1906 年 4 月 23 日判決認為，養女自身對於養親不得請求終止收養。而 1913 年控民第 765 號，1913 年 12 月 24 日判決亦指出，媳婦仔入戶他家後，不得以將來之準夫死亡為由，訴請離戶。以上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87。但 1917 年的判決中，總督府法院認為媳婦仔與其丈夫結婚後離婚，得以離婚作為解消媳婦仔關係之原因。1917 年控民第 2 號，1917 年 2 月 10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88。養子的離緣問題，參見 1917 年控民第 674 號，1917 年 2 月 20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90。

73 1912 年控 273 號，1913 年 8 月 27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84。

74 1913 年控 804 號，1914 年 1 月 22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84。

75 1908 年控 315 號，1908 年 8 月 7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85。

76 1899 年控 5 號，1899 年 5 月 5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303。

77 1913 年控 174 號，1913 年 5 月 5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84。

78 對於收養關係的法律性質，以及收養概念的整理等問題，必須等到日治後期才逐漸成為總督府法院討論的重點，詳見後述。

（二）限縮尊長權與親權制度的引進

在個人主義原則下，與承認成年制度相表裡的另一個問題，即未成年人的親權／監護問題。關於此點，強調尊長卑幼關係的臺灣人習慣顯然不同於承認個人主體的明治家族法或近代西方法，因此當未成年人親權／監護問題進入法院後，即成為總督府法院改造臺灣人尊長權舊慣的契機。

1. 親權與尊長權的分離

在臺灣人習慣中，家族內部係以尊長卑幼關係作為家屬之間的行為準則。尊長限於男性，擁有尊長權，其內涵包括教令權、財產管理權；而尊長權的頂點為家長，即對外代表一家，對內總理家政者。[79] 由於尊長限於男性，因此當家中有男子死亡時，即可能造成家族秩序之問題。至於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根據男子死亡的時點以及有無子嗣，可以分成四種情況來討論（如表一）。

表一：男子死亡對於家族秩序造成的可能影響

	分家前	分家後
子嗣尚幼	子承父份 ①	幼兒財產管理權 ③
無子嗣	夫亡守志 ②	立繼主導權 ④

製表者：曾文亮

根據表一，先依照男子死亡時點，可以分成兩類情況：第一類為男子於分家前死亡。如果男子已有子嗣，則將來分家即由該子承父份（即①），如果男子尚無子嗣而留有寡妻，若寡妻守志，則由尊長為死去男子立繼（即②）。無論何種情況，由於尚未分家，因此家產管理仍掌握在家中尊長手中；該寡母孤兒或寡妻仍應服從家中尊長同居共財狀態。[80] 第二類情況為男子於分家後死亡。此時由於已經分家，理論上應該各管各業，但實際上亡夫宗親可能介入家中事務而引發寡妻與亡夫宗親之紛爭。從總督府法院的判決來看，此種因為亡夫宗親介入而引發

---

[79] 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私法》，第 2 卷下冊，頁 179-182、211-227。

[80] 《淡新檔案》中曾有類似案例，某房因恐家業被霸占，主張鬮分家業，正堂受理後，初時亦認為不合則分；及至深入瞭解後，則改變態度，認為「恐孤兒寡婦反為他人所欺，不如仍交[王經邦]掌管」，因而只就每年所收小租進行分派。參見《淡新檔案》22614。

紛爭的情況，多出現在子嗣尚幼或尚無子嗣的情況，而爭執的要點則在於對幼兒的財產管理權或立繼主導權。（即③與④）這類家族紛爭也是總督府法院改造臺灣人家族內部尊卑關係的重要契機。

在 1907 年的一件涉及寡母與宗親爭奪幼兒財產管理與養育權的案件中，總督府法院根據「親權」制度承認本夫死亡後幼兒之法律行為應由母親代理，未經該母親之同意，不得設定其他監護人。[81] 同年 5 月，另一個判決中則承認親權不得拋棄的原則。[82] 上述兩件判決內容雖未提及寡母之丈夫死亡時點，但從涉及幼子財產權來看，應該是屬於分家之後的紛爭。從判決結果來看，法院顯然是站在寡母這一方。亦即，透過將親權從尊長權的概念中分離出來，讓寡母在幼子的管理教養權方面，取得了對抗亡夫宗親（其他尊長或親屬會議）的法律上武器，並由此限縮亡夫親屬干涉家內事務的權限。這樣的見解除了貫徹分家後各管各業的臺灣人家族習慣外，也為改造家族內部尊卑關係提供了理論武器。

2. 親權與監護制度的展開

總督府法院以法理形式引進明治家族法中的親權制度，雖然限縮亡夫宗親介入寡母孤兒的家族生活，但問題並沒有因此終結。這是因為近代民法上的親權制度本在保護未成年子女權益，因此對於親權本身也設有監督機制，以避免父母濫用親權，影響未成年子女權益。此外，當親權者無法有效行使親權時，法律亦設有監護制度以補親權之不足；而有關監護人的選任及監督機關，則交由親屬會議負責。[83] 當法院引進親權制度限制亡夫宗親屬介入寡母孤兒親權關係時，亡夫之宗親即可能透過寡母有親權喪失之事由或另外選任監護人等方式對抗之。結果此後有關這種寡母幼兒與宗親之間的紛爭，即以親權或監護關係的形式展開，法院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引進有關親子關係的種種制度。[84] 在 1907 年的一件判決

---

[81] 1906 年控民第 618 號，1907 年 1 月 18 日判決。參見《臺灣慣習記事》7: 3（1907），頁 41-42。

[82] 1907 年控民第 174 號，1907 年 5 月 10 日判決。參見《臺灣慣習記事》7: 7（1907），頁 38-39。

[83] 有關當時日本法上關於親權、監護以及親屬會議制度，可以參見我妻榮，《親族法・相續法講義案》，親族法，頁 121-154。

[84] 例如筆者以「親權」為事由，檢索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發現共有 112 筆資料。以「後見」（按：即監護）為事由，檢索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則可得到 107 筆資料。欄位查詢：事由，查詢詞彙：「親權」；查詢範圍：所有司法檔案。檢索日期：2010 年 3 月 10 日。其中不論「親權」案件或「後見」案件，最早均出現在 1907 年，亦即覆審法院引進親權舊慣後；其中絕大部分案件涉及親權喪失之請求。

中，已有夫家宗親利用親權濫用欲排除寡母親權，但遭到總督府法院以只憑多數親族之意向並不構成母親親權之喪失為由，判決敗訴。[85] 不過總督府法院在判決中也表示「本島舊慣中，母親所行使的親權，若有母親素行不修，蕩盡財產，致一家瀕於危險之行為時，喪失其親權。」結果此一判決理由中之字句，即成為日後請求確認親權喪失案件的論理依據。[86]

總督府法院在明確宣示親權制度後，使得寡母在幼兒的教育財產管理權上，得到了法律的保障。雖然宗親可能透過親屬會議另選監護人的方式挑戰寡母親權，但始終沒能動搖總督府法院對於親權制度的保障。在 1913 年的一件判決中，總督府法院表示秘密申報監護就職者，親權者得訴請取消監護人就職。[87] 而在 1918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再次確認監護制度只是親權的輔助制度，因此如果親權者存在、行使其親權或未辭退其親權時，由親屬選任監護人取代親權者的作法，並不合法。[88] 換言之，只要有親權者在，任何形式的監護權都無法侵害到親權者的地位。

唯一的例外是託孤。按託孤乃臺灣人習慣中最接近監護權的制度。根據總督府法院早期的判決，其認為託孤只有管理幼年者財產之權，而沒有如監護人般保護監督其身體財產並輔助其行為能力之權。[89] 託孤雖然不如監護，但是託孤卻優先於親權。在 1908 年的一項判例中，總督府法院認為，選定託孤人後，即使幼者生母仍在，亦不得行使親權，等於承認託孤者優先於親權者。[90] 在 1912 年另一則判例中，法院認為如果監護人選任係依照託孤舊慣，不得僅以生母存在即認為不得選任監護人；因此即使生母沒有參與監護人選任，也只能默認其效果而不得主張選任無效。[91] 換言之，所謂託孤的問題，已經被置於監護制度的脈絡下討論。而託孤在臺灣親族相續令草案時，確實也被監護制度取代。[92] 此後的覆審法

---

85 1907 年控民第 432 號。參見《臺法月報》2: 8（1908），頁 5-6。

86 臺南地方法院 1917 年民第 317 號，《臺法月報》，11: 7（1917），頁 6-7。

87 1913 年控民第 50 號。參見《臺法月報》，8: 2（1914），頁 5-6。

88 1918 年控民第 134 號，1918 年 4 月 9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302。

89 1898 年控 316 號，1898 年 11 月 24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98。

90 1908 控 663 號，1909 年 1 月 13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99。

91 1912 年控 408 號，1912 年 10 月 8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300。

92 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親族相續令草案第二草案》（臺北：該會，1912），頁 192-193。根據該草案，託孤被轉化為「最後的親權者以遺言方式指定監護人」之行為。參見該草案第 229 條，頁 194。

院判例要旨中，也未再出現託孤的相關判決。[93]

雖然總督府承認親權的優越性，但是並不意謂未成年者的親屬一方即完全沒有介入的空間。如前所述，總督府法院在 1907 年的判決中曾經指出親權喪失的可能性。而後於 1914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再度確認此一原則；惟此一權限並非親屬間之決議所得為之，而是經由法院宣告始得剝奪其親權。[94]

除了親權喪失之外，親權者的某些行為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在 1917 年的一件判決中，總督府法院即表示親權者接受未滿 16 歲之幼者贈送不動產，屬於利益衝突行為，應得到幼者親屬之同意。[95] 而在親權的監督方面，總督府法院也有相當的討論。在 1918 年的一項協議會決議中，總督府法院認為臺灣人間，母親為親權者或監護人時，對於未成年者不動產之處分，無須親族同意。[96] 不過，覆審法院此一協議會決議並未得到實務上的支持。在 1920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一方面否定臺灣有明確的親屬會議組織，但另一方面也認為行使親權的母親，於處分未成年之子的財產時，應得到重要親屬之同意，為舊慣所承認。[97] 透過這件判決，總督府不僅修正了對臺灣人親屬會議的觀點，同時也修正了親權者所擁有的權限範圍。在之後的另一件判決中，總督府進一步就重要親屬對於親權者為處分行為時應如何表示「同意」，表示其看法。[98] 結果，親屬會議的組織形式雖然遭到否定，但是未成年人的親屬卻以重要親屬的身分取得了制衡的實質權限。

在經過前後 10 餘年的深化處理後，總督府法院對於親權與尊長權的關係，以及親權的法律性質，提出了總結性的看法。在 1918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一方面承認尊長權範圍、視尊長與卑幼親疏，而有廣狹強弱之別，但另一方面則否定尊長均有如內地法上之親權者般，得以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處理各種法律行為之權限；與此同時，總督府法院又表示在臺灣所謂親權，係從內地法觀念觀察父母所擁有之尊長權，而加以命名者，因此親權即父母所擁有之尊長

---

93 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300-302。
94 1914 年控民第 415 號判決。《臺法月報》，8: 12（1914），頁 5-6。
95 1917 年控民第 134 號，1917 年 6 月 12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9 冊，頁 321-322。
96 1918 年 3 月 29 日協議會決議。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344。
97 1920 年上民第 49 號，1920 年 8 月 12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586-589。
98 1920 年上民第 104 號，1920 年 12 月 23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641-644。

權，係專屬於父母。[99] 至於親權之內容，總督府法院在 1919 年的一項判決中指出，得以法理名義將民法適用於臺灣人間。[100]

（三）家制度的改造

如果說個人主義原則的引進，間接促成了親權制度成為舊慣的重要內容，總督府法院對於家制度的改造，則是以臺灣戶口規則與舊慣立法草案中的戶主之家為其主要論理根據。1905 年底，總督府完成戶口普查，新的戶口規則也於隔年開始實施。根據新的戶口規則，臺灣人在警察行政上出現了一個新的組織單元，即戶口登記簿上的「戶」。雖然總督府法院始終堅持戶口登記簿的記載不能作為臺灣人家族關係的絕對證據，但是戶口規則上的戶主以及分戶等概念，卻在舊慣立法中取代了臺灣人習慣中的家長及分家，同時也成為總督府法院用以解釋臺灣人家制度的重要概念。

1. 戶口規則與家族舊慣的改造

在 1911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利用當事人的除籍請求，趁機釐清臺灣戶口規則中的「分戶」與「離戶」概念。總督府法院借用日本戶籍法上的概念，認為「分戶」是指家屬有相當事由，向戶主請求脫離其支配，另外設立本居生活，並經戶主同意時所應為之手續；而「離戶」則是戶主行使戶主權而與家屬斷絕關係時所應為之手續。但是在離戶權的行使上，考慮到臺灣不像日本法中有明文規定離戶事由，因此基於保護家屬並預防戶主權之濫用，而認為「離戶」必須向法院請求裁判後由戶主為之。[101] 在同一天作成的另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對於戶主離戶權的行使，有更具體的說明。[1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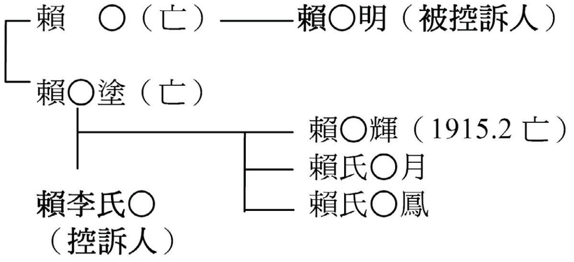
99 1918 年抗第 4 號，1918 年 11 月 9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97。

100 1919 年上民第 8 號，1920 年 1 月 28 日判決。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82。

101 1911 年控民第 56 號，1911 年 5 月 13 日判決。《臺法月報》5: 7（1911），頁 1-3。

102 1911 年控民第 184 號，1911 年 5 月 13 日判決。《臺法月報》5: 7（1911），頁 7-8。在該判決中，戶主請求將其母及亡父之妾除籍，總督府法院認為所謂「除籍」，即臺灣戶口規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16 款的「離戶」之意。而根據戶口規則，「離戶」應由戶主申報，因此向家屬請求除籍手續於法不當。此外，總督府法院也強調對於家中尊長為此類請求，向為本島慣例所不容。

戶口規則上的「分戶」除了可能與離戶相混淆外，其更大的問題在於與臺灣人家族習慣中的「分家」之關係。根據舊慣調查會的調查，臺灣人習慣上的分家有兩個要件：一為分割家產，二為分別住居，亦即所謂「別籍異財」。[103] 但是因為分家之後，根據戶口規則需辦理「分戶」申報手續，因此會造成兩個問題：一為戶口登記簿上有無「分戶」對於實際情況有無影響？第二個問題是，「分戶」與「分家」有何異同？在 1915 年的一件分戶手續請求事件中，即涉及此二問題。茲將當事人之關係圖示如下，並簡附本案事實概要：



本案事實關係大致如下：賴〇與賴〇塗為兄弟。賴〇明為賴〇之子；賴李氏〇則為賴〇塗之妻，兩人並育有一男賴〇輝，及兩個女兒。賴〇死亡後，由賴〇明繼承。賴〇塗死亡後，則由賴〇輝繼承。後賴〇明與賴〇輝鬮分家產並分爨，但未辦理分戶登記。1915 年 2 月，賴〇輝死亡，賴李氏〇請求賴〇明辦理分戶手續，但賴〇明不願，賴李氏〇因此提起訴訟。

本案主要爭點在於臺灣人習慣的鬮分分爨，與戶口登記上的分戶之間的關係。法院審理後，認為根據臺灣人習慣，只要一家之內經過鬮分家產、分爨者，即產生分立一家之效果，因此應該辦理分戶手續。因此，即使當時未即辦理，只要事後請求，戶主仍應協同辦理分戶手續。[104] 法院這項判決，明確闡釋了臺灣人習慣上的分家與戶口規則上的分戶之間的關係。判決中延續《臺灣私法》中對於分家與否的判斷標準（鬮分家產、分爨），並以此家族習慣上之事實，認定應該辦理戶口規則上的分戶手續。與此相反，雖然漏未辦理分戶手續，亦不影響分家之事實。本判決乍看之下雖然只是涉及戶口規則之問題，但實際上同樣涉及寡

[103] 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私法》，第 2 卷下冊，頁 203。
[104] 1915 年控民第 577 號，1915 年 12 月 6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9 冊，頁 214-215。

母孤兒與亡夫宗親之間的家族紛爭；由此可以看出戶口規則與家族舊慣之間的密切關連性。而總督府法院的判決，則再次確認已經獨立出來的「家」之自主性，因而使寡婦得以排除來自亡夫宗親之干涉。

1918 年之後，總督府法院進一步整合分戶與分家的概念，擴大對臺灣人家制度的改造。首先，總督府法院在一件判決認為，隨著時勢發展與經濟狀態的變動，即使是臺灣人也沒有法律上的理由繼續墨守未經鬮分即絕對不得分戶的習慣。因此即使在鬮分之前，只要戶主同意家屬分戶，即得分戶。[105] 總督府法院的這項見解，改變了法院過去認為分家為分戶之前提的見解，使得即使還沒有鬮分家產（鬮分家產＋分爨），也可以發生分戶的效果。但須注意的是，這只意味著分戶的前提要件從「鬮分＋分爨」簡化為「分爨」而已，而非只憑申報分戶，即可生分戶之效果。[106]

其次，總督府法院對於家長權的內涵，也有新的看法。在 1920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將臺灣人習慣中的家長等同於戶口規則上的戶主。根據該判決，總督府法院認為「戶主」為戶口規則所新設者，其權利義務不依習慣；而是在與習慣不牴觸的範圍內，依法理判斷。[107] 而後在另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又認為戶口規則中的戶主為一家之主宰者，其資格及繼承順位一任習慣。而習慣上家長之繼承順位，同列間以長優先於幼，而不依嫡庶，因此戶主之繼承順位亦應比照之。再者家長雖然統理家屬、代表一家，但未必繼承前家長之財產、主持家祖之祭祀。[108] 總督府法院這些判決中的看法，與「臺灣親族相續令草案」中對於家的主宰者即戶主，以及戶主的繼承順位之規定相一致。[109] 而家長未必繼

105 1918 年控民第 110 號，1918 年 6 月 20 日判決。《臺法月報》12: 8（1918），頁 4-7。

106 參見 1922 年上民第 49 號，1922 年 10 月 8 日判決。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62。

107 1920 年控民第 125 號，1920 年 6 月 25 日判決。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59-160。

108 1918 年控民第 460 號，1920 年 8 月 20 日判決。參見伊藤正介，〈本島人の戶主〉，《臺法月報》14: 11（1920），頁 25。

109 在「臺灣親族相續令」草案所設定的家制度中，一方面將一家之主稱為戶主，並在戶主權的具體內容上，參考了明治民法；另一方面考慮到臺灣人的家制度與日本畢竟不同，因此在戶主資格、戶主財產繼承以及家產分析效果上，仍然參酌了臺灣舊慣。從草案具體內容來看，該草案第二章的標題為「家」，而「家」之第二節為「戶主」，其立法理由為：使用「戶主」一語取代「家長」並沒有造成混淆之虞。至於戶主之繼承順位，根據草案第 3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同列親間長先於幼」。參

承前家長財產的看法，則與戶口規則只處理生活關係而不涉及財產權分配之原則一致。[110] 由此亦可知舊慣立法草案最終雖然失敗，但是其將臺灣人家族習慣轉化為法典形式後，對於司法實務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111]

2. 戶主之家的引進與家產繼承制度

所謂家產繼承，乃日本人在舊慣調查過程中，對於臺灣人分家習慣的理解。[112] 因此在家產繼承中，女性自始被排除在繼承人之外，只有在男子死亡而無男性可以繼承時，女兒才例外可以繼承財產。總督府法院對於臺灣人家產繼承制度的改造，主要也是圍繞在男子死亡而無嗣的問題上（參見前述表一④）。而這個問題又涉及兩個部分：一為死亡後留有女兒時的女子繼承權問題，二為死亡後無子女的立繼主導權問題。

在男子死亡留下寡妻與女兒的情況中，總督府法院在 1906 年的一項總會決議中，根據臺灣人習慣，肯定被繼承人為無嗣子之男時，女子（包含未亡人）得為繼承人。[113] 但是該解釋並未考慮到立繼（死後收養）制度對於女子繼承權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在 1913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認為根據舊慣，在有親生女的情況下，以房之繼承為目的而收養過房子者，非為該女之過房子，而是死者之直接繼承人。[114] 直到 1922 年為止，總督府法院仍然認為根據臺灣舊慣，於被繼承人只有女兒時，該女子不當然繼承被繼承人之財產。只有在被繼承人族親沒有異議的情況下，始得繼承。從而女子之繼承權於未確定族親無異議之前，處

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親族相續令第二草案》，頁 22、42-44。而在同年稍後作成的另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則認為臺灣的戶主，或稱為家長，或稱為家主，係指一家之主宰。戶主在家之內部統理家政，對外則代表一家，但不一定承繼宗統或主掌祭祀家祖之事。見 1920 年上民第 92 號，1920 年 11 月 11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632-634。

110 關於此一改變，當時的高等法院書記長伊藤正介稱之為「家長戶主說」，並認為從家長的起源及目的來看，臺灣人習慣中的家長實際上已經消失，法院此一判決對於家長之認定，只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參見伊藤正介，〈本島人の戶主〉，《臺法月報》14: 11（1920），頁 25-28。

111 曾經任職舊慣調查會的小林里平，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914 年親族法相續法草案確定後，儼然成為實務界的唯一權威，只要是與親族事件有關者，法院都會參考草案內容。參見小林里平，〈臺灣戶籍法の根本主義に就て〉，《臺法月報》12: 8（1918），頁 48-49。

112 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私法》，第 2 卷下冊，頁 546-560。

113 1906 年 8 月 11 日總會決議。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340。

114 1912 年控民第 273 號，1913 年 8 月 27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9 冊，頁 65-66。

於不確定狀態。[115] 但是上述判決中亦未承認夫家宗親得直接介入立繼問題。因此，從「家」的觀點來看，尚難謂總督府法院的立場與寡母孤女對立。

雖然女子的繼承權始終未得到明確的保障，但是在立繼主導權的部分，總督府法院則維持分家後各管各業的原則，排除來自宗親的干預。在前述 1915 年控民第 577 號分戶手續請求事件判決作成的數日後，賴家的族親隨即召開親屬會議，替賴〇輝選任過房子，欲透過這一方式，排除賴李氏〇的戶主地位，而奪回賴〇輝的遺產管理權；結果演變成另一場法律訴訟。在該訴訟中，賴家族親以過房子賴〇海的戶主名義，提出離緣及離籍請求。[116] 茲將本件判決中之當事人關係，圖示如下：

法院所認定之事實如下：1903 年 12 月 12 日，賴李氏〇與賴〇塗結婚入戶，賴〇塗死亡後，由長子賴〇輝繼承戶主。1915 年 2 月 16 日，賴〇輝死亡，由賴李氏〇繼承，而後分家成為戶主。賴家族親等於 1915 年 12 月 11 日召開親屬會議，未經賴李氏〇之承諾，即決議將賴李氏〇自賴家離籍，並選任控訴人賴〇海為賴〇輝之過房子。

從賴家族親後續的行為來看，其認為在賴〇輝死後無嗣的情況下，有關立繼

115　1922 年上民第 71 號，1922 年 10 月 26 日判決。《覆審高等判例》，第 7 冊，頁 377-380。總督府法院對於立繼問題或死後收養的承認，與舊慣立法的立場相當接近。在 1912 年的「臺灣親族相續令草案」中，對於家產繼承人之順位規定分別為被繼承人之兒子、被繼承人之女兒以及被繼承人之妻。但在同條中又規定「依第 165 條規定收養之養男，為第一順位繼承人。」而草案第 165 條規定為成年男子或有妻之男子，無第一順位繼承人而死亡，且未留遺言收養特定對象時，其妻得於其死亡後六個月內，經親屬會議之同意，為死者收養養男。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親族相續令草案第二草案》，頁 149、243。此一規定具有幾項重要的意義。首先，所謂死亡後收養，與臺灣人習慣中的立繼相當接近；只是舊慣立法草案中所重視的乃是財產繼承上的意義，而不包含臺灣人習慣中的宗祧延續。其次，明定死後收養的期限為死亡後六個月內；換言之，女子能否繼承最晚在被繼承人死亡後六個月即可確定。第三，死後收養的主導權，歸於被繼承人之妻子與被繼承人之親屬。除了對期限的限制可能是配合「相續未定地整理規則」之影響外，其餘大致符合臺灣民間習慣。

116　1916 年控民第 280 號同第 278 號，1916 年 9 月 9 日判決。《臺法月報》10: 11（1916），頁 49-51。

的問題，應由賴家宗親決定。但是法院的判決認為：(1) 戶主死後而無得繼承之子女時，由寡婦繼承為家長，親屬會議離籍之決議在法律上無效。(2) 於右述場合，亡戶主過房子之選定，為行使家長權之寡婦的權利，親屬會議違反其意選定過房子之決議，亦屬無效。

第一項要旨係針對戶主繼承人之決定。總督府法院認為戶主死後無子女時，由寡婦繼承戶主地位的看法，與舊慣立法草案中對於戶主繼承順位的規定相類似，[117] 並由此確認寡母的家長權。至於第二項要旨則是在寡婦繼承戶主地位的前提下，認為「立繼」或「死後收養」乃戶主之權限，因此宗親不得違反其意思而自行選定繼承人。總督府法院此一見解，雖然沒有承認寡母為家產繼承人，但其對於立繼權限的判定，對於重視「夫宗」的臺灣人習慣而言，不啻為一大改變。在 1900 年代初期總督府法院的舊慣問答中，有關鬮分後未亡人收養螟蛉子的問答紀錄：

問：鬮分後未亡人得任意收養螟蛉子？

答：雖說依照未亡人意，但仍須接受各房之協贊。

問：也就是說各房同意的話，未亡人得從他處任意收養螟蛉子嗎？

答：於親屬會議中得到承諾者，得依照未亡人的意思。

問：在上述會議中，各房有以其子繼承之意而為異議時，未亡人即無法貫徹其意志嗎？

答：是的，不得違反協議而遂其意志。（按：底線為筆者所加）[118]

上述問答中所反映的臺灣人習慣是：寡婦在已經鬮分家產的情況下，雖然可以擁有挑選收養對象的權利，但是此一權利仍須受到夫家親屬會議的限制。[119] 但

---

117 臺灣親族相續令草案第 35 條規定，戶主繼承順位男優先於女，尊屬親優先於卑屬親。但草案中同時規定非家產繼承者不得為戶主繼承人。但根據同草案第 303 條，得為家產繼承人者為被繼承人之妻，生母並沒有家產繼承資格。參見《臺灣親族相續令草案第二草案》，頁 43-45、243-254。由此以觀，總督府法院的這項見解，仍與舊慣立法草案有別。

118 當日應答者則包括吳德功、林燕卿、莊士哲、王學潛、呂汝玉、林耀亭、吳銘元、林慶岐等臺灣中部士紳。完整問答內容，參見〈舊慣調查諮問筆記：財產承繼に關する事項〉，《臺灣慣習記事》3: 3（1903），頁 38-41。

119 必須注意到的是，此一問答背後的結構可能產生的問題。由於接受訪談的臺灣人代表，都是地方上的實力人物。在此問題上，這些人的立場往往屬於宗親、親族會這一方。因此此一問答是否確實反映當時民間習慣不無疑問。不過從法院判決經常涉及寡母幼兒與夫家宗親的紛爭來看，這些宗親確實經常干預寡母幼兒家中的事務。

是根據總督府法院的這項判決，已分家後戶主死亡時，寡母或寡妻得以繼承家長權，並對立繼問題擁有主導權。

如果比較總督府法院對於「戶主死亡只留下女兒」，以及「戶主死亡而無子女」兩種情況的判決，可以看出戶主（被繼承人）的母親／妻子在戶主有女兒的情況下，所能擁有的對抗宗親的法律上籌碼，明顯不如沒有子女時。而其背後的原因，乃在於戶主繼承權順位的問題上。至於另外一種夫亡有子的情況，雖然沒有家產繼承上的問題，但是從被繼承人的「家」的觀點來看，還是免不了有寡婦與夫家宗親之間的爭執；只是這些爭執是以前述的親權與監護權／親屬會議對抗的形式反映在法院判決中。

從上述關於臺灣人家制度舊慣的相關判決可以看出，此一時期的總督府法院，主要是在寡母孤兒與宗親的紛爭案件中，透過戶口規則與舊慣立法草案中所引進的明治家族法「戶主之家」制度來處理家產繼承問題，而排除來自亡戶主的宗親勢力之干預。此一以戶口規則與舊慣立法草案中的「戶主之家」，取代習慣中「家長之家」的結果，使得臺灣人的家制度朝向明治家族法上的家制度靠近。[120]

四、家族舊慣的進一步改造與未竟的內地延長

上述總督府法院對於臺灣人家制度的改造，在 1918 年之後有加大幅度的趨勢，可能與日本中央對臺政策的轉向有關。隨著原敬首相的上臺，中央對臺政策從舊慣立法政策所賴以維持的「特別統治方針」轉向「漸進同化主義」；其對臺灣法制的基本政策，則由舊慣立法轉向「內地延長主義」。1919 年總督府法院的改制，也是此一趨勢的反映。法制政策的轉向，讓總督府法院成為民商法內地延長政策的主要立法技術提供者，因而在司法判決之外，也在立法領域內取得較多的發言空間。這提供了總督府法院另一種實踐自己法制目標的可能性。

（一）家族法的內地延長與舊慣改造的趨緩

1921 年初帝國議會制定了法三號取代三一法，成為臺灣法域的基本法。同一

---

120 惟此非謂臺灣人家制度已經與明治家族法上的家制度一樣。關於此點，可以參見王泰升，〈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的法制改革〉，頁 177-178。

年，總督府開始推動民商法的內地延長政策，並於同年 9 月以訓令第 164 號公布「法令調查委員會規程」（「法令取調委員會規程」），設置法令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法令調查會」）作為調查審議相關法制之機構。此一新成立的法制機構中，總督府法院判官占了多數。[121] 換句話說，負責臺灣民商事法的立法者，隨著政策的轉向，從學者主導轉向實務法曹主導。由於法令調查會乃總督府的立法技術機構，因此總督府法院得以在司法手段之外，同時尋求以立法手段改造臺灣人家族法制。

1. 家族法內地延長之挫折

總督府在 1921 年開始推動民商法內地延長政策。1921 年 10 月，由法令調查會提出的評議會諮問案中，其方針為：原則上民商法全部適用，只有針對臺灣人親屬繼承事項保留少數特別規定。[122] 這個少數特別規定的方針，可謂總督府法院與總督最初的共識。但是在評議會中也曾出現不同聲音。雖然最後的表決結果仍然維持法令調查會的原則，施行內地民法、少數保留特別規定，但是田健治郎總督在 1921 年底改命法令調查會轉向，將親屬繼承兩編均劃為特別規定。[123] 最後法令調查會即是根據此一方針而草擬出勅令草案；經過評議會審議及修正後，由總督府呈送給中央完成立法程序，即勅令第 406 號、第 407 號，並於 1923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結果除了親屬範圍的部分明文規定依照日本民法外，對於只涉及臺灣人間的親屬繼承事項，仍然依照臺灣人的「習慣」。勅令第 407 號第 5 條之所以用「習慣」取代「舊慣」，具有彰顯內地延長的意思。[124] 不過，規範用語

---

[121] 根據法令取調會規程，法律取調會置委員長一人、委員若干人；委員長由總務長官出任，委員則由臺灣總督從臺灣總督府高等官及臺灣總督府法院高等官中任命。從 1921 年的法令取調會委員名單來看，在 14 名委員當中，總督府法院判官共有 8 名。參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大正 11 年版），頁 76。

[122] 參見臺灣總督府評議會編，《第二回總督府評議會會議錄》（臺北：該會，1921），谷野格發言紀錄，頁 40-42。

[123] 根據田健治郎後來的說法，係考慮到繼承編與親屬編關係非常密切，如果在繼承編設置除外例的部分要適用親屬編規定時，可能造成麻煩，因此，要求法令取調委員會在繼承編外，親屬編也要加入除外例。但如此一來，有關除外例的內容即需要從長計議，因此親屬繼承編暫時排除，先就民法其他部分調查。參見臺灣總督府評議會編，《第三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會議錄》（臺北：該會，1922）谷野格發言紀錄，頁 43-44；臺灣總督府評議會編，《第三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會議錄》，田健治郎發言紀錄，129-130。

[124] 蓋如果繼續使用「舊慣」一詞，亦使人聯想到舊政府時期，而與內地延長的基調不符合。參見王泰升，〈學說與政策交織下的日治臺灣民事法制變遷〉，頁 83。又此處的「習慣」，日文為「慣習」。

雖然改變，但對於總督府法院而言，其仍須靠自己在個案判決中去發現適用的法律規範，因此在現實上並無不同。

總督府法院對於這樣的立法成果，顯然不太滿意。《臺法月報》在 1923 年 1 月以整號的篇幅刊載了各界對於此一盛事的賀詞。然而在一片祝賀聲中，當時高等法院覆審部長伴野喜四郎的〈親族篇の施行の急務〉專文，卻呼籲應儘速將親屬法中親權、監護，以及親屬會議等規定，施行於臺灣人間。[125] 總督府法院中像伴野這樣希望儘早實現內臺法律一致者，絕非罕見。例如負責主導法案起草的高等法院院長谷野格，以及同樣擔任高等法院判官的姉齒松平，也都是持同樣的立場。姉齒在 1929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無法贊同在 1923 年將親屬繼承篇排除在民法適用之外一事。[126]

從伴野喜四郎與姉齒松平的文章來看，總督府法院主張內外地法制一元化的主要理由，還是在於實務上的考量。[127] 用姉齒松平的說法來講，就是「人事編的施行並不是破壞舊慣，而是要補充整理舊慣的不足。」[128] 總督府法院雖然對立法結果感到失望，但因為家族法的除外規定本屬於過渡性措施，因此總督府法院仍可嘗試透過立法的方式解決此一問題。1928 年當總督府再度因為共婚議題而討論臺灣戶籍制度的問題時，總督府法院即趁機鼓吹「根本法論」的修法立場。[129] 總督府法院的努力最後發揮了作用。1929 年 4 月，總督府命令法令調查會針對親屬繼承法以及戶籍法制的施行問題進行研究。[130] 到 1930 年 6 月，完成關於親屬法、繼承法以及戶籍法的研究，並準備著手立案，[131] 同年 9 月完成立案，10 月

---

125 參見伴野喜四郎，〈親族篇の施行の急務〉，《臺法月報》16: 1（1923），頁 56-59。

126 參見姉齒松平，〈本島人に付民法人事編の施行は何故急務なるや〉，《臺法月報》23: 1（1929），頁 28。

127 從兩人的文章來看，可以歸納成三點理由：(1) 法律的明確性要求：舊慣的曖昧性，有損於法律的明確性要求。(2) 民法的體系性要求：因為親屬繼承篇的除外，造成許多法規出現破綻，而且親屬繼承事項依用舊慣，也可能產生與其他民法規定相矛盾的情形。(3) 社會進化的要求：因應時代的進步，舊慣已經不敷需要，因而有必要採取新的法律制度。參見姉齒松平，〈本島人に付民法人事編の施行は何故急務なるや〉，《臺法月報》23: 1（1929），頁 28-39。伴野喜四郎，〈親族篇の施行の急務〉，《臺法月報》16: 1（1923），頁 56-59。

128 參見《臺法月報》23: 1（1929），頁 31。

129 此一用語來自 1933 年當時關於內臺共婚法施行的新聞報導，用於指稱主張臺灣戶籍法制應與日本家族法是否施行於臺灣人間一併處理之觀點。參見〈內臺共婚法實施〉，《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第 11778 號（昭和 8 年 1 月 21 日），第 4 版。與此相對的另一派的觀點為「便法論者」，其主張臺灣戶籍法制只需針對日臺共婚所衍生的戶籍登記問題，而不涉及臺灣與日本內地全部之戶籍法上的問題。

130 參見〈法令取調委員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10421 號夕刊（昭和 4 年 4 月 23 日），第 1 版。

131 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0849 號（昭和 5 年 6 月 29 日），第 4 版。

向內閣拓務省提出。為了說服日本中央將日本家族法施行於臺灣人間，法令取調委員會並編纂了一份《民法第四編第五編與臺灣舊慣之逐條比較對照調查》（民法第四編第五編ト臺灣ニ於ケル慣習トノ逐條比較對照調）。[132]

對於總督府法院所主張將明治家族法施行於臺灣人間，可以稱為「內外地法制一元化」的立場；此一立場已經明顯與舊慣政策初期的總督府法院不同。而其在 1920 年代初期的立法過程，以及 1930 年代初期的修法嘗試，更顯示了殖民統治者內部對於殖民地法制同樣可能存在不同的立場與主張。從 1930 年的這次修法能夠送到中央，意味著總督府法院的立場已為總督當局所接受；但是因為日本中央的立場差異，最後還是無法達成總督府法院所期待的民事法一元化目標。不過，修法雖然失敗，總督府法院在這次修法過程中所提出的調查報告，總結了到 1920 年代為止的總督府判決對於臺灣人家族習慣改造成果；報告中以明治家族法為標準，觀察明治家族法在哪些領域有相對應的臺灣人舊慣，哪些領域的臺灣人舊慣是特殊的，又有哪些領域是臺灣人舊慣所無。因此該報告對於總督府法院後續的實務判決而言，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2. 舊慣改造的趨緩

相較於 1910 年代末期到 1920 年代初期總督府法院對於臺灣人家族舊慣的大幅改造，1923 年勅令第 407 號實施後，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家族舊慣的改造步調明顯趨緩。這背後的可能原因，除了總督府法院在立法權方面的發言權增加，因而導致其可直接尋求立法上的改革之外，也可能與勅令第 407 號法制初定有關。[133]在這樣的背景下，總督府法院判決中對於臺灣人家族舊慣問題，只是延續既有的改造成果，而較少見有新的舊慣改造。

雖然此一階段較少明顯的舊慣改造，但是還是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對於「媳婦仔」概念的釐清。由於「媳婦仔」的性質同時包含有收養以及婚姻的元素，因此從日治初期以來，法律界對於「媳婦仔」之歸類即不斷搖擺於收養與

---

132 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03-157。關於此一調查資料之用途，係參考姉齒松平《本島人ノミニ関スル親屬法並相続法ノ大要》一書中之說明。參見姉齒松平，《本島人ノミニ関スル親屬法並相続法ノ大要》（臺北：臺法月報發行所，1938），頁 41、84-85。

133 另外一個可能的因素是，積極促進內外地法制一元化的谷野格高等法院長也於 1923 年去世，此後繼任的幾位高等法院長並沒有如谷野格般的強烈的企圖心。

婚姻之間。但是在 1923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區分媳婦仔與定婚，認為所謂媳婦仔係指以將來與養家之男子結婚為目的，而進入養家被養育之女子，其與僅約定將來結婚，但未將女子送到男方家扶養的定婚不同。[134] 到了 1925 年總督府法院在另外一項判決中進一步區分養媳與養女概念的差異，認為媳婦仔係以將來成為子媳之目的所養入之異姓幼女，其不論收養當時是否已存在確定的未來之夫，均與已成婚之婦一樣，於本姓之上冠養家之姓，並與養家之親屬發生姻親關係。至於養女，除了沒有前述目的外，在姓氏方面也不是冠姓而是直接改為養家之姓，且與養家親屬間之關係就跟親生子女一樣。[135] 透過上述判決，總督府法院一方面重新賦予養媳明確的定義，另一方面則透過該定義，將媳婦仔區分為兩類，而分別定其歸屬。

另一個比較明顯的改造，則是將個人主義原則引進收養關係中。在 1919 年的判決中，總督府法院仍認為臺灣人的養子緣組契約之當事人為養父與養子之生父，因此養子的意思如何並非所問。[136] 但是在 1929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認為臺灣人過去的養子緣組，雖然是以養子的生父與養父間之合意為成立要件，但上述習慣隨著時勢變遷、文化發達而自我改善，改認為養子緣組依養父母與養子之間的契約而成立。[137] 經由此判決，總督府法院進一步將成年制度擴展到收養契約的締結上，貫徹個人主義原則。

（二）家產制度的改造與舊慣的日本化

除了利用修法手段尋求內外地法制一元化外，總督府法院同時也繼續在判決中透過各種改造舊慣的手段，將臺灣舊慣架接至日本民法體系之中。特別是在 1930 年代初期的立法嘗試失敗之後，總督府法院的舊慣改造步調有明顯加快趨勢。從其改造內容來看，一方面繼續根據個人主義原理與日本家制度原理，改造

---

134 1923 年上民第 26 號，1924 年 2 月 28 日判決。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79。

135 1925 年上民第 102 號，1925 年 8 月 4 日判決。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80。

136 1919 年控民第 524 號，1919 年 11 月 15 日判決。《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484。

137 1929 年上民第 81 號，1929 年 9 月 25 日判決。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78。

臺灣人家制度與家產繼承制度，另一方面則在法律概念體系上揚棄臺灣人習慣用語而改用日本法上的用語，由此使得臺灣人家族舊慣進一步脫離固有習慣，更加朝向明治家族法靠近。

1. 家產繼承制度的改造

總督府法院再度積極透過判決改造臺灣人家族舊慣，主要發生在 1930 年代。此時總督府法院剛在家族法與戶籍法制日本化的修法工作中遭遇挫敗。但另一方面，總督府法院藉由此次修法過程，仔細地從明治家族法觀點檢討了臺灣人家族舊慣，而這一研究成果也成為總督府法院司法改造的重要依據。整體而言，總督府法院在 1930 年代對臺灣人家制度與家產繼承舊慣的改造，基本上是將家產制度轉化為財產繼承制度。而在具體的改造過程方面，可以分成幾個部分來看。首先是將原本結合了「生活」（同居）與「財產」（共財）的家產分析制度，轉變為單純以「財產」關係的變動為主的「家產繼承」制度。此一改造的關鍵點在於利用戶口規則中的「分戶」概念轉化「分家」的意義，並將繼承人的資格判斷時點提前到繼承發生時。例如在 1929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認為家產繼承人的資格，為繼承發生時屬於家屬身分的直系卑屬男子；如果是已經因為別籍異財而離開家者，即無繼承權。[138] 此一關於繼承資格之判斷，在舊慣立法草案中已有規定（第 309 條）；其主要考量係繼承權的發生時點為被繼承人死亡時，因此不以習慣中之分析家產時點為準。[139] 至於何謂「別籍異財」，根據 1930 年的判決，認為只要自被繼承人家中分戶即喪失繼承權，並不以經過家產鬮分者為限。[140] 而到了 1936 的另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再度承認分家即分戶外，並重申分戶不以申報為要件。[141] 根據上述判決，加上之前已經完成的改造，臺灣人家制度舊慣與日治初期所調查的臺灣人家制度習慣已有明顯差異，茲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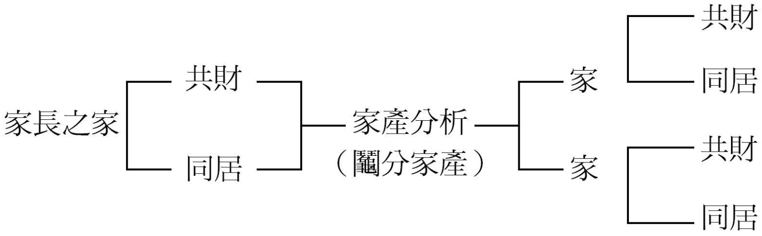
---

[138] 1929 年上民第 19 號，1929 年 4 月 19 日判決。參見姉齒松平，〈本島人の慣習上に於ける分戶の要件に就て〉，《臺法月報》24: 6（1930），頁 9。《覆審高等判例》，第 7 冊，頁 162-167。

[139] 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親族相續令草案第二草案》，頁 250-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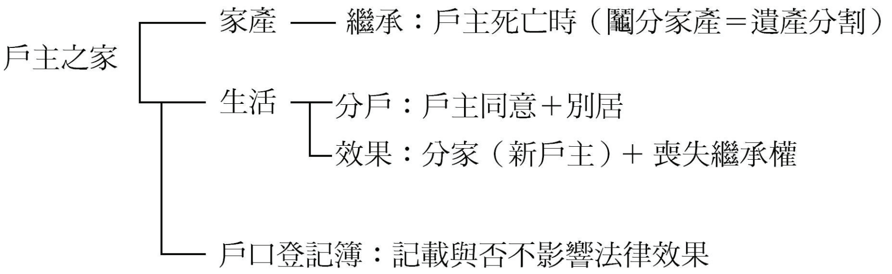
[140] 1930 年上民第 69 號，1930 年 5 月 24 日判決。參見姉齒松平，〈本島人の慣習上に於ける分戶の要件に就て〉，《臺法月報》24: 6（1930），頁 11。

[141] 1936 年上民第 146 號，1936 年 9 月 31 日判決指出，臺灣人習慣上的分家，以家屬取得戶主同意，設立新家即為已足，不以申報為要件。參見《臺法月報》30: 12（1936），頁 43-48。



圖一、臺灣人習慣中的家制度

繪圖：曾文亮



圖二、總督府法院判決中的臺灣人家制度舊慣

繪圖：曾文亮

圖一為臺灣人習慣中的「家」，是由家長帶領的同居共財團體。此一同居共財團體的變動，是透過分家（家產分析）的形式進行，完成家的世代交替。圖二則是經過總督府法院改造的臺灣人家制度，根據 1920 年的判例，可稱為「戶主之家」；惟此一戶主概念係源於戶口規則，因此與明治家族法上的戶主概念仍有不同。在「戶主之家」的架構下，分開處理生活上的住居變動（「分家」）與財產上的變動（「家產繼承」）。其中生活上的住居變動因為涉及對臺灣人動態的掌握，根據戶口規則規定必須辦理申報（但不以申報為生效要件），而財產關係的變動，則根據繼承法原理，以被繼承人死亡為變動時點。

總督府法院改造臺灣人家產繼承舊慣的第二個重要環節，在於採用「戶主／家屬」繼承框架取代「家產／私產」繼承框架。按日本初期確立個人所有權後，總督府法院一方面將祭祀公業排除在民法適用範圍外，另一方面則以財產繼承制度來解釋臺灣人的分家習慣。由於同時賦予家長與家屬法律上主體地位，因此所謂的繼承，除了家長之外，也包括因為家屬死亡而產生的繼承。結果在財產繼承

上，也就分成「家產繼承」與「私產繼承」。此一「家產／私產」的規範框架，從 1900 年代的舊慣調查時期即已確立，並一直被沿用到 1930 年代。[142] 但隨著將臺灣人家制度與戶口制度中的戶主概念之整合，總督府法院在 1931 年法令取調委員會的「民法與舊慣對照調查研究」中，首度以舊慣變遷為由，將臺灣人的繼承舊慣，區分為「戶主權繼承」與「財產權繼承」。[143] 這一見解在 1935 年高等法院上民第 198 號判例中，為總督府法院所採納，成為臺灣人家族舊慣的內容。由於本判決乃用來說明承認私產對於臺灣人傳統家產習慣所產生影響的絕佳案例。為方便說明起見，茲將本件關係人及事實摘要如下：

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如下：林〇為戶主，有後妻林戴氏〇。1921 年 5 月 16 日林〇過世，留下一筆土地。1922 年 11 月 18 日林〇明亦過世，而且沒有妻兒。1934 年，林〇本透過親屬會議選任繼承人，繼承林〇明之應繼分。林戴氏〇為此提出訴訟。

從臺灣人習慣來看，這個事件涉及的是家父長過世後尚未分家前，某房絕嗣的問題。依照臺灣人家族習慣，此時應該為該絕嗣之房選任嗣子（通常由同宗兄弟之子過房），由其繼承該房煙祀及應得之財產，亦即總督府所謂的「死後收養」方式。換言之，林〇本在本件中的處理方式，事實上是符合臺灣人習慣的作法。而林〇本在本件中亦主張該土地既係繼承自原戶主林〇，自然屬於家產，因此林戴氏〇不具繼承人資格。林〇本的此一主張並且得到控訴審法院的認同，因而判決林〇本勝訴。

---

[142] 例如在 1930 年再抗第 4 號，同年 12 月 23 日判決中，總督府法院仍重申臺灣人的財產繼承分為家產繼承與私產繼承兩種，並由此而說明兩者之內容及繼承發生時點之差異。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5 冊，頁 293-298。

[143] 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42-143。

但是高等法院上告部接受上告人之論旨，認為林〇死亡後，其戶主權由林〇本繼承，其財產則由林〇本與林〇明繼承。由於尚未分家，因此林〇明為林〇本之家屬。嗣後林〇明死亡時，即財產繼承之順位即為：直系卑屬、配偶、直系尊屬、戶主。因此在本件中，林〇明死亡所發生之財產繼承既然屬於因家屬死亡而生之財產繼承，則直系尊屬的林戴氏〇之繼承順位，在戶主的林〇本之前。

總督府法院此一判例不再從財產屬性區分繼承類型，而改從被繼承人身分，將繼承區分為兩類：因戶主死亡之繼承，與因家屬死亡之繼承。前者除財產繼承外，還包括身分之繼承；而後者則只有單純的財產繼承。其次，戶主死亡時之財產繼承與家屬死亡時之財產繼承，有不同的繼承人順位。這樣的架構，與日本民法上的家督繼承發生於戶主更迭、遺產繼承發生於家屬死亡之邏輯，完全相同。但是戶主死亡時，雖然發生戶主身分繼承與戶主財產繼承，惟原來的家並未因此分化，因此在家父長死亡後，仍然維持了「戶主—家屬」的結構，從而林〇明繼承自父親的財產遂成為家屬個人財產。[144] 因此一旦林〇明死亡，即再度發生「家屬遺產繼承」；從而於該家屬無男性子孫時，即由次順位繼承人繼承，而非透過「死後收養」的方式選定繼承人。總督府法院在本判決中所使用的「戶主／家屬」規範框架，明顯是受到明治家族法的影響。此後總督府法院即在此一框架下，一方面從近代繼承法的原理改造臺灣人家產繼承舊慣，一方面將日本戶主制度的相關規定，引進臺灣人家族舊慣中。

總督府法院運用繼承法理改造臺灣人家產繼承舊慣的第三個重要部分，在於改造宗祧因素對財產繼承的影響。日治前期雖然引進財產繼承制度，並認為家產繼承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即發生，但對於涉及宗祧延續的立繼習慣，雖然改用「死後收養」之概念，但實質上並未改變立繼內涵，因而造成女子繼承權之不確定性，已如前述。進入 1930 年代後，情況有所不同。在前述「戶主／家屬」框架下，總督府法院在戶主死亡與家屬死亡而無法定繼承人的情況，分別引進「選定追立繼承人」與「代位繼承」制度。在選定追立繼承方面，總督府法院首先在 1935 年的一項判決中，認為臺灣人戶主死亡而沒有男性直系卑屬時所選出的「選定追立繼承人」與被繼承人間不必然發生養親子關係。而後在 1939 年的另一項判決

144 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42。

中，總督府法院除再度確認此一原則外，並進一步承認戶主的尊屬親亦得成為選定追立繼承人。也就是說總督府法院使用「選定追立繼承人」取代「死後收養」，不僅只是概念用語的轉換而已，同時在實質上，也讓女子、尊親屬均得以成為選定追立繼承人，而改變了臺灣人習慣中家產只能循著「宗祧」延續而往下一個世代移轉的觀念。

而在家屬死亡但沒有法定繼承人時，總督府法院同樣承認得透過選定方式追立「代位繼承人」。在 1939 年上民第 62 號判決中，總督府法院一方面承認女子得成為選定代位繼承人，另一方面則強調繼承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之代位繼承人選定期間，以被繼承人死亡前為限。[145] 由於本件判決頗能反映代位繼承人與立繼習慣的差異，因此摘要說明如下：

本件案例事實為：陳甲於 1935 年 4 月 2 日死亡。陳甲之子陳乙於陳甲死亡前之 1920 年 1 月死亡，留下一女陳氏〇；1937 年 4 月，陳氏〇被陳甲之親屬選為財產繼承人。本件之爭點在於陳氏〇被選定為陳乙之繼承人是否成立？

二審判決認為：依照臺灣人習慣，繼承人死後無嗣，於繼承發生時，得選定繼承人繼承。但高等法院上告部的判決則否定此一習慣，認為臺灣人習慣中的選定繼承人，有期間之限制，亦即該選定行為必須自繼承人死亡之日起，至繼承發生為止。本事件中，自 1920 年 1 月 25 日起，至 1935 年 4 月 2 日為選任期間。法院限制選定期間的理由是，這樣才能符合繼承制度的性質，並保障交易安全。

從陳氏〇的被選任並未成為爭點，可以知道總督府法院使用選定代位繼承人一詞取代立繼或死後收養，並不只是名詞上的替換而已，而是在實質內涵上改造立繼舊慣。而本件判決認定代位繼承人選定期間以繼承發生前為限，則是繼承法原理的進一步貫徹，有助於避免因為立繼舊慣或死後收養所造成的繼承狀態不明確。

---

[145] 1939 年上民第 62 號，1939 年 5 月 17 日判決。參見《臺法月報》33: 8（1939），頁 66-70。

總督府法院在 1930 年代中期，將臺灣人家產問題從「家產／私產」繼承框架轉換為「戶主／家屬」繼承框架，確實是一項重大的改造。在「家產／私產」框架下，「宗祧」雖然被排除在法律之外，但是其對於家產繼承仍具有實質的影響力。男子不論先或後於戶主死亡，只要在分析家產前有某房死亡而無子嗣，其所涉及的死後收養或承祖相續，與習慣中的立繼並無實質不同。但是在「戶主／家屬」的框架下，在男子先於戶主死亡的情況，會發生兩種效果：一為其自身的家屬遺產繼承效果，另一為其作為推定戶主財產繼承人資格的代位繼承問題，於男子無法定繼承人時，可於戶主死亡前選定追立繼承人（亦即 1939 年上民第 62 號之情形）。而如果男子在戶主死亡後尚未分析家產前死亡，根據戶主／家屬框架，雖然尚未分家，但前戶主之財產，因為繼承已經發生，除了繼承戶主地位者外，其餘之人所繼承之前戶主財產，已經變成家屬財產，此時因而發生家屬財產繼承的效果。經由總督府法院的改造，財產移轉具有重大影響的時點，已經從分析家產時轉移到戶主與其繼承人死亡之時，也就是繼承發生之時點。這一關鍵時點之轉移，固然與近代繼承法原理有關，但是此一西方化的改革，乃是在參考明治家族法框架的前提下所進行；亦即此一西方化改革乃是在日本化的過程中所發生。

總督府法院對於臺灣人家制度的日本化改造，從前述「戶主／家屬」的繼承框架已可清楚看出。在前述框架下，於戶主死亡而無法定繼承人時，總督府法院參考了明治家族法中關於選定家督繼承人的原理，而認為選定追立戶主繼承人與前戶主不必具有養親子關係，從而前戶主之尊屬親亦得成為選定繼承人。除此之外，如「隱居」作為戶主繼承原因，以及戶主繼承人的分家限制等的引進，也都是日本化的影響。按臺灣人習慣中，本不存在隱居制度，此亦為日治初期的總督府法院所承認。[146] 1906 年的臺灣戶口規則雖然承認隱居制度，但是總督府官房法務課於 1931 年出版的臺灣人事習慣調查中，仍認為臺灣人舊慣中不存在隱居制度，[147] 而在同年 11 月總督府高等法院上告部判官姉齒松平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臺灣沒有隱居的習慣。[148] 但是在 1935 年 4 月 5 日的總督府法院判官總會中，

---

146 1901 年控 74 號，1901 年 10 月 14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1 冊，頁 292。

147 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07。

148 參見姉齒松平，〈本島人の親族相続に関する慣習法の大要〉，收於姉齒松平，《祭祀公業並臺灣に於ける特殊法律の研究》(臺北：臺法月報發行所，1934)，頁 619。

決議承認隱居亦為戶主權喪失的原因；換言之，隱居亦成為臺灣人舊慣。[149] 而隱居乃戶主權喪失之原因，從而如果戶主隱居，亦將發生戶主身分之繼承與戶主財產繼承問題。

而在戶主繼承人的分家問題方面，臺灣人習慣中，家會隨著家產分析而世代交替，沒有永遠存續的問題。因此子孫有欲外出自立者，只需得到父母同意，通常即先分與家產，並立約書證明。但是總督府法院在 1937 年 3 月 26 日作成判官聯合總會決議，不許戶主繼承人分家。[150] 總督府法院的這項決議，只有在日治後期家產舊慣的脈絡下，並參酌明治家族法的規定，才能理解。由於此時期分家的意義已經不再是家產分析，因此所謂不許分家，實際上係指離籍別居之意。至於限制推定戶主離籍，則是與明治家族法中法定推定家督繼承人原則上不能放棄其家督繼承權相類似，只是家督繼承權變成戶主繼承權而已。但明治家族法之所以有此規定，係為了維護家之永續不滅。由此以觀，總督府法院此一總會決議，實隱含永久延續戶主之家的意思，從而與臺灣人習慣中對家的理解不同，而較接近於明治家族法中的家。

2. 新的舊慣之創造

以總督府法院判官為主的法令調查會，在 1930 年代初期曾經調查比較過臺灣人家族舊慣與明治家族法之間的關係。其中可以看出明治家族法的某些部分並沒有相對應的舊慣。這種舊慣闕如背後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臺灣人家族習慣中雖有類似作法，但未被承認。二為臺灣人習慣中本無類似作法。其中第一種情況的可能性極低；因為否定習慣的法律效力主要的機制為「違反公序良俗」，如果明治家族法有類似規定，則這類習慣通常會得到合法的評價。至於第二種情況，則意味著臺灣人習慣中不存在類似的處理方式；因此從明治家族法的角度來看，自然找不到對應的習慣。對於第二種情況，總督府法院可能透過解釋的方式將臺灣人習慣改造為與民法接近的舊慣，例如前述的財產繼承制度；或者，總督府法院也可能以臺灣社會變遷而產生新習慣、或直接以法理形式，引進日本明治家族法上的規定。

---

149 參見姉歯松平，《本島人ノミニ関スル親屬法並相続法ノ大要》，頁 63-64。

150 姉歯松平，〈本島人の分家成立に就て〉，《臺法月報》34: 3（1940），頁 32。

對於原本即不存在於臺灣人家族習慣中的日本民法規定，總督府法院更多是透過法理的形式援用。關於此點，可以追溯至鈴木宗言覆審法院時期的親權制度，以及 1923 年以後的準禁治產人監護制度。[151] 除此之外，如扶養以及日本繼承法上的許多規定，都是臺灣人習慣中所無者，在 1930 年初的修法運動失敗後，總督府法院只能透過法理的方式將這類規定適用於臺灣人的案件中。例如對於違反丈夫之意思而別居之妻，丈夫應否負扶養義務；又扶養費用之程度，以及同時有親生子及養子時，誰應負扶養義務？法院之解釋均與日本民法類似。[152]

以法理形式引進臺灣的制度中，更多的是關於繼承法上的規定。例如總督府法院在 1929 年的判決中承認繼承人得請求特留分。[153] 此外，為了能夠更完整處理繼承人未定的情況，高等法院覆審部判官同上告部判官聯合總會於 1932 年 12 月 12 日決議，「在臺灣人死亡而繼承人曠缺時，對於土地以外之財產得準用民法第 1052 條規定，選任繼承財產管理人。」[154] 再者，對於被繼承人死亡時遺留大量債務而可能影響繼承人時，總督府法院也在 1936 年以法理形式承認限定繼承制度適用於臺灣人繼承事件中。[155]

總督府法院以法理形式引進明治家族法上的規定，前提在於其意識到「臺灣人習慣」的不足。而其判斷臺灣人習慣足夠與否的標準，即是明治家族法。如前所述，日治後期的總督府法院一直希望能夠將明治家族法也適用於臺灣人間，因此在 1920 年代末期的修法活動中，曾經以明治家族法為中心，比較臺灣人家族舊慣的情況。從其在 1931 年提出的報告中，可以明顯看到繼承法制的部分，有許多部分沒有可對應的臺灣舊慣。換句話說，總督府法院之所以認為臺灣人習慣明顯不足，乃是與明治家族法比較後之結果。而總督府法院必須大量依法理援引

---

151 1924 年上民第 157 號，1925 年 2 月 20 日判決。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63。

152 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41。

153 1929 年上民第 59 號，1929 年 10 月 19 日判決。參見萬年宜重編，《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頁 156-157。

154 參見姉齒松平，《本島人ノミニ關スル親族法並相續法ノ大要》，頁 450。

155 按限定繼承之規定在於保護繼承人不致因為被繼承人債務過多而受到影響，因而賦予繼承人得主張限定繼承。這項基於個人主義原則的制度，與臺灣人習慣中「父債子還」的觀念相違反，因此本不存在於臺灣人的家產分析習慣中。總督府法院的這項舊慣改造係因 1936 年 1 月蔡蓮舫過世後留下龐大債務，其子蔡伯汾向臺中地方法院申請限定繼承之結果。有關該事件之報導，參見《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第 12979 號（昭和 11 年 5 月 16 日），第 4 版。

繼承舊慣的現象，也是總督府法院改造臺灣人家產繼承舊慣後的必然結果。簡單而言，在臺灣人家族習慣中，本不存在如明治家族法中之個人財產繼承制度，而是家產分析。因此當總督府法院將臺灣人分家習慣解釋為個人財產繼承後，當然無法在臺灣社會中找到這些與個人財產繼承制度相配合的輔助規定。從而以法理形式引進這些規定，可以說正是總督府法院將臺灣人分家習慣改造為財產繼承後，所不得不為的配套措施。

3. 法律概念的日本化

除了持續改造舊慣內涵外，總督府法院在判決中所使用的法律概念，也逐漸以日本民法上的概念取代臺灣習慣用語。此種現象在 1930 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明顯。例如在 1935-1937 年的總督府高等法院判例集中，即可看到在有關繼承的慣習部分，出現了「選定戶主相續人」、「推定財產相續人」、「追立相續人」、「遺留分」、「遺留分減殺」等判決事項。[156] 而在 1939 年上民 62 號，同年 5 月 17 日判決之「繼承權確認並持份更正登記請求事件」中，法院在判斷家產繼承人順位問題時，也是使用「法定推定戶主繼承人」、「代位繼承」、「選定繼承人」等概念來說明當事人的法律關係。

這種概念用語日本化的現象，除了與總督府法院引進臺灣人習慣所無的明治家族法制度有關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總督府法院對於臺灣人家族舊慣的改造，使其內涵與明治家族法相當，從而得以直接使用明治家族法的概念。例如 1936 年，隨著戶口規則改正而將過房子、螟蛉子與養媳的名稱統一為「養子緣組」，總督府法院也重新解釋了舊慣中的收養關係。在 1937 年的一項判決中，總督府法院將過房子緣組與螟蛉子緣組統稱為男子的緣組；而對於女子的緣組統稱為養女緣組。[157] 在隔年的另一項判決中，進一步以收養關係作為法律上的概念，至於當事人間究竟屬於過房、螟蛉或媳婦仔，則於事實部分處理。[158] 總督府法院此一概念上的轉換，可以說正是近代法學中對於法律概念抽象化要求的具體實踐，也是其利用近代法學重新詮釋處理臺灣人家族習慣的確證。

---

156 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7 冊，頁 13-14 之事項目錄，並參見各相關判例內容。
157 1937 年上民第 165 號，1937 年 10 月 9 日判決。參見《覆審高等判例》，第 7 冊，頁 534-544。
158 參見 1938 年上民第 50 號，1938 年 6 月 15 日判決。《臺法月報》32: 11（1938），頁 43-46。

（三）殘餘的舊慣與未竟的內地延長

隨著總督府法院在日治後期對臺灣人家族舊慣的改造，到 1930 年代末期，除少數例外，多數臺灣人家族舊慣已被總督府改造為可由明治家族法制來解釋。至於這些例外，總督府法院也積極尋求進一步改造。1938 年，隨著皇民化運動的推展，高等法院將親屬繼承法制的日本化視為皇民化運動的一部分，而以臺北辯護士會的名義舉辦了一場關於臺灣親屬繼承與祭祀公業習慣的座談會。[159] 這次座談會邀請了臺灣各地的領導階層參加，討論的主題包括：(1) 是否贊成將民法完全施行於臺灣人間？(2) 祭祀公業應否設置除外例？(3) 親屬法中，哪些臺灣人習慣應設置除外例？(4) 繼承法中應否設置除外例。從討論內容來看，主要集中在祭祀公業、妾、招夫以及均分繼承上。討論結果，除了均分繼承問題外，多數與會者均贊成直接適用民法即可，因此最後的結論為贊成民法親屬編施行於臺灣。[160] 至於均分繼承問題，高等法院長提供的方案有三種：一為依照舊慣的嚴格均分繼承。二為依照民法採取長子繼承。三為維持習慣上的均分繼承，但長子得分得較多。討論結果，有發言者均贊成設置除外例，其中多數支持第三個方案。[161]

座談會中討論的舊慣，正是當時仍被保留的臺灣人家族舊慣。除此之外，其他臺灣人家族習慣多已被總督府法院轉化為民法上的概念。因此就像長期擔任總督府高等法院法官的姉齒松平在其 1930 年代末期的著作中所一再強調的，日本領臺四十餘年後的臺灣人家族習慣，已經與領臺當時大不相同，甚至與日本民法規定相近。[162]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姉齒松平所稱的臺灣人習慣，指的是國家法律所承認的習慣，亦即經過總督府法院所承認的舊慣。這些舊慣從日治初期到日治後期，不斷經過總督府法院的詮釋與改造，最後即使保留臺灣人習慣的用語，其實際的意涵也已經有所改變。因此，在姉齒松平的《本島人に關する親族法並相續法の大要》中所呈現的舊慣面貌，可以說是總督府法院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實

---

159 參見臺北辯護士會編，《親族相續祭祀公業に關する立法に就て全島座談會》(臺北：該會，1938)。

160 參見臺北辯護士會編，《親族相續祭祀公業に關する立法に就て全島座談會》，頁 36。

161 關於此問題因為發言者眾，在此不一一列舉。請參見臺北辯護士會編，《親族相續祭祀公業に關する立法に就て全島座談會》，頁 37-51。

162 參見姉齒松平，《本島人ノミニ關スル親族法並相續法ノ大要》，頁 16。

務判決，根據不同的時空條件及改造手段，經過數十年累積而成的一套新的家族法律規範。

但是總督府法院並不滿足於判決改造的結果。前述的座談會其實乃另一個修法運動的開端。1938 年 11 月，高等法院長伴野喜四郎透過廣播就臺灣的皇民化運動與親屬繼承法規的整備發表演講，[163] 認為當時仍依用舊慣的臺灣人親屬繼承法規，將成為臺灣人皇民化運動的一大障礙。[164] 因此主張將日本民法親屬繼承編適用於臺灣人，但關於諸子均分制度，因為跟日本的家督繼承處於兩個極端，不妨設置除外例；惟對於此種絕對均分制度，仍須多少加以修正。[165] 伴野的修法主張很快就得到總督府的認同，並於 1940 年再度提出法案。[166] 可惜該次修法於送往中央後再度遇到挫折。[167] 總督府法院的這次修法挫折，顯示其與中央之間的立場差異仍然存在。但除此之外，其有關臺灣人家產均分繼承原則的動搖，則顯示了總督府法院進一步改造臺灣人家族舊慣的決心。

雖然總督府法院的修法主張再度遭到挫敗，但是到了戰爭末期，隨著中央立場的改變，總督府法院的這項目標最後差一點就實現了。1944 年 10 月間，隨著大東亞政策的進展而由內務省所提出的「對朝鮮及臺灣同胞處遇改善要綱」（朝鮮及臺湾同胞ニ対スル処遇改善要綱）中，使用了「同胞」一詞，而且強調戶籍地域間的移動自由以及法域性格的平等化等。[168] 到了 1945 年，總督府方面也擬定了臺灣住民處遇改善政策，作為始政 50 週年的新政策，其中即包括將日本的戶籍法與家族法制實施於臺灣人間，甚至也出現有關廢止總督統治的討論。[169] 然而此一總督府法院所期盼的內外地法制一元化措施，最終隨著日本的戰敗而未及

---

163 其演講內容並刊登於隔月的《臺法月報》。參見伴野喜四郎，〈本島人の皇民化運動より觀たる親族並相續法規の整備に就て〉，《臺法月報》32: 12（1938），頁 1-5。

164 參見伴野喜四郎，〈本島人の皇民化運動より觀たる親族並相續法規の整備に就て〉，頁 2。

165 參見伴野喜四郎，〈本島人の皇民化運動より觀たる親族並相續法規の整備に就て〉，頁 5。

166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第 14429 號（昭和 15 年 5 月 15 日），第 2 版；《臺灣日日新報》第 14430 號（昭和 15 年 5 月 16 日），第 2 版。此外必須附帶說明者，雖然總督府法院主張均分繼承應設置除外例，但日治末期的「均分繼承」是指在「戶主／家屬」繼承框架下戶主死亡而產生的財產繼承，因此其制度脈絡與臺灣人習慣中家產分析已經有所不同。

167 1940 年 8 月 13 日公布的勅令第 520 號中，卻只修改了勅令 407 號第 18 條關於有限會社法的規定，至於親屬繼承法的部分，則維持依用舊慣的原則，未予更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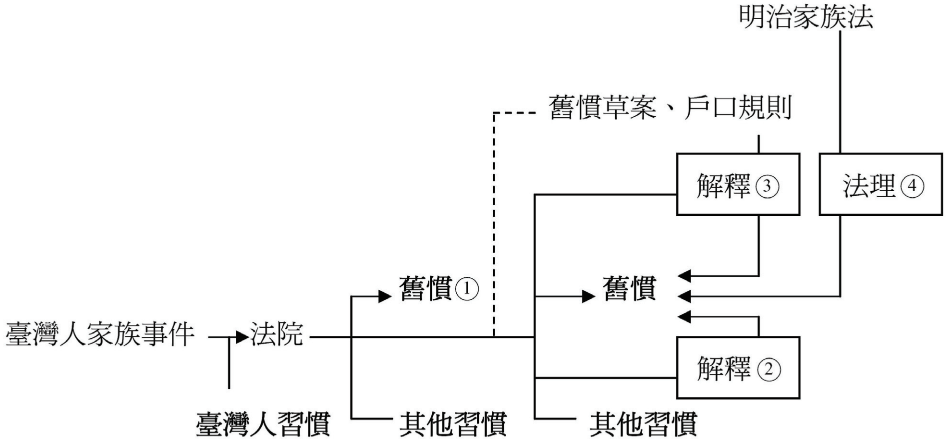
168 參見淺野豊美，《帝国日本の植民地法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8），頁 520-521。

169 參見近藤正己，《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頁 422-436。

付諸施行。結果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舊慣便以一種不斷處於被改造狀態但仍保有部分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樣貌留存在臺灣的歷史之中。

五、結論

日治時期臺灣人家族法制，在「依用舊慣」的原則下，只能由總督府法院透過具體個案發現法律內容。這套全新的舊慣從一開始就不是完全以臺灣人的生活經驗為基礎，此後並逐漸地被朝向明治家族法體系改造。在這樣一套不斷處於改造中的舊慣體系中，不同時期的舊慣，即使名稱相同，其具體的內容也未必一樣；而且可能越到後期，越接近明治家族法。對於此一舊慣改造機制，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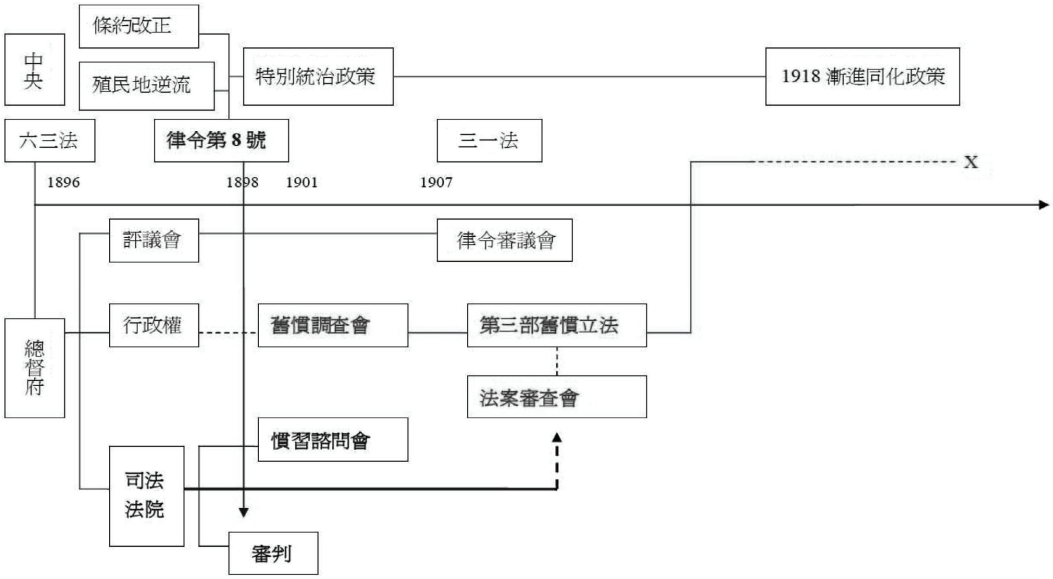
圖三、總督府法院的習慣／舊慣改造機制

繪圖：曾文亮

此一機制的基礎乃近代西方法的法源理論，而運作此一機制的總督府法院，不僅在制度上模仿自近代西方司法制度，法院判官也都與日本內地判事一樣受過近代法學教育。但是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基於民事紛爭的不告不理原則，總督府法院只能在臺灣人家族紛爭進入法院後，才能根據個案探求相關的「舊慣」內容，作為判決的依據。因此臺灣人向法院提起訴訟，可以說是此一機制運作的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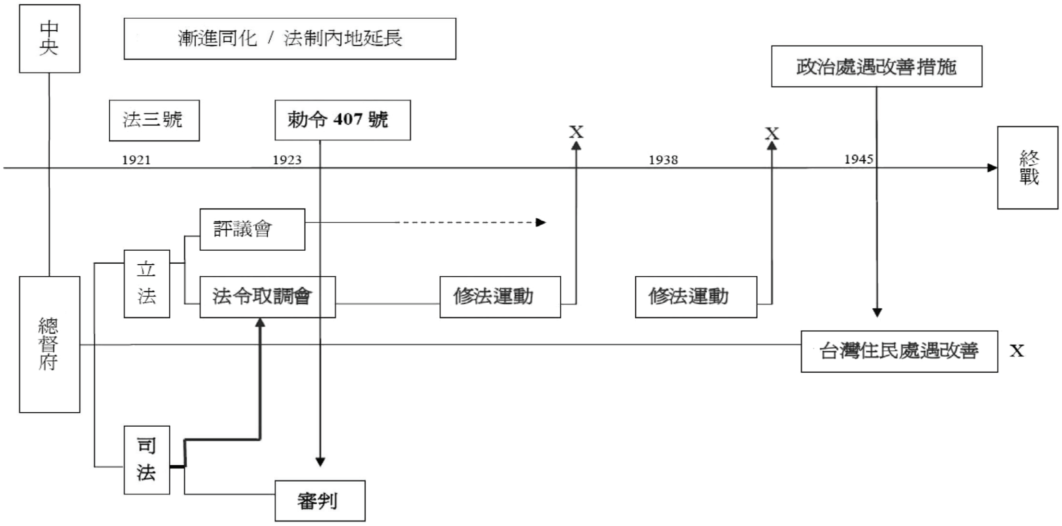
點。而由於經由法院判斷認為具有法律效力的習慣，才會成為所謂的「舊慣」，因此所謂「舊慣」並不完全等於臺灣人的日常生活習慣（即①）；其不為法院採擇者，則屬於不具法律效果的「其他習慣」。除此之外，總督府法院也可能在嗣後改變舊有的判斷，而將原本具有法律效力的舊慣，再變成其他習慣；或雖然繼續承認其效力，但透過解釋的方式，改變舊慣內涵（即②）。再者，總督府法院也可能透過解釋方式，將舊慣內容朝向舊慣立法草案或戶口規則的規定解釋，而間接引進明治家族法的元素。（即③），甚至依法理的形式援用明治家族法的內容（即④）。其中③跟④即是讓舊慣內容日本化的主要管道。

總督府法院在認定舊慣的過程中，可能有上述各種不同的可能性。舊慣的改造，便是總督府法院隨著時間經過，推翻過去自己所認為的舊慣內容之過程。而在總督府改造舊慣的過程中，除了不同時期的總督府法院立場可能有別外，其他像是政治、社會等外部環境因素，也會影響到總督府法院的改造步調。為方便說明起見，茲將日治時期總督府法院在日本帝國體制下的位置區分為前後期，分別圖示如圖四、圖五。



圖四、日治前期總督府法院在日本帝國體制下的位置

繪圖：曾文亮



圖五：日治後期總督府法院位置圖

繪圖：曾文亮

圖四為日治前期總督府法院所處的外部環境。在兒玉／後藤時期的舊慣調查體系中，有關舊慣立法的工作主要是由舊慣調查會負責，而總督府法院只是根據1898 年律令第 8 號規定負責司法審判事務而已。結果總督府法院為了瞭解臺灣人習慣內容，除了在具體個案中判斷個別習慣的法律效力外，另一方面則透過自己內部的組織以問答方式瞭解臺灣人習慣；這項工作大約到 1905 年告一段落。而在此期間，由於對臺灣人家族習慣尚未有整體認識，總督府法院對於臺灣人家族習慣，基本上承認其法律效力，同時強調與明治家族法的差異。但是受到個人主義財產制的影響，總督府法院很早就承認成年制度。

在承認個人成年後即擁有完整法律行為後，一旦臺灣人間出現有關成年的效果或未成年親權／監護的紛爭，總督府法院即必須加以處理。結果總督府法院的立場是承認成年與親權制度，而限縮臺灣人習慣中的尊長權。由於「依用舊慣」的目的並不在於如實地遵照臺灣人的民間習慣，而是帶有改造臺灣人習慣的目的在，因此此種依照近代法律原則對習慣的改造，並不違反依用舊慣政策的宗旨。在引進親權制度後，更多關於年幼者的財產管理與教養紛爭，以親權與監護權的形式進入法院，此外，由於戶口規則實施，也使得許多關於戶口登記的紛爭進入

法院。這使得總督府法院得以持續深化因為限縮尊長權而確立的親權與監護制度，也讓總督府法院得以將家長（權）改造為戶主（權），同時排除宗親勢力對家內部的干預等。而在總督府法院進行此一改造的過程中，舊慣立法事業所完成的舊慣法典草案，以及戶口規則所參考的日本戶籍法制，則成為重要的論理參考依據。除此之外，確立婚姻關係的對等性等，從當時內臺社會均出現的個人主義改革思潮來看，也有其改造的社會基礎。而隨著 1918 年中央政策的轉向，總督府法院的舊慣改造幅度也有明顯增加，但整體而言，日治前期主要的改造與個人主義原則有關；同時也可看到以戶主／親權／婚姻為主要核心的明治民法上「家制度」的間接影響力。

圖五為總督府法院在日治後期外部環境的改變。1918 年中央政策的轉向，除了影響總督府的舊慣改造幅度外，也影響了總督府法院在殖民地統治組織下的位置。隨著 1921 年法三號的制定以及內地延長主義政策的確立，與此相應的總督府內部組織調整，讓總督府法院在立法權方面取得更多發言權。

總督府法院透過法令調查會成為總督府行使立法權的重要機構；因此在立法相關事務上取得較大的發言空間。1921 年開始的民商法內地延長之立法工作，最後因為總督的殖民地統治考量，而將家族法排除在外。但對於總督府法院而言，民事法源分割，不利於實務運作，因而在 1923 年實施的勅令第 407 號施行後，仍試圖透過修法手段實現內外地法制一元化的目標。總督府法院的堅持在 1920 年代末期因為戶籍法制的修正問題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報，惟在草案送到中央後仍舊歸於失敗。在勅令第 407 號施行後，總督府法院的舊慣改造也有趨緩之勢。這可能是因為法制初定，總督府法院一時也難以否定；另一方面，則是總督府法院仍得透過修法的手段來達到內外地法制一元化的目標。

總督府法院在 1930 年代初期的修法運動最後雖然失敗，但是透過此一修法過程，總督府法院有機會從明治家族法的觀點重新思考如何將臺灣家族舊慣日本化，總督府法院在修法過程所累積的知識基礎，也為其 1930 年代所進行舊慣改造提供了論理基礎。

進入 1930 年代之後的總督府法院，對於臺灣舊慣的改造甚為明顯，在以明治家族法為參考架構的情況下，將以往的「家產／私產」轉化為「戶主／家屬」

框架，根本性地改造了臺灣人家產舊慣，並以法理形式引進許多明治家族法中的繼承制度；此外，也大幅使用明治家族法的概念取代舊慣用語。而後在皇民化運動開始後，並以法制一元化符合皇民化精神為由，再度嘗試修法，只是最後仍歸於失敗。1944 年日本中央曾經嘗試將明治家族法施行於臺灣，但最後仍因為戰爭結束而未能實現。

總督府法院利用前述的舊慣改造機制中的各種方式，在不同時期自身立場與外部環境影響下，或快或慢地改造臺灣人家族舊慣。在日治前期基本上是以個人主義原則改造臺灣人家族內部關係；而在 1930 年代之後，則是將臺灣人家族舊慣，從結合生活與財產關係的「家產制」轉化為生活與財產分離的家制度。經過近四十年的改造之後，所謂臺灣人家族舊慣，不僅在概念架構上沿襲明治家族法的體系，而且許多舊慣內容也分別受到明治家族法中的近代元素與日本元素的滲透。由此以觀，日治後期臺灣人家族舊慣確實如戴炎輝或蔡章麟所觀察到的，有明顯日本化的傾向。雖然從成文法的規定中來看，日本中央或總督府對於臺灣人家族法的部分採取較消極的「依用舊慣」政策，但是總督府法院並未因為臺灣人家族習慣與日本家族法同樣具有封建保守性格，而未努力改造臺灣家族舊慣。只是在此一改造過程中，明治家族法的性格限制了西方化的程度；至於明治家族法中的日本固有元素，雖然仍有部分未被引進臺灣家族舊慣中，但其主要原因也不是總督府法院未積極改造，而是戰爭結束導致改造未及完成。

至於 1930 年代之後總督府法院致力於臺灣人家族舊慣日本化的原因，顯然不是因為日本人法官越來越不懂臺灣人習慣，而是與總督府法院的內外地法制一元化目標有關。總督府法院的此一目標乃出於實務上的考量，亦即民事法源的分割，不利於審判實務。但是此一主張，與制定勅令第 407 號當時的田健治郎總督乃至 1930 年代內地中央的考量均有所不同，因而導致總督府法院始終未能透過立法的方式實現此一目標。立法手段的失敗，讓總督府法院只能透過判決改造臺灣人舊慣。此時包括總督府法院在 1920 年代末期修法運動所累積的知識基礎，以及 1930 年代臺灣戶籍法制的實施及皇民化運動等，都有助於總督府法院在 1930 年代對臺灣人家族舊慣的改造。只是總督府法院的這項家族舊慣日本化工程，最後仍然因為日本的戰敗而未能實現。

引用書目

〈內臺共婚法實施〉，《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8 年 1 月 21 日，第 4 版。
〈法令調取委員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4 月 23 日，第 1 版。
《淡新檔案》，22614。
小林里平
1918 〈臺灣戶籍法の根本主義に就て〉，《臺法月報》12(8): 48-52。
小林道彥（著）、鄭天凱（譯）
1997 〈1897 年臺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明治國家與殖民地領有〉，《臺灣風物》47(2): 129-157。
日本近代法制史研究會（編）
1992 《日本近代法 120 講》。京都：法律文化社。
王泰升
1997 〈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的法制改革〉，收於王泰升，《臺灣法律史的建立》，頁 159-182。臺北：著者發行。
1999 《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8 〈學說與政策交織下的日治臺灣民事法制變遷：以岡松文書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37(3): 47-95。
2009 〈日治法院檔案的整編與研究〉，收於王泰升主編，《跨界的日治法院檔案研究》，頁 1-37，臺北：元照出版公司。
外務省条約局（編）
1990 《外地法制誌》，第 4 卷：律令總覽。東京：文生書院。
伊藤正介
1920 〈本島人の戶主〉，《臺法月報》14(11): 25-28。
西英昭
2009 《「臺灣私法」の成立過程：テキストの層位学的分析を中心に》。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
伴野喜四郎
1923 〈親族篇の施行の急務〉，《臺法月報》16(1): 56-59。
1938 〈本島人の皇民化運動より觀たる親族並相續法規の整備に就て〉，《臺法月報》32(12): 1-5。
吳煜宗
2007 〈臺灣民事舊慣的法化過程：婚姻法制近代化筆記〉，收於戴東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現代身分法之基礎理論：戴東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75-93。臺北：元照出版公司。
吳豪人
2004 〈岡松參太郎論：殖民地法學者的近代性認識〉，收於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頁 511-586。臺北：元照出版公司。

我妻榮
1938 《親族法・相續法講義案》。東京：岩波書店。
近藤正己
1996 《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
近藤佳代子
1993 〈近代の家：「家」の論理と商品交換法の論理との交錯〉，收於利谷信義、吉井蒼生夫、水林彪編，《法における近代と現代》，頁 239-265。東京：日本評論社。
邱純惠
1998 〈日治時期臺灣民商法施行問題初探〉，《臺灣風物》48(1): 21-40。
姉齒松平
1940 〈本島人の分家成立に就て〉，《臺法月報》34(3): 30-35。
1930 〈本島人の慣習上に於ける分戶の要件に就て〉，《臺法月報》，24(6): 9-12。
1929 〈本島人に付民法人事編の施行は何故急務なるや〉，《臺法月報》23(1): 28-39。
1934 〈本島人の親族相續に關する慣習法の大要〉，收於姉齒松平，《祭祀公業並臺灣に於ける特殊法律の研究》，頁 593-631。臺北：臺法月報發行所。
1938 《本島人ノミニ關スル親族法並相續法ノ大要》。臺北：臺法月報發行所。
1939 〈本島人に關する親族法及相續法の問題〉，《臺灣時報》，頁 9-17。
後藤新平
1901 〈臺灣經營上舊慣制度の調查を必要とする意見〉，《臺灣慣習記事》1(5): 24-38。
1904 〈敢て會員諸君の意見を問ふ〉，《臺灣慣習記事》4(7): 76-78。
春山明哲
1988 〈台湾旧慣調查と立法構想：岡松参太郎による調查と立案を中心に〉，《台湾近現代史研究》6: 81-114。
洪郁如
2004 〈植民地の法と慣習：台湾社会の女児取引をめぐる諸問題〉，收於浅野豊美、松田利彥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構造》，頁 245-273。東京：信山社。
淺野豐美
2008 《帝国日本の植民地法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淺野豐美（著），何義麟、劉夏如、洪郁如、楊桂香（譯）
2000 〈近代日本的「條約改正」與臺灣殖民地法制的初步建構〉，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頁 307-346。臺北：播種者文化。
陳其南
1990 《家族與社會：臺灣和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昭如
1997 〈離婚的權利史：臺灣女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靜嘉
2002 《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萬年宜重（編）

1931 《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臺北：臺法月報發行所。

1943 《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上告部判例集：昭和 13-15 年》。臺北：臺法月報發行所。

臺北辯護士會（編）

1938 《親族相續祭祀公業に關する立法に就て全島座談會》。臺北：該會。

臺灣總督府（編）

1922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編纂）、小森惠（編）

1995 《臺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判例：自明治 29 年至昭和 18 年》。東京：文生書院。

1997 《臺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判例補遺：明治 31 年至明治 40 年》。東京：文生書院。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編）

1921 《第二回總督府評議會會議錄》。臺北：該會。

1922 《第三回總督府評議會會議錄》。臺北：該會。

鄭政誠

2005 《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戴炎輝

1949 〈五十年來的臺灣法制〉，《臺灣文化》5(1): 1-13。

戴炎輝、蔡章麟編纂

1955 《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第 1 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190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二回報告書》。臺北：該會。

191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 2 卷下冊。臺北：該會。

1912 《臺灣親族相續令草案第二草案》。臺北：該會。

魏家弘

1996 〈臺灣土地所有權概念的形成經過：從業到所有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

2004 《正伝後藤新平》，第 3 卷：臺灣時代（1898-1906 年）。東京：藤原書店。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17, No. 1, pp. 125-174, March 2010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Old Customs Made New: Transformation of *Kazoku* Customs in Colonial Taiwan (1898-1943)

Wen-liang Tseng

ABSTRACT

In 1923,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replaced most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s in Taiwan with those of Imperial Japan, with the exception of legislations related to family and succession affairs, which still followed the norms in the prevailing Taiwanese *Kazoku* customs. Hence, the modernization or Japanization of laws for Taiwanese family and succession affairs were comparatively less apparent. As a result, controversy arose as to the extent of Japanization concerning Taiwanese *Kazoku* custom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is issue through a critical review of primary data collected from related precedents of both Appellate Court and High Court of Taiwan. Analysis of the data revealed that Taiwanese *Kazoku* customs were indeed subjected to influence from Japan as well as the West. Starting from the 1910s, the Colonial Court introduced elements of Japanese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s indirectly through legislations related to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r through re-interpreting “old” Taiwanese *Kazoku* customs. Such tendency became more intense and obvious in the 1930s and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actual legal practice in local courts. In addition, the knowledge gained in the legal reform movement of the 1920s as well as the enactment of Taiwan Koseki Law and the Kominka movement in the 1930s all contributed to such tendency. With the defeat of Japan in 1945, the Japanization of Taiwanese *Kazoku* customs came to an abrupt end as an unrealized dream of inland extension.

Keywords: Taiwan, Taiwan Court, old customs, Taiwanese *Kazoku* customs, 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臺灣史研究》
第十七卷第一期，頁 175-210
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
一個歷史書寫* 的反省與展望**

郭文華***

摘　要

本文從美援衛生的定位出發，從書寫取徑與關心課題著手，整理並回顧相關的歷史論述。在成果方面，本文就美援衛生的資料狀況提出初步的觀察與檢討，並以疾病防治與治理邏輯為中心，分析現有研究的興趣與成果。最後呼應臺灣史研究的國際化趨勢，本文用戰後瘧疾防治為例，說明超越國家單位的國際書寫架構在衛生史的論述可能。

關鍵詞：美援、公共衛生、疾病史、健康政策、國際衛生

---

* 美援醫療與衛生研究在臺灣史尚屬新興領域，有待開發之處甚多，因此本文採用範圍較廣的「歷史書寫」一詞來含括相關這段時期衛生發展的各種素材，與根據這些素材所產出的歷史論述。

** 本文較早版本發表於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辦「近代華人社會公衛史」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08 年 12 月 26-27 日）。感謝評論人祝平一、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衛生史小組成員，及與會者的批評與建議。對於戰後衛生的性質，筆者受益於與劉士永、邱文聰、王文基等人的討論，同時也感謝《臺灣史研究》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雖然如此，文章若有任何論點之不完備與缺漏，當由筆者負責。本文是筆者戰後東亞公共衛生研究的一部分（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 97-2410-H-010-001- MY2），在資料收集上得到梁雅惠與張純芳的協助，在此致謝。

***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公共衛生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來稿日期：2010 年 2 月 23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4 月 19 日。

一、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
二、理論分析與檔案耙梳：美援衛生的書寫取徑
三、疾病防治與治理邏輯：美援衛生的案例研究
四、作為書寫方略的國際史
五、美援衛生史的未來課題

以長期的規模來眺望臺灣歷史時，不僅是以漢民族的開發臺灣，或臺灣漢人社會的形成過程等中國史範疇來看而已；在東亞的架構乃至以世界史的契機來探討時，不應僅從國家單位的國際政治秩序為觀點，毋寧應從國際政治社會形成之前，或是更原始、無文字之時代以來的東亞各地域間，人們互相交通往來的歷史推移中所產生的東亞交通圈、交易圈這類的角度來掌握，似乎反而更有助於理解臺灣的歷史。

——曹永和[1]

一、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

「美援衛生」是論述上就口，但不好定義的用語。[2] 顧名思義，美援衛生指戰後臺灣透過各種以美國為首的經濟與技術援助所成就的醫療與衛生服務。從直接影響來看，它含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 1971 年衛生署成立長達 27 年臺灣的衛生發展。

---

1 曹永和，〈臺灣與海洋亞洲教研平臺　序〉，《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1（2008 年 10 月），頁 7。

2 美援的一般性描述，參見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其相關研究參見楊翠華，〈美援技術協助：戰後臺灣工業開端的一個側面〉，收於陳永發主編，《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 261-292。

雖然如此，目前的歷史論述並未單獨處理這段時期的衛生進展。[3] 筆者先前的研究回顧[4] 曾以學科為分類，介紹臺灣醫療史研究的可能性。14 年過去了，臺灣史就主題或就時期上都有長足發展，呈現生氣蓬勃的學術風貌。但是，相較於日本把被盟軍總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 SCAP）接管的那幾年（1945-1952）界定為「占領期」，不斷更新研究與整理史料，雖然臺灣史學界開始重視戰後初期的社會轉變，但踏實的研究還不算多，醫療方面的更是鳳毛麟角。[5] 對此現象，誠如楊翠華指出的，或源於可用史料的缺乏。[6] 但這個解釋並不能具體呈現為何這段衛生上有不少轉折的時期未能得到學界大力投入，研究質量與其他時期，甚或其他領域都有段距離。美援究竟算不算值得處理的「分期」，似乎還有待商榷。[7]

另一方面，官方與公共衛生界對這段時期的重視有增無減。不但衛生機關從 1990 年代起陸續出版著作或資料集，如《臺灣撲瘧紀實》、《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共五冊）》與《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照片選集》、《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大事記》、《臺灣根除小兒麻痺症紀實》、《臺灣瘧疾根除四十週年紀念展導覽手冊》、《荒漠行醫照影：中沙醫療團援外史料紀錄》等，[8] 醫療機構與前輩也

---

3 比方說，醫療史主流論述依然援用杜聰明在《中西醫學史略》（高雄：高雄醫學院，1959），頁 486-505 的分期，將醫學在臺灣的進展分成「原始醫學」（-1544）、「瘴氣醫學」（1544-1865）、「教會醫學」（1865-1895）、「日治醫學」（1895-1945），與「中華民國醫學」（1945-）等時期。固然作為美援醫療代表人物之一的杜聰明，在提出這個說法時尚無法體會這個時期的歷史轉變，但之後的主流論述除了將戰後再細分為「建立期」、「擴張期」與「整合期」外，其書寫的進步觀點並未有太多改變。

4 郭文華，〈臺灣醫療史研究的回顧：以學術脈絡為中心的探討〉，《臺灣史料研究》8（1996 年 8 月），頁 60-75。

5 談論這段時期的歷史作品，大多以「戰後初期」或簡單地稱「戰後」，輔之以年代斷限，比方說 1945 年到某某年，來處理特定脈絡下（比方說經濟發展）的歷史事件，而其中談醫療的論述並不多。對此，本文後面有進一步的分析。

6 楊翠華，〈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2008 年 12 月），頁 93。

7 例如在《兩岸分途》中，主編陳永發是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峙與分治，放在冷戰的架構裡，來強調這個時代在歷史書寫上的重要性。

8 行政院衛生署編，《臺灣撲瘧紀實》（臺北：編者，1993）；行政院衛生署編，《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一）、（二）》（臺北：編者，1995）；行政院衛生署編，《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照片選集》（臺北：編者，1995）；白榮熙編撰，《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大事記》（臺北：行政院衛生署，1999）；臺灣醫界聯盟基金會醫學史工作室、醫望雜誌編輯，《臺灣根除小兒麻痺症紀實》（臺北：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1）；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臺灣瘧疾根除四十週年紀念展導覽手冊》（臺北：編者，2005）；盧忻謐、陳怡霈、蔡篤堅主編，《荒漠行醫照影：中沙醫療團援外史料紀錄》（臺北：行政院衛生署，2007）。

陸續撰寫歷史或回憶，緬懷戰後的點點滴滴。[9] 以《發現臺灣公衛行腳》來說，它列出的十大公衛計畫裡與美援有關者，包括瘧疾根除、婦幼衛生、家庭計畫、基層衛生建設等。對他們來說，這是一段雖已過去，但彌足珍貴的美好歲月。[10]

雖然，臺灣醫療史如許雪姬指出的，是「現階段最容易與國際接軌的研究領域，……，因此有賴更多人力的投入和在學科界線上保持彈性」，[11] 但對於研究者來說，如何面對這段時期依然是一大挑戰。美援衛生是「沒人做，所以大有可為」，還是它只是殖民體制轉進到冷戰對峙之際，一段含混瑣碎，無足輕重的過渡？或者，我們要更嚴肅地問：「研究美援衛生的意義何在？」

對此，筆者認為在文章開頭所引，曹永和院士對國家單位的歷史之評論值得我們思考。這麼說，當學者考慮如何把美援衛生放進以國家或地域為中心的歷史書寫，或者是科學史家范發迪所指「甬道式發展」的國家科學史（“tunnel history” of national science）論述時，[12] 我們預設兩個方向一致的書寫路徑：一個是以政權更替為主軸的治理框架，一個是以醫療現代化為中心的發展內容。在這樣的書寫路徑上，美援衛生的範圍與性質都不容易界定。

以時間斷限來說，從 1951 年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援助起，至 1965 年正式宣布停止援助為止，美國經援臺灣共 15 年。雖然如此，美國對臺灣的實質援助可以追溯到 1948 年「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下援助戰後工業的部分項目。而美援所孳生的相對基金，在援助終止後仍繼續運作到 1970 年代中期，而在援助期間進修研究的醫界領袖，回國後更透過教育對臺灣醫學的形塑產生影響。[13] 換句話說，美援的影響跨越政權交替，很難界定其論述範圍。

與此關連的是對美援衛生的評價。相較於日治時期，因為有清楚的政權歸

---

9 郭文華，〈歸檔臺灣醫療：初探醫師書寫的歷史與社會學〉，《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4（2004 年 6 月），頁 105-148。

10 葉金川主編，《發現臺灣公衛行腳：臺灣十大公衛計畫紀實》（臺北：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2001）。

11 許雪姬，〈2007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6: 2（2009 年 6 月），頁 200。

12 這個說法引自范發迪（Fa-ti Fan）對傳統科學史框架的描述。他將在 J. H. Hexter 的說法引伸到科學上，指出傳統歷史書寫將科學發展放置在國別論述的處理方式。參見 Fa-ti Fan, “Redrawing the Map: Science in Twenty-Century China,” *Isis* 98(2007), p. 525; J. H.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Views on History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3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頁 53-56；張淑卿，〈嶄新的醫療觀點：美援對臺灣醫學教育的影響〉，收於劉士永主編，《臺灣醫療 400 年》（臺北：經典雜誌，2006），頁 148-151。

屬，其治理本質也有定論，論爭是比較清晰的殖民醫學之於現代化的脈絡。[14] 不過，就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而言，如何界定美國與臺灣當局的關係便是大哉問（比方楊翠華對戰後科學交流的探討），[15] 更遑論所謂「美援」就資金來源與組織運作來說，都極龐雜與難掌握。比方說，除了美國以外，當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與國際兒童急難基金（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等也協助臺灣衛生，更有致力建立開發中國家衛生的民間組織，如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16] 與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另一方面，即使是美國所主導的協助，其管道與目的也很複雜。以戰時依據中美雙邊架構所衍生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以下簡稱農復會）來說，它雖然以復興農村為標的，但它也透過基層機構的建置，促成公共衛生的進展。另外由馬歇爾計畫下所設的經濟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更是以提供經濟援助的方式（包括公共衛生的基礎建設）來穩定政局，並隨其援外政策而調整。[17] 這些都讓研究者找不出適當的研究切入點。

由於美援衛生的書寫問題性，本文採取與一般回顧不同的重點。筆者不羅列所有的相關研究或史料來源，而是藉由現有研究的後設分析，討論美援之於衛生史研究的意義。作為公共衛生與醫療史研究者，筆者的看法啟發自 T. J. Hinrichs 對中國醫療史的回顧與范發迪對二十世紀中國科學史的回顧。[18] 因應科學史的跨學科特質與異質性，兩位作者不約而同避免進步式的單線論述，改以具有引導意義的「地圖」（map）或地景（landscape）概念，來掌握立場複雜，變動分化的研

---

14 Ming-cheng M. Lo,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Jen-to Yao, "Governing the Colonized: Governmentality in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1895-194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ssex, 2002); 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15 楊翠華，〈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歐美研究》29: 2（1999 年 6 月），頁 41-103。

16 會名原為美國醫藥援華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是 1937 年一群熱心中美關係的華僑所集資成立。戰後方改此名，其援助範圍也遷移到臺灣。

17 到援助終止之前，經濟合作署先與技術合作總署（Technic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整合進國外業務署（Foreign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而國外業務署又於 1955 年與 1961 年兩度改組為國際合作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與國際開發署（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18 T. J. Hinrichs, "New Geographies of Chinese Medicine," *Osiris* 13 (July 1998), pp. 287-325; Fa-ti Fan, "Redrawing the Map," pp. 524-538.

究成果，並以此凸顯這個領域的現有狀況與書寫可能。同樣的，筆者希望本文不僅介紹美援衛生；它也能顯示美援在構築「臺灣衛生史」研究地景的可能方向。

除此之外，呼應曹永和將臺灣納入東亞與世界史的期許，本文主張衛生不但需要跨出國家史窠臼，更要重視疾病在東亞地域扮演的角色。雖然限於範圍與學力，本文不分析無文字歷史前疾病與交通圈或交易圈的關係；但它希望擴展醫療社會學者市野川容孝的「醫療遞嬗」（transactions in medicine）觀點，[19] 主張從研究衛生在戰後東亞的移動與流轉來掌握其歷史性質。[20] 以美援時期來說，雖然衛生體制與國家須臾不離，但研究者不能以臺灣一地為限，而必須對冷戰與東亞地緣政治有所認識。另外，與一般政治分析不同，衛生史要時時注意疾病與醫療做為文化活動的特質，方能掌握美援的書寫蹤跡。

在以下各節中，本文先整理美援在醫療史的位置，並就資料狀況提出學術史的觀察與檢討。其次本文以研究類型為中心，從疾病防治與治理邏輯兩個方面分析現有美援衛生研究的興趣與成果。最後，本文用戰後瘧疾防治為例，說明超越國家單位的國際書寫架構在衛生史的論述可能。

二、理論分析與檔案耙梳：美援衛生的書寫取徑

談美援衛生的書寫必須先談醫療史的整體產出。如前所述，近年來臺灣醫療史有不少進展，但尚未有全面性系統性的分析。[21] 對此，筆者整理 1992 年到 2007

---

19 這個觀點來自 John Dewey 對於現代性傳遞的認識論主張。市野川指出現代醫療源於西方，在東亞生根，但在敘述上研究者不能先將前者與後者強分為二，再去談它們之間的「互動」。相反的，著眼於醫療的基本形式與功能，歷史研究者要將醫療的跨國移動當作整體的文化活動（a total continual action），方能從各個社會的知識受容過程中掌握現代醫療的流轉。參見 Yasutaka Ichinokawa, "Introduction: Transaction in Medicine & Heteronomous Modernization," in Shizu Sakai, Tatsuo Sakai, Christian Oberländer, and Yasutaka Ichinokawa, eds., *Transaction in Medicine & Heteronomous Modernization: Germany, Japan, Korea and Taiw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for Philosophy, 2009), pp. 11-12.

20 事實上，一些研究者已經嘗試以超越國家的地域視野來處理歷史。以文章開頭所引曹永和的評論來說，他所期許的對象是臺大歷史系的「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領域發展計畫」。而按照計畫的描述，所謂「海洋亞洲」（Maritime Asia）指歷史演進中與海洋密切相關的亞洲大陸和島嶼，包括中國大陸沿岸、日本、琉球，以及東南亞諸國等。此外，衛生作為文化與社會的產物，醫學史學者梁其姿也提出超越國家的「華人東亞」（Chinese East Asia）概念，試圖擴大衛生史的論述範圍。

21 雖然如此，有三篇相關的研究回顧值得注意。一篇是張璨尹，〈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史研究回顧與

年臺灣出版的相關著作與論文。[22] 雖然這個統計還很粗略，但已足夠一窺這個學術地景的部分樣貌。

從總數來看，這波研究裡以碩士論文佔最大宗，共 65 篇。其中大多數完成於 2000 年之後，出身於各種學科的研究所。[23] 雖然如此，或許因為基礎研究的闕如，這些論文往往侷限於某一斷代，描述特定政治環境下的醫療（例如清領時期的教會醫療）。這個現象也出現在單篇文章上。雖然它們總數達到一百，但出現的期刊涵蓋各種人文與社會學科，散見於地區性文史刊物、聯誼通訊或科學與健康普及雜誌等，內容十分駁雜。

而聚焦到戰後，我們看到各種取向眾聲喧嘩的局面。這種狀況的形成，一方面是歷史學者對當代課題有其學術謹慎，並未積極介入。另一方面，人文社會科學由於長程分析的要求與學術累積，研究者逐步形成有時序意義的分析。在其中，有先前提過的公共衛生進步解釋，也有將醫療發展連接到更大的民主化進

展望〉，《史耘》11（2005 年 12 月），頁 117-134。作者以較貼近公共衛生操作的「公共衛生政策」、「公共衛生思想」、「傳染病防治」、「環境衛生」與「衛生醫療機構」等範疇，對相關研究做了詳盡的說明。其次，范燕秋以 1993 到 2003 年出版的臺灣史通論著作為研究對象，提供精彩的分析。（范燕秋，〈近十年國內《臺灣史》通論著作研究回顧〉，《臺灣史料研究》21〔2003 年 9 月〕，頁 88-114。）她指出民主化與本土化洗禮帶動「認識自己」的風潮，也帶出解嚴前較少觸及的研究課題，如日本時期的統治，與有趣的切入點，如歐洲擴張時期的歷史等。雖然如此，這些新研究不見得如實反映在教育性質的通論裡，顯示臺灣史在敘述觀點上的對立現況與在教育上的可能問題。另外，許雪姬在「2007 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召開之後，也以此為基礎撰寫研究回顧。（許雪姬，〈2007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161-204）這篇文章以總類、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等四類分析當年臺灣史研究的狀況，並從研究時代、論文性質、撰寫者、學術傳承、跨學科、史觀、史料與學位論文的生產分布等方面，具體指出目前臺灣史作為一個學門的研究現況與挑戰。雖然該文也有回顧醫學史的研究，放在社會文化類中（但鈴木哲造的公醫制度研究被歸在政治類的統治制度與帝國政策分項），但畢竟這是綜合性的研究回顧，無法對此做全面性的關照與分析，這也是本文可以補充的地方。

22 這裡的期刊搜尋對象包括優良文史期刊，如《臺灣史研究》或《新史學》，與醫護相關技術學院的學報，如《臺灣醫學人文學刊》等。另外筆者也就熟悉的相關領域作者，如張淑卿或劉士永，以關鍵字方式，利用 Google 搜尋他們的作品。關於學位論文部分，本文仰賴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與中文電子學位論文資料庫（CETD），以「醫療」、「史」或「疾病史」等關鍵字，再輔之以筆者所熟識的研究生與指導教授等方式搜尋而得。

23 有日本研究所、應用日語所、中國文學研究所、人類學研究所、臺灣文學研究所、臺灣文化研究所，社會科學領域的政治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三民主義研究所、新聞研究所、法律學研究所、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建築研究所、社會發展研究所，還有醫學領域的醫學研究所、衛生政策研究所、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醫學人文研究所、性別研究所等。許雪姬在她的研究回顧論文中也有相同的觀察。關於 2004-2007 年間以「臺灣史」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可參見許雪姬，〈2007 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頁 196，表一的統計。

程，探討國家權力與專業的互動。

從以上的形勢素描裡，我們才能理解美援衛生的書寫處境。對醫界來說，美援是新政權入主臺灣後，加速醫學傳承從德日轉換到英美的背景。對公共衛生學者來說，它是臺灣在戰爭困頓後邁向進步與國際化的幕後推手。對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它是幫助統治者洗脫日治影響，與威權體制亦步亦趨的經濟與技術助力。他們各自有不同想像，有時相互引用，但對話不多。於是，在戰後定位含混，與國內論爭疏離，但影響力無所不在的美援不但在分期上找不到位置，論述上也找不出可用的分析架構。[24]

從這個觀察出發，以下筆者簡單整理美援衛生的研究狀況。Neil Jacoby 與趙既昌已經對美援的背景、執行與成果提供基本的認識。[25]《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的「國際合作」項下，則具體介紹與美援衛生相關的合作組織[26] 與其工作內容，比方說傳染病防治、擴充醫療設施、改善環境衛生，與工業衛生與安全等。此外，它也提到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等對這些計畫的經費支援，與美援停止後其孳生的中美基金對防制污染、改善自來水設施、生育控制等計畫的援助，以至於榮民總醫院（現臺北榮民總醫院）的建置等，為美援衛生刻畫大致的輪廓。[27]

雖然如此，作為當時最大的經費來源，美援的實際影響遠大於此。如衛生署指出的，「衛生工作雖然關係民眾健康頗鉅，但在政府支出預算中衛生經費尚難充分編列。幸有美援之援助，加上我國妥善運用其技術協助，使我國之公共衛生業

---

24 即使有一些研究，比如說醫療機構的歷史或專業的發展歷程，在論述上企圖跨越兩個政權，它們也在建立獨立論述軸線，淡化政權更替的影響時，抑制美援這個時期在論述上的重要性。參見陳威彬，〈近代臺灣的癩病與療養：以樂生療養院為主軸〉（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周忠彥，〈臺灣癩病機構之研究：以私立樂山園為例（1928-1992）〉（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鍾淑姬，〈從妊產婦名簿到助產所：臺灣（新竹）助產士的歷史研究，1920- 1970〉（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25 Neil Jacoby,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F. A. Praeger, 1966)；趙既昌，《美源的運用》。

26 如先前介紹的農復會、美國醫藥援華會，與紐約人口局（New York Population Council）、東西文化中心（East West Center）及美援會等。而莊永明在《臺灣醫療史》中則根據臺大醫院的經驗，再加上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與聯合國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等機構。參見莊永明，《臺灣醫療史：以臺大醫院為主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398-403。

27 行政院衛生署編，《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頁 980。

務及醫療服務擴及全民，並逐步發展」。[28] 換句話說，《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固然可以協助研究者迅速掌握概況，但還不足以評估與分析美援對特定計畫的影響、效益評估與政策意涵。[29] 然而，順著這些計畫追下去，就遇到無人觸及的資料荒原。《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雖有官方支持，納入不少資訊，不過畢竟是彙整的機構史，在行文資料上並未順暢一致。而其所附的參考文獻固然多少為研究者指出一些方向，[30] 但是要解答這些計畫的轉折，就不能迴避一手史料的分析。

龐雜與零散的機構檔案是美援研究史料的特色之一。[31] 比方說，當時的一些公開資料、刊物與報告等就有《臺灣省省政府公報》、《臺灣省衛生統計要覽》、《臺灣醫界》、《臺灣衛生》、《中美合作經援發展概況》，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工作報告》等。此外，由於行政調整的關係，部分戰後初期檔案已經開始整理與對外開放，例如中央研究院收藏的經合會（前身為美援會）檔、國史館收藏的農復會檔、[32] 臺灣文獻館臺灣省政府衛生處檔案等，有關美援衛生的資料也不例外。不過，因為美援牽涉的項目十分廣泛，資料分屬不同受援單位，性質駁雜，至今尚無法對其收藏位置與狀況做全盤掌握。因此，如果單就史料處理美援衛生十分耗費時間精力，對資淺學者與研究生都是一大挑戰。[33]

雖然如此，畢竟還有研究者勇往直前，為學界踏出第一步。對此，以下筆者用黃文弘的〈政經框架、典範碰撞與知識位移：臺灣醫學典範轉折的系譜溯源〉[34] 與楊翠華的〈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為例，說明探索美援衛

---

28 行政院衛生署編，《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頁 981。

29 比方說，美援在衛生人力的訓練部分放在「衛生人力養成教育」中（第九章，第四節），傳染病防治的援助部分放在「重要疾病防治」（第一章，第三節）裡，而 1960 年代的代表計畫生育控制，則放在「家庭計畫」（第三章，第二節）中。

30 比方說陳寄禪，《追溯五十年來促進我衛生設施之關鍵事蹟》（臺北：正中書局，1981）。

31 相關整理參見周琇環編，《臺灣光復後美援史料——第三冊：技術協助計畫》（臺北：國史館，1998）。

32 周琇環編，《農復會史料》（臺北：國史館，1995）。

33 就筆者所知，最近五年（2006-2010）國科會專題計畫中處理美援時期衛生相關議題者不過寥寥數個，依申請時間排序有范燕秋「樂生院癩病史料整理與分析(I)」（2005-2006）、王文基「樂生院癩病史料整理與分析：樂生院療養生活與監控系統之變動」計畫（2006-2007）、張淑卿「國際援助與戰後臺灣醫療衛生的轉化」計畫（2007-2010）、郭文華「醫學試驗的社會建構：戰後臺灣與日本漢生病新藥引進情境的探討」計畫（2008-2010）、劉士永「1946-1948 年中國東南沿海疫情的流行病史分析：以鼠疫與霍亂為例」計畫（2008-2010）等。

34 黃文弘，〈政經框架、典範碰撞與知識位移：臺灣醫學典範轉折的系譜溯源〉（臺北：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生時研究者能使用的兩種書寫方式：一個是從外圍大膽眺望、想像與推測，如雄才大略的冒險家一樣說服研究該領域的重要。另一個則是正視一手檔案，像勤奮的田野工作者般從踏查中摸索這段過去的地形地貌。當然，如以下會提到的，這兩篇論文來自於不同的訓練背景，其書寫要求也不同，但同為在地社群的學術生產，兩者都陸續有研究者引用，因此某種程度上具有代表性，有助我們瞭解書寫類型的差異。[35]

首先看〈政經框架、典範碰撞與知識位移〉呈現的理論想像。這篇碩士論文的作者黃文弘受過醫學訓練，在非文史研究所完成論文，畢業後也沒有繼續從事相關研究。[36] 不過，或許也正因為這本論文沒有既有的學科包袱，它反而可以道出人文研究者與醫療專業者有所保留，對美援衛生的想像，因此被廣泛引用。[37]

先不論這篇論文遊走社會、歷史、科學史與文化批評，縱橫於左派、社會資本與後殖民理論之間，書寫上它最令人注意的是將美援當作醫學典範轉折的關鍵，在「現代性全球化與制度性向度」與「專業權力與知識」的交錯下，開展對醫療歷程的歷史重構。[38] 在這樣的處理下，美援衛生不再只是一段歷史上不知道

35 受限於文章篇幅與作者學力，本文不比較社會科學與傳統歷史學在取向上對分析美援衛生的優劣。以筆者粗淺的認識，目前臺灣史的學術社群事實上容納了不少出身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顯現多學科跨學科的學術活力。因此，本文中只就呈現的學術成果，就其書寫的方式來分析。

36 黃文弘畢業自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後進入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在李玉春與周素卿教授的指導下完成論文（口試委員雷祥麟、夏鑄九、陳東升）。完成碩士學位後，他回到醫業接受精神醫學專科訓練，目前任職於永和耕莘醫院心身衛生科。

37 以碩博士論文來說，這篇論文被 10 篇論文引用，分別是鄭淑芹，〈日治時代嘉義地區西式醫療的發展：以嘉義醫院為主（1895 年至 1920 年）〉（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鄔孟慧，〈戰後臺灣的肺結核病防治（1950-1966）〉（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董惠文，〈行政監控與醫療規訓：談日治初期傳染病的防治〉（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黃培潔，〈兩種社工論述場域之分析與反思：以社區發展季刊與漂流社工電子報為例〉（臺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2004）；鍾有良，〈醫療工業、國家與健康〉（臺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5）；陳盈華，〈臺灣社會與疾病史中的 SARS 經驗〉（臺北：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詹雅筑，〈醫學教育與殖民社會：由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出現談起〉（臺北：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蔡姿儀，〈戰後臺灣瘧疾防治之研究（1945-1965）〉（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等，顯示出它受歡迎的程度。

38 作者自承「本研究選擇以美援時期的轉折為探究核心，目的在於從這個關鍵的歷史斷裂點，觀察衛生醫療體系在布局轉換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內部筋紋，並解析其盤根錯節與政治環境的鍵結型態。延伸來說，筆者希望能藉著對這段隱諱過往的重新解讀⋯⋯，鋪陳一個足共分析現時『知識／政策』關連論述的系譜脈絡；在更積極的寫作目的上，也試圖建立另一個供作參考的歷史座標，使讀者能在與其他歷史論述的對照閱讀中，生產出對現時權力結構的想像理路。」參見黃文弘，〈政經框架、典範碰撞與知識位移〉，頁 15。

的過去；在行動上，它喚起讀者從現有美式醫學典範中「覺醒」。對黃文弘來說，美援不但是理解冷戰架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它的歷史探究能引出「已經出現的歷史論述企圖將我們帶往什麼樣的想像？而這樣的策略又指涉了什麼樣的主體位置、意義建構、利益取向以及流動其間的權力關係？」的反省。[39]

在這個宏觀架構下，這篇處理美援衛生的論文雖有新解釋，卻沒有太多新史料。黃文弘用約全論文一半的篇幅處理民國時期的醫療引進（西化）與日治臺灣的衛生建置（進化），當成美援醫療「體系相爭」的背景，之後才是以「美援臺灣」為名的專章，而且這章還先用一半篇幅分析冷戰架構，之後才續著約 30 頁的討論。當然，這不意味黃文弘沒有針對美援衛生提出論點。例如他認為戰前沒有出現過的「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概念與所連帶的計畫實作（practice），[40] 是讓衛生當局操控戰後醫療的關鍵。[41] 不過，為了釐清更大的醫學「系譜溯源」課題，這本論文並未清楚交代美援衛生的輪廓；它像一張重新繪製的世界地圖，但中央還是那塊耐人尋味的解釋留白。

移到美援衛生書寫光譜的另外一端，是〈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作者楊翠華專攻民國時期科學與教育發展，近年轉進戰後臺灣科技政策，而本論文是她第一篇談衛生的作品。乍看之下，這篇文章似乎未脫《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的介紹範疇。但筆者認為作者有意識捨棄無謂的大理論，從檔案裡耙梳當時衛生工作的狀況，並澄清過去的一些猜測，是重要的貢獻。[42] 如作者宣示的：「……本文試圖以美援會檔案為基礎，據以糾正某些似是而非的謬誤，……並勾勒此時期美援推動臺灣醫療與公衛之梗概。」[43]

楊翠華關照到美援對衛生的引導，[44] 也理解美援會檔案的史料限制。因此，她並未將焦點放在單一計畫，而精確地將論證限縮在政策方向，從經援者與受援

---

[39] 黃文弘，〈政經框架、典範碰撞與知識位移〉，頁 16。

[40] 這個觀點也呼應劉士永對日治時期清潔、衛生概念轉變的分析。參見劉士永，〈「清潔」到「衛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8: 1（2001 年 6 月），頁 41-88。

[41] 黃文弘，〈政經框架、典範碰撞與知識位移〉，頁 175-181。

[42] 比方說黃文弘的碩士論文對國府衛生治理集團與劉瑞恆角色的一些描述，在美援會檔並未尋得相當證據佐證，因此值得商榷。參見楊翠華，〈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頁 91-139。

[43] 楊翠華，〈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頁 94。

[44] 比方說美援時期的衛生相對於先前的日治衛生，在政策效果上是「重建」還是「復舊」。關於這個論點本文以下還會討論。

者互動的切入點描述美援衛生計畫的轉變，得到以下成果。首先，雖然美援衛生一貫與政治經濟相輔相成，不純以人民健康為首要目的，但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的衛生規劃還是有許多不同。前者強調在亂局中追求國防與經濟的安定，並且因為當時政府擬定計畫的能力短缺，美援或國際專家的意見扮演重要的引導角色。而相較於 1950 年代，1960 年代的計畫雖然延續不少先前的規劃與執行經驗，但重點已經轉向加速經濟建設，而在政策優先次序上省衛生處也有較多的發言權。其次，這篇論文指出一個與官方說法差異不大，但並未嚴肅討論的議題——援助者的立場與成效的差異認知。固然作者表示目前沒有資料顯示援助者的意圖，但她卻以紮實的檔案研究釐清一般所推崇美援衛生的貢獻，如傳染病防治與鄉村衛生等，雖然也在其工作範圍內，卻非援助者最在意的工作。相反的，一些不求速效的「打底」建設，比方說醫療組織與制度的精簡改善、[45] 醫療人員的進修培訓等，才是他們認定的核心工作。雖然這些工作後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但作者認為不可抹煞。

這篇論文另一個成果是分析戰後衛生在行政上「虛中央實地方」，頭輕腳重，寸步難移的組織架構。這個看法並非創見；筆者先前的研究裡已經指出這個特色。[46] 但是，楊翠華藉由經費的撥付順序與使用範圍等項目，具體顯示這個架構的運作問題。例如，雖然美方認為中央機構的強化是拔本改造衛生的重點，但執行計畫的省衛生處卻只想處理實際的疾病防治問題，以致討論耗日費時，沒有共識。對此作者不認為只是雙方對公共衛生認知不同。事實上，如作者指出的問題「在於省衛生處並非中央決策機關，所執掌的權責僅及於各項計畫的貫徹執行，制度的改良與教育的加強，均非權限所及。」[47]

對僅僅以現代化觀點將美援草率定位成戰後衛生體制的「建立期」，或者對官方說法照單全收的歷史研究來說，〈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對美援衛生的廓清與拓展深具意義。但是它是否就能解答研究者的問題，還有待

---

45 這些改善計畫與補助貸款原先以公立醫院為範圍，之後也擴及私立醫院。參見楊翠華，〈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頁 117-118。

46 郭文華，〈在疾病與美援的年代：戰後臺灣衛生體制的形成〉，收於臺中縣衛生局編，《幼幼無恙：臺中縣兒童保建館歷史映像》(臺中：編者，2001)，頁 15-20；郭文華，〈美援下的衛生政策：一九六〇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收於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療》(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325-365。

47 楊翠華，〈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頁 104。

商榷。例如，作者指出美援重視環境衛生建設，因此有自來水給水計畫。從公共衛生的觀點來說，這是有別於示範區模式，美援衛生的大計劃。[48] 雖然楊翠華對該計畫擬訂計畫的折衝有很好的分析，但畢竟不能充分回答美援究竟在政策上是對臺灣衛生的「重建」，還是日治時期的「復舊」的大哉問。[49]

楊翠華並非沒有意識到這個落差。比方說，她引用從 1945 年到 1957 年擔任臺灣省公共工程局土木科長與公共工程總隊長劉永楙的工作回憶，指出美援執行者在重建與復舊間的矛盾。例如，劉永楙對日治時期的都市規劃給予很高評價，因此該部分大多延續先前規劃，但他卻對日本式的自來水系統構想，比方說污水系統，有不少批評。甚至在考察英國之後，劉永楙還建議省政府效法英國，建立適合臺灣發展的自來水發展方案。[50]

顯然，要回歸歷史，建立美援衛生的詳實論述，研究者除了注意逐步公開的官方檔案，還要留意日益增加的當事人敘述。當然，這些敘述不是一般的原始材料。筆者曾初步分析這些醫療書寫的產出與撰寫機制，提醒不能輕易將它們視為無庸置疑的「史料」。[51] 雖然如此，在親身參與者逐漸凋零之時，美援衛生研究者不能否認這些資料的價值。究竟理論建構與資料分析在美援衛生的書寫上如何取得平衡，下一節會以具體案例進一步討論。

三、疾病防治與治理邏輯：美援衛生的案例研究

接續以上的取徑分析，本節以「疾病防治」與「治理邏輯」兩個主題繼續探討美援衛生的研究。其中，疾病防治反映美援衛生來自臺灣史與疾病史的合流，

---

48 郭文華，〈在疾病與美援的年代〉，頁 15-20；郭文華，〈建構臺灣衛生體制：美援醫療的背景及其衛生政策〉，收於劉士永主編，《臺灣醫療 400 年》，頁 142-147。

49 楊翠華，〈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頁 92-93。

50 楊翠華，〈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頁 127-128。

51 在〈歸檔臺灣醫療〉一文中，筆者指出除了行政院衛生署的《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外，各大醫學院校，如臺灣大學醫學院、國防醫學院，或者是醫療院所，如臺灣大學附設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等機構，都開始出版自己的故事，多少反映臺灣醫療的「本土化」。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醫事人員自我書寫的潮流。它們不管在性質上是歷史書寫或僅僅是紀念特刊，不管在書寫意圖上是要推銷自己或是存史留真，不管在功能上是要聯絡感情還是要爭取歷史定位，都對瞭解戰後的臺灣醫療提供不少素材。參見郭文華，〈歸檔臺灣醫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頁105-148。

而治理邏輯則是在醫療與社會的脈絡裡彰顯臺灣的歷史特殊性。

前面述及，研究美援衛生有論述架構的隔閡，也有資料基礎的障礙，但不意味研究者全無施展餘地。事實上，過去十年中陸續有投石問路的作品，比方說《臺灣醫療 400 年》「美援醫療」部分所收錄的瘧疾根除、結核病防治（防癆）與家庭計畫等。[52] 它們沒有像黃文弘或楊翠華執著美援的整體瞭解（比方說援助的性質），也沒有在理論與檔案的兩難間躑躅不前。這些作品得力於歷史學以外的資源，比方說科學史、醫學史、女性主義或社會學等，藉由它們的觀點對美援下的醫療與衛生進行有限度的探索，或者說是「個案式」的研究。

首先看疾病防治的研究個案。不管對醫界、公共衛生學界，或者醫療史與臺灣史來說它都是明顯的研究課題。就資料而言，《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的防疫部分（第二章）有不少關於防疫工作的概況，而范燕秋〈日據前期臺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1895-1920）》〉與張淑卿〈戰後臺灣地區傳染病防治之研究〉則是兩篇先導性的研究。[53] 雖然處理時代不同，這兩本論文都注意新政權進入臺灣時面對的風土環境、社會變動與疾疫散布問題，而論述架構也很類似。它們以整理疾病流行狀況開場，接著是當局的政策因應與個別疾病的處理情形，最後是成果的檢討與評估。以後見之明看，不管是日治或是戰後，這些傳染病慢慢消失，顯示防治措施似乎奏效。[54] 雖然如此，兩篇論文的作者都不願只是歌功頌德，而想進一步理解這些工作的意涵。也是在這個切入點上，她們對統治者有不同的解讀。范燕秋認為日治公共衛生工作，主要是為殖民者建立適合居住生活的場所，有利於其控制。相較起來，張淑卿對政府採取肯定態度。她認為當局對法定傳染病的介入及干預，與監控系統的發揮，是有效壓制傳染病的主要因素，但也不能忽略來自民眾的配合與支持。

---

52 郭文華，〈建構臺灣衛生體制〉，頁 142-147；張淑卿，〈防瘧與防癆：一九五〇年代的公共衛生〉，收於劉士永主編，《臺灣醫療 400 年》，頁 152-159。

53 范燕秋，〈日據前期臺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張淑卿，〈戰後臺灣地區傳染病防治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54 這裡可以探究臺灣在現代化過程中疾病轉型的問題。對此有興趣者可參考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的疾病結構改變〉，《新史學》13: 4（2002 年 12 月），頁 165-208；吳介尊，〈日治時代以來臺灣地區疾病轉型模式之探討〉，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主辦，「臺灣人口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06 年 5 月 27 日）。

以上兩篇論文雖然為日後臺灣防疫史建立基礎。不過，從疾病史的角度看，它們將醫療與社會分開處理的架構，並未特別呼應疾病認知與社會轉變的密切關連。醫療史家 Charles E. Rosenberg 在其經典 *The Cholera Years* 中，以十九世紀的三次霍亂流行，分析社會面對疾疫的不同認知與因應方式，提醒我們疾病與其防治並非獨立於社會之外，而是與社會互動息息相關。[55] 回到臺灣，固然對移民來說臺灣是「瘴癘之島」，從清領到日治疾疫不斷。但是，到底日治前期與戰後初期是因為疾疫橫行導致社會變動，還是因為社會擾動導致疾疫捲土重來，都是探究疾病與社會互動的切入點。[56]

這種社會與疾病的互動在非急性傳染病的狀況更容易理解。臺灣固然無緣參與細菌學說是如何取得優勢、成為傳染病的主流解釋，疫苗研發與環境改善成為公共衛生信條的歷史變化。但是，對於疫苗與治療方式發展較晚，無法馬上根除的慢性病來說，臺灣提供一個在變動社會中如何與疾病與患者相處的例證。而與此同時，慢性病也提供觀察戰後臺灣，特別是美援衛生引進過程的線索。以下用結核病防治為例說明。近十年中有三篇學位論文較全面性地處理這個課題，分別是李政益的〈疾病、文化與社會變遷：由結核病流行觀點探究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臺灣社會〉、鄔孟慧的〈戰後臺灣的肺結核病防治（1950-1966）〉，與張淑卿的〈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臺灣結核病史研究（1945-1970s）〉。[57] 這三篇論文雖然聚焦美援時期，但並沒有意圖為美援衛生找出定位。相反的，它們關心社會，嘗試從政策施行與民眾反應，看疾病與醫療對臺灣造成了什麼改變。

〈疾病、文化與社會變遷〉是這個系列裡的第一篇作品。它有清楚的問題意識，希望透過疾病觀照日治末期與戰後初期的社會轉折。而它的分析也跳脫疾病防治敘述，用報紙、評論與個人回憶等資料，輔之以病例統計，嘗試建構臺灣對

---

[55] Charles E. Rosenberg, *The Cholera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in 1832, 1849, and 186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6] 對此，劉翠溶與劉士永針對所謂「疾疫」在臺灣史上的出現狀況，有很豐富具體的分析。參見劉翠溶、劉士永，〈臺灣歷史上的疾病與死亡〉，《臺灣史研究》4: 2（1999 年 6 月），頁 89-132。

[57] 李政益，〈疾病、文化與社會變遷：由結核病流行觀點探究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臺灣社會〉（臺北：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鄔孟慧，〈戰後臺灣的肺結核病防治（1950-1966）〉；鄔孟慧，〈戰後臺灣基層防癆工作的推動（1948-1966）〉，《暨南史學》9（2006 年 7 月），頁 87-116；張淑卿，〈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臺灣結核病史研究（1945-1970s）〉（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結核病的反應。雖然如此，這篇論文留下不少可發展的空間。它沒有點出結核病的防治特色，對醫學進展（例如檢驗設備與疫苗的發展與療法的改進）的評估也付之闕如，讓論文止於浮光掠影式的敘述。相較於此，鄔孟慧的論文有不少進展，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她雖然在防疫史常見的「問題－制度－行動」架構下，談了不少美援的幫助，[58] 但也投注心力描述當局社會如何面對與處理結核病，比方說農復會與基層防癆工作，並顯示執行上的困難點（第二章第三節）。第二、作者意識到預防與治療的進步與疾病防治的關係。她除了將牛結核防治納入討論，更用一整章來討論治療技術的轉變，例如從消極的休養與療養治療到積極的人工氣胸與胸廓整型術，從鏈黴素抗藥性的發現到新藥的產生，從隔離之不可行到積極用 X 光搜尋治療對象等。這些發展在在影響當局的防治政策。雖然相較於李政益的人文關懷，〈戰後臺灣的肺結核病防治（1950-1966）〉更扣合公衛科技的歷史發展，但它並未進一步釐清這些知識與技術如何與政策互動。比方說，作者指出基層防癆人力的缺乏，但是我們沒有看到這個狀況有無反映在臺美的交涉上，或者這樣的困難有無具體影響政策。這些都讓論文的解釋力大打折扣。

〈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與〈戰後臺灣的肺結核病防治〉幾乎同時完成，但無論就格局與論證細節上前者都超越後者。固然這兩篇論文的學術要求不同，但我們不能忽略張淑卿在疾病防治史的長期耕耘。相較於作者過去停在監控體系描述與案例分析的〈戰後臺灣地區傳染病防治之研究〉，七年後完成的〈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不但用結核病防治具體演示監控系統的形成與運作，並且將論點連到身體與治理的討論。因此，同樣以防癆為主題，〈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不但比〈戰後臺灣的肺結核病防治〉討論的時限更長，對防治的運作分析更仔細，在理論的創發上也成功利用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觀點，從病患的發現（巡迴篩檢）、治療的管控與疫苗的施打等，耙梳掌握結核病患身體的技術情境。[59]

---

58 這篇論文基本上討論臺灣頒訂「加強防癆四年計畫」以前的防癆工作。根據作者的論點，在此之前的防癆因為沒有專責單位處理，因此事權散漫，值得釐清。其實，這正點出美援衛生的特色。

59 張淑卿之後也一一將這些面向的研究延伸為單篇文章，有〈防癆協會與 1950 至 1970 年代臺灣的結核病防治〉，《臺灣風物》55: 1（2005 年 3 月），頁 43-72；〈戰後臺灣的防癆保健員〉，《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4（2006 年 12 月），頁 89-123；〈有用的利器？卡介苗與 X 光在臺灣結核病防治中的醫療技術實踐〉，收於成令方主編，《醫療與社會共舞》（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8），頁 299-307；〈1950、60 年代臺灣卡介苗預防接種計畫〉，《科技、醫療與社會》8（2009 年 4 月），頁 121-172。

該文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是將實作帶入美援衛生討論的企圖。張淑卿指出防癆的三種技術——結核菌素測驗與卡介苗預防接種計劃、胸部 X 光檢查與驗痰、開放性病患的管理與化學藥物治療——並非臺灣首創，而是援助國所主張的標準化處理。這種由專家背書，本質上符合科學普遍性的意識型態，在執行上便利考核追蹤的防癆方式，不但呼應黃文弘公共衛生是美援介入的新興領域的觀察，也為筆者美援衛生的工作模式分析作了最好的說明。順著實作的理路，〈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點出一連串的問題，例如要用液態疫苗還是乾燥疫苗，或居家治療的「家」該如何定義等。[60] 在這些問題中，在地操作與國際標準的扞格呼之欲出。

在引入身體治理與疾病史對話時，〈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也提醒我們美援衛生的一個基本問題：在不斷強化當局對人民鋪天蓋地，從內到外的身體管控時，研究者是否會走向身體控制的理論冥想，忽略在歷史上這種以疾病防治為名的治理，其性質如何定位，其範圍與目的究竟為何？[61] 對此，近年有幾篇探討美援治理邏輯的衛生史研究，顯示臺灣在冷戰架構的特殊性。

早在執政當局進行思想整肅，防止匪諜滲透之前，衛生上早已有以「檢疫」為名的治理措施。當然，防止疾病擴大，穩定社會民心，是讓檢疫成為當局自豪的成就，也是《臺灣地區檢疫五十年》的出版原因。[62] 不過，就像《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一樣，《臺灣地區檢疫五十年》類似政策鋪排，未有太多論述深度。真正將檢疫獨立變成研究課題者，是陳淑芬的〈戰後之疫：臺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建制〉。[63] 該論文乍看之下與疾病防治類似，但細究其例證的選擇，會發現治理才是其中心關懷。作者用「國家－人民」、「臺灣－中國大陸」兩個主軸，分析以疾病防治來穩定社會秩序的治理邏輯。具體而言，對傳染病相對重視的臺

---

[60] 張淑卿，〈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頁 167、187。

[61] 確實，這個治理轉折無法用日治「殖民」終止，或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開端一語帶過；畢竟，它需要更細緻的歷史分析。如傅大為在《亞細亞的新身體》中指出的，近代臺灣的形成伴隨著「近代臺灣身體」的形成；而這個「近代身體」的構成要素之一，是身體與醫療技術與肉身交纏，或鑲嵌或脫落的各種轉變。值得注意的是，從這個觀點看，政權轉換並不意味著整套身體技術與醫療概念的轉變，而毋寧是醫療、社會、性別關係等多重歷史發展線上的一個結構性因素而已。參見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臺灣》（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27。

[62] 行政院衛生署檢疫總所編，《臺灣地區檢疫五十年》（臺北：編者，1996）。

[63] 陳淑芬，〈戰後之疫：臺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建制（1945-195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2000 年由稻鄉出版社以專書出版。

灣在戰後納入國民政府管轄，與疾疫流行的大陸有更多接觸，而交通往來造成的疾疫蔓延，更加速社會動亂的爆發。而面對這種狀況，當局藉由規定的建置與行政的強化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傳染問題也才因此暫告平息。上述解釋雖然與官方的「成功故事」相去不遠，而治理架構的完成（比方說檢疫法規的建立）是否就反映局勢已經穩定，也還有討論空間。但是，〈戰後之疫〉裡舉出不少因衛生治理所造成的社會衝突，例如進出口管制與檢疫人員操守敗壞有關的「布袋事件」，與以防疫為名強制解散人民聚會的「新營事件」，[64] 顯示實際執行衛生治理的複雜性。

事實上，當時防疫由警察負責，而警方也投入大量人力維持疫情控制，凸顯國家與衛生的曖昧關係。對此面向，社會科學研究的著力較深。這些論文沿用公共衛生學界的分期，將 1945 到 1970 年代當成分析對象，並將醫療當作國家體系下的特殊領域。以裴晉國〈臺灣地區國家機關與醫療體系之發展〉[65] 來說，作者將醫療視為國民黨威權政體的縮影，並稱該時期採行的是「支配性醫療」。作者將國民黨的政策宣示連接到相關法令的頒布，再連接到政策對醫療機構與保險的介入，醫學教育與醫療資源的控制等，營造出「強國家」（strong state）的印象。

葉永文也以「威權時期的醫政關係」為題，描述 1970 年代前的臺灣醫療的政策特色。[66] 與裴晉國不同的是，作者雖然延續強勢支配的分析框架，但卻將討論限縮在國家與醫界領導者的關係，指出混亂期後臺灣進入「強勢統治」或「以政領醫」的態勢，顯示在機構的建立、法規的調整與執業的規範上。另外，葉永文強調美援對此支配的功用，稱之為「醫療體制的政治翻轉」。如其總結：「隨著美援勢力的深入，當局著實地以政治翻轉了戰後臺灣的醫療體制，而以英、美價值取代德、日價值的體系論述，形塑出符合國家統治利益的醫政關係。」[67] 王開弘的論文著重醫療專業與國家的治理協商，與裴晉國及葉永文的研究有諸多呼應。他將衛生分成國家主導的「公共衛生」與專業自主的「醫療」兩個端點，認為在防疫趨勢上臺灣是從公共衛生朝向醫療化與市場化。[68] 公共衛生雖然是美援

---

64 陳淑芬，〈戰後之疫〉，頁 64-66。

65 裴晉國，〈臺灣地區國家機關與醫療體系之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66 葉永文，《臺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67 葉永文，《臺灣醫療發展史》，頁 104。

68 王開弘，〈臺灣防疫政策的歷史制度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進入臺灣的重要管道，但在臺灣政經轉型的態勢下，醫界取代公共衛生執行者，成為執政當局協商的對象。[69]

在社會科學研究者率爾以國內政治為範疇討論衛生與醫療的治理邏輯時，拙著〈美援下的衛生政策：一九六〇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是試圖凸顯美援歷史複雜性的跨界作品。[70] 在先前的碩士論文〈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臺灣家庭計畫：醫療政策與女性史的探討〉裡，[71] 筆者從三種領域的論述——公共衛生的家庭計畫、經濟成長的人口控制、國家發展裡的人力規劃，指出它們在美援架構下政策的纏繞與轉進。另外，這篇論文也指出技術，特別是子宮內避孕器「樂普」（loop）與統計工具的使用，成就出臺灣節育計畫的特色。

在剖析美援衛生的同時，〈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臺灣家庭計畫〉並未忽略公共衛生與經濟發展、援助者與受援者之間的衝突。以避免婚前生育來說，該論文指出臺灣接受人力規劃專家建議，鼓勵未婚婦女工作。但是，她們的社交面變廣所造成婚前性行為與生育，卻是原先將人口控制設定在家庭範疇內的專家所始料未及的。另外，更大的衝突來自節制生育與「反攻大陸」願景的差異。對此，〈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臺灣家庭計畫〉採取文本分析，從論述裡找出政策衝突是如何在現實考量下遭到「平議」，而〈美援下的衛生計畫〉則進一步強調治理矛盾後面的國際政治。這樣說，雖然當時國府播遷確實為臺灣帶來人口壓力，不過對執政者而言問題不在於是否採取行動，而是該不該承認移入人口是「問題」。如果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那這些人不過是「國內移動」，而人口是否「過剩」也要重新考慮。但如果承認人口壓力，自然也默認治理疆界的現實，間接放棄政府的執政目標。換句話說，以衛生為名的人口計畫不僅和當局想法不同，它可說正面衝擊國府的統治正當性。也因此，〈美援下的衛生計畫〉指出當局最後的妥協並非單純對美屈從；藉由公共衛生與冷戰現實，它重新定義臺灣作為國家實體（statehood）的治理範圍與統治邏輯。

---

69 張瓊蓉以戰後臺灣衛生所為例的碩士論文也指出類似的發展過程。她認為原先因為公共衛生計畫需要而成立的衛生所，在群醫中心成立後轉型成為以提供門診為主的醫療單位，失去了原先服務社區，把關公共衛生的初衷。參見張瓊蓉，〈衛生所與社區疏離關係的歷史發展分析〉（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70 郭文華，〈美援下的衛生政策〉，頁 325-365。

71 郭文華，〈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臺灣家庭計畫：醫療政策與女性史的探討〉（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當然，戰後臺灣的國際處境是另一個複雜課題，也是分析美援衛生的關鍵之一。不過，從疾病防治到治理本質的省思，這些個案型研究已經證明它們的解釋潛力。這些研究不但從疾病史中得到思想活水，又從其中重新反省臺灣作為歷史案例的獨特性。順著這個脈絡，筆者將在下一節探討具有國際視野的衛生史書寫的可能。

四、作為書寫方略的國際史

追根究底，美援衛生的本質是「powered by the U.S.」，或者說來自國際組織的衛生協助。如美援公共衛生影像集《幼幼無恙》指出的：「如果社區化是理念落實的過程，那國際化則是觀念再提升的自我要求，社區化與國際化的結合，讓臺灣的衛生保健快速跟上已開發國家腳步。」[72] 接續疾病治理與治理邏輯的探討，本節嘗試強調一個跨國界，結合醫療與社會的「國際史」書寫方略，作為累積美援衛生研究成果的起點。[73]

國際史絕對不是新提法。從 1950 年代的瘧疾根除，到 1960 年代的家庭計畫，都不乏國際性的比較研究。如地理狀況相似，約在同時實行瘧疾防治的斯里蘭卡，或者是與政經環境類似，約略同時期採取生育控制的韓國，都曾是社會科學研究者比較臺灣經驗的對象。但這裡提出來的國際史與一般比較研究不同。筆者希望打破地方史與國際史的分野，同時以「國際」與「臺灣」為研究主體，扣緊戰後美國為鞏固「自由世界」（相對共產世界）採取的計畫衛生模式，探討這樣的治理下衛生在東亞社會的交纏。換句話說，張淑卿〈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中提問的標準化衛生操作並非孤例；它必須要從國際視野來關照，並且從醫療技術的發展、公衛專業的建立、衛生計畫的執行，與社會操作的機制等多重面向考慮。

當然，在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論述框架下，日治時期已經有精彩的國際史研究，例如從衛生制度化與東亞秩序的切入點，飯島涉的鼠疫與瘧

72　臺中縣政府衛生局編，《幼幼無恙：臺中縣兒童保健歷史映像》，頁 81。

73　對此許雪姬也有類似的看法。她指出醫療史「不論就殖民現代性或持科技醫療與社會研究的觀點，都必須植基於特定時間之中的社會文化脈絡。至於跨時代、跨地域的縱、橫軸比較，也是此領域的研究不可或缺之手段。」參見許雪姬，〈2007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200。

疾史研究；瀨戶口明久從「帝國知識」的觀點，比較與整理日本本土與殖民地的昆蟲學與防治蚊蟲知識；劉士永掌握學術生產特色，分析北里柴三郎的門生在殖民地的知識網路等。[74] 這些研究所探討者不限於一國一地，而展現醫療的跨國性格；它們也呼應傅大為在《亞細亞的新身體》裡揭示的書寫方略：即使同在現代化的大方向上，相異的社會情境也會滋生攸關技術與身體，獨特的歷史途徑。[75] 也因為如此，這樣的國際史現階段要用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每個案例都有不同的衛生狀況、社會情境與政治效應，需要妥切地處理與考量。

以下筆者用個人比較熟悉的瘧疾為例，說明國際史書寫的可能。[76] 瘧疾是老問題，但要到日治時期才成為公共衛生的工作標的。對此，衛生署出版的《臺灣撲瘧紀實》是典型的進步觀點作品。[77] 它從蚊蟲研究與防疫措施（如服用抗瘧藥、追蹤病例與環境清理）等面向，描寫臺灣如何脫離「瘴癘之地」的惡名。這種說法不能說全錯，但卻是僅著眼於現代性引進的片面敘述。晚近疾病史研究者關注瘧疾防治的國際動態，提供細緻處理臺灣案例的啟示。例如，從治理邏輯來說，脇村孝平提出「對人法」與「對蚊法」的兩種防治路線與它們對瘧疾控制的社會影響。[78] 而顧雅文的研究進一步將臺灣放進這個脈絡，具體呈現公共衛生主流之

---

74 飯島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2000）；飯島涉，《マラリアと帝国：植民地医学と東アジアの広域秩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Akihisa Setoguchi, “Control of Insect Vectors in the Japanese Empi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onial/Metropolitan Environment, 1920-1945,”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 2（2007）, pp. 167-181；Shiyung Liu, “The Ripples of Rivalry: The Spread of Modern Medicine from Japan to its Colonie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 1（2008）, pp. 47-71。

75 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頁 18-19。

76 以下瘧疾防治的部分敘述，來自郭文華，〈世界衛生版圖少了臺灣這塊〉，《新新聞》977（2005 年 11 月 24 日），頁 100-110；郭文華，〈尋索躲在標準論述後的臺灣防瘧奇蹟〉，《科學發展月刊》34: 2（2008 年 2 月），頁 82-84。另外，筆者於 2009 年分赴洛克斐勒（Rockefeller）檔案館與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收集相關資料，部分資料與觀點也受惠於此。

77 行政院衛生署編，《臺灣撲瘧紀實》（臺北：編者，1993）。

78 因為瘧疾是寄生蟲所引起，而其中間宿主是蚊蟲，因此控制上可以有利用抗瘧藥，從人體中去除瘧原蟲的「對人法」，還有藉由殺蟲劑與環境整理，去除瘧原蟲中間宿主的「對蚊法」兩種路線。雖然在實行中這兩種方法並不排斥，通常也一起使用，但在歷史的發展中不同的主事者往往有不同的控制重點，比方說發現瘧原蟲的 Ronald Ross，便主張中間宿主的消滅是基本，但德國 Robert Koch 卻認為普遍使用抗瘧藥，消滅人體內的瘧原蟲才是究竟。參見脇村孝平，〈アノフェレス・ファクターとヒューマン・ファクター——植民地統治下のマラリア防遏：インドと台湾〉，收於見市雅俊、斉藤修、脇村孝平、飯島涉等編，《疾病・開発・帝国医療：アジアにおける病気と医療の歴史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頁 185-212。

外，防瘧在現實問題與理論間的徘徊。[79] 另一方面，得力於地理資訊系統的協助，研究者對日治時期的瘧疾分布有更多掌握。瘧疾不再是沒有時間感、公共衛生學上的「風土病」（endemic），而是如顧雅文與劉士永所指出的，與殖民治理範圍的移動與轉變相關連。[80]

瞭解上述的瘧疾史進展，有助於我們掌握美援的防瘧轉折。事實上，《臺灣撲瘧紀實》與最近的《臺灣瘧疾根除四十週年紀念展導覽手冊》都強調當時公共衛生的國際參與。不過持平而論，這些論述並非單純歷史描述。它們將國際組織視為醫療先進的象徵，並且用臺灣得到國外協助達成瘧疾根除，之後將其所學回饋國際的過程，凸顯目前遭受的衛生孤立。這是可以理解的敘述理路。從 1990 年代以來相關的紀念活動，如 1990 年高雄醫學大學主辦的研討會與論文集、防瘧前輩的紀錄片、《臺灣撲瘧紀實》的出版、2004 年的瘧疾前輩巡迴演講與資料展覽、2005 年疾病管制局主辦的瘧疾撲滅四十週年展覽，到 2009 年陸續出版的防瘧人物訪談等，[81] 在在強化臺灣防瘧的先進與支撐該計畫的國家意識。

確實，臺灣率先根除瘧疾，給予其他國家不少經驗，而世界撲瘧文獻中談臺灣的地方也的確不多。因此，這些書寫不斷強調臺灣的進步性，認為世界不該忽略它。不過，在抱怨政治因素之外，衛生史研究者或許還該思考實際的書寫方略。畢竟事過境遷後，再怎麼精彩的案例也看似大同小異，成為國際衛生論述中可有可無的細節。因此，雖然筆者不認為臺灣完全沒有值得提供的歷史教訓，但在「翻案」之前，我們必須認識清楚世界怎樣談防瘧，而這樣的談法少些什麼，才能凸顯臺灣的特殊性。這是國際史書寫的核心概念。

簡單介紹防瘧理念在二十世紀的轉折。首先是公衛政策的原則之爭——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到底單一疾病防治與社會環境的改造孰先孰後？雖然這個問題在戰前便時有論辯，但由於洛克斐勒基金會國際衛生組（International Health Division

---

79 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瘧疾防遏政策：「對人法」？「對蚊法」？〉，《臺灣史研究》11: 2（2004 年 12 月），頁 185-222。

80 顧雅文，〈臺湾におけるマラリアの流行及びその防疫対策の推移〉（横浜：横浜国立大学国際社会科学研究博士論文，2005）；劉士永，〈從血絲蟲到瘧原蟲：從風土病類型移轉看臺灣西部平原之開發〉，收於王利華等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變遷與疾病》（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 393-423。

81 梁鑛琪，〈瘧疾研究所呈現醫療專業的時代意義〉，收於余玉眉、蔡篤堅合編，《臺灣醫療道德之演變：若干歷程及個案探討》（臺北：國家衛生研究院，2003），頁 203-211；蔡篤堅、梁妃儀訪談，〈梁鑛琪口述歷史〉，《臺灣風物》59: 2（2009 年 6 月），頁 9-39。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影響，在實行上大致以疾病控制為中心。從鉤蟲防治開始，國際衛生組織便在 Wickliffe Rose 主任領導下，定出掃蕩疾病以帶動公共衛生的方針。而在正式跨足國際後，基金會在遠東、東南亞、澳洲與巴西都設有辦事處，並建立一套結合實驗室研究、田野試驗與大規模推動以疾病防治為中心的工作模式。[82]

洛克斐勒基金會在 1951 年解散國際衛生組，其工作移轉到世界衛生組織，而這個爭論也進入新階段。具體而言，在疾病控制與公衛基礎孰先孰後外，這個論爭又添上效益的新面向——用多少經費控制瘧疾才划算？而這些爭議並未因 DDT 的出現而消失。雖然基金會之前執行不少研究，包括有名的 Sardinia 全島瘧疾撲滅試驗，證實 DDT 比過去的除蚊劑長效，品質也穩定。但瘧蚊種類繁多，生長習性又各不相同，加上抗藥性瘧蚊的發現，大多數專家，包括大力推動 DDT 的泛美衛生組織（Pan American Sanitary Organization，1958 年改名為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主任 Fred Soper 都不看好撲殺中間宿主的防瘧模式。另一方面，對世界衛生組織來說，瘧疾是建立威望的機會。1947 年世界衛生組織的防瘧委員會發下豪語，希望使用 DDT 全面將瘧疾，甚至瘧蚊根除，之後更將斯里蘭卡、希臘與委內瑞拉等國家納入防瘧計畫中。[83] 於是，在 1955 年全球根除計畫拍板定案前，防瘧政策一直走在不確定的態勢中。專家對於要不要控制瘧疾沒有意見，但卻對控制到什麼地步沒有共識——它是該被「控制」（controlled）還是需要「根除」（eradicated）？[84]

上述背景有助於理解臺灣如何轉進世界防瘧體系。隨著洛克斐勒基金會踏入亞洲的腳步，[85] 臺灣在戰後納入其防瘧體系，從 1947 年起在潮州、基隆與埔里

---

[82] John Farley, *To Cast Out Disease: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Division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13-1951)*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83] Javed Siddiqi, *World Health and World Politic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 System* (Columbus,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5), pp. 128-134; Randall M. Packard, *The Making of a Tropical Disease: A Short History of Malar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50-176.

[84] Marcos Cueto, *Cold War, Deadly Fevers: Malaria Eradication in Mexico, 1955-1975*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5-69.

[85] Darwin Stapleton, "Malaria Eradication and the Technological Model: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ublic Health in East Asia," in Ka-che Yip ed., *Disease, Colonialism, and the State: Malaria in Modern East Asian Histor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9), pp. 71-84.

從事瘧蚊調查與抗瘧新藥的試驗，但這些工作隨即因政治考量而中斷。等到冷戰態勢成型後，世界衛生組織接手防瘧，以雙方互助的技術支援方式，在 1951 年與臺灣簽約，讓它與越南、寮國、柬甫寨、印尼、緬甸與泰國等，成為瘧疾控制在亞洲的第一波試金石。

但這不意味計畫執行者自始至終清楚自己的工作目標。雖然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經費，專家、器材與設備，在全島如火如荼展開地毯式噴灑，但根據《臺灣撲瘧紀實》的報導，在五年計畫（1952-1956），也就是所謂「攻擊期」剛開始時，主事者不期望瘧疾就此撲滅；直到進行到第三年時，當局才配合世界衛生組織宣示延長噴灑計畫兩年，並將目標從控制改成根除。[86]

但臺灣終究成功了，在 1965 年獲頒根除證明。這是臺灣撲瘧經驗的迷人處——如果沒有成功的把握與經驗，臺灣是如何在不確定成效，在不斷有疫區移民（如大陳與滇緬移民等）遷入的態勢下，依舊深信可以完成任務？一些研究者重新解讀 DDT 噴灑的社會因素，有不少有趣發現。例如，葉嘉熾的論文從防瘧計畫的執行中，指出日本遺留的公衛基礎以及國際組織的技術支援，是 DDT 之外臺灣防瘧成功的制度性貢獻。[87] 而臺灣的研究則補充葉嘉熾沒有強調的在地角色與傳承。且不管連日清與莊徵華等前輩的見證，范燕秋很早便以宜蘭經驗為例，指出日治時期的防瘧培養出一批熟諳此病的基層人員。[88] 這些人不見得是專家，但他們熟諳瘧疾的控制方法，為戰後的計畫打下基礎。另外，蔡篤堅等人的訪談更指出當時年輕醫學院畢業生的無私投入，[89] 是防瘧計畫順利執行的重要因素。

林宜平與劉士永進一步指出臺灣撲瘧後面的社會結構。[90] 對他們來說，所謂的「日本基礎」或者不能簡化成公共衛生的進步而已。從大掃除到清潔日，民眾

---

86 行政院衛生署編，《臺灣撲瘧紀實》，頁 82。

87 Ka-che Yip, "Health, Disease, and the Nationalistic State: Perspectives on Malaria Eradication in Taiwan," in Ka-che Yip, ed., *Disease, Colonialism, and the State*, pp. 85-102.

88 范燕秋，〈戰後臺灣瘧疾之根除：以宜蘭地區為例〉，收於宜蘭縣立文化中心編，《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編者，1995)，頁 134-169。

89 有梁鑛琪、陳錫舟、彭瑞雲、周聯彬、陳政德、謝獻臣、陳錫煊、曾柏村、吳耀津、葉盛吉、陳萬益、莊徵華等 12 位畢業自臺北帝國大學與臺灣大學的畢業生。參見蔡篤堅、梁妃儀，〈臺灣撲瘧經驗所展現的醫學倫理新貌〉，《應用倫理研究通訊》24 (2002)，頁 6-9；蔡篤堅、梁妃儀，〈瘧疾研究所代表的臺灣醫學倫理發展意涵〉，收於余玉眉、蔡篤堅合編，《臺灣醫療道德之演變》，頁 111。

90 Yi-Ping Lin and Shiyung Liu, " Forgotten wars: Anti-malaria campaign in Taiwan, 1905-1965," in Angela ki che Len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Modern Chinese East Asia* (forthcoming).

早已習慣大型的公衛演習。而原先就建置完成的公共建設與嚴謹的戶口制度，地理的相對隔絕與人口的穩定，都為以家戶噴灑為主的撲瘧計畫打下厚實基礎，更不用說是之後長期的監視與考核。從這個觀點看，如果當時公衛專家將衛生與社會強分為二，認為以疾病防治為中心的衛生計畫無法兼顧兩者，臺灣的經驗顯然讓我們重新深思公衛體系與社會密不可分的關係——沒有在地的人際網路與環境知識，也就沒有衛生計畫的成功。

但這個故事是否就如此簡單？從政策與治理的角度來說，臺灣的防瘧決策還透露當局與冷戰政治的微妙關係。比方說，1950 年代瘧疾計畫的難題之一在於當地政府的猶豫不決。雖然有國際組織協助，但非所有國家都有能力與意願配合執行。[91] 相對於此，臺灣的反應異常明快。1951 年在世界衛生組織派遣專家訪查後，當局隨即在 10 月 17 日舉行跨國跨部會會議，與會者包括內政部衛生司、臺灣省衛生處、臺灣省瘧疾研究所、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美援運用委員會、農復會與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瘧疾的防治方針。甚至之後提出的四年計畫中，當局也樂觀宣稱可以在最有效益的方式下「根除」瘧疾。[92]

這個決策確實輕率；因為次年執行者便將工作目標下修為謹慎的「控制」。但是，如果我們將臺灣對美國在冷戰的依賴關係納入考慮，我們可以理解撲瘧計畫強渡關山的政治邏輯。Packard 指出 DDT 的撲瘧模式之所以成為主流，其中一大原因是因為美國想傾銷自己生產的 DDT。[93] 雖然臺灣與他國不同，早在推動計畫時便可自行生產小部分 DDT，但原料尚需美國提供。另一方面，臺灣並非遠離戰爭；在準備反共之餘，臺灣也擔負共產勢力的圍堵。於是，如同先前殖民者的考量一般，當地盛行瘧疾並不利於軍隊，因此需要控制。雖然這個決策後面複雜的政治經濟網絡還有待更多研究，但清楚的是，1965 年世界衛生組織的瘧疾根除證明不僅是對臺灣公共衛生的肯定；它同時也讓這塊昔日的日本殖民地重新鑲在以美國主導的冷戰衛生版圖上。

---

91 Gordon Harrison, *Mosquitoes, Malaria, and Man: A History of Hostilities* (New York: E.P. Dutton, 1978), pp. 228-248.

92 Taiwan Provincial Malaria Research Institute, “Proposed Malaria Eradication and Insect Control Program in Taiwan, January 1951 to December 1956,” Document stored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ile number: RG 469 China Subject Files 1960-1961, Box 253.

93 Randall M. Packard, “No other Logical Choice: Global Malaria Erad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in the Post-war Era,” *Parassitologia* 40: 1/2（1998）, pp. 217-229.

小結以上。國際史書寫不是比較研究，而是回歸歷史，在理解衛生的跨國本質後，將國際衛生動態與在地回應同步呈現。筆者認為，從這個角度出發的研究不但可以在題材上與醫療史對話，更可以超越過去歷史素材雜亂、理論先行的書寫兩難，從案例中建立對美援衛生的紮實認識。

五、美援衛生史的未來課題

本文最後檢討美援衛生的書寫課題。顯然，疾病是一個起點，但非全部。比方說，楊翠華很早便提出機構與援助性質的重要。[94] 從此觀之，一些跨國性衛生援助機構，如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中華醫學基金會，更不用說與洛克斐勒基金會關係深厚的紐約人口局（The Population Council）等，都是具體的研究課題。雖然目前已經有些個人性的紀錄或回憶出現，比方說，《臺灣醫療道德之演變》中有關「老協和」部分的介紹、[95] 美國醫藥援華會前執行長 John Watt 編輯的戰後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歷史，[96] 或者是衛生署委託編輯的《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與臺灣》[97] 等，但如果要深入瞭解它們對臺灣的影響，還是必須重回檔案，以國際史的視野處理。

以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U. S.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No.2; 簡稱 NAMRU-2）與紐約人口局來說，它們是兩個與冷戰治理相關，但討論不多的機構。前者原隸屬太平洋艦隊，1955 年因為戰略考量將總部設在臺北，直到臺美斷交後於 1979 年結束業務。雖然 NAMRU-2 是冷戰布局所產生的戰爭機構，但對於當地研究人才的養成，熱帶醫學的支持（比方說肝炎、血絲蟲與烏腳病），與臺

---

[94] 楊翠華，〈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頁 41-103。

[95] 蔣欣欣，〈老協和精神對臺灣的影響：英美醫護教育的傳承〉，收於余玉眉、蔡篤堅合編，《臺灣醫療道德之演變》，頁 41-67；施純仁，〈協和精神概說〉，收於余玉眉、蔡篤堅合編，《臺灣醫療道德之演變》，頁 179-186。另外，關於協和人物在臺灣的醫療活動，可參見劉士永，〈淺談戰後初期的台灣醫學活動與資源整合〉，《源遠》2009 年冬季號，頁 5-11。

[96] John R. Watt, *A Friend in Deed: ABMAC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37-1987* (New York: ABMAC, 1992); John R. Watt, ed., *Health Car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1950-2000* (Boston: ABMAC Foundation, 2008).

[97] 李孟智編，《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與臺灣：臺灣醫療衛生界一個真誠伙伴的紀實》(臺中：李氏慈愛青少年醫學教育基金會，2007)。

美學術聯繫（如華盛頓大學）都有很重要的貢獻。紐約人口局由 John Rockefeller III 成立，以大規模節育來控制人口成長為目標。雖然它與冷戰沒有直接關連，但在控制人口以穩定當地政局，進而節制共產擴張的邏輯下，它卻與美國的東亞政策緊緊扣連。[98] 在這樣的脈絡下，人口局也透過人口調查，研究人才培育與公衛計畫推動，將其冷戰的政經理念編入實作，並透過在地的研究機構來延續其影響。

在機構之外，人是重要的因素。對此，張淑卿已經指出美援人才進修對戰後醫學教育的影響。[99] 但除了正式進修與參訪之外，透過衛生計畫合作所培養的官僚，也是探究美援衛生不能忽略的面向。比方說，在國府時期擔任協和醫學院院長與衛生部長，在臺灣擔任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代表的劉瑞恆，便是瞭解美援衛生的關鍵人物。[100] 此外，曾擔任臺灣省衛生處長與衛生署長，對臺灣衛生政策影響甚大的顏春輝，與繼任的許子秋等，也都是值得注意的衛生官僚。雖然目前關於許子秋已有傳記式的作品，[101] 但顏春輝的研究依然闕如，而他們與美援機構及衛生計畫的關係也尚未釐清。雖然學界可以接受美援衛生後面的政經背景，但這些是否可以串成如日本占領期歷史一樣嚴肅的討論，仍有待觀察。

而這樣的研究積累，無可避免會牽動戰後臺灣衛生發展的詮釋。這樣說，如果殖民與現代化是討論日治衛生的概念架構，那「後殖民」或「後現代」是否是討論美援衛生的適切架構？本文雖然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不過，它期待更多的實證研究來深化這個探討。讓筆者用一個例子結束本文。在目前的公衛論述裡，衛生所的全面建置是戰後衛生的起點。另一方面，學者也質疑這是美式標準化衛生治理的開端，甚至是日治警察系統的延續。[102] 不過，從擔任臺灣省政府營繕課技士，主導衛生所規劃的李重耀建築師的回憶裡，我們看到類似劉永楙的在地美援經驗。[103] 李重耀當時受農復會鄉村衛生組許世鉅、張坤崗委託，依照人口與經濟狀況畫出五種標準化的衛生所式樣，提供給各鄉鎮依圖興建。沒有設計醫療空

98　郭文華，〈美援下的衛生政策〉，頁 325-365。

99　張淑卿，〈蔪新的醫療觀點〉，頁 148-151。

100　關於劉瑞恆的生平與事功的介紹，請參見劉似錦編，《劉瑞恆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衛生事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101　林靜靜，《壯志與堅持：許子秋與臺灣公共衛生》（臺北：董氏基金會，2002）。

102　Hsien-yu Chin, “Colonial Medical Police and Postcolonial Medical Surveillance Systems in Taiwan, 1895-1950s,” *Osiris* 13 (July 1998), pp. 326-338.

103　林敏哲、李學忠、李蕙美策劃，《桁間巧師：李重耀的建築人生》（臺北：重耀建築師事務所，2003）。

間經驗的他為了達成目標，除了參考日本與美國案例外，每天更與美援專家討論細節，才繪製出中英文對照，大家滿意的建築圖。

這些建築圖也呈現徘徊在標準模式與在地習慣間的美援衛生本質。例如，李重耀雖然知道美國建築習慣使用空心磚造，但因為臺灣過去多用加強磚造，因此他從施工觀點說服專家，終於可以使用加強磚造。而這樣的說服與協商模式在公衛計畫並不少見。例如當時參與瘧疾防治的黃揚銘回憶道：「嚴格來說，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等的各國顧問，與其說他們提供了實際的撲瘧方法與步驟，倒不如說是尚待實驗與標準化的理論與觀念來的貼切。」[104] 換句話說，在解決沒有標準答案的熱帶公衛問題時，美援模式與在地經驗其實不見得相互排斥。作為研究者，我們要更貼近現場，從這些互動中建立對「被援助醫療」的歷史認識。

這是書寫美援下的衛生之時代性意義。正因為它來自於對當前政治、身體治理與現代性的想像與反省，它才值得成為可談的分期，超脫現有解釋框架的研究課題。雖然這並不意味美援會完全顛覆我們對於當代的認識，甚至重新建構「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但本文認為有國際視野的國際史書寫方略，在目前有引發大家思考臺灣處境的功用。

---

[104] 蔡篤堅、梁妃儀，〈臺灣撲瘧經驗所展現的醫學倫理新貌〉，頁 6-9。

引用書目

王開弘

2005　〈臺灣防疫政策的歷史制度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白榮熙（編）

1999　《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大事記》。臺北：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衛生署（編）

1993　《臺灣撲瘧紀實》。臺北：編者。

1995　《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一）》。臺北：編者。

1995　《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二）》。臺北：編者。

1995　《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照片選集》。臺北：編者。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

2005　《臺灣瘧疾根除四十週年紀念展導覽手冊》。臺北：編者。

行政院衛生署檢疫總所（編）

1996　《臺灣地區檢疫五十年》。臺北：編者。

吳介尊

2006　〈日治時代以來臺灣地區疾病轉型模式之探討〉，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主辦「臺灣人口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5 月 27 日。

李孟智（編）

2007　《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與臺灣：臺灣醫療衛生界一個真誠伙伴的紀實》。臺中：李氏慈愛青少年醫學教育基金會。

李政益

2001　〈疾病、文化與社會變遷：由結核病流行觀點探究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臺灣社會〉。臺北：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杜聰明

1959　《中西醫學史略》。高雄：高雄醫學院。

周忠彥

2007　〈臺灣癩病機構之研究：以私立樂山園為例（1928-1992）〉。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琇環（編）

1995　《農復會史料》。臺北：國史館。

1998　《臺灣光復後美援史料——第三冊：技術協助計畫》。臺北：國史館。

林敏哲、李學忠、李蕙美（策劃）

2003　《桁間巧師：李重耀的建築人生》。臺北：重耀建築師事務所。

林靜靜

2002　《壯志與堅持——許子秋與臺灣公共衛生》。臺北：董氏基金會。

施純仁

2003　〈協和精神概說〉，收於余玉眉、蔡篤堅合編，《臺灣醫療道德之演變：若干歷程及個案探討》，頁 179-186。臺北：國家衛生研究院。

范燕秋

1994　〈日據前期臺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1895-192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5　〈戰後臺灣瘧疾之根除：以宜蘭地區為例〉，收於宜蘭縣立文化中心編，《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34-169。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2003　〈近十年國內《臺灣史》通論著作研究回顧〉，《臺灣史料研究》21: 88-114。

2005　《疾病、醫療與殖民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臺北：稻鄉出版社。

張淑卿

1997　〈戰後臺灣地區傳染病防治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臺灣結核病史研究（1945-70s）〉。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5　〈防癆協會與 1950 至 1970 年代臺灣的結核病防治〉，《臺灣風物》55(1): 43-72。

2006　〈防瘧與防癆：一九五〇年代的公共衛生〉，收於劉士永主編，《臺灣醫療 400 年》，頁 152-159。臺北：經典雜誌。

2006　〈嶄新的醫療觀點：美援對臺灣醫學教育的影響〉，收於劉士永主編，《臺灣醫療 400 年》，頁 148-151。臺北：經典雜誌。

2006　〈戰後臺灣的防癆保健員〉，《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4: 89-123。

2008　〈有用的利器？卡介苗與 X 光在臺灣結核病防治中的醫療技術實踐〉，收於成令方主編，《醫療與社會共舞》，頁 299-307。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9　〈1950、60 年代臺灣卡介苗的預防接種計畫〉，《科技醫療與社會》8: 121-172。

張瓊蓉

2009　〈衛生所與社區疏離關係的歷史發展分析〉。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璨尹

2005　〈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史耘》11: 117-134。

曹永和

2008　〈臺灣與海洋亞洲教研平臺　序〉，《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1: 7。

梁鑛琪

2003　〈瘧疾研究所呈現醫療專業的時代意義〉，收於余玉眉、蔡篤堅合編，《臺灣醫療道德之演變：若干歷程及個案探討》，頁 203-211。臺北：國家衛生研究院。

莊永明

1998　《臺灣醫療史：以臺大醫院為主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雪姬

2009　〈2007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6(2): 161-204。

郭文華

1996　〈臺灣醫療史研究的回顧與現狀：以學術脈絡為中心的探討〉，《臺灣史料研究》8: 60-75。

1997 〈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臺灣家庭計畫：醫療政策與女性史的探討〉。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 〈在疾疫與美援的年代：戰後臺灣衛生體制的形成〉，收於臺中縣政府衛生局編，《幼幼無恙：臺中縣兒童保健館歷史映像》，頁 15-20。臺中：臺中縣衛生局。

2004 〈歸檔臺灣醫療：初探醫師書寫的歷史與社會學〉，《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4: 105-148。

2005 〈世界衛生版圖少了臺灣這塊〉，《新新聞週報》977: 100-110。

2006 〈建構臺灣衛生體制：美援醫療的背景及其衛生政策〉，收於劉士永主編，《臺灣醫療 400 年》，頁 142-147。臺北：經典雜誌。

2008 〈尋索躲在標準論述後的臺灣防瘧奇蹟〉，《科學發展月刊》34(2): 82-84。

2008 〈美援下的衛生政策：一九六〇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收於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療》，頁 325-365。臺北：聯經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陳永發（編）

2006 《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威彬

2001 〈近代臺灣的癩病與療養：以樂生療養院為主軸〉。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盈華

2007 〈臺灣社會與疾病史中的 SARS 經驗〉。臺北：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寄禪

1981 《追溯五十年來促進我衛生設施之關鍵事蹟》。臺北：正中書局。

陳淑芬

1998 〈戰後之疫：臺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建制（1945-195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傅大為

2005 《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臺灣》。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飯島涉

2000 《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

2005 《マラリアと帝国：植民地医学と東アジアの広域秩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黃文弘

2001 〈政經框架、典範碰撞與知識位移：臺灣醫學典範轉折的系譜溯源〉。臺北：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培潔

2004 〈兩種社工論述場域之分析與反思：以社區發展季刊與漂流社工電子報為例〉。臺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楊翠華

1999 〈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歐美研究》29(2): 41-103。

2006 〈美援技術協助：戰後臺灣工業開端的一個側面〉，收於陳永發主編，《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頁 261-29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8 〈美援對臺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 91-139。

葉永文

2006 《臺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葉金川（主編）

2001 《發現臺灣公衛行腳：臺灣十大公衛計畫紀實》。臺北：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

董惠文

2004 〈行政監控與醫療規訓：談日治初期傳染病的防治〉。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詹雅筑

2007 〈醫學教育與殖民社會：由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出現談起〉。臺北：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鄔孟慧

2004 〈戰後臺灣的肺結核病防治（1950-1966）〉。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戰後臺灣基層防癆工作的推動〉，《暨南史學》9: 87-116。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

1997 《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中縣政府衛生局（編）

2001 《幼幼無恙：臺中縣兒童保健歷史映象》。臺中：編者。

臺灣醫界聯盟基金會醫學史工作室、醫望雜誌（編輯）

2001 《臺灣根除小兒痲痺症紀實》。臺北：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裴晉國

1995 〈臺灣地區國家機關與醫療體系之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趙既昌

1985 《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劉士永

2001 〈「清潔」到「衛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8(1): 41-88。

2002 〈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的疾病結構改變〉，《新史學》13(4): 165-208。

2007 〈從血絲蟲到瘧原蟲：從風土病類型移轉看臺灣西部平原之開發〉，收於王利華等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變遷與疾病》，頁 393-423。北京：三聯書店。

2009 〈淺談戰後初期的台灣醫學活動與資源整合〉，《源遠》冬季號: 5-11。

劉士永（編）

2006 《臺灣醫療 400 年》。臺北：經典雜誌。

劉似錦（編）

1989 《劉瑞恆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衛生事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劉翠溶、劉士永

1999 〈臺灣歷史上的疾病與死亡〉，《臺灣史研究》4(2): 89-132。

蔣欣欣

2003 〈老協和精神對臺灣的影響：英美醫護教育的傳承〉，收於余玉眉、蔡篤堅合編，《臺灣醫療道德之演變：若干歷程及個案探討》，頁 41-67。臺北：國家衛生研究院。

蔡姿儀

2007 〈戰後臺灣瘧疾防治之研究（1945-1965）〉。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篤堅、梁妃儀

2002 〈臺灣撲瘧經驗所展現的醫學倫理新貌〉，《應用倫理研究通訊》24: 6-9。

2003 〈瘧疾研究所代表的臺灣醫學倫理發展意涵〉，收於余玉眉、蔡篤堅合編，《臺灣醫療道德之演變：若干歷程及個案探討》，頁 101-132。臺北：國家衛生研究院。

蔡篤堅、梁妃儀（訪談）

2009 〈梁鑛琪口述歷史〉，《臺灣風物》59(2): 9-39。

鄭淑芹

2003 〈日治時代嘉義地區西式醫療的發展：以嘉義醫院為主（1895 年至 1920 年）〉。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盧忻謐、陳怡霈、蔡篤堅（主編）

2007 《荒漠行醫照影：中沙醫療團援外史料紀錄》。臺北：行政院衛生署。

鍾有良

2005 〈醫療工業、國家與健康〉。臺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鍾淑姬

2004 〈從妊產婦名簿到助產所：臺灣（新竹）助產士的歷史研究，1920～1970〉。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顧雅文

2004 〈日治時期臺灣瘧疾防遏政策：「對人法」？「對蚊法」？〉，《臺灣史研究》11(2): 185-222。

2005 〈臺湾におけるマラリアの流行及びその防疫対策の推移〉。横浜：横浜国立大学国際社会科学研究博士論文。

脇村孝平

2001 〈アノフェレス・ファクターとヒューマン・ファクター——植民地統治下のマラリア防遏：インドと台湾〉，收於見市雅俊、斉藤修、脇村孝平、飯島渉編，《疾病・開発・帝国医療：アジアにおける病気と医療の歴史学》，頁 185-212。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Chin, Hsien-yu 秦先玉

1998 "Colonial Medical Police and Postcolonial Medical Surveillance Systems in Taiwan, 1895-1950s." *Osiris* 13: 326-338.

Cueto, Marcos

2007 *Cold War, Deadly Fevers: Malaria Eradication in Mexico, 1955-1975*.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an, Fa-ti 范發迪

2007 "Redrawing the Map: Science in Twenty-Century China." *Isis* 98: 524-538.

Farley, John

2004 *To Cast Out Disease: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Division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13-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 Gordon

1978 *Mosquitoes, Malaria, and Man: A History of Hostilities*. New York: E.P. Dutton.

Hexter, J. H.

1979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Views on History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inrichs, T. J.

1998 "New Geographies of Chinese Medicine." *Osiris* 13: 287-325.

Ichinokawa, Yasutaka 市野川容孝

2009 "Introduction: Transaction in Medicine & Heteronomous Modernization." In Shizu Sakai, Tatsuo Sakai, Christian Oberländer, and Yasutaka Ichinokawa, eds., *Transaction in Medicine & Heteronomous Modernization: Germany, Japan, Korea and Taiwan*, pp. 9-16.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for Philosophy.

Jacoby, Neil

1966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 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Lin, Yi-Ping 林宜平 and Shiyung Liu 劉士永

forthcoming " Forgotten wars: Anti-malaria campaign in Taiwan, 1905-1965." In Angela ki che Len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Modern Chinese East Asia.*

Liu, Shiyung 劉士永

2008 "The Ripples of Rivalry: The Spread of Modern Medicine from Japan to its Colonie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1): 47-71.

Lo, Ming-Cheng M.

2002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ckard, Randall M.

1998 "No other Logical Choice: Global Malaria Erad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in the Post-war Era." *Parassitologia* 40(1/2): 217-229.

2007 *The Making of a Tropical Disease: A Short History of Malar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osenberg, Charles E.

1987 *The Cholera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in 1832, 1849, and 186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toguchi, Akihisa 瀬戸口明久

2007 "Control of Insect Vectors in the Japanese Empi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onial/Metropolitan Environment, 1920-1945."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2): 167-181.

Siddiqi, Javed

1995 *World Health and World Politic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 System*. Columbu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Stapleton, Darwin

2009 “Malaria Eradication and the Technological Model: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ublic Health in East Asia.” In Ka-che Yip, ed., *Disease, Colonialism, and the State: Malaria in Modern East Asian History*, pp. 71-84.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iwan Provincial Malaria Research Institute

1951 “Proposed Malaria Eradication and Insect Control Program in Taiwan, January 1951 to December 1956.” Document stored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ile number: RG 469 China Subject Files 1960-1961, Box 253.

Watt, John R.

1992 *A Friend in Deed: ABMAC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37-1987*. New York: ABMAC.

Watt, John R.（ed.）

2008 *Health Car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1950-2000*. Boston: ABMAC Foundation.

Yao, Jen-to

2002 “Governing the Colonized: Governmentality in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ssex.

Yip, Ka-che 葉嘉熾

2009 “Health, Disease, and the Nationalistic State: Perspectives on Malaria Eradication in Taiwan.” In Ka-che Yip, ed., *Disease, Colonialism, and the State: Malaria in Modern East Asian History*, pp. 85-102.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17, No. 1, pp. 175-210, March 2010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How to Write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under U.S. Aid in Taiwan: A Critical Review

Wen-Hua Kuo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n account on how to write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under U.S. aid in postwar Taiwan. Unlike conventional review articles, this paper first presents its arguments with an overview of related materials and approaches adopted in this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en followed by an intensive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 on the themes of disease control as well as health policy and governance. Taking the history of malaria and its eradication in Taiw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a policy approach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s apt for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is period.

Keywords: U.S. Aid, Public Health, History of Disease, International Health

《臺灣史研究》
第十七卷第一期，頁 211-222
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評鮑曉歐著《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

陳宗仁*

異文化的相遇、往來、紛爭，甚至兵戎相見，客死他鄉，一直是十六、十七世紀臺灣史的特色，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家與此段歷史有關；臺灣周遭的國家，如中國、日本、菲律賓，甚而遠至泰國，亦均與臺灣有關。目前臺灣出版界流通的歷史書也呈現了這種多元的現象，如韓家寶（Pol Heyns）的《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反映的是荷蘭角度的臺灣早期歷史；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是中國學者的看法；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是美國學者的觀察。[1]

至於臺灣方面，康培德的《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筆者的《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以及翁佳音的《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寫的是臺灣本地學者的觀點。還有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臺灣》，則是旅外臺人的觀察。另外，鄭維中的《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則與韓家寶著作較類似；邱馨慧的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則與康培德作品相近，描述原住民在「文明化歷程」中的變遷。[2]

但在這一長串的書單中，唯獨缺了西班牙人的說法。1930 年代，西班牙傳教

---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4 月 23 日。

1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2002）；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2）；歐陽泰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2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臺灣》（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Hsin-hui Chiu,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Boston: Brill, 2008)。

士 José Maria Álvarez 寫作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3] 是西班牙文的臺灣通史，可惜因語文限制，對臺灣學界影響有限。[4] 新近由南天書局出版的《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填補了這一缺撼。[5]

這本書的作者是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José E. Borao（鮑曉鷗）。他過去為了搜集與臺灣有關的西班牙文獻，花費多年時間，走訪舊日西班牙王國的據點，如古巴、菲律賓的馬尼拉，西班牙國內主要的檔案館、國家圖書館均有其足跡，其收集所得，在 2002 年出版成書，即 *Spaniards in Taiwan*（SMC Publishing, 2001-2002）。

這些年鮑教授屢有單篇論文發表，談論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及東亞海域的發展，但散見各種期刊、研討會論文集，有興趣的讀者難以完整搜羅；而且，鮑教授既是西班牙人，他對三百餘年前先人在臺灣的事蹟，究竟有何較完整的看法，也是我們期盼知道的事。

2009 年，鮑教授大作終於出版，允為臺灣史學界盛事。[6] 初見此書，460 頁，封面是黑色的底，金黃色的古地圖，表露了一種異常時空與陌生感。書名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乍見有點像是異國觀光客的在臺見聞，但副標題有「1626-1642」等字，說明這不是現代觀光客的體驗，而是三百多年前的故事；另一標題是「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讀者或許對此納悶，歐洲史上的文藝復興、巴洛克與臺灣有什麼關係？但這是全書主軸，猶如樂曲的主旋律，隱現於章節間，主導了故事的演變與題材的選擇。

全書除導論及終曲外，共分六章，另有 19 張圖、23 張表，並附有參考文獻及索引，在書籍的編排上，至為嚴謹。

---

[3] José Maria Álvarez,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Barcelona: Luis Gili, 1930).

[4] 此書有關早期臺灣史的章節，已於近年由李毓中、吳孟真譯成中文。參見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José Maria Álvarez）原著，李毓中、吳孟真譯，《西班牙人在臺灣（1626-164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

[5] 作者原以英文撰稿，但英文版晚一年（2009）出版，書名為 *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 the Baroque Ending of a Renaissance Endeavou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 Press, 2009)。

[6] 本書獲 2009 年第 33 屆金鼎獎最佳人文類圖書獎，並有楊宗霖撰寫之書評〈評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大歷史學報》44（2009 年 12 月），頁 205-218；筆者亦曾在國家圖書館刊行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為文介紹，參見陳宗仁，〈福爾摩沙的憧憬及其夢碎：讀《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26（2009 年 6 月），頁 28-30。

在內容上，一開始的〈導論〉，如西洋歌劇裡的序曲，圍繞著「文藝復興」與「巴洛克」兩個主軸；談論著西班牙人來臺灣，原是抱持文藝復興式的憧憬與嚮往，但 1635 年是個轉捩點，此後的時代氣氛是巴洛克式的沈悶，「以一種懷疑、悲觀、問題重重的態度來理解當前的處境」，[7] 結局是西班牙人在羞辱中舉旗投降，黯然離臺。

第一章〈西荷對抗〉，從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東來寫起，但聚焦於西班牙人及荷蘭人在東亞海域的活動，特別是 1600 年至 1648 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掠捕西班牙所屬船隻，封鎖港口，搶奪商品，以及西班牙人反封鎖的作為與幾次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這如同是架構時空舞臺，全書以下幾章的人物、故事，將在這樣的對抗關係中鋪陳。作者認為臺灣島上的西、荷兩股勢力，是「命運相彷的對手」，經歷相同的時代氛圍，即從樂觀向悲觀過渡。

第二章〈抵臺〉，寫地球另一端的西班牙人何以逐步接近臺灣？這種接近，一方面指的是空間距離，亦即航線的不斷探勘、殖民地的漸次擴張；另一方面，對這個天主教王國來說，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距離，西班牙人局限於宗教氛圍中，必須不斷地說服自己，征服異族的合法性何在？作者最後寫道，西班牙人是「踏上無法回頭的旅程，製造出難以逆轉的情境」，[8] 向著世俗妥協。

第三章〈相遇〉，主要描寫西班牙人眼中的臺灣原住民，作者根據西班牙與荷蘭文獻的記載，參考本地學者溫振華、詹素娟、翁佳音及康培德等的研究，按區域介紹臺北盆地及北臺灣海岸的原住民村社，談論村社人口、風俗以及馬賽人的特性，最後則談論村社的政治組織與外人的統治。此章中充滿了紛雜的村社名稱、飄忽不定的居所、奇異野蠻的風俗，佔了 77 頁的篇幅，是全書分量最重的一章。但本章的內容略嫌瑣細，第一節有關村社族群的描述、第三節人口的推估也許可以移入附錄。過多的細節恐使讀者喪失閱讀的方向感。

第四章〈聖救主城〉使全書回到了原有的秩序。在這一章中，作者描述西班牙人城堡的硬體設施與築造經過，亦記載城堡中活動的人員，其中有官員、軍人、自由民、商人、奴僕，還有脫隊的逃兵；作者還提醒我們，在故事的結局，城堡

---

[7] 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北：南天書局，2008），頁 9。

[8] 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頁 89。

或市街空間最後歸於破壞或消亡。

第五章〈北臺灣的商業活動〉，敘述東亞的貿易航線，特別是雞籠與馬尼拉之間的補給船往返；商人則有西班牙人、生理人（中國沿海一帶商人）及原住民；商品有北臺灣的硫磺、藤及鹿皮，菸草是當時新奇的商品，傳播迅速。最後則寫當時各國的黃金夢及其夢碎。

第六章〈傳教活動〉，討論對異文化好奇卻缺乏認識的傳教士，從菲律賓來臺傳教的活動與成果，以及原住民的反抗。

就全書結構而言，導論從西班牙對東方的憧憬談起，終曲是「巴洛克的結束」，這是全書在概念上的架構，至於第一章則是實體歷史的架構，第二章寫來臺前的政經活動及征服的合法性，第三章寫與西班牙人相遇的原住民，至於第四至第六章分別討論北臺據點的經營、商業活動、傳教活動。

附錄 22 篇，大多為重要的史料譯文與事件解說，如西班牙征臺、離臺兩次戰役，以及他們與鄭芝龍、鄭成功的接觸與觀察。此外，本書有豐富的圖與表，如十七世紀西班牙人繪製的東亞圖、港口圖，與作者費心重建的航程圖、雞籠城圖，均使本書深具可讀性與學術性。

這本書的寫法與目前流行的學術專著不同，沒有太強調使用的材料，也未回顧研究史，但這些並不減損此書價值。此書探討西班牙人在臺灣的歷史，但在敘事上，並非僅談西班牙人的經歷，而是不時拉開歷史的縱深和廣度，如第二章論征臺的合法性，從羅馬法談起，一直至來臺後的法理論辯，此乃此書敘事之縱深；又如頁 268 以下十餘頁論尋金夢，除了談論西班牙人的尋金事蹟外，亦同時兼述日本、荷蘭事例，顯示此書之廣度。

此外，本書的問題意識亦甚特出，一般處理十七世紀臺灣史，多半從殖民統治、商業競爭、強權對抗等角度切入，但此書談論的是「文藝復興」的志業與「巴洛克」的結局，這兩個歷史名詞，在此書中，較像是兩種集體心態，或如作者所說，是「文化範疇」、「世界精神」、「一種重大的態度、一種理解人生的方法」。[9]

作者不時在書中解說這兩概念的涵義，如謂「文藝復興」是指一種憧憬、「一種人生態度」、「對名聲所抱有的病態熱忱」；至於「巴洛克」，指的是歐洲人「以

---

[9] 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頁 343。

一種懷疑、悲觀、問題重重的態度來理解當前的處境」。[10] 落實在實際的歷史敘述中，謂 1635 年是「東方」從「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期的轉捩點」，[11] 而西班牙人在臺灣的歷史，「可以用『文藝復興時期的冒險』來一語概括……最後在巴洛克時期的悲觀主義中畫下句點」。而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範疇」構成了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成為西班牙人來臺、在臺及離臺等種種歷史事件背後的主導力量。在全書各章裡，作者依據原始史料，辛勤整理出的歷史敘事，均試圖指向這兩個概念的作用。這是一種文化史的解釋手法，豐富了本地讀者對此段歷史的想像與認知。拜讀之後，獲益良多，以下提出幾點淺見，野人獻曝，謹表對作者之敬意。

（一）關於文化範疇適用性的討論

作者運用「文藝復興」與「巴洛克」這兩個概念來寫作此書，固然是其創意所在，展現作者史識，但同時也可能引來一些質疑，譬如會不會過於強調歐洲文化對於東亞的影響？或者過於強調單一因素、角度以詮釋歷史？

作者在導論中，自謂此書的寫作概念是受歐洲史學者 Jules Michelet、Jacob Burckhardt 的影響，特別是後者的名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在這樣的學術脈絡下，文藝復興不僅是歷史斷代，也是一種文化範疇，可以表述人類精神的某些面向。本書作者進一步發揮前述兩位學者的看法，認為：

> （Burckhardt）主要是在描述義大利……不過這個觀點的適用範圍，也隨著文藝復興擴展及於全歐而增長。他筆下的文藝復興包括了歐洲的帝國主義、經濟擴張、教會衰退，以及看待藝術家的浪漫眼光。不過到了二十世紀，又有新的看法注入其中，著重貿易、財金、科學等面向的重要性，其中又以東方交流為最，呈現出一幅較為動態、互賴、複雜的圖像。[12]

作者在這段文字中，主張義大利文藝復興作為一種文化範疇，其適用範圍會增長，甚至與東方交流。換言之，作為文化範疇的「文藝復興」不僅存在於義大

---

[10] 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頁 9。
[11] 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頁 9。
[12] 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頁 2。

利史、西歐史，也會出現於西方與東方交流史之中，因此，本書便試圖以「文藝復興」、「巴洛克」兩文化範疇來解說東亞或臺灣的時局變遷。

對 Burckhardt 而言，「文藝復興」除了作為時代分期的名稱外，亦是具有「特定的價值觀」，這是從十三至十六世紀義大利史觀察到的歷史現象，但這種價值觀的適用範圍真的會隨文藝復興擴展而及於全歐，再及於歐洲人的「東方」嗎？因此，十六、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史或西班牙在臺歷史是否可用這兩種「文化範疇」來解說，或者此書運用的文化史解釋手法，究竟在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海域史的研究中，是否具有解釋的力量？可以運用到什麼樣的程度？這似乎需要抱持比較謹慎的態度，時時小心這種分析法的有效性與適用範疇。[13]

但本書的作者似乎假定，「文藝復興」、「巴洛克」這兩個文化範疇已是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歷史的主導性力量，而且視「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是相互對立的文化範疇，如樂觀與悲觀、擴張與收縮、勇氣與懦弱、自信與懷疑等。在史實解釋上，有時運用得過於空泛，如第六章謂利瑪竇在去北京之前傳教的方法是「文藝復興時期另一種傳播福音的方式」，而在北京，科學性較高，「巴洛克風格較為強烈」；如果利瑪竇的傳教方法，在進入北京前後，出現兩種風格差異，作者若能論述其變化的原因，而非止於現象描述，或能使其論點更為有力。又如頁 275-276，謂豐臣秀吉對海外財富的覬覦，「有點像文藝復興時代的王子」，而 1630 年代日本幕府則抱持一種「巴洛克精神」，將西方人視為某種「社會疾病」的帶原者，對此類論述，亦宜有更多的說明。

因此，本書的作者似應表明，十六、十七世紀活躍於東亞海域的群體，如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中國人及日本人，這些人群彼此間是否有著某種共同的文化意識，其行為傾向是否有著相關性與同一性？然而，本書似乎將「文藝復興」與「巴洛克」這兩個文化範疇視為前提，而未討論兩者的有效性與解釋力，亦即可以運用到什麼程度？如果能再增加一些篇幅，討論十六、十七世紀臺灣周遭海域的人群擁有某種共同文化範疇的可能性，將使本書更具說服力。

---

13 John E. Wills 在 *1688 : A Global History* 一書中，亦有類似的寫法，Wills 試圖建構一幅 1688 年的全球圖像，全書的開頭有一篇小文，題名「1688 年一月三日　巴洛克的序曲“A Baroque Prelude”」，Wills 對 Baroque 一詞的用法，相較於鮑曉鷗而言，涵義較為限縮而明確，僅視為一種美學上的風格。參見 John E.Wills, *1688 : A Global History*（New York: Norton, 2002）, pp. 1-7, 15.

（二）缺乏與中文學界對話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雖然作者參考了甚多本地學者的論著，亦不斷與臺灣學者討論，但本書提及的某些課題，已有的中文研究成果仍未被引述，舉例而言，如頁 66 有關 Pinar 島的探討，本書根據的是 1970 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論著，但近年澳門史專家金國平已有專文討論；[14] 雞籠港內的華人市集，即所謂的「唐人街」或「澗內」，翁佳音及筆者均有文章討論，[15] 但本書（頁 193）並未提及，使該節的論述不足。又如頁 250 記載雞籠運至馬尼拉的貨物清單，對 lanckijns、cangan 等商品的解釋，宜參考陳國棟有關中國棉布的研究。[16] 鮑教授雖然已盡力搜羅中文論著，但對本地讀者來說，仍嫌對話不足。

（三）部份敘述略有訛誤

本書有些史實錯誤，其中較主要的是頁 159，作者討論臺灣原住民的政治組織類型時，引用日本學者早瀨晉三的論述，將東南亞海域的「王國／民族的形成（kingdom/nation-making）」，分為四種類型，其中第一種是 Indianization（印度化）。

早瀨氏所說的 Indianization，指的是東南亞早期國家的形成是受今印度半島宗教、政治、文化的影響，即法國漢學家 G. Cœdès 的名著《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所論，此處之印度是指今印度半島，而不包含東南亞。[17] 然而作者誤解「印度化」之概念，以為是十六、七世紀西班牙用語中的 “Indias”，Indianization 遂被解釋為自主發展而形成的王國，如臺灣中部大肚王的組織便被作者認為與「印地安化而形成的王國」略有相似之處。[18]

其他錯誤較為瑣碎，如 1582 年有艘葡萄牙船隻在臺灣海域觸礁，此一船型在本書的不同頁別中，出現三種不同的船型：galeon、Nao、Junco，[19] 據當時傳

---

14 旅居葡萄牙的中國學者金國平有專文討論此問題。參見金國平，〈O Pinhal 與 El Pinal 考〉，收入氏著，《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頁 324-343。

15 可參見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106-111；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頁 243-247。

16 陳國棟，〈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收入氏著，《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451-478。

17 此書法文原名 *Les É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有蔡華、楊保筠的中譯本《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18 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頁 161。

19 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頁 295、353。

教士的記載，船型應是 Junco 船。[20] 又頁 275，謂 1596 年有艘馬尼拉開往美洲的西班牙大帆船（galleon）San Felipe 號在長崎發生船難，但此船是因風暴漂流至土佐，至於同年底發生所謂「二十六聖人殉教事件」，傳教士被處死的地點則是在長崎。[21] 同頁謂豐臣秀吉死於 1597 年，但應是 1598 年。

在翻譯方面，如當時文獻提及的 Chincheo，全書均譯為泉州，但應為「漳州」之譯音。而頁 261 介紹漢人的「tibucao 貿易」，這種商品當時從臺灣走私到福建，作者猜想 tibucao 是鹿皮、珠子或菸草，但 tibucao 應是 sibucao 之訛寫，指蘇木。

（四）譯名稍顯紊亂

此書係作者以英文撰稿，再由阿美族作家那瓜（Nakao Eki）譯成中文，人名、地名的譯音選字頗值得商榷。譯者亦意識到此一問題，故於頁 435-436 有〈譯者說明〉一文說明其譯字原則，強調如有通用的譯法，則沿用，其餘創新譯名採取「向舊看齊」原則，亦即本書是以十七世紀臺灣為主題，所以漢字的譯音是以「Hō-ló 而非北京語發音為標準」。

譯者採取何種原則，此事應受尊重，但不論原則為何，全書譯法應有一致性，惟全書有關人名的翻譯卻頗不一致。以西班牙人的姓名翻譯為例，至少出現五種譯法，如頁 55 有人名 Francisco de Vitoria，此書譯成「維多利」，此字一般多譯作「維多利亞」，譯者省其尾音，不知何用意，如照十七世紀閩南語譯法，或可譯為「微多里啞」。

1626 年，從大員逃回澳門的 Salvador Diaz，譯名為「黎華鐸」，這是漢式姓名，似是取 Di、vador 合成，即以外文之姓為姓，名為名，這是另一種形式。但頁 271，有位 Fernandez Quirós 則譯為「費奇若」，似是 Fer 加上 Quiró，改以名為姓（費）、以姓為名，這是第三種形式。又 1597 年，地圖的繪製者 Hernando de los Rios，譯名為「的羅留」，似是 de、lo、rio 等音合成，各取首音節之音，這是第四種形式。

20　現存三份有關此事件的文獻，記載其船型是 junco 或 champana，而非歐洲船型。參見 José Eugenio Bora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Vol. I, pp. 3, 4, 11.

21　有關此兩件事的研究可參見松田毅一，〈サン・フェリーペ号事件に就いて〉、〈日本二十六聖人の人名に就いて〉，均收於氏著，《近世初期日本関係南蛮史料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67），頁 853-908。

又如 1630 年代，傳教士 Jacinto Esquivel 譯為「艾基水」，這是以姓為姓名，屬第五種形式。而且此「水」字不知何據，閩南語之「水」字，讀音與「vel」差距甚多。

有些字詞，有通用的漢字譯法，如頁 18 英國船長 William Adams，譯為「阿當非」，此人是十七世紀日本史中的「三浦按針」，中譯或可援此為名；又頁 414 的 itowappu，即日本的「系割符」制度；頁 163 的 Lamey，譯為蘭美島，應註明乃今之小琉球。[22]

至於往來美洲與菲律賓之大帆船 galeon，本書譯為「傀儡王船」，固有巧思，但若讓讀者誤謂此船與「傀儡」有關，徒添困擾。西班牙文之字根 “-on” 有大的意思，字根 “gale-” 與 galera、galeza 等字有關，原指以划槳為動力的船隻，但 galeon 僅賴風帆為動力，故 galeon 似可意譯為大帆船或音譯為「卡列翁」。不過，人名、地名、品名等翻譯上的問題，不應由本書的譯者獨自承擔，早期臺灣史的研究者們似應儘早討論一套較妥適的翻譯用語。

筆者提出前述個人淺見，並非意指此書有什麼大的缺失，相反的，這是一本好的著作，對早期臺灣史的研究貢獻甚大，也將是此一領域學者必讀之書，筆者讀畢此書，深深感佩作者的用心與寫作企圖。

總之，本書呈現出一位現代西班牙學者對臺灣早期歷史的詮釋，不再從殖民帝國、貿易擴張、景氣循環等觀點論興衰成敗，而是從人（或歐洲人）的集體心性來觀察，即文藝復興式的志業與巴洛克式的悲劇結局。整體而言，這是一本相

---

22 關於翻譯問題，本文審查人另提供其看法，因有助於讀者閱讀該書，故摘述如下：「至於譯者不只是譯法的不一致，書中甚至出現同一名稱有兩三種不同譯名，如 Felipe 有譯為腓力、腓力普、斐理……。頁 149 的 cavan 是菲律賓穀物的計算單位，1 caván 大約 75 升，應註明其換算的方式，而非譯為一袋，會令人誤以為是 1 saco。頁 257 的 mantles 有誤，應為 mantas，從十七世紀西班牙語和閩南語雙語辭典 *Arte de la Lengua Chiõ-chiu* 出現的「四綑布：4 fardos de mantas」、「四扐布：4 palmos de mantas」、「四疋布：4 mantas」、「四搙布：4 braças de mantas」、「四尺布：4 terçias de mantas」及「四寸布：4 pulgadas de mantas」，即可知道「manta」指的是「布」。（參見 Melchior de Mançano, *Arte de la Lengua Chiõ-chiu,* 萬曆 48 年（1620），藏於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圖書館，頁 23、25、27、30）一般用來指稱棉布。頁 287 的「real de a dos」指的是二里爾。頁 384 的 quintal 應說明清楚，雖然 1 quintal 等於 1 pico，但十七世紀的閩南人是以「pico」來代表閩南語漢字的「担」。參見 Melchior de Mançano, *Arte de la Lengua Chiõ-chiu*, p. 28.）1 担（pico）約 100 斤（cates）。（參見 Fernando Iwasaki Cauti, *Extremo Oriente y Perú en el Siglo XVI* [Madrid: Mapfre, 1992], p. 54.）quintal 或許保留原文較為適合，其換算方式為 1 quintal，約 100 磅（libras），等於 4 arrobas。（參見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I, p. 1712.）

當有特色的歷史著作，不似通俗著作之雜抄併錄而無觀點，亦不似學位論文之艱澀且多術語，反而以豐富的原始史料為基礎，表達出一位現代西班牙學者對十七世紀臺灣史的觀察；或者套用作者的話說，是鑽研臺灣歷史多年的「體驗」，換言之，這本書固然是寫當年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但何嘗不是鮑曉歐教授的臺灣史體驗。

引用書目

G. Cœdès（著），蔡華、楊保筠（譯）

2008 《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北京：商務印書館。

松田毅一

1967 《近世初期日本関係南蛮史料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

金國平

2000 〈O Pinhal 與 El Pinal 考〉，收於金國平著，《中葡關係史地考證》，頁 324-343。澳門：澳門基金會。

翁佳音

1998 《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2008 《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

康培德

1999 《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出版社。

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José Maria Álvarez）（著），李毓中、吳孟真（譯）

2006 《西班牙人在臺灣（1626-164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陳宗仁

2005 《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9 〈福爾摩沙的憧憬及其夢碎：讀《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26: 28-30。

陳國棟

2005 〈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收於陳國棟著，《臺灣的山海經驗》，頁 451-478。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湯錦台

2001 《前進福爾摩沙：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臺灣》。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楊宗霖

2009 〈評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大歷史學報》44: 205-218。

楊彥杰

1992 《荷據時代臺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歐陽泰（著）、鄭維中（譯）

2007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鮑曉鷗（著）、那瓜（譯）

2008 《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北：南天書局。

鄭維中

2004 《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臺北：前衛出版社。

韓家寶

2002 《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

Álvarez, José Maria

1930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Barcelona: Luis Gili.

Borao, José Eugenio

2009 *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The Baroque Ending of a Renaissance Endeavou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 Press.

Borao, José Eugenio, et al. eds.

2001 *Spaniards in Taiwan.* Taipei: SMC Publishing.

Chiu, Hsin-hui 邱馨慧

2008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Boston: Brill.

Wills, John E.

2002 *1688: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稿　約

一、《臺灣史研究》為季刊，每年三、六、九、十二月各出版一期，刊登有關臺灣史研究之中、英文論文、學術動態、資料介紹及書評。

二、投稿者請依本刊撰稿體例。

三、投稿請寄文稿一份；經審查接受之文稿，再附磁片。

四、已接受刊登之論文，作者需繳交「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俟紙本出版後，電子全文將刊登於本所網頁。

五、作者可獲得當期《臺灣史研究》五份、發表之著作抽印本五十份，及可能衍生的出版品。

六、經《臺灣史研究》發表之論文，由作者自負文責。

七、來稿及通訊請寄：115 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收；或將電子檔寄至：twhr@gate.sinica.edu.tw

八、來稿以未發表者為限，轉載請知會本刊。

Guidelines for Submission of Manuscripts

1. The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HR*) is published quarterly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of each year. It publishes articl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announcements, documents and source materials, and book reviews on historical subjects of Taiwan.
2. Preparation of manuscript for submission should consult the style sheet of the *THR* as a guide to format.
3. Please send only one paper copy; and if the manuscript is accepted following the *THR* review process, an electronic file (either a diskette or CD) will be required.
4. Before manuscripts are published in the *THR*, contributors are required to fill ou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uthorization and Consent Agreement". Upon publication of the manuscript in print journal, its electronic version in verbatim will be published on the *THR*'s web site.
5. Contributor will be entitled to 5 copies of the issue of the *THR* in which his or her work is published, as well as 50 copies of offprint free of charge.
6. Articles in the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represent neither the views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or those of the *THR* editors. The contributors ar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statements, whether of fact or of opinion.
7. All inquiries and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The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or to the following e-mail: twhr@gate.sinica.edu.tw
8. No manuscript will be considered if it has been published or if it is currently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reprinting of the journal's article requires prior notice and permission from the *THR*.

《臺灣史研究》撰稿體例

一、本刊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出刊。本刊為一學術性刊物，刊行臺灣史研究之相關著作。凡屬此領域之學術論著（中文不超過四萬字，英文不超過30頁為原則）、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之相關短論（五千字為原則）、書評（三千字為原則）、研究動態與文化活動報導（三千字為原則）等，均歡迎惠賜稿件。文稿請用橫式寫作。論著請附中、英文摘要，各以一千字為限；並附關鍵詞。

二、英文稿件格式，請參照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三、中文格式部分

㈠本文部分

1.正文及註釋，平常引號請用「 」標示，書名、期刊用《》，文章篇名和碩、博士論文用〈〉標示。臺灣之「臺」，書名或文章名，無論中、日文，均依照原書、原文之寫法，除此之外，內文中遇有臺灣之「臺」，一律採用繁體寫法。

2.中、日紀元（西元紀年）的情形，一律採用「咸豐 2 年（1852）」的形式，若單以西元紀年表記則不在此限。

3.括號一律採用全型（ ）；雙括號時，以（〔 〕）的方式表示。

4.文中數字與西元紀年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5.正文中引用外文文獻之「書名」、「引文」、「專有名詞」時，必須附中文翻譯；凡正文中使用特殊字型如明體改楷體、加粗或斜體等，強調特定語詞時，須加註說明，方便讀者閱讀。

6.獨立引文每行前後均空二格；遇多段之引文，則每段開頭多空二字。正文內之引文，請加「 」；若引文內別有引文，則使用『 』表明。引文原文有誤時，應附加（原誤）。引文有節略而必須表明時，不論長短，概以節略號六點……表示，如「×××……×××」；英文句中三點...，句末則為四點....。

7.註釋號碼，請用阿拉伯字數碼表示，並請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8.所附之照片、圖表，需於縮版印刷後，仍然清晰可辨識。說明文字、數字及符號，須與內文一致，並以橫列為原則，由左至右書寫；如需直寫，則由右而左。表、圖均需編號，並加標題於表之上、圖之下；相關說明文字，則均置於圖、表之下。

9.文章或註釋當中，若出現作者「按」，無論係改正錯誤或僅為說明文字，均採取〔按：╳╳╳〕之形式表示。

㈡註釋部分

1.註釋中，作者與譯者之表現方式，如各僅為一人時，二者間以頓號表示，如「╳╳╳著、╳╳╳譯，……」；若作者或譯者有二人以上時，以「╳╳╳、╳╳╳著，╳╳╳譯，……」或「╳╳╳著，╳╳╳、╳╳╳譯，……」之方式表示之。

2.正文及註釋，平常引號請用「 」標示，書名、期刊用《》，文章篇名和碩、博士論文用〈〉標示。

3.論著註釋，請依下列格式加註：

第一次出現時：

(1)專　　著：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年分)，頁碼。

(2)論文著作集：作者，〈論文名〉，收於編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年分)，該文起迄頁碼。

(3)期 刊 論 文：作者，〈篇名〉，《刊物名》期：別（年月)，頁碼。

再次出現時：

作者，篇名或書名，頁碼。

同出處連續出現在同頁時，採「同上註，頁碼。」之形式標示。

4.註釋中若遇合刊之期刊，以《期刊名》3：3/4 的形式表示。

5.註釋或參考書目中之頁碼，以頁 1、2、3-4 的形式表示（採用頓號、以-取代～）。

6.文叢、研叢及原刊年的表現方式：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47 種，1957；1852 年原刊)，頁 11-12。

7.期刊卷期之後需附上出版時間，或簡（只有年代）或繁（年月均有）皆可。

8.報紙的表現方式：

第一次出現時：

〈標題〉,《報紙名稱》，年月日，版次。

再次出現時：

〈標題〉。

9.引用電子資料時，請註明下列資料：

作者 (年代),〈篇名〉，下載日期，網址。

㈢引用書目部分

1.全篇論文之後，需詳列引用之書目。不分期刊論文、論文著作集，或是專著，中、日、西文並列時，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中、日文書目，可按作者姓名筆劃，西文書目依字母次序排列，姓在前，名在後。

2.引用書目中，若有版本或原刊年等說明文字，皆於該書後加括號說明之。

3.書目範例：期刊論文、論文著作集、專著書目，依下列格式編排之。

(1)期刊論文：

王世慶

1985　〈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的關係〉,《臺灣文獻》36(2): 107-150。

Coe, Michael D.

1955 "Shamanism in the Bunun Tribe, Central Formosa." *Ethnos* 20(4): 181-198.

(2)論文著作集：

松田吉郎

1992 〈臺灣の水利事業と一田兩主制〉，收於陳秋坤、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頁 105-13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Bourdieu, Pierre

1976 "Marriage Strategies as Strateg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Forster, R. & O. Ranum, eds., *Family and Society*, pp. 117-144.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專著：

曹永和

1985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Shepherd, John R.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史研究

第十七卷　第一期

編 輯 者　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02)2652-5350
傳真：(02)2788-1956
劃撥帳號　17308795
製版印刷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716 號 8 樓
電話：(02)8227-8766
定　　價　新臺幣 200 元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ISSN 1024-2805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17 NO. 1

CONTENTS

Tribal Consolidation of Formosan Austronesians under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 *Peter Kang*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Problematic Military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Claims of Count Maurice Auguste comte de Benyowsky in Formosa during 1771 ······ *Ian Inkster*

Rice Price and "Tai-yun" in Mid-Qing Taiwan (1783-1850) ······ *Ling-ching Wu*

Old Customs Made New: Transformation of Kazoku Customs in Colonial Taiwan (1898-1943) ······ *Wen-liang Tseng*

How to Write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under U.S. Aid in Taiwan: A Critical Review ······ *Wen-Hua Kuo*

Review of *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1626-1642: The Baroque Ending of a Renaissance Endeavour* by Jose Eugenio Borao ······ *Tsung-jen Chen*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March 2010

ISSN 1024-2805